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昏行:蓝鸿勋散文杂文随笔论文集:(1992~2008)/蓝
鸿勋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311-03143-5

I. 黄... II. 蓝...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9921 号

责任编辑 张利洁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黄昏行

——蓝鸿勋散文杂文随笔论文集(1992—2008)

作 者 蓝鸿勋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145-5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自序

“短笛无腔信口吹，衣衫不整下堂来”！我的一些短文终于结集到一起，成其为书了。

书之序，如嫁衣，本应延请名家手笔，但请托之作也往往抹不开请托之情，一个好字说到底，难免过誉。加之，收进本书的拙作，多系茶余饭后的闲话，不登大雅之堂，因而也就不敢有劳名家了。

吾非文人。之所以写得几篇散碎文字，还得感谢老友杜满仓同志。大概是1992年吧，时任《平凉日报》总编的他，见我寂寞得可怜，便鼓励我学习写作，并答应帮我把关、润色，这才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拿起了笔，或谓自言自语，或谓友间闲聊，一篇篇地写了出去，也一发而不可收。那久经劳累和已被世事磨得迟钝麻木的心，忽于此刻苏醒了。童年的放纵，年轻时的鲁莽，战火中的亡命，政治风浪里的彷徨，倒下去的战友，乃至一些同志的人生坎坷，都在脑海里清晰了起来。许多已经模糊的身影，隐约的年代，以及早

已被时光淘洗得只剩下蛛丝马迹的往事，一起跑到了思想的前台，让人无法平静。

孤独感，一直是我的一道无解的方程。这倒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历史环境的使然。记得我刚懂事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爬在大人的背上，挤在大街的人群里，目送那些穿灰军装的士兵开赴抗日前线，但到背起书包上学时却成了“亡国奴”；1943年逃出沦陷区回到老家，本应回到生活的平静，但在“地头蛇”的强权压榨下又陷入了贫困与失学；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可好景不长，参加革命不久便又被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挂”了起来，待到“验明正身”，重新启用，却又面对了一场彻底的大变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人重新踏入了迷惘与困惑。所以，当这一切的一切如潮水般自身边退去，心灵已不为苦乐升沉掀起波澜，只在那里平静地照鉴世事的时候，体味更多的便是那种无以名状的孤独。“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宋·张先《千秋岁》）总想寻找一种直白的语言相对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上的感触，哪怕它是不受欢迎的逆世之音，也不想迎风凑趣，哗众取宠，或挤进什么圈子，成为什么亮点，俯仰由人。我就是我。借用艾青诗中一句话：“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

“灵魂只宜独行”这话记不起是谁说的了。但它却说明孤独非孤僻，亦非自外于现实的自我封闭与逃避，而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寻求的脚步，居尘出尘，敢执一理。1553年，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在《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一书中首次提出血液循环的见解，被宗教法庭以异端罪处死；1600年，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并对这一学说有所发展的布

鲁诺,也被宗教法庭以异端罪烧死在罗马。但历史也终于证明他们的脊梁是直的。在我国,如今不光是知识界与思想界,就是老百姓也对那位上“万言书”的元帅彭德怀,为“人口论”而遭围攻的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以及那位放着乡党委书记不好好当,偏要站出来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让良心透了口气,却不得不离职流浪去打工的李昌平等人莫不交口称赞。这种现象,进一步证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同时,它也说明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这个社会都需要一批正气盈胸,刚介自守,不慕权势,不图富贵,敢于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的“孤独者”来为这个社会的底层人民鼓与呼。尽管这会遭到庸人的白眼,世俗的非议,乃至个人的不幸。

我一直喜欢刘畅园的几句小诗:“黑蜘蛛在墙上结网/六月的蚊蝇/这是陆地上的故事/我走了,到海上去。”至此,本应结束,但意犹未尽的他又接着补充到:“把梦卷起/不占茵茵一席地/小骆驼带走了驼铃/我仍有雄浑大戈壁。”

诗言志。看来,诗人是掂得出“一席地”与“大戈壁”孰轻孰重的。人这一生,争取是一种选择,但如果有比争取更重要的选择时,退让也是一种选择。“要”是一种选择,“不要”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是一种选择,放弃选择还是一种选择。我当然欣赏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司马迁之蒙辱修史,谭嗣同之横刀一笑。但我也更欣赏那必要时刻的决然放弃,如陶潜之归隐,屈原之投江。因为搏动着的心本来就是一腔热血而已。倘没有了骨头,肉体会软瘫下来;倘没了血性,骨头也会散瘫了下来。

“人生何必读书史,直掳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

笔墨之外见主张”。一代画圣郑板桥于二百多年前写的这首诗,也许于现在还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几年,也许是我那些“豆腐块”惹的事,认得不认得的同志找上门来,都要我讲什么写作方法与诀窍,实在令人尴尬。但仔细想想,若讲体会,也不能说一点没有,那就是孔子讲的“思无邪”,朱熹将其释为一字:“诚”。其实,让我说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知道,孔子一生的主张是“仁”,提倡的是“礼”,但其写《春秋》编《诗经》的指导思想却是“思无邪”——实事求是,所以才有了“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而《诗》三百篇中,歌颂爱情与诅咒残暴统治的篇章也俯拾皆是。写作,对作者而言,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对读者而言,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其作用是辩证以引导思维,析理以启迪心智,抒怀以陶冶情操,因而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寒潭秋水之篇章。但所有这些却都只能来源于实事求是——“思无邪”。否则,你就是能把死人说活,也不一定能引起活人的共鸣。

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本指科学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但在写作上却是一种升华。看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实则裁奇夺崛,是实话直说难以体现的真情实意;读之如话家常,事无巨细,行云流水,但在进退上下、开合起落之间,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民生之烛照,正义之呐喊,光明之礼赞,世俗之深尝。一如美术中之素描,看似一片混沌,但在黑白、强弱、虚实、松紧、明暗的线条对比中,却能让人看出画家表达的思想,矛盾的对立统一,而不是照猫画虎。所以,写了《文心雕龙》的刘勰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便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

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文,是一只“眼”——一只从平坦中看到不平,从繁华中看到堕落,从世事的千变万化中看到丑恶与危机的慧眼。

文,也是一颗“心”——一颗忧患的心,一颗痛楚的心,同时又是在苦难中保持清醒,在万丈红尘中保持深沉的反思与追问的仁心。这颗心,如果一旦被物欲消蚀而麻木,那文也就消弭了向善的动力与前进的勇气。

文,更是一个“人”——一个在行走着、诉说着,在用自己的灵魂、气质、血肉去歌、去哭、去爱、去恨的人。坚守阳刚之气,坚持贵张的精血,勇于担当。所以,文不在于拯救世界,而在于坚守——坚守自己挺立的“人格”。文若一旦被名利地位抽走了“人格”,无终极之人文关怀,无大忧大悲之情怀,没有了思想,那文也就很难称其为文了!

当然,走出虚妄,实事求是,也是一桩既讨人嫌又煞风景的事。但与虚伪唱一反调,砭当砭之事,究须究之理,该怒则怒,该怨则怨,该释怀处且释怀,庶望有益于世道人心,亦可聊以自慰。不过,写作毕竟是一种有诉无求的事,也不可看得太重。鲁迅被誉为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但他也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眼下中国,如果几篇文章议论一下便能使腐败分子良心发现,金盆洗手,那恐怕也太天真。青灯黄卷,青史留名者几?夜雨敲窗,笔耕不辍,传诸后世者谁?“立言”也者,不过尔尔!

我的这本集子共收进我的散文、杂文、随笔、论文等共124篇,均系我离休后发表在省市报刊的文字,故名《黄昏

行》。十余年辛苦，一朝回顾，倒也令人欣慰。但我心灵深处的那份清醒也仍然活着。我虽非“桃花源”中人，亦未淡漠于时事，但毕竟游离于生活的漩涡之外，耳目不灵，垂垂老矣！对我而言，作为消闲方式之一的写作，只能是兴致所至的信笔涂鸦。至于经世济困，文治武功的大事，自感缺乏政治智慧，无缘谈起，也不敢涉足。我明白，我只是一名垃圾文字里的旅游者，我的文字将很快死去，只是为了不死的心，也为了读者不弃的情，我将继续拿起我那支不知天高地厚的笔，在这所剩无几的黄昏中，放歌而去，走尽人生。

2008 年重阳

目 录

自序	(1)
黄昏行	(1)
鹰	(4)
年关话酒	(7)
海之忆	(10)
听琴	(15)
尘世里的灯	(19)
七月的记忆	(22)
关于思想的思考	(25)
絮语·闲话·清谈	(30)
因“风”说“气”	(33)
闲话“中庸”	(36)
说捧	(40)
说怕	(43)
说狗	(45)

2 黄昏行

说“猫”	(48)
说度	(51)
说权	(53)
胡批圣贤及其他	(57)
渐读渐识陶渊明	(62)
官为本还是民为本	(67)
“庸官”与“庸道”	(70)
学历与能力	(73)
读《岳阳楼记》	(77)
重读鲁迅	(80)
天增岁月人增寿	(84)
不朽的马克思	(87)
说钱	(90)
话“欲”	(93)
问“福”	(97)
辩礼	(102)
又见《风景》	(105)
当代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108)
忽然想起李友久	(111)
闲话“人民素质”与“现代启蒙”	(114)
闲话“和谐”与“和谐社会”之构建	(120)
“跑”的变迁与“跑官”	(125)
杞人忧天忧错了吗?	(128)
无题有感	(130)
说古道今话“卖官”	(133)
书与读书	(136)

且说“官气”	(140)
假话四议	(142)
善待“谔谔”	(144)
“论据”与“逻辑”	(147)
用自己的话讲	(150)
“吹牛学”导言	(153)
“泡沫”与“当铺”	(155)
商有德乎?	(158)
吃有道乎?	(161)
生活是什么?	(164)
灰色“辩证法”	(167)
“官傍”析	(170)
说“潇洒”	(173)
“仇富”论	(175)
朋友论	(179)
“小人”说	(185)
家之说	(190)
马克思是什么官?	(194)
“吃肉骂娘”析	(196)
崇尚拒绝	(199)
出警入蹕与送往迎来	(202)
谁是“青天”	(205)
漫话批评	(208)
也说“父母官”	(211)
碰到的与想到的	(214)
另一种腐败现象——混	(217)

“减官”与“减负”	(220)
“当官”与“官当”	(223)
“明白”与“不明白”	(225)
不戴“平民眼镜”与“甩包袱”	(227)
“3·18”随想	(230)
“从干部看党”	(234)
也说落不实	(237)
非信无以立人	(240)
宁无愧乎?	(243)
傲骨与傲心	(245)
警惕霸气	(248)
苏哈托与梁武帝	(251)
闲话女性美	(253)
“文明之战”与战争的“文明”	(256)
讽喻诗录粹	(260)
“假”的沉思	(262)
再说“真抓实干”	(265)
正气与勇气	(268)
“数字打假”该动真的了	(271)
小议认钱与认权	(274)
等价交换的异化	(277)
又到九月九	(279)
难找“儒商”	(281)
“负性情绪”辨	(283)
呼唤杂文	(285)
商品市场“疲软”析	(288)

腐败分子的特征	(290)
经济管理有无道德率?	(293)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坚持“两手”都要硬	(295)
“权”与“罪”	(299)
钱与人	(301)
老友	(305)
且说“我看……”	(3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11)
说义利	(313)
学孔繁森当学其真情	(315)
读出幽默	(318)
从艾科卡降薪说开去	(321)
反腐无需唯心论	(324)
庄子、孔子与开发	(327)
闻瑞丽市提高教师工资有感	(330)
关于“海”的思考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化”	(335)
欣闻沪上“卡拉”不“OK”	(338)
回扣的负效应	(340)
令人担忧的换车风	(342)
“合理的利己主义”合理吗?	(344)
“劳动”与“劳动价值论”	(347)
聆听弱小者的声音	(351)
我的学习总结	(354)
也谈生意难做了	(359)

6 黄昏行 _____

官格与人格	(361)
实绩与不实之绩	(363)
《蓝光闪过之后》	(366)
附一:诗十四首	(369)
附二:我的回忆录(之一)两个母亲	(373)

黄昏行

好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黄昏散步的习惯,晚饭后便沿着小城那条唯一的长街走去。

“安步当车”,语出《战国策》之《齐策·四》。一个叫颜斄的齐国高士为维护自己做人的节操,凛然辞别自以为是的齐宣王时所讲。但我却是为了健身。如苏东坡言:“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夜野营常州城外》)

秋天的黄昏,西风伴夕阳,流光正徘徊,看着马路上被阴影逼着一步步很快退走的阳光,心里便平添了一种莫名的凄凉。

时不时有缠绵依偎的恋人与踽踽独行的老人擦肩而过。看得出,恋人心里是喷薄欲出的激情,老人们脸上则是城府很深的平静。有时也邂逅几个喝多了酒的年轻人,脸上涂满欢乐,一步一个趑趄,让人发笑,也让人看着担心。不过,更多的还是马路边摆摊的下岗工人,喧嚷着,拥挤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过去,浏览一下他们那虽然价廉,

但却早已过了时的货色。

有麻辣烫刺人鼻孔的气息扑面而来,有烤羊肉串的烟尘漫天飞舞,从饭店楼窗飞出的猜拳声时隐时现,从歌舞厅传出的打击乐震耳欲聋。市井的黄昏,犹如一盘拼杀未了的残棋,虽然就要曲终人散了,但却变幻无迹,年轻的男男女女裹挟其中,任凭自己在命运的河道里冲撞,体验着生命的繁复与岁月的无常。

蓦地,有几个流浪者向小餐馆门前放的泔水桶凑去,左右环视了一下,便把那黑黝黝的手探进了桶。我不相信他们从那漂着油花却很少实质内容的污水里会捞到什么,但我心里的平静却被他们那慌悚无措的神态吞噬殆尽。思维如电闪,许多过去的事在头脑里碰撞、重叠、融合,使我感触到了生命的变化,也使我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我”。

然而,找到了也不愉快。如今的“我”,是取掉了“我为人人”,只留下“人人为我”的那个“我”,大半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钱为中心,钱以外的事情糊涂一点,麻木一点,倒还快乐。

脚下不时传来落叶沙沙的破碎声,天光渐暗,黄昏将去,我的思绪依然很乱。有人说,黄昏是理性的终结;有人说,黄昏是堕落的时刻,而连同那堕落的方式,难道也像这黄昏行,没有限制,没有尺度,信步而行,放纵自我,让心灵沉没?

不过,由衷地讲,我还是欣赏那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尤其在这能见度很差的黄昏时刻,比起跟着感觉的跑,自欺欺人地飞,自吹自擂地跳,厚颜无耻地爬,摇尾乞怜地跪,要实

在得多！

黄昏在薄薄的暮霭中倾诉/那落叶带走的梦/谁也无法忘记/从尘埃到祈愿/多少理想沐浴其间/时光打在脸上/那熟悉多年的风雨/像一阵歌唱/随风飘逝/不过/此时此刻/我已能举起那破碎的花朵/独自离去……

这是谁写的诗,记不起了,其中的词语或许也有讹漏,但它却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多年了,一直伴着我在这黄昏中的街头行进……

1998年3月26日

鹰

故乡的关山有种头上不长毛的大鸟，凶猛异常，群众称之为“雕”，或曰“老雕”，但其学名为“鹫”，也是一种鹰。

清晨，当清真寺里的诵经声徐徐响起，沉睡的苍松、翠柏一个个在迷漫的晨雾里挺出身影的时候，突然，一声凄厉，几只秃鹰，腾空而起，如箭离弦，直射苍穹！接着，几转盘旋，又掠过群峰，掠过急流高挂的峡谷，风驰电掣般地急转直下，在那远山与蓝天交汇的地方，刺破岚光，悠游而上，一任晨曦梳理它那闪闪发光的巨翼，悠哉游哉，倜傥不羁。让你在审美的愉悦中惊心动魄，更让你在美的陶醉中心旷神怡！

可惜！“万里因循成久客”，自从离开故乡以后，便再也没有见到过鹰。

“雪爪星眸世所稀，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漫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唐人高越这首诗，道出了如我故乡之鹰的那种气概。

“何处苍鹰掣锦绦，霜林飒飒洒寒毛，攫身万里层霄迥，侧翅三秋杀气高！”明人申时行的这首诗则形象地描绘出如我故乡之鹰的那种品质。

不过，还是陶渊明说得好：“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也许才是鹰之为鹰的真谛！

但是，真正使我领会鹰的精神之可贵，还是读了高尔基的《鹰之歌》以后。听：

“天空中坠下一只胸膛受伤的……鹰……你流尽了血，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你那一点一滴的热血将像火花似的在黑暗的生活中发光，许多勇敢的心，将被自由、光明的狂热的渴望燃烧起来……”

它死了！但它“那一点一滴的热血”却“像火花似的在黑暗里发光”。这是什么光？我想，它应该是诗人们说的那种不屈的生命之光，也应该是古人说的那种生生不息、薪传缕继的兴灭继绝之光。不信吗？想想看，在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难道不正是那些翱翔于千山万水的长征之“鹰”；那些走马太行，奔袭于千里“青纱帐”的抗日之“鹰”；那横跃大江，直捣黄龙的解放之“鹰”的“一点一滴的热血像火花似的在黑暗里发光”，使“许多勇敢的心……燃烧起来”，才催醒了我们古老中华的这片热土，并进而缔造出如今这种波澜壮阔的高歌猛进吗！

鹰，是勇敢的鸟。它展翅长空，在狂风呼号中前进，在乌云翻滚中前进，迎着暴风雨，总在前进！

鹰，是不屈的鸟。即使是雷电交加，风雨如磐，它也要冲破黑暗，向前，再向前！追赶太阳，追赶时间！

鹰，也是美丽的鸟。它那一双疾风练就的伟翅虽无孔

雀那种迷人的华彩,但却有着一种阳刚美,如乌云之翻墨,如苍莽之耸逸;它那一双日月光华铸造的星眸虽无鹦鹉的妩媚,鸳鸯的多情,或鸽子般的那种知趣与顺从,但却有着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让你在迷惘中清醒,在沉沦中振奋,在虚荣与矫饰的诱惑袭来时,保持镇定。

是的,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却永远也达不到鹰的高度。“寄语燕雀莫相啄,自有云霄万里高”(李白《观放白鹰二首》)! 鹰的一生,总在浩渺无垠的天地间;鹰的快乐,是沐浴在晨曦的第一道彩霞里,歌颂光明,迎接太阳。

也许是一种固执吧,我总觉得城市的天空是失神的天空。虽然也有燕雀偶尔划出一两道生存或爱情的弧线,但了无生气,更没有那震惊人心的一声凄厉。其实,我知道:那生存鹰的天空实际上要远比鹰的翅膀凋零得早,留下来的,只有空旷与寂寞,它让人惶惑,也让人失落! 不过,我想那鹰的亮翅、鹰的律动将永远永远地在人心里徘徊、荡漾,让人把它当作一首诗,低吟、传唱……

1993年7月1日

年关话酒

酒这东西究竟是仪狄的发明还是杜康的创造，史说不一。但在四五千年前就能把酿化与发酵结合成复式发酵法，则不能不说是化学史的一大创举。

人是怎样发明酒的？说不清，但自这东西一问世便被人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入礼仪、进祭祀、佐餐、助兴、示贺、祝福、入药，还可寄情、抒情——把酒临风，赋悠悠之思；仰瓮狂饮，生豪气干云。有人断言，中国若没有酒，偌大一部中华史将黯然失色，更不能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国人好酒，醉态万千。有欧阳修那种少饮即醉的，也有卢纶那“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的酩酊大醉。黄庭坚，无酒不成诗，“四座欢欣观酒德，一灯明灭又诗成”（《谢答文善二兄》）；但刘克庄却“酒酣耳热说文章”（《一剪梅·夜钱于风亭》）；范成大“老去读书随忘却，醉中得句若飞来”（《分弓亭按阅》）；草圣张旭只要三杯入肚便“挥豪落纸如云烟”（《饮中八仙歌》）；一生落魄的杜甫，“得醉即为家”（《陪王侍御宴》）。

通泉野亭》);一生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却“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御街行》);刘伶一醉,便作骇世惊俗之举,脱光了自己的衣裳,“浩歌惊世俗,狂语任天真”(《醉书》);李白一醉便动感情,“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连”(《玉壶吟》);霸王一醉,豪情天纵,“力拔山兮气盖世……”;杨玉环则醉叹“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醉得仪态万方。此外,像辛弃疾“手推松曰‘去’”的林间自语,李清照“沉醉不知归路”的舟中忘情,都是醉成画卷、醉成经典的,无须赘述。

酒中诗、酒中文,负载着文化的积淀,也负载着人的使命感,是酒与人心的碰撞,也是物质与精神的化合中人对己生命意识与个人才华的释放。犹如放电,但它却是灵魂的放电。有道是:花看半开,酒醉微醺,诗酒乘年华。自古以来,文人便把酒与诗、书、琴、棋、画等融汇在一起,发思古之幽情,慨人世之沧桑,把自己的素养才情尽兴地挥洒,并生发出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陶渊明的《饮酒》与苏轼的《赤壁赋》等名篇巨制,风情雅事,流传千古,也令人神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同样的酒,为什么一到现代一些人的嘴里,便失去了它那原有的文化品格了呢?虽然也有“佳作”,但却不成体统。你听:“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还有什么“你也醉、我也醉,医院里面来相会,不要抱怨不要悔,反正医疗是公费”。如果拿这些与古人的酒中诗文比较起来,那可就真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了!

酒文化的江河日下,当然不能怪酒。但若完全怪人,也有失公允。平心而论,我们的干部一天不“吃公”就心里难

受的,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在酒桌上周旋,也是出于“公关公关,无酒不沾”的无奈。“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你不来这一套就办不成事!绵延了数千年的酒,如今已异化成粘贴“关系网”的“万能胶”、打通“关节”的“润滑剂”。酒文化,大变其味矣!

快过年了,也到了酒的消费旺季。傍晚归来,但见一间新开张的酒楼人涌如潮,稍一驻足,便闻其楼下卡拉 OK 歌厅一微醉的汉子唱道:“……来呀来,我的好妹妹,哥哥把你求呀,你可别皱眉头呀,人能几回醉呀,来他个酒醉人不醉呀,可别……”由此看来,酒文化者,人文化也!跟上有修养的人它就“乾坤大”、“日月长”,跟上修养低的人它就成为市井的地痞无赖,为所欲为。所以,古人说:“酒为淫乱之媒”,莫谓言之不预!

1999 年 2 月 14 日

海之忆

那是 1989 年的事了。组织上给了 8 个到北戴河疗养
的指标,有位老同志因故未去,只好由当时还在岗的我聊以
充数。路上紧赶慢赶,也未追上,待到疗养院,他们却早已
由院方统一组织出游去了。我一个人除了在疗养院花园的
甬路上徜徉,便只有到海边去欣赏那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
但却意味深长的景观。

自然天成的沙滩,沉静深情的水,水天一色的蓝,都把
人的心性过滤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让你的思想只有与海
的碰撞,有意无意地在心里编织着一个个连自己都感到荒
唐可笑的关于海的假设。似童话,又似传说。虽然都是胡
思乱想,可一旦把它抛向大海,又觉得它的光芒闪耀近似辉
煌。

一切都很清晰。这感觉甚至可以延递到许多年后的今
天。然而,这人生亦如眼前这海,有“沙鸥鸣唳,孤鸿飘渺”,
也有“落霞与孤鹜齐飞”;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也有“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孤帆一片日边来”！让人捉摸不透。我也曾想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像爬在这海的礁石上看海那样去俯瞰人生，但在一次次的感动与紧接着的一次次失败中，却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品味了那个只有一撇一捺的“人”字而矣！

人是什么？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给人下了著名的“政治动物”的定义，但卡西尔则视人为“文化动物”，生性严肃的康德不无幽默也不无道理地把人定义为“能够微笑的动物”，可黑格尔又断言：人是“性欲支配着的动物”。在对人的描绘中，最令人自豪的是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的那句“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但在愤世嫉俗的诗人维尼的眼里人却是“大自然舞台上从事表演的傀儡”。歌德说：“只有人能做出不可能的事情，让瞬间变成永恒。”而马克·吐温则认为“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说“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丑恶的”。话虽说的不客气，但谁又能说这些苛刻之词不真实呢？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还是相信孟子的观点：“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把这“四非”看得很高，视为仁、义、礼、智四德之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换句话说，没有作为“四德”之“端”的“四非”之心，人也就不可能称其为人。这便是人兽之别。

不过，孟子也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几希”——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它就

是思想,即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善恶观……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一点点”,那人便有可能退回到动物,成为穿裤子的猴子。这不是耸人听闻,看看媒体近些年的报道:公德缺失,诚信不存,尔虞我诈,敬业漠然,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滥贪滥占以及在“消闲”、“放松”、“时尚文明”掩盖下的胡嫖滥赌……,又与只有生存状态而无意识形态的动物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理想被出卖,高尚被耻笑,思想变得微不足道,但这又不能完全怪人。我国的文化曾是一幅尘封既久而又古色古香的老“水墨画”:茅屋秋风,长袍马褂,四世同堂之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但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全球化”的文化冲击,随着电脑智能化,随着电脑网络与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也使我们面对了一种巨大的文明落差。这种落差,曾使我们惊诧莫名,也使我们疑虑重重。但真正使我们面临困境的,却还不完全是技术与物质,而是文化、思想与精神上的消极体验与感受。如对社会多元化与价值多元化不习惯,感到矛盾;对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调整不理解,感到痛苦;对事事都靠竞争的现实不适应,感到困惑;对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与思想文化的互相渗透感到不可思议,无所适从,找不到精神支柱,对什么都感到“乏味”、“没意思”……,在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力、民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却又不得不面对人的心灵上的沉沦。一些人宁愿把宝贵的时间、精力消耗在虚拟世界的网上游戏与灯红酒绿的酒吧,狂歌滥舞,千金买笑,也不愿给现实一个真实的表示。笑语欢歌背后是日益加深

的无奈,华丽精美的服饰之下则是越来越掩饰不住的空虚与浮躁!

“我穷得只剩下钱了”!这句俏皮的流行语虽近夸大,但却不能不说是句实话。因为只有道德的力量才能使人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获得做人的尊严。它反映了以钱和物质享受定位于人生意义的那些人的异化,是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台戏,有人说它是一盘棋,有人说它是一条路,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梦、一把火,还有什么一首歌、一本书、一张网的说法,不一而足。但不管你怎么说,至少也要在感悟自己生命意义的时候想到:五光十色的时尚,潮起潮落的“热点”,炙手可热的权势、财富、荣誉、地位……,都是人的背景、环境。但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活着是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增添一点光彩的。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巴金《随想录》)。

“风萧萧兮易水寒……”是悲壮的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高雅的人生;“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是豪放的人生;“天子呼来不下船”则证实着人的伟岸与自尊。当然,所有这些也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但“人生壮阔如海”,只要你领会了人生之真谛,就应当像海那样,有一种悠然的心境,疏放的胸怀。要么,“行到水穷处”,要么,“坐看云起”,要么“一蓑风雨任平生”、“休唱《阳关》”!

所以,我爱海。尽管这一生我只见了一次海,而且也并未看到它那有如山崩地裂似的啸与万马奔腾似的怒,但我却体味了它那无与伦比的浩瀚与磅礴。无边的海,无际的

天,在天底下,海才大了起来,而在海的那个无限的平面上,天也才阔了起来。于是,这海边上的人也就小了。那种小,不是渺小二字便可述尽的。但偏偏又是人,装了一颗心的人,又把海看小了。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要宽阔的是人的心灵”。(维克多克·雨果)而人之所以会伟大也正源于此。

海边漫步,或走或停,或极目远眺,欲归还立;或放浪形骸,仰天长啸,浅唱低吟,无疑都是人生难得的情趣与意韵,不知是不是也算浪漫与悠然。但远海衔住的落日告诉我:人生是付出,是进取,而不是浪漫与放纵。如果付出停止了,不思进取,那生命也就像夕阳于海天相接处它所散发出的那片诱人的玫瑰红,很快消失。所以,人之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狂、可傲、可放纵自己的时间和理由。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方正洁白,可荤可素”。若如是,我想,我们就能够遣散头顶上那片乌云,在穿越光明与黑暗的过程中,欢乐如诗,悲伤亦如诗,宠辱不惊,放歌而行!

2005年“国庆”节

听 琴

“腊八”这天,向来不过年的我也一时兴起,忽然想到街上去看看那些忙过年的人都忙些啥。走着走着,一阵久违了的二胡琴声使我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那磁性之音,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愉悦,脑海里那些扰人的思绪在悄悄融释,并在扑面而来的音响中归于宁静。然而,随着揉抖颤滑的指法与弓法的变换,不久,那琴声便如乱石穿空中的山泉小溪一般,含着沧桑与感慨,流淌出了哀婉、苦涩而沉重的旋律,似叹似泣,有些空旷,又有些悠远,像席卷我灵魂大地的阵阵秋风,让人感伤。

中国的乐器,如琵琶古筝,一经拨弄,那高山流水般的叮咚之音便使人有了思古之情。想起高人韵士,红妆翠袖;想起松下问童子的茫茫意境;想起“焚琴”的俞伯牙,或“唱彻阳关泪未干”的辛弃疾与“仰天长啸”的岳飞。但二胡就不一样了,它是“市井”之音,凄艳而不绝望,忧愤而不疯狂,能把你的思绪拉得很远很远,让你聆听到岁月的感怀,青春

的记忆,可一个变奏又把你的思绪拉了回来,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当然,二胡也怅惘,但比琵琶古筝现实、具体。它的怅惘,其实就是民间的疾苦声。

我终于站不住了,挤进人群,才见操琴者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头不抬,眼不睁,好像正在与手中的琴诉说,又好像在用那把琴说什么。与其说是拉琴,还不如说是一个微弱的生命在苦难里踽踽独行,是生命的诉求,或是生命的哀叹与抗争。如淅淅沥沥的苦雨,亦如萧涧寒泉,叮叮咚咚,有一种生命深处的震动与冲击,让我一下子便沉浸在那展示了人间一切悲欢离合的旋律之中。

老人面前有纸“告白”,上书:“家居内蒙,屡遭不幸,子媳全丧,唯留祖孙,街头献艺,实为生计,如蒙解囊,此生不忘。”老人身后有个七八岁的孩子,怯生生地望着围观者,也不时望着压在“告白”纸上的那只碗,碗里有几张毛票,看来还是解囊者少。我犹豫了一下,便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悉数放到了那只碗里,可这自以为是的慷慨之举,也只赢得那孩子惊诧的一瞥,那位老人,除了手中走动的琴弓,一如老僧入定,二目微阖,旁若无人。

人群里一片寂静。来来往往身份各异的行人似乎都要在这里停一停,听一阵。不时有人挤进来,也不时有人离去,所有的人都无声,无声地来,也无声地去,城市里的喧嚣与繁华都在这里被屏蔽于心门之外,唯有倾听。

一曲听罢,我快快离去。本想向这老者讨教一下他演奏的这支听来耳熟的曲子名称与来历,可在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神态下,全没了那个兴致。一路走我也一路想,恃才傲物这种气质是不是那些怀才不遇者所共有?

如行将就戮还弹奏《广陵散》的嵇康，“稽首肉袒，吹篪行乞”的伍员乃至“天子呼来不下船”的李白，不都这样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突然，那支曲子又自脑后飘来，同时还隐隐约约伴有一个苍老的歌声：“……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我一下想起来了，急速往回返，待到原处，只见那祖孙俩正相依偎着缓缓离去。望着寒风中那一高一低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中的往事也一幕幕地闪现了出来……

这支曲子叫《苏武牧羊》，原本是支古箫曲，“九·一八”后经人配词，流传于大后方。我第一次听到它是1942年。那年我随家兄逃出沦陷的北京，却又滞留在叶县，听那家人俱歿于战火的店掌柜演奏过。在斜风细雨中，在月光如水的长夜，随着琴音，让人感到一个孤独的灵魂醒着，一个不眠的心灵把对命运的拷问注入到琴弦里，如泣如诉，简直像哭，但他却没有拉出二胡那与生俱来的苦味。后来，辗转回到老家涇源，又听我们县上那位有着“学者”尊称的老文化馆长演奏过，运弓如行云流水，还有点悠然自得。那把普通而神奇的二胡哟！温情细腻，把人心里那点惆怅拉得一波三折，使人至今都能听到那声声叹息，但他也没能像乞者手中的那把二胡，拉出《苏武牧羊》的沉重、空旷与悠远。尽管也让人感伤，但那是悲哀而不是悲怆与悲壮；是激愤而不是灵魂的倾诉与抗争；是怀旧而不是蓦然回首的伤感；是沉稳而不是行走江湖的浪漫与安详。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苏武牧羊》余音袅袅，好像还在耳边回荡，眼前忽而是那荒村野店的店掌柜，忽而是那沉默寡言的老馆长，忽而又是那相依为命的祖孙俩，他们好

像都已化作云淡风清,向着天上、向着远方,缓缓飘去。“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无论是经过了多少岁月,也无论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经更改,我的记忆依然有如当年,清晰可辨。不过,我也总想:但愿不再让人重复那个时代的人的那种忧郁,也但愿不再有人去奏那音韵凄凉的《苏武牧羊》。

再见吧,《苏武牧羊》!

2005年1月19日

尘世里的灯

我一直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种说法不敢苟同。

书是什么？李斯在《苍颉篇》里说到苍颉造字时“仰观魁星圆曲之势，俯察鸟羽山川，穷天地之变，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霖，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这个记载尽管是神话传说，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字一出世，便冲破上古那鬼神专断的宇宙黑暗，使人类有了战胜自身愚昧的可能，它是尘世里的灯！

这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要制造标题效应。不正是因为有了书的负载与传承，使一代代的人在充分了解前人的思想、智慧、经验与人生感悟的基础上，逐步积累，才发展与创造了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吗？不难想像，如果没有文字写书，孔子无法成其为“孔圣”，马克思也无法成就其马克思主义。至于像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牛顿、爱因斯坦、孙中山、列宁和毛泽东这些对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伟

大贡献的人,如果没有文字与书,恐怕也不会传扬至今。

书,作为精神产品,基本都是精神世界的展现,都在以某种形式散发着某种思想的光辉,它照亮了历史的轨迹,也照亮了人的内心深处的幽微,把人从“自然人”提升到“社会人”,为人类孕育出一代代数不胜数的时代英华。所以,列夫·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它可以使你看到碧海蓝天,听到空谷足音,驰骋于千里之外,纵横于五千年间。人生的酸甜苦辣,事业的柳暗花明,覆雨翻云,乃至自己心灵深处的彷徨苦闷,几乎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世界上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由此,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终生不出其所在小镇的康德会成为哲学家,而一生拒绝出国的李敖却可褒贬古今,纵论天下。原来现实缺少的空间,却都能在书中延伸。这便是书的意义。

不过,如今的出版界也不敢恭维,鱼目混珠,无奇不有,冰雪之作如同“芳草美人”,隐遁于浮世之底,不易找寻。但是,只要善于选择与善读,“内求存道,外求趣美”,某些书还是不失为人的精神之伴侣的。有的,甚至还可撑起你的心灵空间,让你心无旁骛,神游八极。

我不否认书的功利性,也不反对功利性的读书目的。我总想,经过旧“读书无用论”的危害,如今又碰上新“读书无用论”泛滥的我们这一代人,只要能读书,总比不读好。但人之所以要读书,却决不是为了“颜如玉”与“黄金屋”。否则,至今保留在伦敦图书馆的马克思读书之处所深深留下的那一双脚印,便无法解释;否则,鲁迅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自己营垒”的明枪暗箭中还要钻进书堆,钩沉史料,

专心考据的这种学习精神，便无法理解；否则，我们对我们的前辈，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本“书”便如醉如痴，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顾，“甘洒热血写春秋”，也不可思议。

凝神于夜的深处，虔诚地面对书中那繁如星海的文字，我常常暗自思忖：天地间那些穿时空、跨时代，至今仍然掷地有声、动人心弦的宏文大作，难道不都是那些高贵的灵魂于漫漫长夜之中的慨叹吗？

有人说读书是兴趣、是爱好、是习惯。然而，对于忧国忧民之士，对于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共产党人，则只能是一种觉悟、一种使命和一种境界。遗憾的是，如今我们的一些干部告别读书久矣！忙交际、赶应酬、跑关系，硬是把大好的青春活力消耗在灯红酒绿之中，久而久之，即使有“老本”也要“坐吃山空”，何况，有的原本还“成色”不够呢？

《菜根谭》上说：“性定菜根香。”我看读书亦如此。如果不解决理想和信念问题，真正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我们干部队伍里，将很难有人以书为伴矣！

2000年8月11日

七月的记忆

又是黄风阵阵、热浪滚滚的七月。

五年前的七月，在这黄土断崖前，我送走了小华。

在她行将进入那座孤坟的短暂时刻，我情不自禁地掀起那袭白布。啊！她的面容竟如此安详、平静，她似乎知道何以为终矣！“小华华，泥娃娃，一捶打到案底下，案底下一个鬼，把泥娃娃吓个美……”我耳边似又响起这孩子小时爱唱的那首儿歌。

那是她两岁那年的事情了。由于其父母离异，岳母把她从法庭上背回来，一进门她便唱起了这支歌，对于这个新家，她似乎一点也不陌生。但这孩子也不合群，除了家里人，她和谁也不接近，很少到孩子堆里去。有时，她就真像个泥娃娃，盘腿坐在炕上，微微摆动着上肢，摇啊摇，嘴里便哼出那让人听熟了的歌：“小华华，泥娃娃……”

小华上初三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她那长着长睫毛的杏核眼里似也多了一层阴影。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

“姑父,让我跟你姓吧!你不就是我爸爸吗?”我无言以答。因为她爸爸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但我也因此而伤了孩子的心。在她扭头离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她身上好像缺了点什么……哦,对了,她没有当时学生都有的那个红袖章。我这才明白了她要改姓的原因。此后,由于我也陷入运动,很少见到她。有天晚上,不知她怎么一下便溜进我那已被人严加看守的单位宿舍,神秘兮兮地悄声告诉我:“姑父,我们把街上揪你的那些大标语都撕了”……我心头不禁一震,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蠢!”可马上又后悔了,怎么能怪孩子呢?我用眼望去,她却正冲着我傻笑,脸上那股阴霾一扫而光。同时,我发现她那原本空着的左衣袖上也终于有了一个红袖章。

不久,我听说这孩子与她的几个同学徒步去了延安,又从延安徒步走到北京,还参加了检阅,我真为她高兴。可是,从此以后,她便也一步步遭遇厄运。复课后她没能和同学一起转入高中,参加了工作又被分到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工厂去做工。后来,她奶奶做主把她嫁了人,可丈夫的工作又在千里之外,待我从运动中挣扎出来,她已是孩子的母亲,且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小华的病终于被证实是一种不治之症,手术后也仅维持了两年。当她最后一次来看我时,脸上那股不安的寂寞让人心寒。那是病魔的缠绕,也是心灵的消蚀。我的脑海里,不知怎么一下便闪现出鲁迅那句严酷的话:“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是死亡……”

我的目光越过孤坟,越过断崖,越过那些高低不平的土地,视线终于渐渐模糊……噢!下雨了。天上的雨水,我的

泪水,原本都是水,但对于孤苦无依的小华又有什么用呢?

她忠于“真理”,“真理”却抛弃了她;她忠于生活,而生活也欺骗了她……

去吧,孩子!在那些年头,被欺骗、被抛弃,以至被愚弄的弱者又何止你一个?然而,不知何故,我的记忆却至今也走不出那个惨淡的七月……

1996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思想的思考

星期天上街，两个小孙子忽对心语照相馆橱窗里摆的那尊维纳斯石膏像有了疑问，爬在橱窗玻璃上，一个问一个：“她在想什么？”刚上小学的那个说：“她大概想她的胳膊丢到哪儿了吧……”

儿童真是意念和灵感的源泉，他们以不经意的天真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贫乏。

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我们拥有了五光十色的商品，也拥有了各式各样的流行观念。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却有如“理发师”，在欲望泡沫充斥的空间里，正以它那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修理着我们的脑袋，让我们于无形中放弃了原有的思想，也放弃了对现实的思考。

有人说，维纳斯是美的化身，而我看她更像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但她在想什么？她要告诉我们什么？与其说她要告诉我们什么，还不如说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姿态——思想着的姿态。如果说美，那也是一个思想者在精神王国

里遨游时的那种苦苦思索着的美。伟大的数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因思想而坚强。”我们的全部尊严也正在于此。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思想毕竟是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无法给人烤出面包来”，但它却能鼓舞人的灵魂，塑造人的个性，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当我们被抛入危险的海洋时，它能为我们划破人类历史的黑暗，帮助我们找准目标，保持正确的人生航向；而当那些和谐、肃穆的真理袭上心头时，“那崇高的愉悦，那理解宇宙人生的乐趣”，便把我们和世世代代的那些贤哲圣者联系在一起，让思想与他们一起跳跃，一起去度过那美好的时光。

人这一生，大概只忙两件事：一是如何善待自己的身体，一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思想——想法、主意、打算，以及由此而升发出的计划、办法、主义、学说、理论等等。前者为人兽所共，后者为人所独有。对禽兽而言，心为身有，亦为身役，心只是工具，而人却迥然有别，“心之官则思”。

“你想保有你对世界的好奇和快乐吗？”作家毕淑敏在其《心境防割》里问，她说：“那你就必须除去心的伪装，敞开你的心扉。心，必将一生裸露着，让狂风为它梳洗，暴雨为它沐浴。心，没有蓑衣、没有斗笠，心会受伤，心也会流血，这就是心的功能！”她说，如果“心不能再活泼地游弋，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啊”！要知道，作为肉身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惟有作为思想的人，才在宇宙显得比任何物种都高贵得多。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于生存。”

不过,思想者也是孤独者。他们绝不盲从众口一词之说,或对权威的定论不假思索。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在强权压顶、不容置辩时,他们也绝不随声附和。他们对思想看得比任何一种外在的物质财富,包括显赫的权势、地位都更重要,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

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入叙拉古时,他们发现一位老者正旁若无人地蹲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画着圆圈。他就是发现“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定律”的阿基米德。与众多的希腊人一样,当时他也无可避免地死在了罗马军队的刀剑下,但当刀剑朝他劈来时,他却嘟囔着说:“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那些“圆”是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的。

更早的时候,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视察希腊时,见当时有名的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正在悠然自得地晒太阳,便走过去问道:“我能替你做些什么?”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第欧根尼看来,面对他的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征服欧亚两洲的赫赫武功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也微不足道。

在我国,那位家喻户晓的曹雪芹,大家都知道他写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是个大作家,殊不知他亦身怀制作风筝的绝技,还写过风筝谱《南鹞北鸢歌》。据说,当时有个叫于叔度的人,本是曹府当年的杂役,后因当兵负了伤,成了残疾人,穷得揭不开锅,求救于曹,可此时的曹雪芹已拿不出钱来资助他了,便教他制作风筝,拿到达官显贵家中去卖,因而也使此人后来发了财。但身有此技的曹雪芹自己却从未从事此业,而是仍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中去写他的《红楼梦》。安贫乐道,贫贱不移,这便是几千年来我

国那些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士)一脉传承的思想境界与情操。

当然,我们不可能让世间所有的人都像贤哲与圣者那样,有那么高的人文素养。人毕竟生活在世俗的现实里,人也毕竟要首先伺候好自己的肉体,有了生命的欢乐与悲歌,有了喜怒哀乐,有了激情与沉思,才能使思想的翅膀起飞,在海阔天空的精神世界里翱翔。

但是,请不要忘记,如果人都把目光投向物质利益,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让灵魂萎缩,只剩下一具忙碌不止的躯体,那恐怕也就成了可悲的行尸走肉。

感觉——不少人喜欢这个词,典型的说法是“跟着感觉走”。但感觉非思想,所以,“跟着感觉走”只能是一种对事物不能把握的迷茫。

过程——“重在过程”,结果并不重要,这实际是对思想的一种模糊认识。因为过程是带有指向性的,比如从甲地到乙地的跋涉,谓之过程,但漫无目的的跋涉则只能说是散步,而非过程。之所以要强调过程,一方面是因为思想的实现比较难,它要有个过程,而且有些过程还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另一方面,追求过程也展示了一个人的意志、品质与情趣,也具有一种美,但这并不等于不要思想,因为过程的美丽或壮丽恰恰需要思想的指引。

与“重在过程”的模糊认识相联系,还有一种说法叫“重在体验”。应该说,追求人生的丰富性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因此而贬低思想,排斥人生的价值取向,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朝喝凉水”,那便是对人生的不负责任,自暴自弃。

什么叫人生价值？说起来很复杂，实际则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看你对他人——社会，是否有用。人生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也有个投入产出的问题，在这上面，是来不得半点虚假与虚耗的。

然而，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与物质利益的诱惑，恕我直言，如今的人生价值在某些人那里实际只是花样翻新的彩电、冰箱、汽车、配有全套新式设备的新居，以及别人对自己的权势、财富所流露的羡慕。理想被出卖，高尚被耻笑，思想变得微不足道。许多人的手里，如今似乎都有一把算盘一把尺，丈量着生活，计算着收支，算计着别人，也盘算着自己所占有的名利与地位。有的，则宁肯把时间、精力与热情全部抛洒在虚拟世界的网络游戏与灯红酒绿的酒吧里，也不愿给现实一个真实的表示。笑语欢歌的背后是道德缺失，诚信不存，敬业淡然与满腹的牢骚，怨气冲天。至于因此而引发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贿赂公行，贪污盗窃，结党营私，巧取豪夺，渔肉乡里，尔虞我诈等种种无序，则已让我们由原来的惊诧、慨叹逐渐变为习惯，处之泰然，视而不见了！

于是，我忽又想起鲁迅先生的“看客”说。当然，现代意义上的“看客”并非对“示众”者的麻木，而是对自己的麻木。

于是，我还想起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维纳斯还活着。尽管这个看法肯定不会使人赞同。

絮语·闲话·清谈

《平凉日报》的“凡人絮语”一直是读者喜爱的栏目，每周一文，每文千字左右，但在读者调查中却有着 19.5% 的满意率，这体现了读者对这一栏目的认可。

报纸上有絮语，如民间之有闲话，东山西海，杂七杂八，不登大雅，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补充。我们说，正言说论，志在布道，刻意而为，多有矫饰，而絮语闲言则率意随心，发乎自然，如梁间燕语，类乎天籁，湛然天真；如冬闲笼袖曝日之农民，七嘴八舌，各道见闻；如夏天傍晚散坐街头纳凉百姓的闲侃，说人生，道世相，诙谐杂出；或如萍水相逢之路人于灯火青荧的旅社中论是说非，谈笑风生。这里边，固然不乏非议，不乏讽喻，但却是正常年景的承平气象，很难得。记得鲁迅先生翻译的日人鹤见右辅之《思想·山水·人物》一文中说：“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路上的国民。”可见闲话之重要。

如今是“快餐文化”时代。流行歌曲,地摊杂志,电视晚会,打斗电影,MTV,卡拉OK,全是一次性消费,人们似乎要把永恒送进博物馆了。可是,只要用心去听,实际上人们仍在寻找真诚,呼唤正义,渴望公正,厌恶虚伪,抨击世风,声讨腐败!世态变了,人情深处未变。

有人说“清谈误国”,我不这样看。晋人好清谈,但在《世说新语》中却往往都是锦心秀口,隽思妙谛。谢安反驳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如果再将视角放大些: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是对话体,培根、尼采的某些著作也以谈话录的形式问世,《论语》是语录,在那个春秋乱世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只能是清谈,而“五四”诸家,如鲁迅、周作人的散文、杂文中也不乏随情信笔的清谈之作,盛极一时。

诉诸于笔墨的闲话、絮语多以杂文、随笔作载体,不拘章法,率意由之。饮食男女,民胞物与,七情六欲,道德经济,信手拈来,无所不谈;世情时政,时事风云,有褒有贬,往往萦怀;大道小法,宏观微观,说古道今,绵邈深远;格物致知,究诂事理,遐思玄想,亦可成篇。它与抒情状物的散文不同,可直指时弊,引喻连譬,议论风生,亦可如老僧入定,思接千载,体悟人生。它虽因篇幅所限,文字不多,但也堪如一道时代的风景,小中见大,豆芥巨观。当然,此类文字也多因笔触冷峻,放言无忌,而不为某些人所见爱。但杂文的特点,起码的要求,便是说真话、实话,决不跟风凑趣,取悦于人。所以,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在别人思索停止的地方前进一步,思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不过,话说回来,杂文也好,随笔也罢,它们毕竟是文学家族

中的一员,也要讲意境,讲形象和魅力,讲艺术的表现手法,讲独到的感受与情趣,尺幅千里,风格鲜明,让人有美的感受等等。一句话,溶知识与情感于一炉,在指陈评述之间把人、事、情转承升华为学、理、道。我想,果如是,那便有可能是另一种境况,使絮语不絮,而闲话不闲矣!

1997年4月6日

因“风”说“气”

风,大气压的压差作用下的气流运动,来得急也走得快;气,则相对稳定,不像风云,动静无常。风与气作为一个复合词来使用,指风尚、习俗等社会现象,语出《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不过,此一诠释早已无法反映现代生活了。

先说风。街上流行休闲服,是风;下海、追星也是风;东、西、南、北都办文化节,是风;公款吃喝、虚报浮夸还是风;回扣风,送礼风,公贿风,跑官风,有奖销售乱纷纷,这“热”那“热”都是风,但都不是民之“五常性”,也与“水土”无关。

再说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气是个哲学概念,有“理先气后”说(朱熹)与“气生万物”说(王充)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别。北宋程颐的“气即命也”说,虽有命定论的成分,但却不能说没有根据。翻翻我们那汗牛充栋的中华史便可看到,大凡一个朝代的倒霉,几乎都与当时朝野上下的奢靡之气、浮华之气、虚夸之气及官场腐败所引发的萎靡

不振之气、颓废麻痹之气的长期积累有关。所以,我国历代思想家都特别注重气、推崇气,要求人“养天地之正气”,“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按照文天祥的说法,只要使这种正气“浩然”于人的精神世界,“沛乎”于天地之间,那便“皇路”清、“明庭”和,“百疹自辟易”。当然,事情不会像诗人想的那么容易。但人却不能放弃这种追求。放弃,便意味着精神的泯灭,也意味着社会的堕落与沉沦。

风与气,在自然界的表现是流变过程,但在社会上的表现却是一种演变过程。自然界的风,无论是和风、煦风、台风、龙卷风,都有止息的时候,没什么持久性。但社会上的风却是气的源头和雏态,而气则是对风的选择与延续。所以,讲“气”必先正“风”,若一旦使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坐大成气——习气,再纠正就难了。比如吃喝风,现在就很难再说它是风了!无论士农工商,也无论官绅庶民,不吃不喝不办事,成为一定之规,也有了一定的内容,集吃、喝、唱、跳于一体,外加桑拿与按摩,成龙配套。至于中央三令五申的纠风文件,则早已成了耳边风。再比如那送礼风,开初也不过是烟酒茶、土特产,“意思意思”,而今则家用电器、黄金首饰、股票外汇、巨额“红包”……据说还有送女色、送房产、送汽车的。这就应了宋玉那句话:“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不过,也要看到社会上的风毕竟不是自然界的风,它不源于自然规律,自然也就不能说不能改变。特别是那些不正之风,往往是那些权名并重的人领风气之先,才引发了一种“众作效应”——风,而也正是这种人的有恃无恐,才使风

又辗转迢迢，积习成气。《论语》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看来，只要那些居于特殊位置、有着特殊影响力的“君子”们讲正气、树新风，这社会上的歪风邪气还是不愁改的，也不怕它改不了。但我们的“君子”是否有这个决心呢？这恐怕就是个问号了！

1999年4月11日

闲话“中庸”

孔子到鲁桓公的宗庙观礼，见一歪斜的瓦罐问守门人：“为何不把它摆正？”守庙人说：“此乃佑庙之器——欹。无水时歪倒，装满水也歪倒，只有装一半水时才正。”孔子由此而悟出了中道和庸道，后人把它合起来称为“中庸之道”。

“中庸”，本质上属哲学范畴，是方法论，也是认识论。但有些人把它简单化了，认为“中”即不偏不倚，走中间道路；“庸”即马虎为人，明哲保身。有人甚至说它是调和折中、放弃斗争、贪图苟安等等，并以其“为克己复礼服务”而大加痛斥。其实，在《中庸》里，孔子讲的最多的还是“诚”。尤其，为了“诚”，孔子还主张不必勉强事事合于中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可见，中庸的本意并非简单的“中”，而在“诚”。

那么，何为“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翻译过来，即：以事论，它是客观规律、法则；以人论，它是做人的标准、规范。以人论“诚”，孔子在《中庸》里讲得

多;以事论“诚”,他讲得不多,但很重要。比如他说:“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什么是“合内外之道”?用现代话讲,即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一定要综合主客观的条件、规律,使其符合“诚”的要求。“诚”,即以诚恳、老实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实事求是。能这样做,便“时措之宜也”——应天顺人,无不合宜。所以,孔子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他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意即治理国家的办法有九项,但实行起来只有一个字:“诚”。

当然,“中”按字面解,亦即不偏不倚。但若联系孔子讲的“诚”来理解,则此“中”既非折中,亦非正中,而是事物的一种正确状态。子曰:“过犹不及。”他认为事物发展有两个极端:“过”与“不及”。“过”,是灾;“不及”,则阻碍事物的发展,要落后,要挨打,也是灾。正确的态度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无过无不及。这也就是说,在把握现实,进行重大决策时,既不要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也不要从那个极端跳到这个极端;既要看到事物发展的可行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勇于探索,也要看到客观规律的不可逆转性,实事求是;既要看到现成经验、模式的普遍意义,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也要看到当地实际的特殊性,坚持从实际出发。“中”,即“过”与“不及”之间的一种适合事物发展的“度”,是事物的“质”的数量界限。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有人说,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倡导者,特别是我们党,便一直大反“中庸”。这不对。如毛泽东同志

1939年给陈伯达的信中便说：“‘中庸’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后来，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又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他在这封信里甚至还说：“‘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以上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41、1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面对一部中国革命史，我们想想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在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双重打击下从容应对，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就思想方法来说，难道不正是既反对“过”——左，又反对“不及”——右，团结了人民大多数，才取得胜利的吗？

不过，话说回来，要真正掌握“中”，也不容易。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话，说的不过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似父，子要如子，要各就各位，不能乱套。不然，国将不国，家亦不成其为家，但被歪嘴和尚一念至“极端”，便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再比如“要举社会主义的旗，不走资本主义的路”，一些人便把它搞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某些人那里却成了“一切向钱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某些物欲膨胀的干部看来就是先让自己富起来，以致，“一朝权在手，便把钱来捞”。诸如此类，将一种理念、理论赤裸裸的极端化现象，我们还见得少吗？所以，孔子说：“不诚无物。”意即不实事求是就等于没有客观事物。他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即天下只有“至诚”（敢于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发挥中庸的作用。而且，

这种“至诚”的人还要“博学之(博学多识)、审问之(深入调查研究)、慎思之(谨慎思考)、明辨之(明辨得失)、笃行之(身体力行)”才行。否则,“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则“灾及其身者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自己也要倒霉!

1996年8月23日

说 捧

有个故事,说朱元璋微服外出,路遇彭友信,正值雨过天晴出现彩虹,朱便信口吟道:“谁持彩练当空舞,和风细雨系天腰?”彭灵机一动,马上对吟:“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把朱比作玉皇,朱大悦,次日早朝便封彭为布政使,其回报实在太高,所以也为历来捧臭脚的小人所艳羡。

不过,要论捧的艺术,这彭友信比起清代才子纪昀与袁枚,却还逊一筹。纪的捧是“装”,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弄点小误,让乾隆点明,然后便顺口献上“吾主睿鉴高深”的谀词,讨得乾隆喜欢。而袁则“以退为进”。据说,袁中榜后外放知县,去向名臣尹文端辞行,他知道尹最讨厌吹捧,但当尹问他出去做官有什么思想准备时,他却说预备了一百顶高帽子——捧。尹十分不悦,说:“你年纪轻轻怎么也学这一套?”袁说:“世风如此,现在哪有老师这样的人啊!”尹点头称:“也是。”袁出来得意地向等在外面的同学说:“高帽子送出一顶也!”

与古人比,如今的捧,其实只是吹。如电视综艺节目中的那些来宾,在主持人的嘴上,演员都是“艺术家”,歌手都是“歌唱家”,气功表演者都是“大师”,大款都是“优秀企业家”。如果再翻翻某些书籍与报刊,则不论是偷税的明星、堕落的大款、无聊的文人、腐败的官员,都能被捧得光芒四射。不过,谁都知道,那是给钱就干的买卖,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一种捧,被媒体称作“精神贿赂”,主要是指官场上取悦上级的那些官话、套话与废话。如领导一来便是“百忙之中亲临指导”,领导一开口便是“重要指示”,汇报前必讲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汇报后一定要补上“所有成绩都是在领导的英明指导下取得的”。若领导一高兴,走马观花看一看,那便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若再有两句口头建议,那可就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上表称魏忠贤“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的明代监生陆万龄,甘言美语,正好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与平庸,让人生厌!

还有一种捧,硬把肉麻当高雅。它既是官僚主义的催化剂,也是吹向领导耳边的腐蚀风。比如:本来你有点主观,他却说“处事果断”;本来你生活有点特殊化,他却说:“当官就得像个官”;假若你有请必到,有礼不拒,他就说:“如今当官,谁不如此?”假若你一时情急,说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话,他就说:“应付自如,到底不同一般!”在这种人的嘴上,胡闯蛮干是“认识超前”,故步自封是“沉稳老练”,形式主义是“示形造势,有声有色”,官僚主义的瞎指挥则是“敢闯敢干”!此外,诸如打麻将“是‘联系群众’”,爱跳舞是“会生活”,公费旅游是“开眼界”,“泡小姐”是“见世面”……

反正不把你捧到沟里他是绝不会罢休的。所以，清人宣永光说：“最危险的马屁是属员的马屁！”

捧风之所以会历经封建社会而延至今日，腐而不朽，盖因世有喜捧者也！这就像文字对于识者、理论对于智者、思想对于觉悟者才能存在一样。看来，要减少吹捧，还得从喜捧者自身做起。因此，我愿喜捧诸君自重。

1998年8月9日

说 怕

我总想,这世上的人恐怕没有敢说他什么都不怕的。比如怕死、怕穷、怕人际关系紧张、怕得罪人……这类怕,恐怕人都有一点。穷怕生病富怕来贼,出门怕车撞,回家怕老婆……这类怕,又因人而异。人不同、怕不同,怕相同,人却不一定相同。

有一种怕,是崇高的怕。邓小平同志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种怕,表达了伟人的伟大情怀,也指出了革命政党的性质,令人起敬。

有一种怕,却是卑鄙的怕。如四川简阳那位傍“大款”的市长王善武,竟被大款视作“一条狗”,公然戏耍于众目睽睽的大庭广众之下,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战战兢兢,一副可怜相,怕得可悲,亦怕得可鄙。

有一种怕,是互相矛盾的怕。比如经济数字报多了怕来年任务加码,报少了又怕影响自己的前程;怕上级来又怕

上级不来,来了难伺候,陪吃陪喝陪掉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但不来又怕得不到上级的理解与重视,使某些政策的倾斜“倾”到别处去。对下级也有互相矛盾的怕。有的怕下级依赖太紧,把本该下面解决的问题推上来,可又怕离得远了失控;有的也希望下面实情实讲,可又怕下面把实际问题统统抖了出来,没办法解决,反而尴尬。

有一种怕,让人奇怪: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倒怕。比如:债台高筑是可怕的吧,可有些人哪怕已经资不抵债也不怕再负债;虚盈实亏是可怕的吧,可有些人却满不在乎,一级哄一级,全然不怕下面总有一天会因此而揭不开锅。再比如,许多工作落而不实的问题,本是一种可怕的政令“疲软”现象,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整天泡在“文山会海”里,单怕嘴上、纸上的功夫不够,却不敢把自己沉下去,动真的、来实的,搞他个水落石出。此外,诸如怕产值产量上不去,却不怕产品积压卖不出去;怕政策变却不怕手中现有的政策不兑现……总之,这些怕与不怕都叫人害怕。

人在一大堆怕中生活,能不能做到该怕的怕,不该怕的不怕?难。因为这首先要在价值观念上做出选择。选择了高尚便要与清贫为伍;选择了奉献,便要与默默无闻相伴。如果选择了高尚却又时不时地想着“发”,那便有可能对该怕的不怕,甚至铤而走险,不该怕的倒怕,处处设防,提心吊胆;如果选择了奉献却又不甘寂寞,总想“爬”上去,出人头地,那便有可能为了“爬”而怕这怕那,或为了“爬”而不得不背弃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倒怕!

1996年8月4日

说 狗

西方人爱狗,视为宠物,饕以美食,穿以锦衣,使其在物质上的“文明”达到人狗合一。但中国人爱狗有些则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给予政治上的待遇与荣誉。如 3000 多年前的周朝便有“犬人”一职,专司牵狗参加国家的礼乐庆典;汉朝则编制了“狗中”、“狗监”专门负责皇帝猎犬的训练;春秋战国,国与国会盟要把鸡、狗、马血抹在嘴上,谓之“歃血”,以示诚意;战败国投降要献上猎狗,以示臣服。此外,周懿王还把国都迁至“犬丘”,汉武帝则把一座皇宫赐名“犬台”。由此可见狗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莫须有”的龙,在今天也仍被视为神物,但对狗则显示了少见的反复。可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可对朋友说“愿效犬马之劳”以示忠诚,但骂人又用“鸡鸣狗盗之徒”、“狗娘养的”、“人模狗样”、“偷鸡摸狗”、“狗咬狗一嘴毛”等以示不屑。《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句“你这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便把

个王连举的叛徒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画坛上，一代宗师齐白石“愿为青藤门下走狗”的自嘲，则让人对其发自内心的谦虚肃然起敬。《荀子·荣辱》上说：“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狗彘之不若也！”这也就是俗语“猪狗不如”的由来。

“犬吠寒烟里，鸦鸣夕照中”——暮霭中的山乡一派生机；“鸡飞过篱犬吠窠”——不用问，一定是绝少闲客的农家来了生人；“夜静群动息，时闻隔林犬”。——多么空旷静穆的山村之夜啊！而“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则写出了行人在深山雪夜中找到投宿之处的喜悦心情。从不同时间、地点的犬吠声中悟出各种意境，这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本事。可最直观的还是犬之吠盗、看家。有道是：“一条好狗护三村！”这便使人想到了狗的忠诚。所以刘邦有了“功狗”之说，一些大臣往往也以狗自居。元朝至元年间，尚书丞桑哥专权，正献王彻理奋数其奸脏于上前，上怒，命左右批其颊，王辩不为止，曰：“国家置臣子，犹人家之畜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出不见贼，乃捶犬，犬遂不吠，乃良犬乎？”上悟，遂“收桑哥，籍其家。”明武宗时，大同寇至，帝欲亲击，杭雄叩马谏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盗，奚用犬为？”帝笑而止“遣杭击”。如今，人们对狗的忠不忠已不在意了，宠其柔而玩其媚，使狗的商品价值大涨。报载，成都出现了狗保姆，月薪300元，管吃管住；北京一只哈巴狗卖了32万元；还有为狗登报征婚的，而且还一定要“处狗”！看着这些狗的幸福生活，不禁使我想起了《醒世恒言》上的一句话：“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

何谓“乱离人”？如今大概只有从杜甫的《三吏》《三别》或曹操的《蒿里行》中去找了。至于他们所说的什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等惨景，大概也只有从百年屈辱的旧中国走来的那一代人还多少有所体会。对于建国后出生的一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一代，已成历史，甚至也不愿再“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了！人们的所思所想正如一句广告词：“享受生活。”还记得黄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那个小品《家有老父》吗？小两口把爱犬寄养在老父家里，春节放假去看狗，一大堆狗食罐头被老父当成给他买的营养品，媳妇给狗织的毛背心也被老人当作给他织的帽子戴到头上，在一片酸涩的苦笑声中，它反映的难道只是孝与不孝的问题？

狗的幸福生活自然是建立在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幸福之上的。人一有了钱便有了爱好，养狗、养猫、养鸟、养鱼，虽有玩物丧志之嫌，但总比“泡小姐”、“包二奶”胡嫖滥赌文明得多。不过，话说回来，牲畜毕竟是牲畜，若喧宾夺主，甚至看得比自己的父母都重，那就过分了。想一想吧！想想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的生活不如你的那条狗；想想还有多少人为了你那养狗的自由而日夜守卫在国门、奔波在社会治安的第一线上，那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心安而理得。

2005年5月20日

说“猫”

老友与我开玩笑，故意问我可读过《邓小平文选》？有何心得？吾答有三：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知理论的生命力是求实、是发展，不是躺在“本本”上吃“现成饭”；二为“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出真知”；三是“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则说明披在人身上的外衣往往与实不符。过去讲出身、讲成分是如此；如今的讲学历、讲文凭亦如此，都有片面性。至于那些讲钱、讲“跑”、讲“关系”的取才与用人，则是一种“祸害”，也不值一议！

拿猫论用人，伟人睿智，举重若轻，因而也不能不发人深思。我养过猫，那时住在平房里，老鼠为患，一位移居广州的战友便千里迢迢地给我带来两只波斯猫，一只绿眼睛，一只红眼睛，很可爱。我发现猫爱观察世界，脑袋随着眼珠转，且总爱搞点特殊待遇，捕鼠之余，还偷吃邻家的鸡，搞得我很狼狈。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鼠患，也只好暂且作罢！

对于猫的观察与思考，老友不以为然，一笑了之。但我

却并不以为是笑料。在中国的历史上，“杀妻求将”的吴起，“盗嫂受金”的陈平，“首鼠两端”的李斯，“反复无常”的苏秦、张仪等等，不都是些类似波斯猫这种有才无德的人物？不都也干出了一番骄人的事业？何也？“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而不考其行也！”说白了，亦如吾之暂且留任波斯猫一样，客观需要。

有人说邓小平同志的“猫论”是“实用主义”，“不择手段”，我不这样看。因为“猫论”恰恰讲的是手段——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决定手段，属价值论范畴，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而实用主义之所以要受到人们的鄙夷，也不在于其不择手段，而是以务实之名去掩饰或否定了真理，所谓“有用即真理”。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便是“有奶就是娘”。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则把价值与真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有奶虽可吃，但娘还是娘。”这种态度表现在经济上，便是不管它姓“资”还是姓“社”，资本主义有没有搞，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便大胆地去试；表现在用人上，则不管他什么出身、门第，文凭、关系，“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不过，话说回来，“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话，毕竟是龚自珍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讲的，只可就事论事，若脱离了环境、时间的具体规定，若将其当作长治久安之计，则患莫大焉！就拿我们熟知的李林甫和蔡京这两个历史上有名的奸相来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尽管面对的是才华横溢的李隆基，但在统率群僚、驾驭四方的能力上却历经19年而君宠不衰，即使是拥兵自重、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的安禄

山,见了他也“手足无措,但知唯唯”。至于那个“六贼之首”的蔡京,则更是有名的才子,他的书法当时便被公认为“绝世之作”,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苏黄米蔡”之“蔡”,原来也指的是他。可以说,无论才华与能力,他们比之历代的名臣贤相都毫不逊色。但也正因为他们的恃宠专权、弄权为奸、结党营私、贪婪无度,并在政治上以迎合当时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奢侈浮夸为能,无限度地加大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政治矛盾,才使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与北宋后期的经济繁荣毁于一旦。此外,如赵构宠信的秦桧,忽必烈宠信的阿合马,嘉靖重用的严嵩,乾隆重用的和珅,乃至伟大的孙中山所重用的蒋介石,莫不如此。谁能说这些人无才?但过人的才智若与阴暗丑陋的个人品质结合起来,其负面效应便不是“偷吃邻家几只鸡”这种事可以形容的了。所以,选才、用才与如何识别人才,从来都不是小事。正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便是这个道理。

2001年10月28日

说 度

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想说说度。

度者,计量之标准也。如温度、湿度、角度、弧度、经纬度等,纳入哲学范畴,则为:“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黑格尔称其为“度量关系关节线”,其实就是事物发展的转折之点。如水在摄氏 0 度以下为固体,0 度以上为液体,100 度以上化为气。这 0 与 100 即水之形态转变的度(点),反映质与量的统一。

但是,事物发展中的度,却不都像烧开水或做冰棍那样简单。比如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干出成绩,因循守旧不行,前怕老虎后怕狼、优柔寡断也不行。然而,一举一措又都系着社会安定、经济兴衰、人民冷暖与人民的承受力等多方面,如何掌握好敢与为的度,做到大胆而科学,大胆而恰当,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有这样的说法:“胆大也是财富。”由此而令人想到大跃进的另一种说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时之间,

亩产数万、数十万斤粮食的“卫星”满天飞，影响所及，岂止生产！损失之大，何止经济！以致在那阵风过后，又不得不拿出相当的时间来进行总结、恢复，其教训至今让人想来心悸！

不错，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小平同志说的是“一些”，这“一些”就是度，而且是“看准了的”，这和那种不顾财力、民力一哄而起的胡闯蛮干是两码事！说到胆，也要分析。“胆小怕事”，带有贬意；而“胆大妄为”则又是缺乏理智的行为，不足为训。所以，我们的古老文化历来提倡“有胆有识”。有识之胆可成大事，有胆之识也能成大事，胆与识，是互补的，而关键在识。这个识，就是按照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找准最佳发展的“度”，掌握好“火色”，避免形而上学，避免发生质的逆转和失误。

列宁有言：“真理夸大一步便是谬误。”辛弃疾说：“物无美恶，过则是灾。”同时，历史经验证明，革命虽然有可能被旧思想、旧观念所阻挠，但也有可能被革命口号包裹的盲动浮夸行为所迷惑，而功败垂成！

度啊，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多少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的“度”等待人们去探索、去把握啊！但愿我们有些地方这次交的“学费”不是太多！

1994年8月11日

说 权

“掌好权,用好权”——过去的老话;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今的戏言;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为共产党人的权力所下的定义。

过去官分九品,今自中央以下有省市县乡各级,但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官,都有属于你那一级的权,于是,你那些权力的定位、走向便也是人民群众必然要关心的问题。

权力犹如“千斤顶”,要“顶”起人民的重托。它也是把“种子”,只要撒到有可能“开花结果”的地方,便让人民看到希望。权力又是一把“刀”,但只对准邪恶,同时又是一把“剪”,要用它剪断“关系网”与不正之风的风源,使社会的公平、公正再也不是“口头禅”。同志,你的那些权力是这样的吗?

权与力这两个字,人们一般习惯合并起来用,但权只是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这种力怎样表现,能不能在“为人

民服务”的时候发挥得恰到好处,则因人而异。比如:有人掌权“十个指头弹钢琴”,得于心而应于手,有人却犹如一个蹩脚的乐队指挥,到处都有不谐音;有人掌权,把权的力量发挥到腿上,哪里有问题,便到哪里去,可有的人却“述而不作”,事事全凭嘴一张;有人掌权,“如履薄冰”,唯恐人民不满意,但有的却什么损害人民利益的事都敢干,渴望自己的权像银行存款,天天膨胀!

权力的悲哀,是被低能儿拨弄得颠三倒四,今天这里“撒”一点,不行;明天又在那里“撒”一把,不灵。许多需要权力征服的事都是雨过地皮湿,春风不度,结果,权瘾过足了,问题成堆,徒有其权。

权力的蜕变,是权力脱身“主业”进“市场”,成了“商品”,可买可卖,于是也就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妓,成了臭气熏天的垃圾,成了一切祸害之源。

权力的可怕,是嫉妒凭借权力的肆虐,那就有如泥鳅变成了毒蛇。还记得《昔昔盐》吗?才子薛道衡在这首诗里写了“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万人传颂,便被多少也懂点诗道的隋炀帝杀了,还愤愤地讥薛“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有人说“我穷得只剩下了钱”,却无人说“我穷得只剩下了权”——尽管是一样的“穷”。可见,权比钱更让人忘乎所以。

人都说自己“淡薄名利”,却没有人愿意“淡薄权力”。为啥?原因就是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客体的一种占有,无论是其“含金量”,还是其左右他人的能力与魅力,都令徒有虚名或徒有财富的人望尘莫及!所以,它也永远摆脱不

了人的羡慕与追逐。

但是,权力的现代意义却与责任、义务相联系,有了法的制约,舆论监督,成为“有限权力”与“可约束权力”,这就使那些权迷心窍、钱迷心窍、色迷心窍的“公仆”绊住了手脚。不过,话说回来,理论上的东西也总难落实,如今即使在法治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权力腐败也未解决。从上个世纪中期到这个世纪,尼克松的权力滥用,田中的贪污,科尔的受贿……震惊世界;而像苏哈托、马科斯这种世纪型的巨贪,像全斗焕、皮诺切特这种杀人如麻、既贪且残的军阀,也正是在“法”的庇护下,苟延数十年才被揭露。这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阿克顿勋爵于19世纪在其《自由权力·权力》一文中讲的,如今已是人们论起腐败的口头禅。但就权力而言,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我们就无法使权力消失。不管它是封建的、民主的、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作为社会,它必须有管理、有服务、有权威。

“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这是当前人们论起腐败的另一句口头禅,似乎只要有了监督便会“海偃河清”,使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权力的本性便是“扩张”,它不仅会摧毁道德防线,把掌权者腐蚀成寄生虫,无利不贪,同时也会把掌权者腐蚀成专横跋扈的“暴君”,得志便张狂。结果,监督在“暴君”面前的结局便只能是:要么,俯首为奴;要么,粉身碎骨,一败涂地。至于因此而使监督蜕变为“打情骂俏”式的逢场作戏,便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现象了!

我们承认法对权的监督、制衡与约束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国无法不立”。但法治的社会说到底也还是“人依法治理的社会”。我们也承认我国还是个法治不健全、不发达的国家,致使某些地方的权力前“腐”后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法对权的约束也毕竟是“他律”,是“惩于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人的内因——“自律”。不是不敢为,而是不想为,不愿为,乃至不屑其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也惟其不易,才是考验——是对干部的考验,更是对干部工作的考验。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能不能很快造就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体制,使跑官、要官、花钱买官与吹牛造假骗官的人无隙可乘,并使那些“昂昂独负青云志,下看金玉不如泥”的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将是我们的反腐斗争能否最终取得成功的一项根本性的考验。

不错,列宁曾说:“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但任何一项宏伟事业的背后也都必然要有一种卓越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法的背后是哲学,是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理想、抱负与信仰。这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请记住但丁的话:“道德常常可以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也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有德无才会误事,但有才无德要坏事。信否?

2001年8月17日

胡批圣贤及其他

幼时读私塾,我们那位曾是前清秀才的老师总爱于课间穿插些小笑话,调剂气氛。如讲到《论语》“三十而立”这句,他便告你有人解释为“两个十五之年,椅子板凳不敢坐焉”!让人捧腹。念到孟子名言:“鱼,我所欲也!”他会朗朗背出某人以此为题的八股文:“鳎而长长焉,鳖而团团焉,非我所欲也!跳跳者虾焉,爬爬者蟹焉,非我所欲也……”离题万里,还自鸣得意,令人作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胡批圣贤”的笑话少见,但“胡批”并未绝迹。就拿曾经批得死去活来的“克己复礼”来说,近读学者赵书妍、李振宏的考证方知“复”与“履”古为一意。“克己复礼”即克服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而不是恢复周礼。(见2005年第2期《河北学刊》)另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是这样。“喻”为“告诉”,“知道”,意即“在上位的人应当晓之以仁义,在下位的人应当晓之以财利”。(见2005年第2期《开封大学学报》)此外,如“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上”“下”二字，按先秦诸子用字的句式习惯，应作“尊”“卑”解。如《论语》：“惟上智下愚不移”的“上”“下”二字之取意即为“尊”“卑”之意。它讲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即“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与后世人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一个意思。可我们却硬要把它当作孔子的政治主张去批判，解释成“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罚”。再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白了就是管理社会的人劳心，被管理的人劳力，讲的是一种社会分工，也与什么“上层建筑领域问题”不沾边。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意即孔子永远时髦，这话现在似乎应验了。如“食色性也”这句话，有读书看报习惯的人大概经常与其碰面，但其出处则有说孔子，有说孟子。其实只要你打开《孟子》就会看到：“告子曰：食色性也。”至于《礼记·礼运》篇有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听着意思差不多，但是否孔子所言，说不清。就算是，也不能混淆啊！

拿别人的话往孔子头上扣，不止一例。例如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子夏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等，常见有人加在孔子头上大开讲席。不知是有意借用孔子大名，还是征引过于马虎？

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感到他伟大平实而又让人摸不透。他忧国忧民，却又始终保持一种爽朗的胸襟，从不怨天尤人；他有点貌似狂妄的自信，但又非常宽容，通情达理；他认为教育是影响千秋万代的事，要把门打开，有教无类，循循善诱，但他又认为不能勉强，不能把人雕琢得失去人的本性；他身处乱世，把社

会看得很透,但他又有着一种伟大的愚执,为了理想,哪怕到处碰壁也从不后退;他的学说是对社会与人生的终极关怀,极富情感性和理想性,在本质上是实用的,但又非用不可,可一旦实用则又必然要发生质变。一个最能说明这种质变的事例,便是从西汉至今被历代封建专制政体奉为政治思想最高准则的“三纲”,其来源“既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而是西汉的董仲舒”。(见《学术研究》第3期刘明武文)当然,也不能说与孔子一点联系都没有。《礼记·哀公问》:“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这些都是“三纲”的具体内容。但他们说的只是人伦,而董仲舒则把这种很正常的人伦关系提到了“纲”上,视为“天定”: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下。”(《春秋繁露·基义》)这就使问题起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三纲”的标准提法(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句式)也并非来自董仲舒,而是《礼纬·含文嘉》。可惜,纬书不知作者,故“三纲”标准提法的发明人也就埋没至今。

千万不要以为孔子是个老顽固。实际上,他比他的一些弟子要旷达得多。《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天对守候在他身边的子路、冉有、曾点、公西华四个学生发问:“平常你们总说‘不了解我呀!’假若有人了解了你们,你们咋办?”子路抢着说:“兵车千辆的国家,外有别国入侵,内有饥荒,我去治理,只要三年,便可使人知勇、懂得道义。”孔子微微一笑,又问冉有,有答:“国土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我去治理,三年后可使人人富

足。至于礼乐教化就只有等待有学问的人了。”孔子又问公西华，公西华答道：“但愿学习参予祭祀，同国外打交道，签订盟约，做个礼乐司仪就行了。”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点正在弹着瑟，好像并不怎么关心他们的发言，孔子看了他一眼，问：“点，你怎么样？”曾点说：“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孔子说：“各抒己见吗。”点弃瑟而对曰：“暮春三月，与五六成年人或六七个小孩在沂河里洗完澡，在雩台上吹吹风，一路上手舞足蹈地唱着歌走回家，这就是我的志向。”孔子说：“吾与点也！”——“我也跟你一样啊！”

这就是孔子。你看，他不是也渴望能有我们心灵所需的那种快乐，那种生活吗？

吾非儒家，同时也深信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学说都不可能在当代完全“复活”。如果真要讲到“复活”，拿孔子来说，我看需要“复活”的也只能是他那政治理念——“仁”。用当代语言来说也就是“人道主义”，不能复活的则是他用家庭法则规范政治生活的那些制度性的构思。值得尊敬的，也是作为生活导师与政治哲学家的孔子，而不是作为等级制度与家长制度守门人的孔子。尤其，要强调一下他与封建思想的区别。因为孔子的思想毕竟只是一个学派的思想，是中国特有的，而封建思想则是一整套的，是世界共有的思想体系，不能混淆。否则，其于世界各国曾经存在和现在仍然存在的封建专制政体便无法作答。

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大概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未息。谁是谁非，看来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辩论得清楚。但有两点必须澄清：一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割裂传统的众多反思，似乎连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乃至文

化大革命的发生,都要追溯到五四运动,把罪责归结到“打倒孔家店”,这是不对的。因为五四运动虽然被称为是“新文化运动”,但实际上仍是一场很直接的政治运动。其矛头所指,乃是其刚刚结束不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相继出现的封建军阀专制,至今我们还要肯定“五四”批孔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二是以封建专制为儒定性,更将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归结于孔,最后达到“万恶归儒”,也是片面的。因其所否定的不仅是儒,而是我们浸润其中、成长其中的传统文化。这不是耸人听闻。因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毕竟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尽管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基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止一次地发生变异,甚至是“癌变”,成为箝制人的思想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如果为了倒洗澡水便连洗澡的孩子也一起倒掉,那就愚蠢了。

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接轨”。据说除了经济上的“接轨”、市场上的“接轨”、外贸上的“接轨”以外,文化也要“接轨”。那我们就好好想想吧!想想我们自己的“轨”是啥,在哪里?想想一个失去自己传统文化的“轨”又如何能与对方平等地对接!我想,也许只有这样多想想,才不会从另一个角度去重犯历史性的错误。

2005 年端午节脱稿

渐读渐识陶渊明

陶渊明,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晋书》、《宋书》均谓其系东晋开国元勋大司马陶侃之曾孙,祖陶茂、父陶逸均曾官至太守,外祖孟嘉亦系东晋名士。但因其祖、父均非承袭陶侃爵位的嫡嗣,陶渊明幼时家道即已中落,虽饱读诗书,然“大济苍生”的抱负却不得施展,一生之中仅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职,最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仅做了八十天的彭泽令便挂印辞官,回到了家乡。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他把尔虞我诈的仕途生涯看作一个“误”字,可见其悔甚矣!

初识陶渊明,还是上一世纪的50年代。那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经常介绍一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而对陶渊明的评价记得好像比其他人所用的笔墨还多,只是自己那时还年轻,感到乱世里的陶渊明与刘宋王朝的谢灵运一样,不过一隐者,并无深刻认识。再

识陶渊明,则到了“文革”期间,自己除了等待批判,闲得无聊以外,便一头扎进平师图书馆去读书。也许是“缘”吧,竟在那尘封已久而又杂乱无章的书架里觅得先生的《桃花源记》、《咏荆轲》、《归去来辞》、《读山海经》、《归田园居》等诗文辞赋多篇,这才使一个面带微笑,荷着锄头,于五柳树下或引吭高歌,或浅吟低唱的陶渊明,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了起来。

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华大地成了军阀与纵横捭阖之士的乐园,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思想已无用武之地。一些不愿与黑恶势力妥协的文人,表面上拒绝对一切事物做出判断和反映,放浪形骸,出言玄远,行为古怪,不与人同,好像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外面,但其内心却有着难以抑制的忧虑与痛苦。如刘伶的以酒度日,长醉不醒;嵇康于就戮前还要从容不迫地奏完《广陵散》,便比较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但陶渊明与这些人不尽相同。与其说他是一个从痛苦的现实抽身而出的隐者,还不如说其生性便是一个酷爱山川自然的高逸之士。你看,当他一回到匡庐山下的小山村,便有如一个孩子似的“载欣载奔”,“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感到山水都在和他打招呼——“山泽久见招”;芳菊青松都在欢迎他——“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使“久在樊笼里”的他,或“眄庭柯以怡颜”,或“园日涉以成趣”,或“策扶老以流憩”,或“矫首而遐观”,或“登东皋以舒啸”,或“临清流以赋诗”,简直是乐不可支了。有时,他也提上一壶酒,邀二三野老“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有时则“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寄情于山水之乐。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一首首清新淡雅,直率朴

实,不假雕饰,且又情趣盎然的诗辞文赋,便伴着微弱的油灯光亮,从他那已经磨秃了的笔端一泻而出,成为留给后人的不可多得的财富。

鲁迅对于汉末乃至魏晋易代之间那些表面上不化不禄,实际却是以退求进或以“隐”求名的所谓“隐者”向来不以为然。说真正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但却说“陶潜因为并非混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

“自然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说,它是一种静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烟里”;或是一种随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也可以说是一种选择:“久在樊笼里,复返得自然。”但若从本质上看,则是一种可贵的人格:“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万丈红尘中“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去其外饰,复归本真,安贫乐道,质朴自然,这不正是一种牺牲,一种勇气,或是一种健全的生命活力吗?

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称陶诗为“五言古以陶靖节极诣”。但重读陶渊明的诗辞文赋之后,我觉得他不仅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同时也有着当时那些普通农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辛苦。尽管他不时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也不时有着与“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的情趣,但更多的却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愁与凄凉。实际上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其某些诗中所说的那么悠闲、潇洒。“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有时就连他那一口酒的嗜好也无法满

足,不得不接受“田父”的接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而最可叹的还是“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一个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竟至乞食于野,能不说是儒道斯文的最大悲哀吗?

不过,陶渊明毕竟是陶渊明,不论环境有多困难,他是始终“不坠青云之志”的。我们知道,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腐败历史少有。《资治通鉴》称其“交通请托,贿赂公行”。葛洪《抱朴子·疾谬》说当时的一些势利小人“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连结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为了当官向上爬,不择手段,人格丧尽,但陶渊明却在当时的权臣檀道济延请其出仕时坚辞不受,后檀又去看望他,并赠以梁肉,亦被“挥而拒之”,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宁可穷困潦倒也不与腐败政权合作的骨鲠之气!

为人如此,为文亦如此。看陶诗陶文,我总觉得陶渊明不仅是营造田园意象的隐逸派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少有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特别是其《读〈山海经〉》组诗十三首,连鲁迅先生亦认为是“金刚怒目之作”。“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不但说明息隐山林的陶渊明没有忘掉现实,而且也不完全就是“采菊东篱下”的那种与世隔绝者。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其中尤以《桃花源记》的评价繁杂,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言其脱胎于《老子》八十章的“小国寡民”思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颓废消极,麻痹了人民的斗志。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我们说《桃花源记》无疑是个虚构的乌托邦,亦与老庄

的思想影响有关。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压迫剥削,人人自食其力,和平宁静,风俗淳朴,一切都与当时那个腐败政权相对立的社会,难道不正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表现的不满与否定吗?

陶渊明生前郁郁以终,身后却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一些文坛大家皆从陶诗陶文汲取了极其丰厚的文化营养。鲁迅也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与李白一样,都是头等人物”;胡适则有诗赞曰:“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家空两手。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庐山游记》)因此,我觉得在陶渊明身上,除了那些令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文化素养与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外,他那“穷且益坚”的“不坠青云之志”,他那“贫贱不能移”的浩然之气,也许才正是需要我们去认真体会与学习的。尽管这与某些现代人的精神追求不符,也不会得到某些人的欣赏与赞同!

2005年11月15日

官为本还是民为本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官为本的体制,但也不乏一些仁人志士在官与民这个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近读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其感触就颇深。薛存义是柳宗元的同乡,代理零陵县令两年后卸任,柳宗元写了这篇序为其送行。

序,除用作序言以外,亦是赠予体文章的名称,多为应酬之作,内容空泛,了无新意。但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却写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官为民役”——“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也就是说,凡为官者都是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老百姓的老爷。“公仆”一词是否由此演变而来?说不清楚。但这一观点却显示了柳宗元洞幽烛微的先见之明,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牧民”观念正相反。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便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老百姓处于这个等级社会的最底层,即使是有良心的官吏“施惠于民”,也只能是居高临下地恩赐,而不是把自己视为“公仆”,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为人民服务”。但“官为民

役”之说则把这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柳宗元看来,阶级、国家制度的形成,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即使是身居上位的各级官吏,也是客观上需要有这样一批人来执掌“司平”的职能。他说:“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司平”即主持公正,公公道道地给大家办事,而不是上下其手地滥用职权,坑害百姓,侵害社会的公平,危及社会的安定。

其次,对于“受其值”,“怠其事”,“又从而盗之”(即拿了薪水不干事还干坏事)的官员怎么办?柳宗元亦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打个比方说:“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怒而黜罚之矣!”把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假如有户人家的雇工拿了主人的工资却不干活,还不时偷走主人家中的钱财、器物,那主人一定会处罚他,赶他走。”所以,对于那些懒官,贪官、庸官、昏官老百姓亦有权“黜而罚之”,“愤而逐之”。他问:“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者,何哉?”——如今的为官者像那个佣人的实在太多了,可老百姓却不敢黜罚他们,是什么原因?答曰:“势不同也!”——官与民的势力不一样啊!但“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势力不一样,道理却一样,如果把百姓逼急了起来造反,那官吏又能把老百姓怎么样呢?因此,“有达于此理者,得不恐而畏乎”?——为官者若懂得这个道理,能不恐惧吗!

译完这些话,我才明白这篇《序》为什么流传千年,让人不忘。如今,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的人尽管还是少数人,但在近一二十年有干部腐化堕落的报道不绝于耳这种背景下来读这篇《序》,又有谁

能不怦然心动呢?!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柳宗元的主张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懒官、庸官也好,贪官、昏官也罢,他们都是体制的产物。不否定封建官僚制度,“官为民役”便无从说起。不过,从“官为民役”的主张出发,突出强调民众应有的历史地位、作用与力量这一点来看,也不能不说是柳宗元吏治思想中的一个民主思想的亮点。特别是他在屡遭贬谪的困境中犹能坦坦荡荡地把自己摆在百姓之“役”的位置来思考吏治上的问题,而“非役民而已也”!这不仅在那个时代,就是如今又能有几人呢?

产生于唐代的《送薛存义序》,到了 21 世纪却仍不失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能不发人深思吗?

2005 年 6 月 7 日

“庸官”与“庸道”

小文《官为本还是民为本》见报后,一些老友反映文中对庸官着墨不多,且语焉不详,要我作庸官解。但我总觉得庸官之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实则秉承了封建社会的为官之道,杂以现代社会的灰色人生哲学,成为观念形态上的病变,使“官念”退化,“官德”缺失,阻碍了选贤任能,也削弱了领导机关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形成“庸政”,这就不是一篇小文能说清的了。因此,现仅将庸官的几种为官之道述后:

一曰以“庸”取宠,以“庸”为进。我们知道,干部者,乃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也,干则进,不能干则退。但一些深谙官场潜规则的人,却以“庸”为进,时时在上司面前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话不温不火,行事不凉不热,在不掌握领导真实意图之前对任何事都不拿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一定要叫他表态,那也是:“大概、也许、或许是,不过、恐怕、差不多;可是、我们也以为,仿佛、好像、不见得。”尽在中

词里兜圈子,让人如入十里雾,不知所以然。只是因其“庸”态可掬,在上司眼里倒成为老成持重,有自知之明,加以听话好用,这种现代版的“南郭先生”才“庸”而不愁,有的甚至比那些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此乃庸道之上乘者也!

二曰以碌掩“庸”,以“庸”代为。碌者,忙也!“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固然是一种“庸”,但办事只办上级看得见的,忙“文山”,忙“会海”,忙送往迎来,忙陪吃陪喝、陪游陪玩,天天忙得跟打仗一样,却忙不出任何实际效益和效果,又何尝不是一种“庸”呢?当然,由于目前对办事效率还缺乏有效的客观衡量尺度与监督,因碌而“庸”或因“庸”而碌的问题,在一些机关单位也很难解决。只要你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便可博得勤政的美名。而如此一来,也就使一些本来很有生气的领导干部陷入事务主义,成为碌碌庸人,越碌越庸,也越庸越碌。不过,即使庸碌终身,按照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最后仍可使“多年的‘庸’妇熬成婆”,官升一级,因庸而得福。此乃庸道之中乘者也!

三曰以“庸”求安,以“庸”自保,庸道之下乘,亦系不得已而为之。要知道,在如今的某些机关单位,由于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较好践行,你想不随声附和都不容易。至于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也大有人在。久而久之,便使有些人学乖了,遁入“庸”门,不出头,不显眼,中规中矩,唯唯诺诺,尽管活得窝囊,却也“庸”得平安。有的甚至因此而博得上司青睐,认为“成熟了”,得到赏识,也并不乏人。有一首《庸官悟》就是说这种庸官的苦衷与庸道的高深和奥妙的,现抄录于后,以飨读者。

为官多年任蹉跎，政绩无多“悟”偏多，仕途经济如参禅，如今试与君细说：

对上要有奴才相，对下要当二阎罗。主仆角色随时变，为主为奴看场合；

上情下达学鹦鹉，报功莫怕水分多。“假大空套”是本事，好大喜功不为过；

典型拔高三千尺，汇报全凭不烂舌。实事求是也要讲，但是只说不能做；

以权谋私要会谋，方法策略宜斟酌。只要不做招风树，法不责众奈我何？

问题来了当球踢，莫把荣誉轻放过。有位谋事不谋名，才是傻瓜人一个！

当然也讲责任心，此心对上不对国。中央政策耳边风，上级心思细揣摩；

如果发现领导错，他说没错就没错。记住仕途一大忌，看破也不能说破；

不要怕人说无能，无需谨慎修官德。能把上司哄转了，蓬雀也上凌霄阁！

2005年7月22日

学历与能力

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就像互交部分不超过二分之一的两个圆,并不对立,如果不是我们用人制度由过去主要讲出身转而主要讲学历,也许不会引起争论。其实,讲出身也并不是就不讲学历,比如我们老祖宗说的那个“两榜进士出身”,按现代语言解释,就是“学历”。

在用人问题上,无论过去与现在,应该说大家都是唯能力论者。尤其在关系到一个地方、单位的生存发展时,所用之人的出身、学历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能力不是写在脸上的。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像带有农耕文明色彩的传统社会那样,四周都是熟人,或熟人的熟人,“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彼此关系是透明的、亲切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的活动范围大,活动频率高,这就使用人不得不利用现成的信息——文凭,来判断其可能具有的实际能力。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讲学历总比讲血统、讲财富、讲门第出身公

平得多,比过去用人有原则无规则“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要进步得多。问题是机制要活,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能一纸文凭定终身,更不能把文凭作为当官的直通车票,搞“唯文凭论”。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杰出的人并不具有什么高学历。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历史上被称作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的代表的。他参与过“独立宣言”的起草,担任过驻法大使,在科研领域揭示了闪电的秘密,发明了避雷针,但他却连初中也未读过;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一生有过 1300 多项发明,经他实验改进的白炽灯泡,至今还在为世人发光,但他也没有上过大学。再比如我国的李白、杜甫,一被史家誉为“诗仙”,一被誉为“诗圣”,但这一“仙”一“圣”不要说什么文凭、学历,即使是那个时代为士人看重的科举考试也未参加。据说,杜甫还曾要求报名,被“当局”以“野无遗贤”的借口拒于门外,而李白则因祖上在隋末曾被贬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唐属安西四镇),其家世有不便公开的背景,在蜀一直未能“入籍”(取得正式户口),无报考资格,于是便成了终身“布衣”。

看《三国演义》,我一直感慨弄不清那位总把手头活干得极其漂亮的诸葛亮是何学历。但他却进可以为帝王师,退可以躬耕垄亩,“采菊东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大到指挥三军,小到木牛流马等机械制造,无所不精。刘备弱小时他以智谋见长,以弱克强,为蜀汉积攒了抗衡吴魏的实力;战乱稳定时他以治理见长,内修国事,外结盟好,安抚四邻,屯田兴利,为日后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舌战群儒时有人问他“治何经典”?如同今天问人“学什么专业,有何著

作”一样,他却避开这个问题的正面作答,而对儒字作了一番相当精彩的解释:“……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钩渭子牙……皆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也!”他把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人称为“小人之儒”,而把经世致用、泽及当代的文人称为“君子之儒”……你看,这已是一个多么坦荡、开阔而又富于“时代感”的人才观啊!

说到学历与能力,我又想起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的那段妙论:“这一张小小的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身下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包羞遮丑,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都掩盖了起来……”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第六次全国作协大会选出的15位正副主席,尽管都是名扬国内外的大作家,可他们的“树叶”却并不怎么样,准大学毕业的4人,初高中毕业的5人。铁凝、叶辛、陈忠实是高中毕业,谭谈是初中毕业,可又有谁敢小瞧他们呢?

有人说这是天才!我不反对,但天才却是基于一个事实与一个假定而来。一个事实是人的智商不同,智力不等,总有异乎寻常的人被称作“天才”;一个假定是“天才”的形成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磨砺、自省、自觉与自励,包括自己的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等等,是“环境的产物”(法国唯物主义学者爱尔维修语)。引申一下便是“天才”可以再造,人人可以成为“天才”。所以,在我国早就有了“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说法。

我无意贬低学历。不管怎么说,一个接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有着较高学历的人,在融入现代开启未来上,总比

学历低或没有接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的人要快得多。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但知识不等于知识力,它必须经过实践与再实践的反复实验与积累。何况,一个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动员号召能力,指挥决策能力,复杂形势面前的观察力、反应力、判断力,临危不乱的应变力,乃至决定人生成就的那个最重要的能力——创新思维与创造力等,是学校难以教育得出来的。

不要忘记:“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以,尽管这文凭如今可买,学历亦可通过某些渠道“包装”、“速成”,但也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树叶”再多也难成“真佛”。在众人眼里,你的空疏与寡陋,照样会让人一览无余!

2005年1月8日

读《岳阳楼记》

公元 1046 年(宋仁宗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托,为重修的岳阳西门堞楼写下一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

古代的“记”,多为记事体,但范的这篇“记”却是以议论为主的哲理散文。他骈散兼用,溶景于情,表达了古代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追求与抱负,至今也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读《岳阳楼记》,人们大多只对范的悲喜观、忧乐观赞赏不已,而很少注意后面那句“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一个“不以己悲”的一代名臣竟又有如此意味深长的慨叹,发人深思,也值得研究。

范仲淹,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 年)进士,江苏吴县人,为官不久便上书谏“裁冗兵、冗官、冗贵”、“废郭后”而被贬睦州;随后又因“越职言事”,贬饶州。景佑五

年,李元昊反兴庆(今银川),溃宋军于定川寨,侵延州、陷丰州、破安远、屠渭州(今平凉),其势几不可挡。危急中,一介书生的他,被派与韩琦将军一起去御敌,苦战经年,终于庆历四年把战事稳定在萧关(今固原)一线,他也由经略史升任为统领陕西、河东两地的宣抚使,参知政事。但他又“谏十事”:重农桑,轻徭役,整武备,清吏治,严格选官、任官,除腐败……遂又被“罢知彬州”。他的这篇《岳阳楼记》就是这次被贬之后写的,而此时的他也已是50多岁的人了,烈士暮年,“怅望关河空吊影”,于是便也有了“进亦忧,退亦忧”的无限感慨!

“然则,何时而乐耶”?是问己?还是问天?我看都不是,而是那些良知不泯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无力回天的困境之后,从心底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士”。这个峨冠博带群体,从春秋到战国,切入时代前沿、推动社会改革的是他们;奔走呼号、为匡世济时而百家争鸣的也是他们,其佼佼者在各个领域都扮演了历史前进中的主角。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崛起与巩固,“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知识最终要“货与帝王家”,这就使那些轻薄才子误把学问与仕途联系到一起,舞文弄墨,全为了升官发财,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什么“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全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

什么叫做知识分子?按鲍德里亚·乔姆斯基的定义,“是否定性的传播者”、“是质疑者而不是顾问者”。鲁迅则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所以,尽管中国不少“读书人”,但

“学而优则仕”，而“仕”一“优”便也就到了学问“死”的时候了！“仕”在“思”不在，有“仕”则无“思”、无“学”，真正像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轼、范仲淹这种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穷本究原、敢为民呼的人，却只能在“道”与“势”的抗争中求生存。当然，中国古文化的辉煌不容否认，但从某种角度讲，却不能不说是天不期然而然。“……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左丘失明而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例，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可以说，从《楚辞》、《史记》到《红楼梦》，包括这篇《岳阳楼记》，大凡在历史上重重写下一笔的，几乎都是出自那些“退”字号的文人之手。“退”而为诗，“退”而为文，这除了说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不幸，又还能是什么呢？

“然则，何时而乐耶”？我看像范仲淹这种人是永远也乐不起来的。因为从“道”与从“势”不论到啥时候，都是那些良知不泯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2000年11月30日

重读鲁迅

我第一次读先生的著作是 1943 年,但直到现在也对先生怀着一种沉重的感觉。

先生所处的环境太复杂了。从“胁迫于幻影的病病人的精神错乱”到“为布尔乔亚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从“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毒的煽动家”到浪漫的郭沫若指责先生为“封建余孽”,明枪暗箭,触目惊心!以致,连陈独秀也感慨地认为“世之毁誉过多者,莫如鲁迅先生”!

然而,事实要比这深刻得多。如今又听到先生“峻刻”、“偏激”、“固执狭隘”、“缺少人情味”的新说了。曾经被先生痛斥的那些为文化围剿而摇唇鼓舌的帮闲文人,走出墓地,与先生同归“伟大”,而他们的闲适之作现在也与先生的不闲之作同散芳香了!不过,当无聊成为某些人的风格时,我仍钦佩先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为什么就不研究先生这种铁骨精神呢?作为知识分子,谁能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挺起脊梁,成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我想,在中

国,只有先生。

记得过去读先生的书,于叹服先生的学识渊博以外,往往震惊于先生的敢言人之不敢言。但我现在不这样看了。他曲尽世态,并不指望世风立变;他喝破魔界,也不奢求鬼蜮就此敛手;他知道:“道破人心者不祥”,却对中国人的那些劣根性——麻木、冷漠、妄自尊大与“自我胜利”的阿 Q 精神痛加针砭。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什么名流与权威,一进入先生的笔下,便都成了“落水狗”!我总想,以先生的睿智,怎么就不知道“刀不出鞘,珠不出椟”才最安全呢?但祖国与人民是个大磁场,他只能把自己化作一柄剑、一团火,置身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是人不是神”这话被转述得太多了。但你只有走进他的书,看他怎样彷徨,怎样呐喊,怎样横眉冷对,怎样俯首为牛,才能认识他。换言之,他的书才是他。读先生的书,我特别喜爱那些“骂”人的文章。有时感到正好“骂”在我的痛处,有时又感到“骂”中某些人的要害,尽管他不与先生同时代。读先生的书,也好像跟着先生探险,“忽魂悸以魄动,忧惊起而长嗟”!让我看到了一个切入时代前沿的思想家在寒凝大地时乞求朱墨春山的挣扎,又让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先行者“站在沙漠上,看着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不后退半步的那种悲壮。当然,我更动情于先生那欲哭无泪的真实情感,神往于先生的大爱大憎。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如今之所缺。

鲁迅的那个时代,就中国的文学来说,差不多与西方的十八九世纪衔接。这一时期,法国有司汤达、巴尔扎克,英

国有哈代、狄更斯,德国有歌德、席勒,俄国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即使是积弱积贫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当时也还有个泰戈尔。可在中国呢?谢天谢地,幸亏于五四运动之后有了这位无论是其文学造诣还是其民族性、历史性都与这些世界文豪比较起来毫不逊色的鲁迅先生。

杂文这个文体我不知由谁创造,但现代杂文却很少有谁能超过先生。他用这种艺术形式参予社会变革,改造人性,同时也把它铸造成一种特殊的文体。不要看它只有千八百字,由于其凝艺术与哲理为一体,喜笑怒斥,挥洒自如,往往却有一剑封喉的妙处,要比几十篇泛泛而谈的“鸿论”管用。所以,尽管先生希望他的文章速朽,但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把先生的著作经常置于案头,说要不时地翻翻。他认为那是世界文学的奇葩,无法企及的精品。

现年 70 岁以上,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前后,并对当时的文坛多少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先生的生前身后,若论学问,王国维可以说是无人出其右;若论著作,梁任公著作等身;若论社会活动,胡适的折冲樽俎一时无两。至于“甘洒热血写春秋”的仁人志士更是数不胜数。然而,人们之所以至今怀念先生,不仅是先生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作,更是他那文字中的骨头和声音中那独立、准确、深邃的思辩,直至现在也令许多文坛翘楚无法望其项背。陈毅元帅有首悼念先生的挽联说得好:“要打‘叭儿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只文坛闯将;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

我庆幸这次重读。因为我终于读出了一个伟大的参照

系,不再困惑。我感到先生还活着。如同医学上的“病毒抗体”,在人性自救的意义上活着,在民族自救的意义上活着。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在狂风暴雨中第一个把悬在我们民族头上的警钟敲响,让钟声刺破黑暗、穿透时空、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撞钟人!

安息吧,先生!

2000年8月13日

天增岁月人增寿

重阳节前，老杜让我写点关于老有所为的文字，我却忽然想起一句俗话：“天增岁月人增寿。”

不是吗？人生苦短，淹留倏忽，一转眼便过了古稀之年，岁月越增人越老，毕竟是事实。

“老有所为”这话是鼓励，应当感谢说这话的人。但人一老便激情不再，怀抱的是那份度尽沉浮以后的安然，看尽云卷云舒的坦然，总希望自由自在，闲适如羽，再也用不着去推敲什么，小心什么，脱掉“隐身衣”，有了“自我”，便是最大的快乐。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为”的话，那也是随心任性，率意而为：或读或吟，或庄或谐，或信手涂鸦，或聊发少年之狂，或如一缕清风，随精神之冥冥遨游于八荒天地，或如老僧入定，坐看云起，思到水穷……这便是“为”，至于那些“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犹能自奋蹄”者，神人也！吾辈俗人，实难企及。

查良镛先生说：“中国人一老便一流而入佛、入道，追求

来世。”我不相信这些,我只求静,特别是离休以后,高贵的圈子,怕有攀附之嫌,主动回避;生活的圈子,琴棋书画扑克麻将之类一窍不通,也碍难涉足。正所谓:“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不过,与老妻相伴,与孙女为伍,周旋于 60 平米,倒也使我那险些失衡的心重归宁静。有时,开悟见性,还会凭空漂来一丝“悠然见南山”的感觉,乐在其中!

不近人情吗?也许。因为人情这东西你越讲究越复杂,人与人也越发地不能坦诚相待,不几年间,经常是忍看朋辈成“新鬼”与“新鬼”们自己之间的互相捉弄与糊弄。所以,“不近人情”也罢,只要守住自己心灵上的那方净土,倒也清静。

是逃避吗?是,也不是。因为某些逃避却并非逃避。正像刘心武的一首小诗说的:“落进犁开的泥土,在视线不到的地方,既痛苦而又欢乐地——绽开自己。”这种“逃避”,既不是躲进套子里的别里科夫,也不是万念俱灰的八大山人,是选择,是求静,是自知之明,也是否定之否定。当然,一定要说是逃避也未为不可。

是孤独吗?是,但这要看你怎么看。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孤独的大宣言。他在“哀众芳之芜秽”的同时,“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甚至为此“虽九死其犹未悔”!但你能说他的这种孤独不值、不对,或无所谓吗?此外,与“白雪难同调”的李白,“安可辞固穷”的杜甫,“遑遑独问津”的王勃,“我有迷魂”的李贺,“无意苦争春”的陆游,“死犹未肯输心去”的黄宗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郑板桥,乃至“横眉冷对千夫指,

伏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他们有的孤独一世，不与人同，但你能说他们孤独得不应该吗？

孤独是梦者，亦是行者，尽管思索未必准确，呼唤时告无功，但他们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且行且进，坦言直说，实乃大梦者之大勇大行也！我们这些行将入木者难以望其项背，也不敢妄以类比，如果一定要说也有什么所谓的“孤独”，那也只不过是一杯清茶里的小天地，只能呷出淡淡的苦味，并无实际意义！所以，请勿误会。

2001年12月4日

不朽的马克思

3月14日,又到马克思逝世纪念日。

马克思的一生,颠沛流离,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走到哪里便被哪里的政府驱逐,即使是他的那位身为普鲁士王国大臣的姻兄,也签发过驱逐他的手令。

马克思的一生,也不为社会所见容。他被许多所谓“有教养的阶层和人士”诽谤,他也批判了许多所谓的“大师级人物”;他几乎与全欧洲所有的杰出人士都打过交道,而他的许多重要思想也在论辩中形成。恩格斯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因而,即使是他的论敌也无不折服于他的为人。

20世纪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真正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因此而发生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遏制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导致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以致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从它那里借鉴,被迫进行了许多制度上的调整。

不过,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比,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生、存在毕竟很短。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到现在不过100多年,而它却走完了从理论的提出、论证、完整到实践的全过程。这期间,它有过波澜壮阔的高歌猛进,也有过巴黎公社失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种令人困惑的挫折。但这并不表明历史转向,因为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有其发展上的起伏,有时甚至要起伏很多次,才能使人从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中充实自己,走向成熟,发展壮大。同时,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一场激烈的阶级冲突便可解决问题的简单否定,而是经过扬弃(即在吸纳了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创造之后)的那种否定之否定。这就规定了它的长期性、复杂性,道路曲折,也反反复复。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取代,则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样看?一个时期以来有过“老教条”、“走进了死胡同”、“正在消亡”等说法。但当代的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罗纳却认为“不读马克思的书就不能成为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而写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萨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文化的真正核心,是“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解决当代社会实践的现成答案,可也未过时。就拿如今在一些国际论坛众说纷纭的那个“全球化”来说,包括一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无不对于19世纪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何以便有了关于资本开拓了市场,从而造成了各民族日益广泛深刻的相互联系的预见,感到惊讶!

而马克思所着力提示的关于资本的文明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别是经济发展与人的本身发展的复杂关系等等,则更是学者们如今共同关注的时代难题。

马克思逝世已经 119 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那些著作也许早已被人淡忘了,而争论却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潮起潮落,时起时伏。但你研究它、讨论它是一回事,鄙视它、抛弃它,又是另一回事。正确的态度,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思想、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这里,马克思虽然讲的是“每个时代”的问题,但对马克思主义,乃至对于其他伟人的思想、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准确把握”是前提,把人的“思想、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是检验的标准,当务之急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接轨,与具体的国情紧密联系,发展马克思主义。若离开了这些,抓住某些表象便轻言“过时”、“消亡”、“走进了死胡同”,那不仅有失公允,就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恐怕也要深表遗憾!

2002 年 3 月 14 日

说 钱

钱,一个幽灵,一个怪物!它不发光,但能使人的眼睛发亮;它没有手,却牵着人的鼻子走,让你为它而哭,为它而笑,为它而凶、而狠、而狂、而傲。可一旦拥有了它,又为它而提心吊胆!不知有多少人为它而变坏,也不知有多少人变坏了才有它。

然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钱,却有如空气、阳光与水,谁也离不开它。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他所做之事又多与钱有关,当过委吏(仓库会计)乘田(畜牧业主管),因而对钱的体验也务实,说:“民衣食而后知耻”,“衣食足”才能“教化兴”。曾被某些人称作“暴君”,而实则为伟人的斯大林,也说过一句务实的话:“落后是要挨打的!”什么叫“落后”?它的直接表征就是穷,就是没钱!

“男儿屈穷志不穷”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翻了“三座大山”,又建设起了一个新中国。但是,如果因为穷便从钱的

“罪恶”感出发,视钱为浊物,也不足取。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进程便是钱的创造与积累的进程,即使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也要用钱来做后盾。为什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会使那些强国首脑睡不好觉?原因就是“饿得只好睡觉的东方雄狮这才终于醒来了,它那每根直竖的毛都是金子铸造的”。——一位西方记者如是说。

不过,以“富”为因,所导致的结果若不是人的文起来、雅起来、聪起来、慧起来……这些“美”与“善”,而是狂起来、傲起来、凶起来、野起来、冷起来、浑起来、狠起来、荡起来、淫起来、贱起来……这些“丑”与“恶”,那就令人担忧了!

如今什么最可怕?不是人人谈钱、想钱,也不是为了钱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腐化、铤而走险,真正可怕乃至彻底可怕的,是钱成了人的惟一追求的价值尺度!“人为钱使,心为钱役”,当没有理性约束与道义指向的钱成为人的生命里仅有的一座“黄金坐标”时,道德对金钱的控制作用便微乎其微了。

西晋南阳有个终身不仕的鲁褒,因有感于当时社会“钱能通神”的风气直弄得“纲纪沉沦,贿赂公行”,曾写了一篇“钱神论”言钱之害。此作如今虽已难寻原文,但从《晋书·鲁褒传》中亦可窥其一斑。如:“钱之为体,有乾坤象,外则其圆,内则其方……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真是写尽了钱之罪恶,而作为钱的别名“孔方兄”亦从此传扬至今。

鲁褒距我们已有 1600 多年了,但他的思想、观点却不能说已经过时。今天,被金钱膨胀起来的欲望,实际上已摧毁了文化上千古化育下来的价值生态,一切的一切,都已被纳入了与钱交换的范畴,我们面对的现实除了金钱和欲望之外,不知还有什么。

当然,闭眼不看如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一味地玩味“穷”的“美”与“神圣”,并不明智。但是,不问是非,不问社会的分配再分配,一头钻进钱眼里去拥抱钱,也不能说是明智之举。要知道,人,也只有人,才是这博大的世界生物群体中惟一能以“文明”的创造来为自己定位的生物。对于钱,只有为它注入“文明”的内涵,才是一种“美”的显现。否则,无论是你把它当作取悦上级的“升官梯”,还是把它当作“勋章”来佩戴,抑或把它拿来垫起自己的身高,最终都要遭到社会的不齿与唾弃!

2001 年 6 月 17 日

话“欲”

欲,在我们这个曾经讲求“存天理、灭人欲”的国度名声一直不好。

欲,在如今这“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也被贬得一无是处。

然而,欲却是个永恒的字眼。大概自人猿揖别以后,欲便促使人去钻木取火,改进工具,实现了农耕文明,又跨过了工业文明,来到这电子时代与信息时代,拥抱了地球,闯进了月亮,如今又要去火星看看有无外星人!

欲,还是个生活性很强的字眼,衣食住行离不开它,人类的繁衍更是一个“欲”字使然。不要说芸芸众生,即使是那些青灯为伴,不化不禄的尘外“高人”,同样也有个能被人理解与尊重的欲望。与世无争之谓,一时一事之说也!因为生活本身便是无数的欲所堆成。

不过,欲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多变的。如今,人们总想侥幸于一时的冒险欲,不计后果的占有欲,急功近利的表现欲,明争暗斗的权力欲,急不可耐的攀比欲,矫揉造作的炫

耀欲,及时行乐的享受欲,极尽豪华的奢侈欲,不管他人死活的掠夺欲与见利忘义的贪欲、玩世不恭的色欲、仗势欺人的霸欲和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盗名欺世的显示欲……都从“潘多拉魔盒”里跑了出来,拼抢、争夺、倾轧!300年前,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也许就在人的这种“欲海翻波”之中。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欲”,就是这样,它既有“恶”根,亦有“善”根,是攀援理想天国的“梯子”,也是引发人间罪恶的“发酵剂”。它既可使你保有一副浩然自守的铮铮铁骨,但也能使你塞智为昏,染洁为污,化铁为泥!

秦之李斯,是被史家称为“智绝当世”的人物,在秦统一六国“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攘四夷”等重大政治决策中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人生志向却并非定社稷,安天下,而是要做一个永享富贵的“仓中鼠”。在秦始皇驾崩迎立新君时,伙同宦官赵高将始皇令其长子扶苏继位的遗诏秘而不发,并将被史家称为“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辨于心而拙于口,尽礼敬人,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的扶苏害死,改立无才无德的胡亥,结果,幻想传至万世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李斯自己也落得夷灭三族、腰斩于咸阳的下场。

汉之霍光,名将霍去病之弟。侍武帝,佐昭帝,立宣帝,废昌邑王贺,诛杀谋逆的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等,威风赫赫,一时无两。可是他的权欲太盛,特别是其妻欲使其嫁与宣帝的女儿成为皇后,竟阴使牙医下毒害死许皇后,弄得朝野共愤,结果,死后仍被夷灭三族。班固评曰:“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亦

不过如此。然，阴妻之邪，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明之张居正，“少颖敏绝伦”、“深沉有城府”，为官后即使是严嵩、徐阶这些权相也对他十分敬重。万历年间他出任宰相后，励精图治，振弊起衰，堪称一代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改革家，但其贪欲亦盛。他每月的俸薪不过 87 石米，一生所得折银亦不过两万两白银，可是他向宦官冯保的一次行贿即有“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冯保事发，他亦受到株连，家产被抄没时，竟又抄出金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八万多顷，身败名裂。

记不起是谁讲的了：“愚蠢多来自人的原欲。”它也有如人们须臾或离的水，合理地渲泄可灌溉大地，哺育人类的繁衍生息，一旦失控，则毁灭万物。“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这便是欲的“二重性”。

其实，说“人性善”或“人性恶”，都有片面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之初，如玉璞”，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潜移默化与教化，成为“环境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环境的主宰”与“自然主宰的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78 页）这说明，人的价值在社会。人之为人，至少也要知道如何识别、掌握与驾驭自己的欲，把自己“主宰”成为一个无负于社会、无负于天地良心的“好人”！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谁说的，记不起了。但它却点明了人生的意义。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话是谁说的，也记不清了。但它却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

“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元稹在一千年前说的这句话，也许现在还有用。

2001 年 10 月

问“福”

春节期间,走在街上,忽对家家门上贴的那个“福”字有了疑问。

“福”是钱吗?是的,连莎士比亚也说它能使“黑变白,丑变美”,“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寡妇恢复三春娇艳,重做新娘……”但巴尔扎克却说:“幸福并不在金币挥霍的屋檐下!”

“福”是权吗?不错,权能满足人的表现欲、占有欲,“堂上一呼,堂下百喏”。即使是“指鹿为马”,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但现代民主社会制度下的权,却与其自身的原则、责任、义务相连系,有了法的制约,舆论监督成为“有限权力”与“可约束权力”,若不自觉地“自我膨胀”也会导致“自我毁灭”。所以,只要良知未泯,人就会把权力当成负担,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幸福么,很难说!

“福”是闲吗?当然,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劣根性,谁不想坐享清福?但闲是有条件的。否则,即使是闲得如同闲云

野鹤一般的陶渊明,不是也会“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吗?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板桥语,也有道理。因为人一糊涂便没有了思想,是是非非,视而不见,自然也就无所谓吃亏与不吃亏。但你能像郑老夫子那样,随便画一把扇子便可“换得纹银三十两,聊以糊口和养家”么?

此外,还有一说:“知足者常乐,能忍自是福。”反映了中国小民向以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作为幸福保障的心态,以致连纪晓岚也说:“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但“造物主”却赋与了人类一个永不满足的天性,使人的主观认识有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不断发现,并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有了无止境的追求。若事事都以“知足”论,隐忍认命,逆来顺受,得过且过,随遇而安,那不仅不会再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恐怕也不是人的什么“福”。

有人说,幸福其实也很简单,它可以简单到如同喝一杯自己想喝的茶,穿一件自己喜爱的衣裳,吃一种向往已久的美味,听到对于自己的某些赞誉,或是自己在某种场合下的那个会心的一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幸福是“无处不在无时在”的。但是,恕我直言,那些瞬间的“欢乐”,一时的“开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浅浅的感觉而已,无所谓“福”!

何谓“福”?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写了《战争与和平》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并且是个典型的贵族(伯爵)与大庄园主、农奴主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他比国家早4年解放了自己庄园里的农奴,在家里凡是自己能干的事也

都要自己动手。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妇人当作搬运工叫去扛箱子,还给了他5戈比小费。这时,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那贵妇人大吃一惊,并要向他讨回那令她含羞的5戈比,可托尔斯泰却说:“这是我的劳动所得,它使我幸福,我很看重它。”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其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幸福和快乐》中,找遍俄国,发现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人竟是枕锄而睡的农夫,是从农夫打瞌睡的倦态与打呼噜的声音中飞扬和流溢出来的那种由衷的舒坦和满足。说能吃、能喝、能睡这种生活的本然,便是给人带来幸福与快乐的源泉。

德国作家伯尔写过一篇《懒惰哲学趣话》,说在某港口的一条渔船上有个渔夫在太阳下打盹,一个过路者问他为什么不下海,却在这里晒太阳?渔夫说他已经捞到了20几条鱼,还有4只虾,够了。那人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些鱼呢?这样,你以后有了钱就可以添渔船,买渔轮,然后再建冷库,然后甚至开上直升飞机去找渔群……渔夫问:再往后呢?那人说,再往后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坐在港口的太阳下去欣赏这美丽的大海了!渔夫说:“我现在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这篇短文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拼命攫取与幸福感并无什么关系。

另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我国清代诗人李密庵竟把幸福化解为一个耐人寻味的“半”字。说:“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半村舍,半山半水半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半姻眷。半雅半粗半器具,半华半实半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饌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

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半半歌》)

但是,写了《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一世界名篇的法国作家左拉却从积极的一面发掘幸福,他说:“生活中的惟一幸福就是不断前进。”话虽不多,却发人深思。因为前进是一种力量,一种踏遍荆棘的勇气,一种走过风雨的从容,一种面对艰难险阻的魄力。同时,也只有前进,才能有发现、有创造、有收获、有进步。当然它也同样只是一种感觉,但人也只有在主客观世界改造的不断前进中才能获得这种感觉,尽管它也不会很持久,但它也时时守候在新一轮矛盾解决的大门口。幸福,便是人的这种一次次前进中所获得的成就感或成功感,它是有深度的,就像躁动于泥土中的种子,而幸福也就藏在那份躁动的喜悦之中,无需表白,无需炫耀,无需伪装,也无需用攀比的办法对比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手段与目的的不同,幸福的感觉也只蕴藏在你为社会进步的努力奋斗中。不是吗?我敢说:当科学家千百次研究试验的科研项目终于完成,当工程师苦心孤诣的设计拔地而起,当两鬓斑白的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当作家、画家看到自己的创作几经周折终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当医生、护士看到自己医治、护理的患者终于走下缠绵已久的病榻,当编辑、记者看到自己连夜赶出的报刊在读者群里争相传阅,以及工人看到自己手上的部件在传送带上起舞,农民看到自己的一年辛苦终于变成了丰收的时候,他们从心底泛起的那份喜悦

与幸福,是任何一个害人利己的奸商、骗子与贪官污吏都难以体会得到的。

所以,印度有句谚语是:“只为自己打算的人没有幸福”!

2001 年 3 月 4 日

辨 礼

礼的虚伪,大概在 2000 多年前便被老子戳破,说它是“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这在如今尤为明显。“无事不登三宝殿”,“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至于成千上万送给贪官的“礼”,则礼之非礼,昭然若揭。

礼对人性的钳制、压抑,特别是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大概在 2000 多年后被鲁迅识破。他在《狂人日记》里揭示了“礼教吃人”,又喊出了“救救孩子”!至于他说的“女同胞”(主要是农村“女同胞”)如今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千年礼教中的神权、族权与夫权压迫的阴影,还很难说。

不过,也要看到,礼,毕竟是成形于封建社会初期的东西,现在看来,礼的那些“虚伪”、“反动”,在没有秩序、没有稳定、人伦大乱、礼义全失的春秋战国,或许还是个“进步”。何况,礼的本意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禁乱之所由生”(《礼记·经解》)——使社会稳定、有秩序,这在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不对。至于程

朱理学后来把它发展到连寡妇改嫁也是“大逆不道”，这恐怕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了。

常常听到有人把我们以往的社会作为西方现代法治社会的对立面，称作“人治社会”，谬矣！“人治”，即仅凭一己之好恶来规定社会秩序，亦即史家所称的那种乱世的“丛林政治”，这种“治”，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多少、占多大比例姑且不论，但要靠这种“治”去承载、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不要说五千年，就是一两个世纪也难。那么，与法的对应物是什么呢？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又是什么呢？是“礼”——“礼治”。“礼”，指礼仪，进而引申为君臣、父子、亲友、师徒、邻居、男女老幼、兄弟姐妹互相怎样对待，冠冕服饰怎样区别，语言的讲究，以及生丧嫁娶、节日祭祀、典礼庆贺……等等的具体规矩，但其潜在意义则是通过“礼”而“安上化人”——使社会文明化，然后，“由礼以达道”——使人懂得善恶美丑，自觉地做到“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道德，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政治”。几千年来，如果没有内化在人心里的这种道德与“思想政治”做基石，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古老国家是很难维系到现在的。

说有“法治”与“礼治”两种社会，其实也都是从概念上去讲的，究其实质，则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要“法”的，也没有一个社会不要“礼”的，区别只是两者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当然，无论是“法治”或“礼治”都有其“霸道”的一面，尤其是“礼”的虚伪及其陷人于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消极思想，不可低估。但你研究它、改善它，是一回事，“一

棍子打死”它，涤荡它、扫除它，又另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没有“文革”对“礼”的讨伐，乃至“文革”后对“礼”的道德内涵与“礼”的那些最富于整合、教化的力量视而不见，便没有“文革”以后一直困扰我们的公德失落与道德滑坡。

2001 年 6 月 11 日

又见《风景》

整理旧书,又见辛笛于1948年写的《风景》。

“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的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惯爱
想一路走来行过的地方/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暗淡/瘦的耕
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

1948年,正是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关键一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风景》,显然不是诗人所见的纪录,而是潜思维于刹那间迸发的火花,表达了诗人对中国社会的沉重思考。

列车、轨道、瘦弱的牛;茅屋、坟与更瘦的人;“社会问题”像一节接着一节的车厢,“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使老百姓的“生活距离终点这样的近”……瞬间景象,就这样被诗人组合到一起,附着在思想上,上升到诗的意境,让人百感交集。

53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如今读来,这首诗却依然让人深思不已。这倒不是因为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作品情有独钟,而是诗人的真诚让人感动。记得雷抒雁先生有首悼屈原的诗说:“忠诚,是忠诚者怀中的沉沙/诗人怀沙一跃/冷冷的江水为之疼痛两千年……”难道江水真的会疼痛?不,真正疼痛的,是那条不废的江河——历史。是历史之痛把诗人的忠诚传递了下来,也才把诗人那美丽的诗篇传递了下来,成为千古绝唱。

诗,也是史,是史的精灵。如果既逃避历史,又无视现实,只凭诗的语境与诗的语言去挥洒,那不管你涂抹得如何了得,也难逃“游戏笔墨”之嫌。

当然,“游戏”也有好多种。吹喇叭、抬轿子的热闹“游戏”;躲进象牙塔,自我欣赏的冷漠“游戏”;钻进故纸堆,刻意风雅的酸腐“游戏”;“临风落泪,见月伤心”的病态“游戏”;烟波万里,虚无飘渺的朦胧“游戏”;嬉皮调侃,“小我”比“大我”更触手可及的小资“游戏”,以及“自嫌诗少幽燕气,便向冰川跃马行”的故意做作……,哪怕你把它捧成掷地有声的金属,也如同快餐,吃了就忘!

诗目前缺什么?借用王安忆、刘醒龙两作家对文学的批评:“技巧智慧太多,灵魂血肉太少,创作的苍白,就需要当今最流行的词儿——补钙。”

不过,话说回来,某些诗人也自有其难处。在如今这个“人只为钱笑,也只为钱哭”的时代,行走于江湖,不得不为“稻粱谋”;周旋于豪门权贵,也不能不仰人鼻息;百无聊赖,在浅吟低唱中寻找自己赖以栖身的梦,让人同情;趋炎附势,甘当“帮闲”,也够可怜!但是,当人文关怀被挤出诗外,

精神品质被置换成钱的时候,诗性境界也就变成了“白话世界”——大白话,什么也没说。

还记得海德格尔的话吗?“诗是思”。但一个没有诗性的世界也许要远比一个没有思想的世界更可怕。

2002 年 10 月 20 日

当代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七·七是个啥日子？”“牛郎会织女呗！”“九·一八呢？”“就要发呀！嘻嘻嘻……”这公共汽车上的欢声笑语让人啼笑皆非。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抗日战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年轻人也该有他们自己的活法。嘻笑怒骂，无拘无束，调皮捣蛋，天真烂漫，这都让人看着可爱。但我心中却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碰撞。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让每一代人都接受一次血淋淋的现实，才能使民族魂薪传缕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就像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永远向前，从不屈服，但也在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破坏下，挟裹了太多的泥沙。她只能沉重地流淌，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发生断流，让人难以预料。

黄河，你将永远地沉重下去吗？

1943年，肖斯塔科维奇写下不朽的《第七交响曲》。当莫斯科保卫战的前沿阵地传出它的旋律时，枪炮齐喑，一片

寂静，两军阵地全被那雄浑的乐章所笼罩。不难想象，那些黑瘦黑瘦的战士们的眼睛里当时迸发出的是一种怎样的庄严、肃穆与神圣不可侵犯的英雄气！

不错，我们也有《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这声音不知唤起多少中华儿女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敌人，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马本斋……而且，正是这种精神的传递，才又有了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

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只有“爱你、恨你、又想你……”我们的文化正走向“快餐文化”与“闲适文化”，媒体正兜售“百变自我”、“享受生活”，鼓吹“消费主义”。只要打开电视机，便见商界的“才子”与形同“三陪”的女秘书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观众演绎着一个主题：“男人靠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拼枪、争夺、倾轧、挣扎。反正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英雄与崇高日益远去，再也难有震撼人心的声音……

当然，民族要向前走，就不能一味地沉浸于不幸，一味地品尝苦难。但伟大的民族也应该有与他那个“伟大”相匹配的文化遗产。不管怎么说，人生需要意义，需要理性，需要神圣的理想，而这一要素却只能由社会的“精神市场”来提供。

当代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是钱？是权？是名誉、地位，还是爱情、家庭、宗教信仰、共产主义？抑或，什么也没有，只知“跟着感觉走”？如果调查，一亿人也许会有一亿种答案，但这些答案却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50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但谁又能保证不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再趴下呢?比如:人格对钱“趴下”,官格对腐败“趴下”,正义对恶行“趴下”,党性原则对人情关系网“趴下”,大写的“人”对小写的“人”“趴下”等等。这不是耸人听闻,想想吧!一个李洪志,一篇歪理邪说,一套并不高明的骗术,就使不少人上当受骗这种教训,难道还不应该汲取吗?

“站直了,别趴下”!这也许并不只是一部电影的片名
.....

1999年8月15日

忽然想起李友久

读孔繁森的事迹时,脑海里忽又浮现出一个风尘仆仆于灾区的干部身影——原平凉地委书记李友久。

七十年代初期,我跟友久同志去一个重灾公社。走在半路上,他忽然叫停车,让司机开车先去了公社,然后便领着我一村挨一村地去看群众的生活。正在吃饭的,他要看碗里的稠稀;吃过饭的,他要看锅里有无剩饭,剩的是什么,且要逐家逐户地看猪鸡的数量,牛驴的膘情,从这些常人不注意的地方去推度群众的生活困难程度。记得在一个叫高驿的小山村,当他发现一家老人因吃了国家供应的薯干而排泄困难,爬在坑上痛苦地辗转呻吟时,他的眼睛一下湿润了,走在路上,好长时间没有一句话。还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重灾县,他又是半路下车,循着村里一阵哽哽咽咽的哭声走去,经过询问,得知此户的男人因过量食用了当时农村唯一可以找到的代食品——油渣而中毒死亡时,他一下失去了自制,赶到公社,望着正在吃饭的公社书记问:“你那碗

面条真的还能吃下去?”怒不可遏,弄得周围的人不知所措。

关于李友久的政绩,自有公论,无须赘述。但从其急民之所急的工作态度看,我总觉得他也与孔繁森有着某种神似。孔繁森去阿里上任的路上半路下车,先搞了3个县的实地调查,弄清了当地资源蕴藏的巨大优势;李友久在检查灾区的路上半路下车,发现了难以在例行公事的检查中能够看到的群众生活。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及其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官从民来,应与民通”,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更应与民“通”。而也只有“通”,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实践与群众的意愿“合拍”,这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可是,如今且莫说那沉在办公室里终日欣赏自己遥控指挥的习气,也莫说那只听喜、怕听忧,一有不同意见就大发雷霆的脾气,更莫说那以检查为名,行吃喝玩乐之实的乌烟瘴气,就说那“认真”下去或下来的吧,如果是电话开道,小车成行,随从一大堆,接待人员前呼后拥,需要听的汇报早已经过“秀才”的神来之笔,那么,不要说查不到极需要查的那些“角落”,就是走访通衢闹市,怕也难睹其实,这又怎么能说与民“通”呢?

障碍,令人生畏的障碍! 而比这种“人阵”之“障”更可怕的,是领导身边不知何时生出的那些专为隔断领导与群众而生活的“职业群众”。这种人,言必称“群众”,行必近领导,且专找那些脚重身沉的领导献殷勤。忽而关心起居,忽又关心健康,忽而告你去某处之宜与不宜,忽又献上一个“臣以为”,指点迷津。反正你不找他他找你,你不买账他买账。谁说领导脱离群众? 有“我”挡驾! 有了这般谄媚取宠

的小人围在身边,那我们的“某些领导”自然也就心底平静,悠然自得了,哪能再有心思去想与民“通”。

有一种观点说:“时代不同了,不能再翻‘老皇历’了!”我总不以为然。这除了“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仍是改革开放更加紧迫的重大课题”这个大道理外,改革的利益格局调整中,由于必然要发生有人受益多、有人受益少、有人成为改革“阵痛”主要承受者的现实,同样有个关心与帮助部分困难群众渡过难关的问题摆在那里,不容忽视。无论时代怎么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息息相通,才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过去革命战争靠的是这一条,现在搞改革开放还是要靠这一条。所以,小平同志说:“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看来,焦裕禄、孔繁森都是这样做的,李友久虽然做得不如他们,但也有着这方面的努力和追求。是不是他们都翻了“老皇历”,值得深思啊!

1995年8月20日

闲话“人民素质”与“现代启蒙”

不知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近几年有关人民素质的议论忽然多了起来。一些报刊媒体上的文章不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跟不上法治建设,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不适合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甚至,经济搞不活,发展上不去,治安搞不好也怪群众。一夜之间,我们忽然从过去高喊“群众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理论高峰一下子滑了下来,一切归咎于“人民素质低”,于是便也有了“现代启蒙”的提出——重新教育人民群众。

“启蒙”,在康德那里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看做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理性反思并走出传统束缚的过程,它主要是思想对理性的确认。在中国,启蒙运动曾使辛亥革命前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一期间,出现了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时代。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仅以自己的人生理想去改变社会,他们更以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考去铸造个人的生命实践,“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斯民致太平”,

前仆后继,或成功,或成仁,一件件个案,在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绝唱,也最终构成了一幅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但是,也毋庸讳言,在某些人那里,对于中国的“启蒙”也从来就没有满足思想领域或价值观上对民众的影响,而是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理念冲突的关注,并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一个多世纪的“启蒙”,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如今流行的全球化、“现代性”,这些人对“启蒙”的理解,让我斗胆说一句:都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其理论和制度的资源的,而是以西方已有的知识来重新估定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以此来要求制度与体制达到西方现代的同质性诉求,结果,付出的努力艰巨,而收效却微乎其微。以致,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邓小平同志还讲:“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

中国人的素质究竟低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1949年的革命成功并不基于“五四”时期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而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大同”理想对共产主义本土化的向往,由工人农民用枪杆子投票选择了共产党。如果这个历史现象还不足以说明现代的话,那么,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使中国的改革如同决堤之江河,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的那步关键的开局之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是那些具有现代化理念的经济学家“启蒙”的结果,而是农民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冒着坐牢的危险闯出来的。至于此后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出现的“温州模式”、“深圳模式”,也不是哪位经济学家的设计,而是下面干部群众当时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的创造。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细究起来，我们的某些改革亦如此。越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才越能使人的胆识大开，直面忧患，化危为安。如所有制打破国有与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放个体经济这一大政策的转变，可以说，它也不是谁的“启蒙”，而是被1979年及其以后的知青回城潮所引发的严重失业问题“压”出来的。这一年，全国的待业人员达2000万，其中回城知青就有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见《薛暮桥回忆录》），而此时的国营与集体企业也已存在着大量的冗员，不可能容纳如此巨大的失业大军，于是才有了提倡自谋职业，放开个体经济的政策提出。尽管这时还不是以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战略提出，但个体经济的大门一开，就超出了解决回城知青就业这一范围，开出了一片始料未及的大境界，也为日后的改革留下了一片开阔的改革大空间。

“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不知是谁说的，记不起了。但今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的那场八级大地震却给“人民素质低下”论者上了生动的一课。从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营救，到浸透温情的举国援助；从医疗救护、伤员转移到后援物资与人力的源源不断开进，在那条幽明异路的阴阳界上，每一时、每一刻都无不涌动着13亿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浓烈的手足情谊。一个无街不成市、无人不言利的社会，谁曾想，竟有如此朴素的热忱，会有如此普遍的关注！曾几何时，我们还为社会上那些拜权拜物的“游戏规则”痛心疾首，但诚信、守诺，热血衷肠乃至见义忘利的人间正道，却在“呼隆”一声的震荡中作了全新的填补。就在逃命成了人的唯一意志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刚刚逃出死地，惊魂未定，

却又冒着余震的危险返回去抢救那些压在废墟下的人,有的甚至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人素质低”的论调听久了,确实也为中国人的这种表现不解。这一股感人的力量,高尚的情操,良善的精神,坚韧的执着,又是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几年前,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比斯特与江泽民同志有过一次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后来他在回顾这次讨论时说:“……从数据上看,去年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这对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我个人感觉,这也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现象。”(见2005年8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实际上,约翰·奈比斯特看到的只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其余如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资本市场的设立、规范,西部开发,农民进城务工与农村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组织形式的民主——村干部直选、村民自治等,这些获得成功或较大成功的关键性改革也是这样。从宏观上看,这些改革虽然也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改革,但在具体领域却不能不承认最终仍要有赖于客观条件的发展成熟,有赖于民间的智慧开创,有赖于民意的参与与推动。

我不反对“启蒙”,同时认为“启蒙”还有着更广阔的领域。其中包括走出陈旧意识形态思维,克服泛政治化思维,厘清公权与私利,对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权力腐败进行有效遏制,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实现利益分配的基本公平等,就像上个世纪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那样,使人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但“启蒙”如果离开了中国的现实,离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把“启蒙”变成对西方政治思想、理念乃至体制、制度的“照单全收”,那恐

怕就不是“启蒙”的“启蒙”了。说句不中听的话,一个时期以来,也正因为那些不是“启蒙”的“启蒙”,才使我们的某些改革走了弯路。比如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大会便一致认定:“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可我们在一个时期却硬要推行什么“教育产业化、有偿化”,结果,食洋不化,不仅使高校扩招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也弊病丛生,一校两制与屡禁不止的乱收费、择校热等,使普通百姓承受不起,也使宪法规定的教育平等、每位公民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力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市场经济毕竟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进而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演变,恐怕至少也要几十年或上百年,也不现实。特别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成例可循,若没有国家权力在改革取向上的决定性影响,没有一批走在理论前沿,不顾冷遇与待遇的经济学家参予其中,并运用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做出突破性的努力,是不行的。但这与无视群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积极性,乃至把改革当中所发生的某些困难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群众“落后”、“素质低”的思想认识无涉,也与无视客观实际、无视经济发展规律的胡闯蛮干不沾边。

“学在民间”这个观点,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于上个世纪初提出来的。它说明:“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正造福人类的伟大思想,往往处于江湖之远而不在

庙堂之高,与那些凌空蹈虚、云里雾里的书斋学问比较,它更具民间智慧的鲜活性、创造性和独立性,也更贴近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切中现实的要害与本质。所以,我说“启蒙”虽然很重要,但也应该是提出进行“启蒙”——重新教育人民的那些同志,首先从西方话语的氛围中解脱出来,走进“乡土中国”,到民众社会里去经受一下常理和常识的“启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许能使“启蒙”回到真正的“启蒙”意义上来,避免重蹈事与愿违的历史覆辙。

2008年8月30日

闲话“和谐”与“和谐社会”之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党中央于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在2020年前要达到的目标,使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向着制度建设的层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同时也使我们树立起信心,确信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和谐社会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中心任务。

前几天闲翻《左传》,忽然一语醒目:“八年之中,九(纠)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和谐”这个词竟出于此处,倒彰显出汉语的无限魅力。

“如乐之和”——用音乐说明“和谐”,在西方文化中亦有如是说。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说:“相反相成的声音协调统一产生了音乐,音乐就是和谐之美。”赫拉克里特说:“一与本身相反,又复与它本身和谐,正如弓弦与琴弓。”可见,“和

谐”蕴含着博大的境界,是一种巨大的、包容众多的统一。

“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苏轼《鳊鱼》)说的是鱼与水的“和谐”。“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说的是动与静的“和谐”。“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琳上奏着的名曲。”(朱自清《荷塘月色》)这情景又像一幅古香古色的水墨画,温馨、宁静,让人心中不时涌泛着一一种恒久的光芒。

物物相谐,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贯追求的审美思想。不过,何谓“和谐”这里也无须长篇大论,单就这两个字的字形去分析便可找出答案。

先说“和”。“和”中的“禾”,指五谷之禾苗,可延伸至粮食,与人之“口”合在一起则说明“和谐”的先决条件是要人人有饭吃。否则,饿着肚子谈“和”是“和”不起来的。

再说“谐”。由“言”与“皆”组成,意即“都说话”,特别是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有表达他们利益诉求的机会,并学会尊重和听取他们的话,而不是装聋作哑,或粗暴地打压。所以,写了《文心雕龙》的刘勰说:“异音相从谓之和谐。”而邓小平同志则说的更明白:“一个政党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

“累了你就歇歇脚,渴了你就喝杯茶,气了你就消消火——请进,这里就是你的家。”写在大门口的这段作为广告词的问候语,使河南省义马市过去往往是“火药味”十足的信访大厅一下成了“群众之家”,(见2006年10月12日《文摘报》)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说明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和”。因为只有使广大人民“和”起来,才能对国家有利,若只突出某一方面或某一阶层的利益,那

不仅“和”不起来,也对国家不利。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也是这样。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社会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却又使我们面临并长期面对一些急待解决的矛盾。其中如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强资本与弱劳工的劳资格局导致的劳资冲突,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三农”问题,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念扭曲,官德、医德、师德下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先富起来的群体形象急需改善……等,无不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尽管这都是社会进步所必然要产生的分化与问题。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服务于长期战略需要的长远之策。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提高执政党的能力”到“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完善,并在六中全会最后确立。所以,它既不是一两次送温暖便可解决问题的短期行为,也不是泛泛议论一下便可达到的境界。从认识到经验,从理论到实践,它必须有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它也必须首先使以宪治国、依法治国成为保障它的形成和起作用的制度与机制。当然,“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要靠教育,靠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靠“人文关怀”的政策体现等等,但积极可靠的途径还是通过法治来公平合理地化解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至少,也要使一些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乃至关系后门与当事人的背景影响法律公正的现象,在法治领域绝迹;至少,也要使老百姓敢打官司,打得起

官司,冤有处喊,苦有处诉。这不是耸人听闻,因为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弱势群体的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而对弱势人群的关爱之心、怜悯之举,则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成熟与高低。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要“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这很重要。因为社会的不和谐往往并非政策或体制上的问题,而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法令政策措施不当,滥用职权,盲目蛮干所致。如果再有腐败因素掺和进去,执法违法,仗势欺人,那便有可能使杯水之患酿成轩然大波。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必须要有与其相匹配的监督,适时发现矛盾,揭露矛盾,才能使矛盾化解,相融相容。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运动和静止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运动本身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体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上,便是使那些看似无情的揭露与批评成为社会自身的纠错机制,并且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使社会的和谐成为一种永恒、可靠与充满生机的、更高层次的动态和谐。

当然,话虽如此,要使道理变成现实也并非易事。它要有法律与制度上的保护,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要有为政者的宽容,真正做到不打击,不报复,“闻者足戒”。而最重要的,则还是要有一大批有勇气、有智慧、敢于争鸣的媒体,实话实说,有话直说,“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

识”。才能谈得上鼓励与促进社会的和谐。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如能善待各种声音,百家争鸣,和而不同,那这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激情澎湃,一往无前。中国民主主义的兴起如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亦如此,而改革开放的初行,若不是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便不会有其后乃至如今这种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境界。它没有思想的束缚,只有法律与制度的约束;没有特权的骄横,只有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人人平等,没有人对人的轻蔑与歧视,而只有人与人的相互关爱与互助。所以,它只能是一个全局性的大目标。地方、单位与部门的工作虽然都和这个大目标息息相关,但却只能紧跟中央的步伐走,谁也不能像若干年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样,提前实现。道理很简单:没有整体的和谐就没有局部的和谐。而且,任何跟风起哄、哗众取宠的行为都对“和谐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2006年11月20日

“跑”的变迁与“跑官”

“跑”在词典作“急走”解，别无深意。但近些年其词义却发生了变化，如跑买卖、跑合同、跑销售、跑原材料，一个“跑”字，便形象化地把“时间就是金钱”的市场经济勾画了出来，煞是传神。而另一些跑，如跑批文、跑项目、跑指标、跑贷款、跑车皮、跑职称、跑调动、跑分配、跑分房……，则说的是那些不跑就办不成的事，一个“跑”字，意味深长……

不过，真正意味深长的跑，还是“跑官”。“官”——社会的稀缺资源，也是一种受人尊重的社会身份，但因跑而得之，则令人费解。一老友谓余曰：“非也，此中华之‘国粹’也！”余愈惑，翻古书，果有所得，如《荀子》中关于“苞苴行与”的发问便是一例。“苞苴”，是以荷叶包着鱼肉向上级行贿，类似今日之“红包”，而荀况所说的这种行为则是成汤时代的现象。由此可见，“跑官”早已是个古老的话题了。

封建制自其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以后，“跑官”就是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卿相必自科目”看似规定很严，同时还

有“察举”、“铨叙”等制度的监督、考察,但贿照行、官照跑,以致连“文起八代之衰”、一度还当过吏部侍郎的韩愈也有过“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的感叹。“夤缘”,即攀附权要、以求仕进之意。一个可供说明“夤缘”的实例便是与韩愈同时代的那个“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史载其本是个“面柔、陋鄙、无学术”的下级禁卫官,因通过其舅父的妹婿、也是当时门下省侍中源乾曜的侄孙源光乘,认识了源乾曜的儿子源清,“与清善”,使清父把他提拔到御史中丞(唐代为专管图籍文档的秘书),后又利用御史中丞“多与中贵人近”的条件,疏通了大太监高力士,向当时特承恩宠的武惠妃表忠心,愿保其子“寿王取太子位”,使惠妃“德之”并“阴助之”。于是,才由御史中丞而皇门侍郎,而礼部侍郎,直至同中书门下的宰相。

攀亲戚、拉关系、用钱跑、以贿通,走夫人、公子与领导身边人员的路子,吹“枕头风”与“耳边风”,这大概便是从古至今的“跑官经”。据说,如今还有以色情去跑的,虽是跑的发展,但却超出了跑的涵义。而值得研究的,倒是“跑官”这个封建制度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死灰复燃,乃至成其为“风”。同时,“跑官”之害也是明摆着的,向着官跑、向着权跑,一旦跑成,便与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没有质量,却尽是欺世盗名的本事,吹牛拍马,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虚报浮夸,许多贪官由此而出,许多惊人的经济损失与事故由此而来,蝇营狗苟,遗害无穷!

“跑官”能治不能治?笔者以为,能治也难治。因为能治不能治全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如果一个地方、单位的党的政治生活健康,班子里面的多数成员都能从党性原则的

高度来看待干部的选拔与配备,下面就“跑”不起来,至少也不会成其为“风”。相反,“家长制”、“一言堂”,或把班子变成权力的“交易所”,今天安排你的,明天照顾他的,各打各的“小算盘”,利益均等,心照不宣,那“跑官”就不仅难治,恐怕也就无复再言其治矣!

1999年8月24日

杞人忧天忧错了吗？

自从《列子·天问》讲了那个“杞人忧天”的故事以后，便引来了后世人的百般嘲笑。可我总觉得杞人没有忧错，他也并非庸人。

要弄清《杞人忧天》的对与错，先得弄清那个“天”。中国古文化里的天，极具歧义性。它或指某种必然性，或指某些规律、精神，或指国、君等等，当然也指自然之天。道家把一切自然而然的属性归之于天，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而在儒家那里，天人关系又成了人的伦理纲常与人的自然欲望的关系。它以天人之间伦理性的通感和同构为立论的依据，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程颢）“人副天数”、“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天”，又成了“道”——伦理道德与封建纲常的永恒性。杞人忧的是哪个天？因为是寓言，不好妄断。但如果联系杞国在春秋初期便过早地为楚国所灭这一史实来看，可以说，他正好忧对了。

“杞国无事忧天倾”一语，是李白在其著名的《梁甫吟》

中讲的。因为是名人所讲，所以也常被人引来讽喻那些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和意见。殊不知，在这句话的前面，他是先讲了“白日不照吾精诚”的。如把这两句连起来读，则不难看出诗人对杞人不仅毫无讽喻之意，而且是以杞人自喻，表达了自己对孕育着危机的盛唐的那种无以言状的忧虑。

其实，何止李白，古往今来，那些良知不泯的知识分子又有哪个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呢？“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是文天祥的为国之忧；“在家常早起，忧国愿丰年”，是杜甫的为民之忧；“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反映了陆游对那些达官显贵醉生梦死的无限忧愤；“心事浩茫连广宇”则表达了鲁迅对当时那种“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社会景象忧心如焚。用范仲淹的话说，他们是“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现代话讲，这就是那种弥足珍贵的“忧患意识”。当然，有些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斥之为“庸人自扰”，不屑一顾。可我觉得，忧总比不忧好，尤其要比麻木好。因为忧是为了不忧，近忧是为了不远忧，如果整天是一片叫好声充于耳际，一派形势大好的汇报摊于眼前，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人不昏头才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说法绝非耸人听闻；“盛世不惧危言”这说法也不是多余的古训，历史上的泱泱大唐何以能有那么一段炫耀古今的“贞观之治”？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因为有了那个爱听忧的唐太宗。

因此，我说：“天塌”可作别论，但不能小看了“杞人忧天”。

1996年6月2日

无题有感

刚读了《平凉日报》本地腐败案件的报道，又见《陕西日报》“全国十年反腐败的阶段成果——百名地厅级以上干部落马”，无独有偶，于是也使人想了很多……

权力可能会腐败这问题，我们党在建国前便认识到了。那时，毛泽东同志有过“两论”——“糖弹”论和“赶考”论，大意是共产党人接管全国政权以后，还要接受人民和历史的“考试”，重大的考验将是能否经得住“资产阶级裹着糖衣的炮弹”袭击。到了80年代，又一著名的论断提出，这便是邓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讲的“经济变质”、“亡党亡国”。从“两论”到“两亡”，我们的认识不可谓不早、不深，打击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不严，但腐败却有增无减。而问题的严重性，则还在于腐败的发展已使人见怪不怪了！花天酒地是工作需要，“声色犬马”是瑕不掩瑜，公款挥霍是跟上时代，吃喝嫖赌不算问题。有的，白天干“事业”，晚上“泡小姐”，问题出来了，也被认为是“小巫见大巫”，大惊小怪！

意义的虚妄与意义的短缺同时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如今,“民主”、“法制”、“监督”、“制衡”……这些应该有的词汇我们都有了,但人情关系这门“学问”反而更张扬。什么事都有原则也没有始终不变的原则,什么事都有规矩也没有非此不可的规矩。试问:当一个“熟人社会”的特征与依靠私人关系结成的“差序格局”成为社会的“无物之阵”;当社会的公平、公正让位于“看谁的路子稠、关系硬”,且一旦有了“关系”、“路子”便可升官发财的时候,又有谁能把“亡国亡党”当回事呢?

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极端理性化”的时代,但如今又陷入一种“理性失落”的状态。你听吧!人都恨“后门”,但也恨“背上猪头找不着庙门”;人都恨“关系”,但也恨“没天生个好爸爸、好亲戚、好同学、好老乡”;人都骂腐败,但骂的却是“腐化幸福”的“分配不公”,而不是腐败本身;人在本来“应该”而“不能”中叹息、愤恨,但人的价值取向也以一种极其强烈的反理性的色彩向着人的原始本能的方向复归,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手段都敢用!这便是如今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老实说,只要这种非理性的“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腐败就很难遏制。

无需责怪体制,因为体制改革毕竟是个渐进的过程;无需责怪法制,因为法制建设也毕竟是个实践积累的过程,何况,“官法如炉”也难敌“人心似铁”,这早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不过,我们却不能不痛心地指出干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现在即使对那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不论,只就干部升迁任免中的形式主义这一点来说,也足以使那些品质不好的人如鱼得水。我们不是没考察,但考察

只让那些“跑龙套”的同志去“走过场”，难得群众倾心相告；我们也有“民主集中制”，但在人的问题上往往却是个别同志说了算，加之，如今的人际关系复杂、微妙，就是放开了讨论，实际上也很难有人“放着河水不洗船”！

当然，人是个多面体，会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队伍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贪官何以前“腐”后继？反贪何以如同“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而且总是一挖一窝、一揪一串呢？说句人们不爱听的话，贪官若不首先便是某某人的“关系官”、“亲信官”、“马屁官”，他就很难取得腐败的“资格”！

“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这是东汉时期我们陇东的思想家王符在其《潜夫论》里的一句话，时隔 1800 年，却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我总想，反腐若不在那些“德不称其任”的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动真的，总在客观体制上替他们找原因、找托词、一味迁就，那腐败之“祸”恐怕也就越来越“酷”了！

2001 年 5 月 27 日

说古道今话“卖官”

“卖官鬻爵”之弊，史家考证不一，有说自秦始，有说自汉兴，实际上，封建社会代代都有。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明之严嵩、清之和珅这些有名的权奸，都有卖官的劣迹。其中卖官卖得最巧的还是南宋平章贾似道，他好玩斗蟋蟀，赢了便论输行卖，输得多的卖大官，输得少的卖小官，“以输代贿”，就是有人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也只能望“玩”兴叹！岂奈我何？

不过，真正论起“卖官术”，还是今人要比古人精。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的那位“卖官的官”——浙江温州平阳县原组织部长董根顺，任职4年便聚敛了171万不明来源财产，置有5处豪宅，其收贿竟然也有几收几不收：“东讲西讲的不收，山区太穷的不收，不可靠的不收”，但“个体户有的是钱，收了没事”。在收的时间上，除“逢年过节、乔迁新居、子女上学”大捞一把外，“平时不收”。你看，这有多精明。

惊讶中让人深感悲哀,奇闻中又觉得无可奈何。因为类似的这种“精明”,实际上早已是某些地方的“潜规则”和“流行病”了。俗话说:“平时多烧香免得急来抱佛脚。”尤其是那些并非凭真本事上来的平庸之辈,即使不能再上青云,也要图个平安,稳坐钓鱼台。何况,那“香火钱”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不送白不送,送了则既可夯实私人感情,又可奠定保职和提升的人气指数,何乐而不为?又何必干那种“放着河水不洗船”的傻事呢!

官衔职位这东西虽可成为“商品”,但因其自古以来便不能批量生产,所以总是奇货可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闹蝗虫,皇粮国税收不上来,便规定百姓“纳粟千石,可拜爵一级”。这是因为财政困难而卖官。到了汉武帝时,为筹开边军费,则增设卖官制,特别是汉灵帝刘宏,竟设专门机构“西园官邸”卖官,“纳十算仅得为吏”。那时的一算是一万,可见官价之昂。秦汉以下,唐宪宗一朝有“纳粟补官,入粟助边”的制度;宋徽宗时,公然卖官,以致连东京(开封)城里的童谣都说:“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明朝成化年间的官价是“纳米140石,可补正九品,每加50石可升一级”。清康熙为平“三藩之乱”与“准噶尔叛乱”,一次便卖了五十顶知县的乌纱帽,而乾隆以“捐班”、“候补”等名义的卖官收入,每年竟达500余万两白银,是年财政收入4000万两的八分之一。如今的币值无法与古代比,但从几位“大意失荆州”的贪官劣迹看,“官价”依然不菲。江西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乡长一职要卖3.5万元,有经济效益的厂长、经理要卖4至4.5万元;山东省的泰安市,由于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卖官无忌,其“官价”在当地广为传播:

“正科提副县大概四五万，副科提正科得要一万多！”

卖官之害，突出在一个“滥”字。古人把这种“滥”叫“十羊九牧”。明人王琦在其《寓圃杂记》里说：“仅成化十六年，长州一县即有纳（官）者凡三百人，因人设职，可谓滥矣！”但真正的“滥”是政治上的“滥”。什么“牛皮大王”、“骗子手”，“社会渣子”、“前科犯”，乃至负案在身的“中山狼”，都有可能摇身一变，“沐猴而冠”。如《中国青年报》今年2月10日披露的那个刘柏松，原为中原地方铁路物资开发中心经理，1990年因诈骗罪在河南取保候审，但其“用50万元巨款疏通某一权威部门的秘书张某”后，竟于候审期“走马上任北方某省交通厅副厅长，直至1995年才被再次逮捕”。另一典型是该报今年6月22日披露的“五假干部”吴军、高磊、蒋玉祥，竟买通包括安徽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何永炎在内的3名厅级领导，从1991年开始先后为他们办了假招工、假学历、假党籍、假职称、假转干等手续，一跃而成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行政处、劳务司、经济开发中心等3个单位的副处级干部，直至1996年案发。

官衔、职位的“商品化”，实际是政治上的一种“蜕化”现象。因为高投入的“买”，势必要带来新一轮高产出的“卖”，有人即使“买”了没条件再“卖”，也要变本加厉地去“捞”，索取权力的高回报率。于是，腐败分子便在这“买”与“卖”或“买”与“捞”的循环往复中繁衍生长，发展壮大，所以，苏轼在其《思治论》里说：“吏之不择，此存亡之所从出也。”而与其同时代的司马光则说得更明白：“吏治之滥，万恶之源。”可谓一语中的矣！

1999年11月23日

书与读书

书是什么？公认的看法是“精神食粮”、“进步的阶梯”，所以，“开卷有益”。但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这么看。比如《上海宝贝》算不算“食粮”与“阶梯”？琼瑶的书虽是畅销书，但一些学者却斥为“公害”，如果再浏览一下书摊，《怎样做老板》、《商战十八法》等，目不暇接的全是赚钱的绝招。美女血案，明星自传，名人艳史，官场密闻，诱人得很，但你却无法凭借这些“阶梯”“阅尽人间琼楼玉宇”。想跳出三界外吗？也行，有佛家禅语，道家箴言，但不管你怎么读，却都难逃酒色财气四大不空。此外，像有人示意，有人动笔，或附骥尾，或攀门庭，或捧人，或自吹的那些书，只要一看书皮，就让人懒得去买、去看了。

固然，古今中外名家的传世之作也有。但曲高和寡，且出版社职工的工资、奖金，书商的利润，也都无法靠这些真正的“食粮”为“阶梯”。这究竟是作者的悲哀还是读者的悲哀呢？说不清。

说到读书,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直把读书的功利主义推到了峰顶,窒息了思考与个性。可是,曾几何时,类似的功利主义又被另一种气候推动着卷土重来,在某些人眼里,《孙子兵法》已不是一部兵书,而是饱含处世谋略的著作;有些人看《周易》也并非看重那特殊文化所蕴含的哲理与智慧,而是引申到星相巫卜,要预测吉凶祸福;李宗吾的《厚黑学》,拟古讽今,鞭挞了旧官场的黑暗,但某些人读后却得出了如今处世“脸不厚、心不黑便成不了事”的结论;唐浩明的《曾国藩》,令某些人感兴趣的也不是其艺术结构,而是曾国藩那老谋深算的为官之道;高阳的《胡雪岩》,也有类似的效应,以致连社会上都有“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看《胡雪岩》”的说法。

人为什么要读书,简单说来,无非是“求知”二字。但作为成年人的阅读却又不能是简单的“求知”,而是“求是”,是从阅读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所以,历代人们,无论是官是民,但凡有点文化基础的,无不重视阅读。这也是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

“书犹药也”。这是西汉刘向在其《说苑》里讲的,南宋的陆游也在其一首诗里说:“诗书经卷作良医。”他们为什么把读书看得如此重要?原因便是读书不同于听广播、看电视,它是一种“养心”的活动,要读者启动思维,调动自身的审美想象,反复品味,才能完成鉴赏。这也正如铁凝在其《罗丹之约》的自序里说:阅读“是文字与心与眼之间的高级运动”。她说:“心灵成长离不开这样的运动。只要人类尚存文字,阅读便与人类同行……特别是在时代的功利和物

欲色彩更加鲜明的关头。”

“书富如海，百货皆有”。这是苏轼从另一角度对于书的肯定。这倒不是夸大。因为书所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还在于主题的感悟，情操的陶冶与精神上的潜移默化。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心灵的罗盘都要在书里感应，并使我们从作者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上获得美感，读出人生的大境界，带来思想认识的愉悦与升华。试想，人这一生，又有什么能比在万籁俱寂的晚上，捧上一本书，或半倚床侧，或微伏几案，边读边与作者在历史的时光大河里徜徉，在无声中去感受书中那些美妙的旋律更让人向往呢！无论是老庄的深奥，孔孟的智慧，巴金的控诉，鲁迅的呐喊，还是毛泽东的大气磅礴、挥洒自如，都会使你沉思不已；无论是海明威的幽深，高尔基的沉重，伏尔泰的咏叹，还是莎士比亚的海阔天空，议论风生，也都能让你为之一振！书，也只有书，才是人的心灵栖息地。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为生计而奔波的人来说，不带功利性的阅读也是一种奢侈。老实说，现在又有谁能像鲁迅先生那样，衔起烟斗，呷一口苦茶，在书中去体会那思接千载、独步堂奥的神韵呢？“游心游魂致良知”的读书人现在不能说没有，但恐怕也为数不多了。中国人尽管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高调唱了上千年，但真正的读书人却总是那些对“关系网”拙于粘附力，因而也总是进退失据的人。正心修身，如林间游丝，“总被雨打风吹去”；“忧思难忘”，也难得有个地方“慨当以慷”。在唯利是图的滚滚红尘里，“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书香是给读书人帮不了什么忙的。因此，我的读书态度一直很保守。除了那些精华难泯的书

以外,很少读书。加之,经济有限,近几年也基本不买书。不是个读书人,却说了些关于书与读书的话,实在惭愧。

1998 年 8 月 23 日

且说“官气”

“官气”，即人们常说之“官架子”、“官腔”等是也！大凡把人民给的权力视作“非我莫属”的人都有这种“气”。常见的“官气”如：“门难进、脸难看、话难搭、事难办”；“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爱吹不爱批”，横竖都有理；“爱听喜、怕听忧”，一听汇报问题就不耐烦；“嫌贫爱富”，没有油水的地方从不去；“官大学问大”，不管什么领域的问题都敢凭自己的一知半解讲他个滔滔不绝；“有权就有胆”，脑门一热就拍板，反正“我”说了算……。此外，像生活作风上的好虚荣、抖威风，处处显露人高一等、车高一档；“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自我卖弄，趾高气扬；开会讲座次，不上主席台便不自在；下乡接待要上档次，稍有不如意便耿耿于怀等，也可大体归之于“官气”。

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就和交警上岗、营业员上柜台一样，同属社会职业的一种分工，但为什么会产生有别于常人的“官气”呢？其原因，则不能

不归之于那个“权”字。因为有些人一进入权力氛围,便极易使权力成为人的潜在意识的主体,而人的本我思维反倒成了权力的“软件”,久而久之,便使自己养成一种游离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气质,以有权者自居,也以有权者的人格出现,即使在家庭也概莫能外。有人说那些官气很浓的干部也有“四化”,即:“举止架子化,言语文件化,生活特殊化,作风官僚化。”其实是“一化”——权力人格化,一当官便不会做群众了!

当然,也不是人一当官都这样。就领导干部中的多数,特别是就那些素质好、修养好的领导干部来说,由于其思维涵盖力强,自律性强,权力的承载不仅不会成为自己潜在意识的主体,反而会把权力意识提升为职务意识的自觉与自警,时时以群众中的一员要求自己,鄙视飞扬跋扈,也不以势压人,强调己立立人,更强调先正己而后正人。所以,在他们领导的单位或地方,既可突出权力意志,做到令行禁止,亦可“得其众而收其心”,即使是面临艰难险阻,也能把下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处变不惊,指挥若定。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者的权与力,领导对象的恭与敬,是分离的。而联系这个分离的纽带,则是领导者的人格与形象。“官气”十足的人虽可动用一切手段张扬其权的影响力,但却无法使权运用到其应有的力度,即使是权势熏人,也只能使人恭服、畏服,而不能使人敬服、信服。由此生发出去,便是下级的阳奉阴违,许多工作落不实,“腰来腿不来”,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害死人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患莫大焉!

1996年11月3日

假话四议

常见的假话,是恭维的话。这种假话往往出于世故者的逢场作戏,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见人便想恭维一番,瞎编一通,不然心里就不舒服。子曰:“巽与之言,能无说乎?”——好听的话谁不喜欢?所以,随着世故加深,这假话便也越来越多。

廉价的假话,是阿谀奉承的话。比如,打麻将毛病吧,可领导一上牌桌便成“密切联系群众”了!公款吃喝是毛病吧,可领导一上餐桌便成“善于公关”了!就连对送礼的来者不拒也要说成“领导人缘好,玩得转”。所以,尽管“马屁精”的名声很难听,却历来不乏其人。

可悲的假话是“套话”、“废话”、“大白话”。反正都是文件上讲过、报纸上登过的那些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自己再拿来“过把瘾”,至于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当然,言不由衷也有其难言之隐。或慑于某种压力,或出于为官之道,反正大家都如此,自己不“如此”反而显得

尴尬。这也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恶魔》中说的：“人总是相信自己的谎言。与其被人骗，不如自己骗自己！”

可怕的假话，是大睁两眼说“瞎话”。一如看见皇帝裸体便交相称赞其新衣；你“难得糊涂”我便“糊涂”的“难得”；你把“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我便说“败亦无愧，精神可嘉”；明明是官僚主义造成我们的工作“在困难中前进”，可你一定要说是“前进中的困难”，那我也就附和“在所难免”；你虚报成绩，我也正好拿来给脸上贴金，如此等等。你“糊涂”，我也“糊涂”，你“糊涂”得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亏损，债台高筑，举步维艰，可我的“糊涂”却与官阶同步。于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便成了某些人坚守的处世箴言，使假话之风愈演愈烈。

人为什么要说假话？因为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尤其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情况下，要说真话，非有彭德怀那种铮铮铁骨不可。对于既无铁骨，又欲全节求生的我等芸芸众生来说，那就只能像老作家萧乾所说的那样去做：“如果说真话得不到保证，那我即使不说话也一定要保证自己不说不说假话。”

1996年5月5日

善待“谔谔”

“谔谔”一词,最早见于《楚词·惜誓》:“或推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亦有“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比喻。可见,“谔谔”者即那些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的直言敢谏之士。如荀子言:“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这种人,其实也正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不可或缺之士。

“谔言”之可贵,在于其直言时弊,使人在万象纷呈之中看清本质,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从而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改进工作;“谔言”之重要,在于其系反骄破满之言,增添忧患意识之言,也是克服官僚主义、保持风清气正之言。所以,善待“谔谔”不仅是领导作风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一个单位、地方党风党纪上的大事。它既可使领导获取正式渠道不易掌握的信息,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亦可使单位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善善从

长”，“同条共贯”，使良好的领导形象不胫而走，听到某些不敢讲也难以反映上来的呼声和建议，有助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有助于改善与加强党的领导，意义重大而深远。

古之明君其所以明者，多因其善待“谔谔”，是以成明。唐之魏征死后，太宗有“朕失一镜”之叹！周舍死后，赵简子每每临朝不悦，曰：“不闻周舍之谔谔，是以忧也。”但是，历史上也有以无谔为幸的昏君，结果，祸由此发，乱由此播，业由此坏，身由此败。宋徽宗赵佶，“用心一偏，疏斥正士”，国破家亡，当了俘虏；南唐后主李煜“拒忠绝谏”，金陵城破时还拥着小周后填词，一首《临江仙》只写了一句便被宋军擒去；而下场最惨的还数那个原来明白后来糊涂的齐桓公，不听管仲遗嘱，启用竖刁、易牙、卫开方。这三个“唯唯诺诺之徒”，治国无术，却一个比着一个赛“无限忠于”，竖刁自己把自己阉为太监，易牙把自己3岁的儿子烹熟给齐桓公尝鲜，卫开方则15年不回家，以示其忠。可是，当他们羽翼丰满、大权在握之后，便把齐桓公禁闭在寝宫活活饿死，一直到尸蛆爬出围墙，真可算得上是旷古未闻，叹为观止了！

“唯唯诺诺”是与“谔言”相对立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发音：“是。”这便很容易使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领导昏昏然，飘飘然，误把下级的“诺诺”连声视作自己的“英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出“官、暮、骄、娇”之气，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霸气冲天，害莫大焉！

当然，“唯唯诺诺”者，也并非个个包藏祸心。平心而论，今之“诺诺”，无非慑于势、慎于心，隐情惜己而已。明知不对，也“诺诺”而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过，谦谦君子之中也不乏趋炎附势之徒。这种人，“唯唯”时，只唯上，不

唯实；“诺诺”时，则把是“诺”成非，非“诺”成是，巧言令色，一切看上级的脸色行事。而比这更恶劣的，则是那些虚有谦恭的“伪君子”，为达个人目的，“诺诺”之余，或进厚礼，或贡珍奇，或施色相，或馈重金，或结乡党，或认干亲，或投“衙内”，或拜夫人，陪赌不赢，陪酒不醉，陪玩不累，陪吃不嗇，把个上下级关系搞得乌烟瘴气，这就不能不叫人厌恶了。

“诺诺”乎？“谔谔”乎？这里边有做上级的为“君”之德，也有做下级的“从臣”之德。涉及党性，关系做人之根本，当然也影响到民心。因此，我唤“谔谔”：魂兮归来！

1995年4月19日

“论据”与“逻辑”

人常说诗人的某些语言是有着跨文化、超时代与穿透时空的威力的。但我却直至此次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后,方知此言不虚。

凡是读过法国诗人拉封丹《狼和小羊》的人,大半都还有可能记得他的那句开篇的话:“强者的论据总是最好的论据。”这首诗写于 17 世纪中期,距今 300 余年,但这句话对强者的抨击和对弱者的震撼,却愈久愈强了。

你听:“人权高于主权。”人权与主权,本来都是好东西,两者也并无根本的矛盾,并非水火不容,但到了“狼陛下”的嘴里便把它们对立了起来。说“高于”,“高”多少?“高”在哪些方面?谁也说不清。但“狼陛下”说它“高”,你就得承认它“高”,否则,“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尽其所有,除了原子弹,一切现代化的武器全用上,“‘炸’你没商量”!

你看:5 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射进中国驻南大使馆(其中

2枚未炸),他说是“误炸”;4枚激光制导的“聪明炸弹”炸了南联盟的电视台,他说那是因为它“进行战争宣传”;6枚集束炸弹将住满了平民的科里萨村夷为平地,百余人当场死亡,他说那是南联盟的“人肉盾牌”;2枚导弹抛进意大利的加尔达湖,伤及3位渔民,有人戏言:“北约轰炸意大利——出口转内销”,但“狼陛下”的发言人却说那是为了保证飞机降落时的“安全”,“很必要……”

这就是“强者的论据”。

说来也怪,时代在发展,潮流在变化,但“强者”的逻辑却始终不变。过去,他们或凭借自己的船坚炮利,殖民海外,开拓疆土;或以“传播文明”、“传播福音”的面目营造势力范围;或打着建设“新秩序”、“共荣圈”的旗号侵略别国;或以什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任意瓜分、宰割落后国家,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如今,他们则以“人权高于主权”为“论据”,积极“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想在什么地方动武就在什么地方动武,想用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管你什么联合国不联合国,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一脚踢开。

“强者的论据总是最好的论据”。拉封丹一句话便概括了“狼陛下”的本质,也一针见血地概括了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人类历史。它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同时也清楚地说明:思想上的缴械投降才是最可怕的。不要以为人家什么都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要知道,只要这世界上还有“狼”,“狼陛下”就会随时抛出“最好的论据”,以主持“公道”、捍卫“人权”、消除什么“隐患”为由,合乎逻辑地张开血盆大口,威胁“羊”的生存与发展,乃至把“羊”吃掉,建立一

个由其主宰的世界新秩序,独领清溪!这恐怕才是“狼陛下”的真实目的。

1999年6月27日

用自己的话讲

“我用自己的话讲。”——“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同志在今年6月的一次全省会议上轻轻推开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说了这句发人深思的话,便自己讲了20多分钟……讲话结束时,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见7月5日《经济参考报》)

说话要说自己的话,这大概不是谁的新发明。公元前23年的西汉学者杨雄便在其《法言·问神》一书中说:“言,心声也。”但我们一些同志却总以为口吐铅字才是口吐真言,非上级文件讲的不讲,非党报上说的不说,即使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清的事,也要秘书写出来,照本宣科。结果,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只抄一通公式,往事实上乱凑”的“洋八股”,便是毛泽东同志说的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党八股”,令听者昏昏然,也令讲话的人自己昏昏然。诗人流沙河在其《高级笑话》里便讲了一个念讲稿念昏了头的故事:“故乡县城某官员登台念讲稿,语言铿锵,语调剜切,完

全不像秘书起草。当念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手掌随势向下一砍,语气坚定,听众一愣,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官员猛省,赶紧接着大喊一声:‘吗’!全场大笑。”可见当“传声筒”也不容易。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这个“存在”是与事实接轨的那种“存在”。如果我们说话、行文都是一级一级往下套,遇到实际问题便“打官腔”、“绕兀子”,总怕负责任,那这种“存在”恐怕也就“存”的无趣,“在”的乏味!

说句实在话,玩“新”并不难。谁不会把昨天的马克思、恩格斯换成今天的亚当·斯密与凯恩斯,套用他们几个“新”概念与“新”名词呢?但是,要让听的人怦然心动,觉得“解渴”,那可就除了实话实说,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为什么鲁迅、巴金、老舍、毛泽东的文字让人拿起来一读便不忍释手,原因就是他们不说空话,也不讨好任何人,不言则已,言必由衷。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通文达政,不管多难、多硬的问题他都敢碰,不论多复杂、多艰深的理论他都会以群众能接受的那种语言、文字深入浅出地讲来,谈笑风生,如话家常。当然,无论是鲁迅、老舍,还是巴金、毛泽东,他们也都不乏极书面语的文字,但夹杂在他们那些类似口语的文字中却使文字回到了生活的老家。是文字,也是声音;是事实,更是真理,让你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进入了他们讲的那个“境界”,体会出对时代与社会的感喟,对历史与文化的深思,对新生的期待及对未来的感悟。扶隐发微,辨危诘难,裁夺奇崛,气象万千。我总感他们的文章既不是靠小聪明“编”出来的,也不是在办公室里“憋”出来的。因为语言、文字都是活的,而这活的源头却只有“真实”二

字,离开了真实,你就是“编”出个语言的“花环”,“憋”出一座文字的“大厦”,也无法深入人心。我想,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才使令狐安同志那仅仅 20 多分钟的讲话却赢得了“很久、很久”的掌声吧!

1998 年 11 月 22 日

“吹牛学”导言

《庄子·外物》篇载：任国有位公子声称做了个大鱼钩，以 50 头牛当鱼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居然钓到长达千里的大鱼，他把这条大鱼剖晒成鱼干，供全国人吃了一年的。

我很喜欢这则故事。因为它开“吹”风之先，堪称历史之最，同时也证明了“吹”风的源远流长。

“吹牛”一词，现已被“包装”、“创意”、“自我推销”代替；“吹”的手段，也已现代化。打开电视机，便如同在看阿里巴巴撒玫瑰，一种种时髦、一阵阵流行、一把把利益、一份份美好的享受，忽地一下便悬浮在眼前，让你艳羡不已。酒是“御酒”，喝一口便不想家；饭是“御膳”，嘍一顿便不虚此一生；保健品能使老汉年轻，儿童食品能使娃娃聪明，化妆品让你青春永驻，美容师的一次美容便使你潇洒一生。

吹破天，如今算商品特征，也算人文特征。见人先掏名片，头衔一大堆，真假都有，然后便海吹一通自己的关系多、

路路通,无所不能;影视剧还未开拍便吹成“划时代”,写了点男欢女爱的书便吹是当代《红楼梦》;几支小曲唱罢便成“家”,出几个镜头便成“星”;皮包公司经理凭一张嘴走遍天涯,自称“佛子”的气功师能使千里以外正在科研中的东西变性……

不过,有水平、有学问的吹,还是某些地方工作上的吹:曰“以点代面”,曰“典型拔高”,曰“数字注水”,曰“示形造势,脸上贴金”。据说,还有一种类似“模糊学”的吹法,堪称一绝。一个报告或总结,就像一幅三维立体画,横竖都是成绩,存在问题摸不清;一个个引进外资的洽谈会、繁荣经济的交易会,如同雾里看花,吃喝玩乐一大堆,成果全在“意向”中。此外,像那些与实际利税不挂钩的产值,与财政收入不沾边的扭亏增盈等,则如舞台布景,仅供视听。

有人说,吹牛吹不出效益,是唯心主义!我不这样看。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你看:某些地摊小贩不是已吹成“大款”,某些文化人不是已吹成“大腕”,某些官员不是已吹出了“政绩”,平步青云,这咋能说是没有“效益”?当然,栽跟头的也有。但这却正好说明吹是“学问”,就看你入道深不深。

世有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大众传播学等,而唯独没有“吹牛学”,实在令人遗憾!可是,又一想,也对。吹牛学问全在心领神会,怎么能教呢?因此,仅作“导言”一篇,“正论”恕不续貂。

1996年8月18日

“泡沫”与“当铺”

最近媒体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报道中有一个发人深思的词：“房地产泡沫”与“典当金融”。意即危机纯系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比如泰国，在过去 1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过热的房地产开发吸引了金融界以房地产作抵押的大量贷款，使房地产业形成不反映供求关系的“泡沫经济”，结果在“泡沫”破灭的同时便引发了金融兑付危机。报载：1996 年底，泰国因房地产开发过剩而收不回来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 50%，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亦大体如是。到今年 7 月 15 日，泰国已有 16 家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因流动资金枯竭而倒闭。此外，最近发生于日本的坏账事件，也是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大量的抵押贷款成为不良债权而坏账的。

可见，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即不完全反映供求关系的房地产开发热；“典当金融”，即信贷体系被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吸引，使抵押贷款占用流动资金过多，把银行变成了“当

铺”。其实,这种“状况”,在我国也大量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6年来,全国积压商品房6624万平方米,占压资金600余亿元。在基层,有80%的资金是开发商用积压的商品房向银行“典当”而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积压与东南亚不同,有相当一部分是背离群众需要的高档住宅楼、高级公寓与别墅,或花园别墅。至于高档商场、星级宾馆、豪华舞厅、夜总会等,则遍地开花,完全超越了群众的消费水平。这些高档“商品房”,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虽为某些地方营造了暂时的表面繁荣,也使开发商发了财,但在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后便形成积压。不过,这种积压对开发商来说却有惊无险。因为银行即使将其作为抵押收回也变不了现金,有的甚至还不得不“剜肉补疮”,用“以贷收息”的办法来维持那半死不活的局面。有些开发商之所以身背百万、千万贷款而有恃无恐,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在银行的经营观念中,房地产抵押贷款是高质量的硬担保,也最安全,无可厚非。但凡事都要有个度,不动产抵押贷款一旦超过了合理限度,便掩盖了信贷资产流动的真实水平。我们知道,现在的不动产抵押动辄二三年、三五年,有的甚至时间更长,而与之相对应的流动资金贷款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短贷长放”,形成实际上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这不仅要降低信贷资产的实际流动能力、变现能力与向储户随时支付现金的能力,同时也把信贷资产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发展到需要抵押品变现又变不了现的那一步,贷款本息的相当部分便要悬空,而由此所带来的储户恐慌心理与社会动荡,则要远远大于不良债权的坏账。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日本银行的坏账近来已引起香港的

重视,要求银行收紧按揭、披露贷款额、重估房地产业的融资程度。人家未雨绸缪,我们何时才能具有人家这种见事快、反应快的经济头脑呢?发人深思。

1997 年 11 月 2 日

商有德乎？

商有德乎？这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了。因为道德是超功利的，多数人不赞成把商与德联系起来，所以，义利之辩自古未休，直至马克思主义问世，此争才算有了眉目。马克思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商人在沟通产销、货畅其流、服务社会、满足广大消费者需要方面，是一种具有社会效益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经济行为，怎么能说无德呢？

可是，生活的现实却每每告诉我们：商无德。如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坑蒙拐骗的勾当随时可见，走私犯禁屡禁不止，黄、赌、毒害人不浅。在传统商业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中，“商海”成了一片“利欲之海”，诚信、廉耻、人格、良心，都在那里变成了交易，人为钱笑，也只为钱哭，一切都是“钱图”！

现实生活中的商为什么会如此地让人不可思议呢？这

不能怪商人。首先让我们看看舆论导向。打开报纸与广播,有关商人的报道大半都是业有所成的“企业家”,荣誉头衔一大堆,灿若星辰,但只说他们挣了多少,却从来不说那钱来得容易不容易;打开电视机,一切有关商人的电视剧也大半都是金屋藏娇,挥金如土,要什么有什么,鱼与熊掌兼得,但却从不告诉人那钱是咋来的。从影视到社会,一个被压抑已久的精灵——钱,跳起了大神,在它的魔力下,争夺、倾轧,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试问:当钱成了社会文明的指向,成为全部社会文明的灵魂的时候,那又咋能不让商人去巧取豪夺呢?

诚然,现代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完善与健全也需要时间,但在某些地方,无“必行之法”也是事实。地方主义“庇护”,“关系网”从中作祟,再加上某些执法人员的贪赃枉法,结果,“上面打假不息,下面造假不止”,“上面质量万里行,下面假冒伪劣天天行”。扫黄、打非、缉毒、反走私、抓淫秽与盗版书刊音像的战役一个接一个,但一阵风过去,依然故我。有的地方,商业行为的混乱与混浊,实际已发展到动摇人们对改革与发展的正确认识的可怕地步。

商有德乎?我说有。但除了少数商业奇才与精英,多数人还是要靠强大的舆论与强大的法制压力方可就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历来依靠两个“杠杆”:一个是经济“杠杆”,没有它的作用,人类就失去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另一个是体现为道德与法律的社会“杠杆”,没有它的约束,就不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对“利欲之海”的商业,不发挥道德与法律这个“杠杆”的规范、约束与引导的功能,便不可能避免其在竞争中发生混乱,危害社会。“以商兴×”的提法,

就一个地方来说,虽有其特殊性,无可厚非,但也不可颠倒“生产决定流通”的经济定律,用一个“杠杆”来代替另一个“扛杆”的力量。要知道,现在哪怕是最强调商贸自由的国家,他们也不指望商贸经济促成一切。至于那些“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理论与商业实践,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让人无法容忍,即使是国际社会也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夸大。因为在“什么钱都敢赚”的暗流里,涌动的是对法律和正义的藐视,是对公众与社会信任度的破坏,是对国际商业秩序的挑衅。所以,到头来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患无穷!

1997年7月20日

吃有道乎？

吃有道乎？我说有，也没有。言其有，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把吃看得很严肃。如“不食嗟来之食”，说明吃是不能以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则教育人欲不可纵；“君子耻食其食而无其功”，是反对不劳而食；“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则警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要居其位而尽其职，不能光知道吃，不知道干。可是，这些大道理在历代帝王的宫廷、官府里并不管用。他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发展到西太后，一顿饭要吃 150 道菜，一碗粥的用料 50 余种，宫廷会餐的满汉全席要吃三天三夜，这就成了暴殄天物了，还有什么“道”可言！

也许是时代不同了，如今对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腐朽糜烂的豪吃、海吃有个独特的解释：“饮食文化”。既然是“文化”，那就有个“继承”与“发扬”的使命在，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公关”手段的出奇制胜，这吃的“文化”便成了

泱泱华夏文明的一大块。现在只要一说吃,特别是“公吃”,在某些人那里便把上至慈禧下至刘文彩吃过的东西,都要借助“公”字来享受一番。于是,上级下来的吃要风味独特,下级上来的吃要花样翻新,年终总结评比的吃要山珍海味齐上,开张、剪彩、晋级、达标的吃要水陆杂陈。盈利单位的吃,理直气壮,“不吃白不吃”;亏损单位的吃,有恃无恐,因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吃吃喝喝出效益”;各种会议的吃,要大大超过标准,方显会议之隆重;各种庞大的检查团、验收团、观摩学习考察团的吃,要吃出个档次与水平,才能显出东道主的好客与热情。此外,像那些出于感情投资需要而讨好某些有权有势人物的吃,可就“别有洞天”了!有“红袖当垆,玉人把盏”;有“暗香盈袖”、“火照红妆,满意留宾住”;更有那“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吃到这种程度,心猿兮——意马,飘飘兮——欲仙,哪里是一个“吃”字说得清楚。

“公吃”的一大讲究,便是先吃他个昏天黑地,当美食把人的嘴完全征服,把人的心彻底腐化之后,你才能指望大家放下架子谈工作或谈交易。如今的社交饮食便是这样,它隐含的信息是:口福能使人把道德与政治上的原则和信仰松弛下来,而也只有大家放松了各种戒律之后,才有交易的可能!

中国人历来把“道”看得很神圣,可这“公吃”之“道”却总是让人糊涂。言其无道,有数十个红头文件赫然入目;言其有道,可禁归禁,吃归吃,随时可见那醉眼惺忪的“公仆”徜徉于觥筹交错之中。怨干部嘴馋,怨世风奢靡,怨小金库难查,都有道理,也都对症下药下过“药”,可“吃了也白吃,白吃

更得吃”! 奈何?

管子说“道者一也”;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看来这“道”在古人那里便是个“弯弯绕”。古人闹不明白的事,现代人当然也难以说清。不过,就“吃之道”来说,整日忙碌于“公吃”的那些人,正因为心里明白,头脑够用,才不醉也不醒的。相反,那些不谙此道的“书呆子”,观念更新跟不上趟的“糊涂人”,是不会在这上面去下工夫的。可是这世上的人到底谁醉谁醒、谁糊涂谁不糊涂呢?这就让人难以评说了!

1997年7月13日

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什么？这几年议论纷纷。有说是“一首歌”，有说是“一条河”，还有人说是“一把火”，因为这生活的内涵原本就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看法各异，倒也不悖常理。但近有一种新说却发人深思，曰：“游戏人间！”并有题为“为君轻松”的文章为其注解，说：“大量消闲文化的出现，表明很大一部分老百姓懂生活了”，“歌舞升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祥和的社会”。这就令人费解了。难道生活就是“游戏”——玩？玩就是“懂生活”？而且大家都去玩，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祥和”社会？

谈及玩生活，这又使我不禁想起近一二十年那些玩得出奇，玩得令人叫绝的现象。有人花几十万元买条狗玩，有人把钞票卷成鞭炮放着玩，有人点歌一首掷千金，有人玩赌一场输数万元，有人千金买一醉，有人花十几万元吃顿“黄金宴”，奢靡相竞，饕餮是求，真叫人大开眼界！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某些地方为使有钱人玩得舒服，玩得开心，而竞相兴

起的那些低俗的服务项目。餐厅有什么跪式敬酒，酒吧舞厅有“三陪”，桑拿浴有女性按摩，宾馆、饭店据说还有什么“应召女郎”。至于什么傍“大款”，包“二奶”，卖“青春”之类的丑闻，则早已屡见报端，不是新闻了。

生活是什么？其实这个词的本身就已说明：有“生”才能有“活”嘛！“活”，只能建立在生产与创造的基础之上。如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讲：生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活则是接受被动的事实后的一种主动的改变。生不由己，也无从选择，好坏与否，都依赖人的后天自我完善，而这一完善的过程便是活。这个活，如果按活到 80 岁来计算，一个人的一生只有 29 720 多天，其中如再除去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用于吃喝拉撒睡与上学求知，减去童年与老年弥留之际所必须的虚度，真正留给人用于事业、工作的时间不过几千天，它是经不起虚耗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无论干什么，也无论是为官或为民，那些成功之士，实际上也几乎无一不是那些对事业、工作兢兢业业，心无旁骛，甚至是被人看作不懂生活，不会生活，乃至有点傻里傻气的人，而不是那些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与“顽主”。尤其在这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的当今社会，除了那些有权有钱又有闲的人以外，很多时间，即使娱乐也只能是为了娱乐他人而娱乐，“摧眉折腰”，还要陪上笑脸，比干一天工作还累，哪里还能再讲什么“游戏人间”——玩！

“活在未来”。这是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讲的。他说：“许多人都认为是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当下，其实不然，我们吃饭、工作、行走、写作，都是为未来作准备。”

的确如此。因为不管是工作、生活，人总是活在希望中，希望有个美好的未来，因而他也就“活在未来”。

不是吗？想想看，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一个村、一个乡、一个社区，乃至一县、一市、一省或全国敬仰的典范，难道不都是他们以前生活里那一点一滴、一丝不苟的铺垫？

“活在未来”说得多好。对于我们这些日寻其利的普通人来说，应该是当头一问：你思考过未来吗？你活在未来吗？

当然，事业、工作也并非生活的全部，人也不能是根紧绷的弦，要有劳有逸，张弛有致。但这与玩生活是两码事。不要以为玩生活且能真正玩得起的人是少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风俗之变，不但会形成“众作效应”，同时亦会迁染民心民志。翻开历史看看，南宋可谓是玩生活玩得最好的一个朝代，成天“歌舞升平”，轻松快活得有如神仙一般，弄得老百姓也“直把杭州作汴州”。可是，当忽必烈挥师南下时，谢太后连发四道诏书也无人勤王。最后，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赵昺跳海，江南人全部沦为四等贱民，这便是那些玩生活的人在历史上玩出的沉痛代价。

有时我想，如今最可怕的也许还不是人人谈钱，想钱，乃至为了钱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受贿、铤而走险。说到底，只要动真的，这些都是依法可治的。但失掉理想、信念与精神支柱的奢靡相竞风气一旦弥漫开来，则无“药”可“医”。“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这个刚刚摆脱了“一穷二白”的民族，会不会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而不能自拔呢？发人深思……

1995年6月18日

灰色“辩证法”

辩证法——“正确说明真实存在的科学”。但如今也有着不少不反映真实的逻辑而又无以名之，故称其为：“灰色辩证法”。

一、“明”与不明的对立统一

大凡贪官“落马”都有一屁股糊涂账——“不明来源财产”。如广东原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有“不明”财产 1000 万，广西原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有“不明”财产 1600 万，而广东阳春市原市委书记严方耀仅“不明来源”的私人存款就有 500 余万。他何以连自己一五一十存进银行的钱也说不清呢？据业内人士私下讲：这除了法律有“空档”——“不明”之罪最多判 5 年，而一讲明便有性命之忧外，一个很大因素便是办案人员不愿“打破砂锅弄到底”。因为有些“锅”不能打，也打不破，何况一个县市就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大家都在“关系”圈里过日子，谁能不给自己留点回旋余地。所以，“明”与“不明”便在这里统一了起来，该“明”的

“不明”了,而“不明”的也就让人“明白”了。

二、“简单”与“复杂”的否定之否定

徐州市沛县原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了一名从事美术工作的女青年,此女 28 次赴南京,两次上北京,耗时 290 天,最后幸而得一画界师长帮其把状子递给中央某领导,才将阎绳之以法。此类案件情节简单,证据确凿,按说并不难判,但却化简为繁,横生枝节,使得受害者状告无门。可有些干系重大的案件却化繁为简,说了就了了!如重庆綦江彩虹桥的垮塌,处理了县委副书记林福元,接着便有 8000 群众签名要求惩治幕后的县委书记张开科;而西南航空公司原副总经理宋贤杰在服刑期间竟又被群众揭出贪污 260 万元,以致不得不将其原判 14 年又改为无期。人们常说,社会是复杂的。其实,这个复杂便是“简单”与“复杂”的否定之否定。它既有简单问题的复杂化,也有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奥妙无穷!

三、“变通”之“变”——量变到质变

“变通”本是为文之法,语出《文心雕龙》:“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但如今的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大。如公款吃喝叫“洽谈”,公费旅游叫“考察”,回扣变成“辛苦费”,行贿叫“攻关”,公费送礼叫“跑步(部)前(钱)进”……。此外,像“吃喝嫖赌全报销”的种种“变通”,也早已让人“习以为常”了。反正“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过,让人触目惊心的“变”还是某些地方于产权改革中的那些“变”:高折旧、低评估,只盘亏、不盘盈,外欠一律转坏账,以及评估之后的“压一块”、“让一块”,再按所谓的“政策”让法人“吃一块”等等,有的甚至以“兼并”为名把企业“产改”搞成事实上的“零出

售”，成为某些人的“坐地分赃”！这恐怕就是“变通”的质的飞跃了。

辩证法自黑格尔把它系统化以来的 180 多年，尽管有着唯心与唯物的区别，但类似如今这些“天才”的运用却少见。这究竟是辩证法的“发展”，还是现代人的“弯弯绕”呢？不得而知。兹录以存，以待后人的实践检验。

2000 年 1 月 30 日

“官傍”析

近两年来,报纸上出现了个新名词——“官傍”。原不知其所指,后来看到中组部调研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领导干部有可能傍“大款”》,方知其意。

很少见中组部有如此尖锐的文章,也很少见有如此精妙的词——“官傍”。这两个字道出了一种新的关系组合——有权与有钱的比肩联袂,甚是传神。在语法上这叫“指代”。一如古典小说中的官称“乌纱”吏作“幕”,漂亮女人称“红粉”,地痞流氓叫“泼皮”,一语中的,而又最具特性。你看,“傍”字前面加个官,不就巧妙地把这种“傍”与风尘女子靠在“大款”身上的那种“傍”区别开了吗?尽管都是为了钱!

平心而论,人们并不反对领导干部与“大款”接触。因为他们需要了解“大款”是怎么富的,富了以后的心理状态、投资走向是什么,这也是工作需要。但凡事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如今的状况,亦如中组部的文章所说,是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远离群众，却热衷于贴近‘大款’，同他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有的人以各种借口不参加领导班子民主会、党委（党组）会，而对‘大款’举办的舞会、宴会、过生日、搞庆典等活动有请必到，从不推辞；他们很少到困难户、五保户家里走走看看，却常常是‘大款’家里的‘座上客’，群众称他们是嫌贫爱富的干部，专傍‘大款’的干部”。这就使“接触”变了质。

问君为何傍“大款”？说来可笑也可怜，因为只要傍上这些“哥儿们”，收益小者，可吃喝玩乐，可卡“拿”OK，还可报销难以报销的发票；收益大者，那就在人家“发乎景仰而止于礼”的名义下，把那大包小箱收进门，干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勾当，反正不“出事”谁也不敢往原则上扯，说这种接触不正常。

市井里有“拉着款哥的手，跟着感觉走”的戏言，那是对风尘女子傍“大款”的揶揄。其实，“官傍”亦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有段主人公偷鸡的精采描述：“一根绳头拴上个弯过尖的细铁丝，挂上一点剩菜剩饭，往鸡群里一甩，便会有那贪馋的鸡连食带钩吞下。”而只要吞下，那它就只好“跟着感觉走”了。

当然，拿这样的描述来做今日“官傍”之寓言，也许太粗俗、太原始、太缺乏美感了。但若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那些锒铛入狱的，掉脑袋的，还有那被人当作“一条狗”的，又有哪个不是为了有钱人那点“剩饭菜”而步入歧途，不能自拔呢？

“官傍”是不是腐败？似无定论。有说是工作需要，有说是作风问题，也有对中组部的忠告态度暧昧，不置可否

的。这不好。这害了干部,也有害两个文明建设。仔细想想吧!如今那令人焦虑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社会公德滑坡、职业道德上不去,等等,恐怕没有一件不与“官傍”的危害无关。“官傍”不治,腐败难除,这也许并非是危言耸听。

1997年2月16日

说“潇洒”

自从流行歌曲唱出那句“潇洒走一回”后，这潇洒二字便成了某些人的一种追求。有人把衣着漂亮叫“潇洒”，非名牌不穿；有人把打扮入时叫“潇洒”，珠光宝气一身；有人把吃喝玩乐叫“潇洒”，纵情于“声色犬马”；有人把丽人丛里的狂歌滥舞当“潇洒”，夜夜春宵；有人钱多了“发烧”，把乱扔钱财当“潇洒”，千金一曲，博得美人笑；暴发户则把摆阔斗富当“潇洒”，横着走路，出语伤人……总之，一“潇洒”就是人的个性张扬，就是人的原始欲的一种释放状态，而且，这种张扬与释放越彻底越“潇洒”。

呜呼！人若都作如此之潇洒，那我们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精神文明与振奋。

潇洒，不是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不是不切实际的自我感觉，它反映的是人对物质的态度，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无论对己对人，它都是人格上的一种协调美，是这种美的展现与享受。

不错,潇洒应更多地表现在人的仪表与风姿上,是一种形态美。但这种美却是在内涵深邃的力度美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风度美。否则,所谓潇洒,便只能是一副漂亮的躯壳。

不错,潇洒也更多地表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如办事干练,干脆利落;接人待物,落落大方;面对挑战,从容不迫;处理问题,冷热相应,分寸适当等,但这一切都是以知识、修养等素质作底蕴的。如果没有这个底蕴,那你就潇洒不起来!

刻意模仿非潇洒,矫揉造作非潇洒,因为任何潇洒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低级趣味非潇洒,玩世不恭非潇洒,那其实是硬把庸俗当高雅;及时行乐,乃精神空虚;纵情于“声色犬马”,实乃自戕;至于那些摆阔斗富、乱掷钱财的行为,则不过是宣泄其精神苦闷与昔日的怨恨罢了,更不能说是潇洒!

潇洒不是有钱有势者的专利。安贫乐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者,同样潇洒。潇洒也不是年轻人的特权,老有所为,“宁无白首之心”者,还是潇洒。当然,潇洒也不是“跟着感觉走”。守住灵魂,不拿青春赌明天,也不醉生梦死度今日,一步一个脚印,“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才是真正的潇洒!

1996年12月29日

“仇富”论

我对“仇富”的说法疑问久矣。但直至最近有位学者断言“当前的仇富心态弄不好是要断送改革的”，才感到需要说说。

“仇富”，指对有钱人的仇视。今年“两会”期间个别政协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有此说，社会上还有什么共产党要“均贫富”、“劫富济贫”等说法，多属误解，本不足论。但把“仇富”与改革连系起来，并上升到“断送”的高度，则令人不解，也站不住脚。别的不说，就拿 2001 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二的那个杨斌来说吧，早年在荷兰流浪，靠救济金度日，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借了朋友几百美元回国闯天下。他先与某省农业厅“合作”花卉生意，使农业厅赔了几千万。随后，又行贿批得沈阳附近一块地，并以这块地向银行多次抵押，套取贷款，包装上市，走“先圈地后圈钱”的路子，不几年便积累了高达 7.5 亿元的财富。你说，把这种人揭露出来法办，对改革有什么不好？

当然,对私企业主这个新兴群体也要有正确认识。20多年来,他们白手起家,胼手胝足,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对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劳动力的安置就业做出了贡献。尊重其事业,放手其发展,是改革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所动摇。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重性”一样,这个新兴群体也不例外,特别是联系到杨斌,仰融,牟其中,赖昌星;联系到曾对金融市场带来强烈震撼的周正毅及近被查处的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我们感到:某些有问题的富豪已从过去“趁共产党还未醒来”,钻政策空档、挖国家墙脚那种偷偷摸摸地干而走向了贿赂公行的买权致富。有的,在权力的保护伞下,走私犯禁,操纵市场,挑战规则,对抗法治,成为经济体上的毒瘤,若不及早惩治,不要说改革,就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也要断送到他们的手里。

至于说到“仇富”,我们承认,在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大国,的确有其基于小农经济狭隘自私而产生仇富心理的先决条件。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只要不怀偏见,便可发现,国民心态,早已不是过去那种“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的意识形态了,“干啥活,拿啥钱,有啥本事吃啥饭”,已成为共识,即便有着某些不平之鸣,也并非仇富。如近几年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以地生财”现象,土地有如“聚宝盆”,每转一次手便有成倍的利润翻上去,“开发商”个个发了财,但法定的安置补助费却落不实,把失地农民弄得“农民不像农民,居民不像居民,有路可走,无地生存”。这能不让人议论吗?另如一些地方借改制之机的贱卖国有资产行为,也是这样,一座工厂、饭店或商店,既不经法定单位的售

前评估、审计与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出售也不进入市场拍卖竞购,全凭领导一句话便卖给了指定对象,而且还要给予这个“优惠”,那个“减让”,甚至让购买者在资产还未到手的情况下便抵押给银行,用银行贷款买改制企业的产权,整个一个“空手套白狼”,能不让人气愤吗?

致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艰苦打拼、顽强拼搏的过程,致富者的身后,应有其艰苦跋涉的脚印,有其向上攀登的足迹与其奋斗不懈的身影。如果说“仇富”便是以“富”作为“仇”的对象的话,我至今奇怪,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中国农村的首富华西村,为什么从未听说有人对他们那惊人财富的来龙去脉说三道四。个中原委,也不说自明,那便是他们一个依靠知识、智慧,一个依靠集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腐败无牵扯,与权力无瓜葛,自然也就不会引起人的反感。但对有些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价格双轨制”,他们能以通过非法途经获取大量的平价物资转手市场而发迹;“官商互动式的承包经营”,在某些地方则蜕变成“发包方与承包方瓜分公利的同盟”;“领导层收购”为主要内容的“改制”,则“吞噬了中小企业最后一笔资产”,使他们成为“转体富豪”。而所有这些,也才正是西方富豪要用几代人完成的原始积累,为什么在某些中国富豪那里却只用了一二十年便大功告成的奥秘所在。

我不嫉妒富。尽管《圣经》上讲,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富而有学养,富而讲仁义,富而有羞恶之心者也大有人在。可怜的是严监生与葛朗台,有钱却成了钱的奴隶,叫人可惜了那钱!

我不鼓励穷。但我尊重穷而不颓,穷而不伤,穷而不暴

戾恣睢的生活态度。为什么颜回会“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原因便是败屋陋巷外面那广袤无垠的空间却是他的心灵放牧之所在，才是他的天堂！

说到“仇富”，还使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便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本应是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强，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小，因而利用公权致富的渠道也越来越少，可我们现在的情况却是每有贪官落马，必与某些富商大贾的作祟有关，而每一有问题的富豪出事也必定要带出一批贪官。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利用公权，又破坏公权，能不让人“仇视”吗？

记得经济学上有个“权贵资本”（即“与行政权力恶性苟合的资本。”）的说法，那是封建特权的产物，当然不能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比。但就贿赂公行的买权致富来说，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权力的‘寻租’与资本‘寻的’疯狂结合”这一经济学的特征。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权力作靠山，国有资产的所谓“流失”便会有很大一部分“流”进那些靠权力发家致富的人的腰包里。它不仅是个极不光彩的财富聚集过程，而且还有那个人所共知的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失控结伴而行，若万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跟不上，便激化了社会矛盾。

一个结论：“仇富”者，“仇腐”也！尽管这个认识有人并不赞成，但它却是明摆的事实。

2003年10月14日

朋友论

人类大概在启蒙阶段便懂得了友情的重要。如 2000 多年前成书的《诗经·邶风》便有“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的记述（意谓人家渡河我不渡，我要等我的朋友）。在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里，有“君子之交”、“道义之交”的交友之道，而在不太正统的观念里也有什么“士为知己者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说法，以致连朱熹这样的准“圣人”也只把朋友释为一字：“义”——“友者，义之合也！”（《四书集注·论语·乡党》注语）这就把人际关系中的友情义务提高到与“礼”、“廉”、“耻”并列的高度，甚至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

把人际关系中的友情义务与国家兴亡相联系，是不是也有点小题大做呢？否。记得老红军王长胜同志曾向我讲过一个长征过草地时他们团长死里逃生的故事。那时，他们团长还是个十五六岁的红小鬼，疟疾缠身，一进入草地便由几个被他称作大哥哥的战友轮流背着走。当第一个背他

的战士倒在沼泽里,后续上来的第二个战士便一声不响地把他背起来继续走,而当第二个倒下来时,第三个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如此周而复始,昏昏沉沉的他不知爬在多少个战友的背上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有多少个背他的战友倒在那魔鬼一般的沼泽里,直至赶上大部队,有了医药,治好了病,他才下地自己走。所以,后来无论是他当了团长或师长,只要战斗一打响,他便出现在第一线,有时甚至离开指挥位置与战士一起去冲锋,并因此而多次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但他也总是改不了,说:“一想起草地牺牲的那些战友便什么都忘了!”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你可以说他是军人的天性,阶级的觉醒,还可以说是为了共产主义,但你无法否认的却是那种来自于生死相依的友情感召与呼唤,而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生死相依的情结,我们才有了那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有了共和国,有了人民的解放。尽管这不是原因的全部。

“生死如浮云,素交山不移”。说起来,这种不以成败利钝为转移的“道义之交”,也正是我国文化传统上的一种美德。战国时期的羊角哀与左伯桃“闻楚招贤,同赴楚,道中遇雨雪,粮少衣薄,势难俱生”。于是,左伯桃便将所剩衣食留给了羊角哀,自己悄悄藏入一株老树的空腹中死去,使羊角哀“入楚而一展平生报负”。此外,如至今传颂的“管鲍分金”、“季子挂剑”、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伯牙焚琴”等,均说明人间自有真情在。此种情怀,以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为前提,天不能灭,地不能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之一。遗憾

的是,如今的立身处世却被告知要讲艺术,讲技巧,报刊有专讲这门学问的文章,书摊也有这方面的专著,可越讲什么技巧、艺术,这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便越激烈,人际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也越多。在我们的周围,如今是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交情如交易,相交只为利,有利千里客来投,无利比邻若天涯。有时,甚至是“人面咫尺隔千里”呀!至于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存在的那种“同志如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的真情,则已是昔日之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不可否认,这人际间以一己之私利为转移的“市道之交”实际亦非自今日始。大凡读过《史记》的人,也许还记得司马迁在《汲郑列传》后面写的那段有名的太史公曰:“……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与此类似的,《史记》里还有个“廉颇退宾”的故事:“廉颇之免(罢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吾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你听!这些势利小人说得有多轻松,简直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杜甫在其《贫交行》里说这种人是“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需数”。其实,何止“轻薄”!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谁上台就舔谁的屁股,谁下台就踏谁的背脚,过河拆桥,落井下石,是什么缺

德的事都干得出来的。北宋那位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一千古佳句的欧阳修，在其另一篇《朋党论》中，对“真朋”、“伪朋”、“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有过精辟的分析，并疾呼：“当退小人之朋。”可他却在这上面犯了个大错误。他一直看好蒋元奇，并推荐其当了御史，可这小蒋上任不久便根据传闻偷偷把欧阳修参了一本，说老先生有男女作风问题。此事后来虽经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实际上则已“满城风雨近重阳”，让人百口莫辩了。

“市道之交”者，势利之交也！势倾交绝，利穷交散，亦如商品交换，讲的是投入产出与成本收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作用则在于一个“用”字，倘若“无用”或“不能用”，便会像扔掉一双破鞋烂袜子一样把它扔掉。“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日门外好张罗！”（白居易《放言五首》）所以，杨雄在其《法言·学行》里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而荀子则讲得更为直截了当：“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荀子·大略》）

朋友，其实是一种季节性的“植物”，它随着人的客观环境条件而繁茂，也随着人的客观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凋零。如果说人有什么可悲的话，那便是总把朋友当朋友。因为不管雨下得有多大，你都没有理由在朋友的屋檐下待得太久。

朋友的意义也常使我想起被子的作用。寒冷的冬日，我们不得求助于被子，但无论多么厚实的被子，温暖身子的也仍然是自己的体温。

当然，人这一生也确实需要有几个道同气合、心灵相契的朋友，以“展切偲之诚”。（《幼学琼林·朋友、宾主》）有道

是：“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所以，即使是特立独行一生的鲁迅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但这并不容易。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有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逢迎谄媚）、友善柔（奉承恭维）、友便佞（花言巧语），损矣！”（《论语·季氏》）这说明，益友如良师，难觅亦难求。不要慨叹什么“世风不正、人心不古”。老子说：“上善若水。”其理由便是水不往高处流，专往地势低的地方去，而人若没有一定的境界，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趋炎附势，如今已是人之常情；锦上添花，金上贴金，也司空见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尊奉的“礼仪廉耻”，眼下实际已是“出土文物”，中看不中用了。可是，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高处的人情，充其量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而低处的情义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善良本性。真正的智者虽在表面上不置一词，但心中却始终要对那些不要鼻子的锦上添花者嗤之以鼻。

何谓真情真意？侯景华先生在其所编的《庄子逍遥书》中有段庄子与渔夫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庄子愀然曰：‘请云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这也就是说，“真”是强装不出来的，它是在人的处世待人中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那种赤诚之心。这在现代社会也一样，要与他人共事，你就必须有一片赤诚之心去帮助别人，包容和吸纳别人的意见。其实，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合则共存，分则俱损，一个总是以敌视的眼光看待社会，看待自己周围的人，处处设防，则最终也必然会使自己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一事无成。

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恩恩怨怨，孔子有个很重要的主张是“以德报怨”。因为道德，包括人与人互相交往中的友情义务与责任上必须遵守的道德，犹如人体须臾或离的“软组织”，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对社会随时进行着让人无法察觉的微调，才使人与人的关系有可能进行那种无声无息的调整，使人与人的交往正常，并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友谊、产生爱。如果有一方破坏了这个准则，“以怨报德”，那便有可能在爱心遭遇尴尬的情况下，使人与人的界限、距离、隔阂逐渐加大、加深，而当人人都把别人的爱心不当一回事，甚至人人都把“以怨报德”冤怨相报视为人情之常，那社会的和谐、稳定便成了问题，这人与人的关系便也要走向它的反面，而不知伊于胡底矣！

2004 年“七·一”速就

“小人”说

“小人”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难养”,即难以相处。但在诸多译本中由于都把“女子”译为“女人”,于是便有了孔子鼓吹“男尊女卑”的罪证。其实,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女”都是“通假字”,同“汝”,意为“只有你们这几个学生和小人一样,是不好教育的。传授的知识浅近了不行,传授的知识深远了你们又埋怨”。(见 2000 年 12 月 11 日《北京日报》金池文)但对“小人”就不同了,单在《论语》这部记录孔子言论的书中,就有 24 处论及小人,可见那个时代的小人为害之烈。

小人为什么会遭到古今仁人志士的同声谴责呢?原因便是小人的阴险,人所共愤。一个可供说明小人阴险的突出事例,便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宠信的那个御厨易牙,未发迹时,他能将自己的幼子杀死烹熟,供作齐桓公的午膳,但当其羽翼丰满,大权在握之后,便伙同竖刁、卫开方把齐桓公

禁闭在寝宫活活饿死,直至尸蛆爬出围墙。还有乾隆时期那个大贪官和珅,原本是个小小的蛮仪卫,因深得乾隆宠信,一直爬到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的位置,但乾隆死后,嘉庆查办他时,才发现其通过权力“寻租”所聚敛的财富几乎已是当时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近代,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也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阴险小人。他本来不是军统初创时的“十人团”成员,“半路出家”,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调入军统当秘书,谨小慎微,任劳任怨,特别是在上司面前,始终把自己放在陪衬的位置,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丝毫没有露出半点野心。但暗地里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阴谋把那些资格比他老得多的上司(如郑介民、唐纵、姜绍谟等)一个一个地搞垮,最终获得蒋介石的欢心,爬上军统权力最高峰,当上了保密局长。

小人的能量不见得小,智识也不见得低,再加上能以窥测方向,曲中求伸,狡黠过人,所以,有时也会让小人鱼龙化就,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比如袁世凯,本是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但却抓住慈禧与光绪为了变法维新而闹翻这一天赐良机,出卖了维新派,用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随后又在倒向共和的过程中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爬上龙椅,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险些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社会,让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鲜血白流。

“小人得志便欲施为”这话,是刘邦手下的谋士酈食其于临刑前的一句感叹。当时,韩信围齐,久攻不下,酈便自告奋勇,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齐来降。但当他正说得齐君思想有所松动的时候,韩信却怕他抢了头功,发起总攻,致使齐君一怒便将酈下了油锅。从此,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

韩信便被史家铭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小人阴险刻毒的典型事例。

小人的阴险,还在于小人的善变与善辩。他们永远没有原则,没有立场,闻风色就变,有奶便是娘,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会“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鲁迅《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他们不仅能论证出亩产20万斤粮食的必然性、水变油的科学性、耳朵听字的可信性,而且,为了满足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需要,还会论证出腐败和贿赂“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甚至,大言不惭,说“穷人上不起大学不是收费太高,而是收费太低”,“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诗经》有言:“天之方济,无为夸毗。”意为老天发怒了,不要去做那些献媚取巧的事。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意为那些曲意迎合别人的“马屁精”是不讲仁义的。但庄子说得更明白:“希夷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谄谀”也就是不管是非对错,只拣对方喜欢的说,这是最为古之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可古之正人君子不知,迎风凑趣,趋附阿顺,才正是小人与生俱来的本事。东晋的桓玄登基,刚坐到龙椅上那椅脚下的地面便下沉了许多,桓玄以为不祥,但大臣殷仲文却说:“圣德深厚,连大地都承载不住了。”十六国的南燕,有一年渟水冬不结冰,皇帝慕容问大臣李宣为何?李答:“帝者,人间之太阳也,渟水就在京畿,焉能有冰!”而最为卑鄙的还数乾隆年间的探花秦某,为了向上爬,竟让自己的老婆拜宰相于敏中的一位小妾做干娘,不

久于死了，户部尚书梁瑶峰当了宰相，他又叫他老婆拜梁为义父，并将贴身所戴之珊瑚珠一串赠梁，惹得才子纪晓岚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讽刺诗曰：“昔曾相府认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转奕门楣新户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行为齷齪，无耻之尤”，这大概便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者是也！不过，单就无耻而论，古之小人如果活到今天有可能还会自叹弗如。如河南卢氏那位卖官出了名的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父在鄢陵老家去世后，卢氏各乡镇与各部委办的头头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头工作，千里奔丧。其中有两个乡党委书记还自备孝帽，抢着摔盆，扑倒在地，大哭不止，谁也拉不起来。后来，还是杜亲自出来说：“行了，我知道了！”他们这才止住了哭声。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首《咏苍蝇》诗：“生从污秽忽雄飞，投机钻营觅软肥，鼓翅摇唇只逐臭，白雪阳春共掩鼻！”当然，拿苍蝇比喻小人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小人不仅如苍蝇那样逐葬逐臭，不择手段，同时也得势便猖狂，甚至，摇唇鼓舌，变本加厉地煽动地狱的火焰，焚烧真诚，焚烧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因素，令真诚、真情、真实沦为“濒危物种”，这就不是什么“投机钻营觅软肥”能说得清了。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文革”期间那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芥蒂丛生，互相戒备，最后甚至发展成图穷匕见——停产停课搞武斗，把个好端端的经济闹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话说回来，“小人”之所以会成为“小人”也与我们用人上的问题有关。也许是“文革”的流毒吧，一个时期以

来,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选才用人上形成了一种惯常的思路:用“自己人”,并美其名曰“知人善任”,而所谓的“自己人”则除了那些脾气相投,平时走得很近,泡在一起,有过感情投资的人以外,便是那些能以迎合“我”之好恶,我说打狗你不撵鸡的人,以“我”划线,这便使“我”的周围成了小人菌集的地方,他们就像攻打碉堡似的,从领导的饮食起居、喜欢嗜好、脾气秉性到祖宗三代的姓氏族谱都要研究个透,绞尽脑汁,以使自己变成领导的“自己人”。而为了维系“自己人”这个“圈子”,江湖义气也就随之而来!尽忠于“我”,尽义于“我”,至于我们党所规定的那些党性原则,是非界限,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等,则早已在“我”的这个“圈子”里被消解得徒具形式,有名无实,这又怎能不使小人竞相效尤,去追逐无耻呢?要知道,当无耻的背后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时候,那不是小人的人也要争着抢着去当小人了,而这也正是我国几千年来小人谬种流传,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2005年12月8日速就

家之说

忽然想到家。家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女人的安乐窝；有人说它是男人的避风港；有人说它是一种文化；也有人说它是一个魔方，让你欢乐，叫你迷惘，赐你幸福，令你悲伤，使你劳神，又任你飞翔……家呀家！在人的一生里，真不知它要变幻出多少斑斓绚丽而又丰富多彩的篇章。

但是，就社会学的范畴去认识，它却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大概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便有了家。它不仅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场所，同时也是传播人生知识、经验与文化的“学校”。因此，它首先应是人的一座文明的“圣殿”，笼罩着道德思辩的力量，一切良好的兴趣、习惯、灵感与生命中一切高贵的想象力、创造力都应在家的抚育下成长起来，而一切狭隘、自私、懒惰、嫉妒、冷漠、贪婪与无中生有的猜忌等人的劣根性，也都应该在家教中自然消失。一如大漠甘泉，涌出宁谧与安慰，让人洗心涤虑，怡情悦性，融溶于家的美满辽阔的蓝天之下，而你自己也就是翱翔于蓝天的那朵自由

的云。

当然,家也是实在的、具体的。要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但家的核心、灵魂、支柱却是无形的情和爱。《礼记》上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这也就是说,家如一片土地,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关怀、爱护和体贴,就是肥美这块土地的阳光雨露。所以,幸福的家总是洋溢着和平、友爱、宽容、信义与民主,温情脉脉;而不幸的家却被争吵包围着,动不动便翻老账,互相揭短,恶语相向。有的甚至演变成家庭暴力,拳脚相加,搅得四邻不安。

人用理性发明了许多关于“公平”、“正确”的定理,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家里追求正确的人却不一定正确。因为幸福的家门永远只为怀抱着无私的爱与责任、牺牲和创造的人开放。如果总觉着自己吃亏,总要在家里讨出个“公平”与“合理”,那这个家所容纳的人恐怕也就越来越少,最后也许就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正确”的人,一个对谁都没有责任与义务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所关心或关爱的人。

有人以看透了的口吻说:“家还不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联合体。”我不这样看。因为家若不是男女双方以理智的爱为基础,不是以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规范来自律,他与她就绝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伴侣,家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不错,家庭从来就与私有制相联系,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要彻底摒除婚姻中的功利主义色彩也不容易,但爱

情与金钱的位置必须摆正。如果把两性结合当做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当做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那你即使如愿以偿,也为今后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为什么华宅别墅里的夫妻反目如今倒比瓦舍民居里的比例高?原因便是婚姻商品化。

何为爱?在文人的笔下它往往被写得如雾如雨又如风,让人找不着北。但要我说,它既不是两情相对时相互流盼的脉脉秋水,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如诗如画。爱,其实就是你守在家门口眼巴巴望着老伴回来共进晚餐的那种眼神,更是男人对女人一天上着两个“班”,忙了工作又忙家而时时表现出的那种欲言又止的歉意。这看起来平凡,但却使爱入了味,溶入到生命里,和着血液一起流淌,营造起人类社会的一道道风景线——家。

家是一个“巢”。尽管其百孔千隙,不避风雨,但只要有了亲情与爱的温暖充溢其间,它便把风雨挡在了门外;家也是座“钟”——一座长鸣的警钟。哪怕你权倾朝野、富可敌国,但只要良知不泯,便会感到母亲的企盼、孩子的微笑与妻子的等待似乎都在提醒你:不要在“权”与“钱”上不走正道走邪道,以免有家回不得,“空悲切”!

战争中的家,是男人的肩膀女人的背,一副扁担一个筐,扶老携幼,生死与共,但却成就了凡人的地老天荒;和平时代的家是“博物馆”、“加油站”,乃至一帧照片或一件旧家具都能引出属于你或属于她的故事,有属于你或她的时间与空间,但也有着老人的鞭策,爱人的鼓励,孩子的追赶,容不得你有任何懈怠与拖延。

家,在流浪者的眼里是夜空中的北斗,可望而不可及,

但却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回味与慰藉；家在失足者的眼里是苦海的彼岸，只要回头，便有希望，为时不晚；但劫难之中的家，却是受难者的世外桃源，无论是一身的汗或一身泥，还是一身的伤痕与疲惫，一回到家便洗个清清白白，一杯热茶，一条毛巾，一枕耳语悄悄话，便使你对震天的喧嚣忘个干净，对橡皮裹着的棍子嗤之以鼻，并从老妻的眼中恢复起自信，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从而也就有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这草窝”的体验与信念。

家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拥有了它，你会为柴米油盐搞得头昏脑胀，但一旦失去了它，那你就是千回百转，再把心掏出来，也找不回原汁原味的它！

因此，我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也愿天下人都能珍惜自己那个幸福的家。

2005年8月18日

马克思是什么官？

“马克思是什么官”？这提问竟出自我那还上小学的孙女之口，不禁让我一怔！

原来，孩子的学校有个好传统，每逢重要纪念日都要讲讲这个日子的意义。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纪念日，老师讲了马克思，于是便也使孩子有了如此天真的联想：“马克思是什么官？”

“马克思是什么官”这很容易讲清。但若真和孩子的逻辑推理联系起来，又很难讲清。因为这位外国老爷爷虽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他却一无权、二无钱，晚年流亡伦敦，几无立足之地，因而也就不能像孩子们现在的某些爷爷、爸爸那样，有什么几室几厅的小洋楼，或宛如别墅的小独院。“出无车，食无鱼”，自然也没有送往迎来中的公费吃喝。至于拿上公款点歌跳舞，彻夜搓“麻将”，遍访名山古刹，作千金一掷之“潇洒”，则更为这位共产党的第一国际领导所不齿。可是，如把这些讲给孩子，她会相信吗？

“马克思是什么官”？如按当时的政权认可来说，他只当了不到一年的《莱茵报》主编，实际还是个穷“秀才”。可是，他不当官却掌握了真理，没有权，却有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胫而走。这和现在许多本不应以官大小论高底、分正误，但往往却是谁的官大谁有“理”、谁的权大谁说了算的情况无法去比。

马克思的一生一贫如洗，但他却从钱——这“普遍流通的货币中发掘出‘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生产秘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这和现在有些连做梦都想着“发、发、发”，不惜以手中的权力去换钱的人，也无法联系。当然，把这讲给孩子是多余的，就是讲给某些成年人，怕也笑你：“不可思议！”

“马克思是什么官”？他没当过官，可能也从未想过要当什么官，以致当 1871 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后，他也只是很快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歌颂、支持，而未听说去向这个新政权要官。可是，不知何时起，马克思的这种“君子”风，在马克思的某些“门徒”中竟已荡然无存。

马克思逝世已经 112 年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记忆也日渐淡薄。灯下走笔，我不禁对那位小学教师肃然起敬！如果不是他提起，我这个辱添马克思“门徒”之列的人，也差点把马克思的忌日给忘了。

1995 年 8 月 18 日

“吃肉骂娘”析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一些人论及群众情绪时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但我却不敢赞同,因为有些“骂”事出有因,也值得研究。

一般地讲,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虽然让群众反感,但还不至于要“骂”,但当这些现象的发展影响到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公平,那便很难让人不“骂”!

当前,一个令人不安也让人烦恼和气愤的事实便是权力运作上的腐败。如在建设项目的批准立项与施工承包上做手脚、捞好处;在紧俏物资的批售上捞回扣、捞外快;在开发土地的批用上营私舞弊;在税收、信贷、工商管理等政策的掌握上吃、拿、卡、要等,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权力从银行拆出资金炒股票、炒地产、炒期货、转放高利贷,坐收渔利。至于一些依靠这种权力运作上的腐败而暴富起来的人,那就更不能不让人“骂”了!这种人,在某些人的庇护

下,有的低估国有资产,贬值收购,以鲸吞国家财富;有的无限度地骗取国家信贷资金,即使是债台高筑也有恃无恐;有的以虚盈实亏的手法,膨胀个人承包所得,明分暗拿,形成“穷庙富方丈”的怪现象,以致把些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都搞成了“空壳”,咋能不让人“骂”!

是不是把问题看得严重了?非也!试看各地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不动真的则已,一动真的便是上下一串子,内外一摊子,盘根错节,令人震惊!其严重性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之外。

是不是怀疑或反对党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呢?否。我们知道:改革中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相对的贫富不均也是改革必然要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这个“不均”的总体应是一种“正态分布”,即首先是那些诚实的劳动者、守法的经营者先富,如果社会利益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者的“暴发”,是那些勾结腐败官员狼狈为奸的人“暴富”,是这些“暴发”、“暴富”者的花天酒地、恣情纵欲,那便不能不使那些仍在承受“阵痛”的人有不平之鸣,以至要“骂”!

我们还知道:市场经济的机制、它的内在活力是竞争,是人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参加“有限机会”的竞争,是“机会”均等,但若于无形中把这个竞争变成权力渗透的竞争,变成对腐败官员拉拢、腐蚀与收买的竞争,那便破坏了市场竞争,也不能不让人“骂”!

当然,体制转换期的政策不可能人人理解,有些“骂”是误会,也难免。但若把“骂”一概视做“期望值过高”、“平均主义心理作祟”,也欠公允。正确的态度是正视“骂”,研究

“骂”，把“骂”当做动力，切实解决民之所思、所急和所盼，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

1996 年 10 月 6 日

崇尚拒绝

我崇尚拒绝。

物化了的生活,犹如一个万花筒,它使你眼花缭乱,迷惘,困惑,但只要有所拒绝,便有可能清醒,洞若观火。

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一团乱麻,你压着我,我缠绕着你,时时触动人的每根神经,但只要有所拒绝,你就有可能轻松。

人的一生,实际上生活在拒绝与不拒绝的选择之中。拒绝了假,才有真;拒绝了恶,才有善;拒绝了丑,才有美;拒绝了诱惑,才有可能跨越那迷人的陷阱,守住灵魂!

原则、道德、理想、操守……这些东西,常如岸边停泊的船,潮起潮落。这潮水,当然就是“世风”,但挡住潮水的堤坝却是胸中一念——拒绝。

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要有点“精神”就得有拒绝;

鲁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但人要不“苟

活”，也得有拒绝；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是不同的心理层次。但要达到“超我”，就不能没有拒绝。

鲁迅，拒绝了媚俗，才成就了他自己的风骨，使后人“高山仰止”；

彭德怀，拒绝了“曲道媚时”，才在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一道无形的碑；

孔繁森，拒绝了他那个地位的干部本应有的享受，甚至连家庭温暖、母子情深、儿女情长也一起放弃了，但他却在世界屋脊上铸造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忠报国”之魂；

焦裕禄、张鸣岐，则是在他们感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很少的时候，却点燃最后那点生命之火，完成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那种悲壮的最后冲刺，成为公仆楷模！

我无意美化拒绝。事实上，许多拒绝都是痛苦的选择，然而，它昭示着生命的美丽、心灵的安宁、党性的纯洁与人格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讲，拒绝就是存在，就是创造，就是进取，就是开拓！

当然，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没有经过饥肠辘辘便不知道糠甜，没有经过人生的“几番风雨几晴和”，便不懂得痛苦中的美丽与美丽中的痛苦，自然便很难拥有那分大彻大悟的拒绝！

相对于正义、理想，相对于真理、高尚，我想，我们失落的拒绝是否已经过多？一点点蝇头小利便使凌云的壮志轰然倒塌；一点点利害得失便使人间正义随风飘去。拒绝，对有些人很难。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们也大可不必担心。因为

人类的文化从来都是在拒绝中发展,在拒绝中创造,在拒绝中继承,也在拒绝中扬弃!

因此,我崇尚拒绝。

1996 年 7 月 17 日

出警入蹕与送往迎来

出警入蹕自何时始？不可考。《汉书·文三王传第十七》说梁孝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传警，入传蹕，疑于天子……”是皇家礼仪。至于官吏出行是否也传警，则未见正史有说。戏台上为包大人鸣锣开道，似是艺术需要，意在昭示：包青天来了，有冤喊冤，有状告状，非为传警。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的公仆也要传警而行。日前上街，过马路忽闻警车呼啸而来，慌忙躲避时，那还未临近的警车却已自其扩音器传出一声断喝：“老汉，快走！”原以为是公安执行任务，待醒过神，方见尾随的竟是一辆辆小轿车迤迤而行。行人议论：解放以来，见所未见。有人说：此等气派，怕是学习洋人？但据我所知，不论东洋或西洋，如今的世界各国除了元首来访，多大的官出门也不允许传警扰民！

送往迎来的起始源流已不可考。但与出警入蹕不同，是人际关系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并非皇家专利。如《诗经

·氓》所讲的那个痴情女子把恋人一直送过淇水至顿丘，还恋恋不舍，便表达了一种纯真的爱情。“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焦仲卿与刘兰芝亲情难离的形象比喻；而《阳关三叠》中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则表达了王维与元二的友情。不过，官场上的送往迎来是没有这些真挚、朴素的情感因素的。不要看表面上热闹，车水马龙，风情万种，其实不过都是为了取悦上司罢了。明代的张居正回家奔丧，沿途官员竟“每餐供奉珍馐百品”，以致连他自己也吃腻了，“仍嫌无下箸处”；唐代的杨国忠出行，有的地方官竟别出心裁地弄来一群一丝不挂的裸体美女“端盘执壶”，围着他吃饭，名曰：“肉台盘”、“肉屏风”，你看缺德不缺德！

与古人比，如今官场的送往迎来自然不及，但也令人瞠目。有些地方，往往是前呼后拥地迎接与杯盘狼藉的款待之后，歌之舞之，拥之抱之，桑拿“泡”之，麻将“娱”之，走时还要把那大包小箱的土特产、纪念品装上车。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些地方的送往迎来还要迎到自己的辖区边境，这边送，那边迎，有的还要动员群众，以成夹道欢迎之势。去年有则报道说，安徽某地竟动员了 200 多名小学生欢迎领导，正值下雨，还要孩子们敲锣打鼓，大喊“热烈欢迎”，冻得好些娃娃感冒了，车子却一辆辆地过去了，辗得泥浆四溅，连个招手示意亦无。

官场上日渐奢糜的送往迎来算不算腐败，未见权威部门定论，不敢妄断。但我想这至少也反映了一种与廉政精神相悖的不健康心态。说它是封建思想的因袭与变形，可能言重；说它是旧官场的沉渣泛起，大概也有人不赞成。但

不管怎么说,我看还是收敛一些的好。《论语》上有句话:
“君子之德风。”真正的公仆是应该走进人民群众中去的。

1998年7月27日

谁是“青天”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方宏进到武汉签名售书,竟有不少人在售书现场给他递状子。一老妇双膝跪地,高唤“青天”,说她“本来要到北京去找《焦点访谈》,但打官司已欠下10万元的债,没钱去了,只好求方……”

近两年,《焦点访谈》因其敢捅“马蜂窝”,声名鹊起。有报道说,北京中央电视台的前门与后门,经常排起长长的两行队伍,前门排队“告状”——反应情况;后门则是那些怕曝光的单位要求接见,“说明”情况。一个媒体单位能把舆论监督搞到这种程度,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不能不让人高兴。但我总觉这恐怕也是一种错位现象。按照现代社会的理念,执法与纪检部门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有了问题,老百姓把讨还公道的希望寄托于媒体,并把它视做“青天”,这本身便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谁应该是“青天”?不言自喻。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某些本该成为“青天”的机构却对自己的“青天”角色不感性

趣。好多问题都是不到捂不住、盖不住的时候，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拖到上级或上上一级领导的拍案而起，便不会有真正的解决。重庆綦江彩虹桥的垮塌，本可避免，老焊工周耀琪在施工中便向包括县政府在内的好几个单位反映，但均是石沉大海。轰动全国的钱塘江沉井“豆腐渣工程”，举报人沈柏虎甚至连灌入烂泥的沉井数目、位置，在举报中都一一标出，署上真名，留下手机号码，并愿出10万元做抵押担保，但奔波了8个月竟没有一个单位受理。最后，还是“通过关系将举报信辗转递到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的手上，才使案发。”（见6月12日《工人日报》）

真没想到，“关系”这个不光彩的角色竟在如此的壮举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客观地讲，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是任何一个设官而治的社会都难以根治的一种社会病。封建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难进来”，于是便有了某些封建官僚的麻木不仁；资本主义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也能使鬼不推磨”，于是便也有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客的麻木不仁。但如今有些地方却是没有“关系”不办事的那种麻木不仁。当然，有了“关系”也要用钱去打点、去铺垫，但“关系”总是第一位的。否则，“背上猪头找不到庙门”！

“青天情结”是几千年人治社会的历史印记，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无助小民的求助思想，当然不应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重复。但这取决于那些居于“青天”位置的干部有无“青天”意识，能不能让“青天”归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腐败”除了一些赃官的贪赃枉法之外，比较多的还是那种既无正义感，亦无是非心，哪怕让无权无势的小民冤沉海底也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

主义法治”便不能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老百姓呼天抢地地到处找“青天”这种本不应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的现象,也就不会消失。

1999 年 9 月 19 日

漫话批评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正德年间，徽州大旱，当地太守不抓抗旱，却装模作样去祈雨，有人写了首打油诗批评说：“太守出祈雨，万民皆喜悦，是夜推窗看，见月。”太守闻之大怒，将此人捉来命以太守雅号“西坡”为题赋诗，此人应声曰：“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二人比，差多！”太守当即下令打他十八大板。此人起身曰：“赋诗十七字，被打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

这故事当然是郎瑛的杜撰，意在讽刺那些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的人。其实，这也难怪，在我们这个讲究温良恭俭让的国度，自古以来就没有批评，只有“詈、訾、讥、讽、谏”这些词。据说，批评一词还是舶来品，要在这样一个受过几千年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实行批评，确实不易。不要说那个气量狭小的“西坡”，就连那史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也一样。史载他对直言无隐的魏征虽视为“一镜”，珍之敬之，但也有时恨之，有次竟要杀掉这个“田舍翁”，要不是长孙皇后机智

相劝,恐怕魏征早已是太宗的刀下鬼了。

由此可见批评之难。但如今批评之难还不在于忠言逆耳,而是对批评的误解,总以为批评——不同意见是“唱反调”,“吹毛求疵”,有害实践。轻者,对批评嗤之以鼻,重者暴跳如雷。有的,更以注意“导向”为由,要求批评“理解”、“宽容”,这便在客观上助长了庸俗关系学。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说四平八稳的套话,讲滴水不漏的官话,已是许多人的“语言逻辑”,并渐而演变成人所共知的时弊——只吹不批,甚至不吹不拍反而使人感到不正常。至于那些打着“尊重领导”旗号的奉承,暗送秋波式的逢迎,打情骂俏式的阿谀,乃至不以肉麻为耻的“拍、抬、吹、溜、捧、拉、舔”的招数,则早已让人习以为常,也见怪不怪了!这种风气的流行,不仅闭塞了言路,也使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甚一日,真是害莫大焉!

当然,批评必须遵循客观,实事求是。这尤其是在我们曾经有过把批评当棍子使的沉痛历史教训之后,更要注意态度、方法,做到以理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培育起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至于说到“理解”与“宽容”,则应与曲道媚时的伪善、无是非之心的麻木区别开来。其实,要真正讲到“理解”与“宽容”,则应是对批评的“理解”与“宽容”。因为只有“理解”与“宽容”的立场才有可能使批评存在,而也只有这个“存在”才构成了批评与实践的对话与交流,构成工作发展的前进动力。

其次,批评也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因为批评是思想的表达,没有发自肺腑的批评,直言无隐,也就很难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试想,当初若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打开思

想禁锢,又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解放的汹涌澎湃?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哪儿来的打开国门的改革与开放呢?尤其在当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情况下与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只有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倾听各个阶层的真正诉求,鼓励批评,畅所欲言,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

实践离不开批评。这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我们还缺乏经验的当前,只有广开言路,提倡批评,注意多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少走弯路,并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更加成熟起来。

1996年3月10日

也说“父母官”

一个时期以来,不时见到有人在媒体上对某些人一当官便以“父母官”自诩,戏称“本府”、“本县”的现象撰文批评,讽以“无知”,责以“封建思想,流毒不已”,我总不以为然。

先说“父母”一词的使用,古今不同。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把“父母”延伸到祖国,而《小雅》的“南山有台”中“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父母”则泛指贵族,到了春秋末年以后,“君子”成了“有德者”的泛称,即“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者,谓之君子”,遂又使“父母”连系到“有德者”。但据唐孔颖达疏引汉郑玄对《书·无逸》的注释,“君子”亦指地方官,在老百姓嘴上便成了“父母官”,只是它的广泛使用还在宋代及其以后。如北宋的王禹称出知黄州便有“万家呼父母,千里赴菡萏”的记载。至于说到“官”就代表了封建,也不见得。因为“官”亦作“公”解。如《汉书》上讲的“五帝官天下”的“官”,便是这个意思。所以,

法官、武官、警官、外交官等官称如今在世界上依然通用,谁也不把使用这些官称的国家视作封建国家。

何谓“父母官”?孔子的学生子夏有次读到《大雅·洞酌》的“剡弟君子,民之父母”不解,去问孔子,孔子说:“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民之父母矣!”这也就是说,作为地方官,要首先对那些有损人民利益、有碍稳定的“坏事”负责。它体现的是“视民若伤、爱民若赤”的情怀,更是“民惟邦本”这一古老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实践。“民本思想”,有人并不待见它,说它是:“政治上的短视”、“小国寡民”。但从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常心”到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邓小平同志的“我们办事想问题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再到“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孔繁森,一条红线,贯穿至今。它是历史上明君贤相的“制国之常”,亦是我们党常讲的那个“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背离了它,便有可能使载舟之水再覆舟,前景堪虑!

当然,“父母官”毕竟是等级观念的产物,与现代法制社会的“民主”、“平等”精神相悖,也不好听。但好听又如何?看看《焦点访谈》曝光的那些“公仆”吧!面对记者的镜头,治下一方制造了大量害人的假药不知道,有毒大米进入流通说不清,残民虐民的黑社会势力任其坐大,祸乱社会的淫荡娱乐场所无人过问,贫困山区的妇女儿童屡被拐卖,一再反弹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说不出个原因,有名无实的人均纯收入连“影子”也算了进去,大量的走私犯罪、偷逃国税却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如果拿他们和历史上那些至今仍活在人民心里的“父母官”比,那“公仆”二字恐怕也就

无地自容了。

我们要“公仆”还是要“父母官”？回答自然是前者，也是肯定的。但问题不在其名，而在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的干部有无“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而不是以何种名称自诩，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1 年 11 月 26 日

碰到的与想到的

每日上街,总要碰到一两场“猫鼠斗”。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只要远远一望见“大盖帽”的身影,便一哄而散,待其走过,又散而复聚,而每当“大盖帽”与他们发生冲突时,那些围观者也没有一个不同情他们的。一言不合,便是一场轩然大波!尽管那些围观的人连谁是谁非也没听明白。

许多年来,我们的城市管理总未离开就管理说管理的思路。言及城管成本之高,效果之差,在这方面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体会。为了政绩,每天要忙于查、罚、驱、赶,而小贩们又全然不当一回事,或聚或散,软磨硬缠,不但使执法的难度日益加大,也使法的执行渐渐流于形式,徒唤奈何!

客观地讲,那些随意设摊到处叫卖的小贩,有如“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碍城市的文明与形象,也增加了城市交通与卫生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取缔他们,完全应该。但是,同志!你可想过,在城市的“主流社会”背后,还生活着一个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暂时无法享受现

代生活的“小康”，却有权追求“温饱”。风餐露宿，辗转于十字街头，虽然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其潜在意义则是在用自己的血汗分担着改革的“阵痛”。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贡献”，而且是那种悲壮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什么叫“文明”？“文明”的核心，它的第一含义是“人文关怀”。即社会对于“弱势人群”的同情、关爱与尊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坐公共车给老人和抱小孩的妇女让坐，等等。尽管这些也都很需要。

什么叫“形象”？就城市而言，除了它那成龙配套的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交通与敏捷便当的信息网络、健全的生活服务体系、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些“硬件”以外，核心是其“软件”——人，是那些安居乐业的人，与从这些人身上所流露出的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素养。如果一方面是一大批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人在花天酒地里醉生梦死，而另一方面又是满大街的“猫鼠斗”！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与执法者的那种永不疲倦的周旋！那就很难再讲什么形象了。

我们常讲：“城市管理就是服务。”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我想，它绝不是只让那些有钱人有地方吃喝玩乐，把日子过得惬意了再惬意，舒服了再舒服，而是首先要使那些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弱势群体”也能过得去，至少，也要为他们留出一片生存的空间，帮他们找一条生活出路。否则，与管理相对应的服务便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还记得韦唯唱的那句歌词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其实,城市管理亦如此,也要有爱。但这个“爱”的献出则主要还是我们政策上早就应该有的那个社会主义的温暖与爱。因为城市管理说到底还是人的管理,如果没有政策上对于“弱势群体”的倾斜,就管理说管理,便不会有真正有效的管理,而那个本应循此而来的“美好的明天”——文明、稳定与良好的城市形象,自然也就不会很快地到来!

2002 年 2 月 17

另一种腐败现象——混

老友到某单位办事,先找到主办,主办说这事得找科长,科长说他不敢做主,得找局长,可局长又说此类小事应该去找承办人,一波三折,转了一大圈也不得其“门”而入,给人的感觉是,偌大一座暖气烘烤的办公楼,硬是“热”不起来!

说起来,人们对此种该管不管、该办不办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民间也早有什么“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的说法。所谓“混”,无非是老百姓说的“混日子”、“混天天”的那个“混”,旧官场叫“混差事”、“混银子”,如今叫“混工资”。表面看,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实际上则是一种腐败现象。因为一个干部虽然不贪不占,但却什么都不想干,上班来,下班走,遇事敷衍,上推下诿,游手好闲,那岂不同样会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人民群众的眼里走形变样吗?

“混”的现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机构重叠,权力交叉,人浮于事,职责不明等,若进一步考察,则有其更深一层

的原因。曾国藩在其《应诏谏言疏》里讲：“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者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不顾大体，察其秋毫，不见舆薪者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不问是非者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则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也。”你看，曾文正公在 140 年前说的这些“通病”，如今在我们的某些单位不也是历历可见吗？

人们在考察历代的兴亡更替时，总喜欢着眼于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着眼于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裙带关系，鸡犬升天之类的吏治腐败，殊不知，像曾国藩说的那些“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等浑浑噩噩的官场“通病”，实际也是促使政权没落的一种潜在因素。有清一代的由兴到衰，民国以来的历届军阀政权的频繁倒台，乃至国民党在大陆的迅速溃败，均不乏这方面的原因。我们说，贪财、贪权、贪吃、贪喝、贪赌、贪色是腐败，但此种腐败犹如长在人身上的毒瘤，危害剧烈，却也明显，而贪懒、贪闲、贪养尊处优，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办事”这类常常被人忽略的腐败现象，则犹如慢性病，其危害是潜在的、缓慢的，但也是危险的。

我们把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公款吃喝玩乐等违法乱纪行为作为反腐败的重点，当然没错，但还不应仅仅着眼于此。因为反腐斗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廉政，更是为了勤政，为了让干部更好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办实事，办有效率、有效益的事。而也只有如此，

才能最终避免曾国藩说的那种“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的历史现象重复出现！

1996 年 4 月 14 日

“减官”与“减负”

两则新闻调查让我把这两个问题想到了一起。一则是“湖北仙桃市大福镇农民盖一间房的费用平均约 2000 元,收费却从 1996 年的 150 元涨至 400 元,害得村里有 40 多户人扒掉了房子远走他乡”;另一则说的是“竹林面积居全国之首的福建,产销一根毛竹在缴纳生产环节税、经营环节税、增值税、所得税以外,还有 15 道收费……”结果,“除农药、化肥、劳力等投入的 4 元钱外,一根毛竹的实际所得只是一双竹筷钱!”(见 2001 年 7 月 4 日《中国青年报》)

年年喊减负,年年负不减,这本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值得重视的是其原因,就在那个逼得 40 多户远走他乡的大福镇,摊派款里“真正缴给国家税务部门的只占两成多,其余都是人头费”!而在湖南浏阳的社港镇,《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记者发现,“镇政府竟有各类机构的牌子上百块,一个政法综合办便有 37 块之多!”原因是上面每分解出来一项具体工作都要下面有机构对口,有人专管,牌子一挂,便算落

实！

读《二十四史》，我们常为那些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成为中原率先进入农耕文明的汉族心腹大患，感到不解。但绕开 24 姓家谱的道德评价，单就组织效率去考察，便不难发现，游牧民族的组织虽然简单，但要远比中原的老大帝国更具活力。而其后来丧失活力的原因虽有很多，但也与其入主中原以后重新陷入虚浮庞大的组织结构，使官僚主义丛生，腐败横行，什么工作都落不实不无因果。我们现在的情况当然不能与这种历史现象比，但人浮于事却是不争的事实。去年 10 月一位新华社记者 in 陕西洋县的龙亭镇发现“该镇仅镇机关便有 17 名副科级领导”，而在陕西黄龙这个只有 4 万多人口的县“竟有财政供养的机构 308 个，4400 人，平均每 9 个农民便要供养一个‘吃财政’的人”。可见，不言“减官”便无以“减负”。

但是，言及“减官”又谈何容易！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便是我们至今也还未成功地找到一条打破干部“铁饭碗”的办法，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就是精简，也不是就把谁的薪水断了！一切的一切，全在卡紧用人的关口，可问题也恰恰就出在用人上。在某些地方，本是社会稀缺资源的官，可买、可卖、可跑、可要，即使是再不识时务的领导，上任也知道提一批，离任前再把方方面面照顾安插一批；即使是再不懂为官之道的官，也懂得用“乌纱帽”、“铁饭碗”去结“善缘”，树“威信”，赢得口碑“送我上青云”！至于因此而产生的那些“钻而优则仕”、“贿而优则仕”、“拍而优则仕”乃至“吹而优则仕”、“骗而优则仕”的宦海游鱼、“南郭先生”，则只能是一任一任地积累，一任一任往下推，岂可再讲什么

“减官”与“减负”。

难！“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我们用体制的改革，如在旅途，负重前行，步履艰难。但不解决用人上的腐败则更难。否则，一任“笑骂由汝，好官吾自为之”的风气蔓延下去，那恐怕就使国家的财力、民力不堪重负了！

2002 年 9 月 22 日

“当官”与“官当”

“当官”与“官当”这两个词虽然只是字面的颠倒,但却有着不同的涵义。前者即做官、当领导,后者则指的是一种制度:“以官当(抵)罪”。此制兴于北魏,律定:“公、候、伯、子、男五爵犯法每爵抵徒(刑)三年”;南陈则规定:“刑三年,一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犯法,一官抵徒(刑)一年”,“罪不尽其官者留官收赎,官不尽其罪者收赎其罪”、“以官当(抵)罪而免其官者,一年后降先品一等叙用”。

想到这两个词,是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关于“最大国企破产案”的报道之后。黑龙江始建于1905年的阿城糖厂,本是始终高踞黑龙江“糖财政”头把交椅的利税大户,但经过将近百年的辉煌后,从1990年开始,每换一任厂长便亏损1到2个亿,到去年底,亏损8亿,还有1665万元的银行未达账款不知去向。当4000多名职工在冰天雪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去寻找生活出路时,此前负有直接责任的三任厂长却全已调到比糖厂级别更高的机关当官去了。

难怪李鸿章在100多年前便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

做官”！阿城糖厂一案，说明了“当官”容易，也说明了一种事实上的“官当”现象的存在。“官当”——“官挡”。一官在身便挡定一切罪责，不受法律的追究，这在吏治清明的封建朝代也少见！它使贪官、庸官有了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使不学无术“脑袋一热就拍板”的昏官有了保护伞，反正不管弄下多大的问题，拍拍屁股那个窝就一了百了！

小平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但是，“治国容易治官难”。这里面固然有法制不健全、监督体制不到位等客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搅在一起的“关系网”从中作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此一来，再加上官僚主义的麻木与明哲保“官”者的“多栽花、少栽刺”，“民不举、官不纠”，或即使是“纠”也把大事“纠”成小事，小事“纠”成没事，于是便使“官当”成了不期然而然的现实。

自宪法修改以来，一个不时被人提及的话题，便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几代人奋斗追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终于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当然让人激动。但法治的核心是有法治官，如果在“真正关系到大局”的这个事情上不动真的，形成事实上的“官当”，乃至让某些人带着一屁股屎去易地“当官”，那恐怕就使法的威信与法的威力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折扣，法将不复其为法，而“法治国家”的理想和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了！

1999年7月18日

“明白”与“不明白”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说：“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我因未发狂，结论与他相反：凡事倘一研究便不明白。

什么叫“商品”？经济学里讲，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由价值而有价格，几要素讲得十分明白。可叫人不明白的是，有些东西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商品，为什么竟也挤进流通、交换领域而身价百倍呢？如身份证与文凭，当初制作时即未打算让它像国债、股票一样流通、转让，或像照相机一样出租。真要论其价值，一个小本本或一个小塑料片，充其量也不过几块钱，可有的竟已炒到数百、数千元。某些人的“权力”，也不是“商品”，但却有价，心照不宣，只要得其门而入，一纸批文、一个电话、盖个公章，便换来成千上万的利润。

时至今日，勤劳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已使许多勤劳者的生活好起来，有目共睹。可让人不明白的是，那些收费不菲、本是勤劳先富者的好去处——星级宾

馆、豪华酒家、舞厅、夜总会，为什么却没有真正的勤劳者去光顾呢？尤其，每见反腐败的风声一紧，这些好去处便门可罗雀，“严打”一来，电视屏幕上便出现从这些好去处抓获的那些人连头也不敢抬！“张灯开宴银千两”，不明白是哪位勤劳者掏了腰包？街谈巷议，不明白的是那数百元一瓶的茅台、数千元一瓶的人头马，又有几滴进入了勤劳者的口中！有人说，勤劳者的品德高尚，唾弃高消费，不习惯“潇洒”！既然如此，那层出不穷的种种高消费又是为谁准备的呢？当然，不能说沾上高消费的都不是好人，但起码说明有不少人民的血汗钱落入不该进的口袋，有不少不该花的血汗钱也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可是，这些“不该”的标准又该由谁说了算呢？

走笔至此，忽有所悟：难怪这几年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拓片到处有售，概因“难得明白”也！因为“难得明白”便不去“明白”，或者，“拿上明白装糊涂”，该“明白”的也不让它“明白”，于是这“难得糊涂”便有了市场，大行其道矣！

1997年1月3日

不戴“平民眼镜”与“甩包袱”

不戴“平民眼镜”与“甩包袱”，是新近的策论。前者主张对时下诸多社会矛盾的热点（如公款挥霍、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物价上涨……等）不能戴上“平民眼镜”看问题，从而“失去改革者的理智”；后者则干脆建议政府对一些社会问题“甩包袱”，不要“像过去那样敏感”。对此，《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发表高云同志题为“不戴‘平民眼镜’戴什么？”的文章，说“他们这一换眼镜不打紧，眼前的世道色调亦不能不变”“观察社会人生、进行决策……大约才会真正的丧失理智”。

诚哉斯言！“平民”者，工农大众之谓也。我国《宪法》的开宗明义之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若摒弃了“平民”视角，岂不连带作为“领导”与“基础”的工农亦将“摒弃”？这“世道色调”岂能不变？！说到“理智”，则更令人大惑不解。目前，我国城市正在深化着劳动人事制度、劳动保

险制度、住房制度、教育有偿化、事业产业化、企业股分制等各项改革。农村在农业经济迅速市场化的情况下,也面临着市场经济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如产品销售的把握、生产技术与信息的获取、产品结构 with 品种的适时调整等,都要农民自己掌握、适应,风险大,困难多,而生产资料的价格与生产费用又不断上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不断拉大。可以说,改革正牵动着工农大众的每根神经,其承受力、应变力及对改革的风险、压力的消解能力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个时候不戴“平民眼镜”、“甩包袱”,我想,如果不是神经错乱,便可能又是什么“走火入魔”了!还奢谈什么“理智”?

其实,论起不戴“平民眼镜”与“甩包袱”,也不是什么新货色。1992年的俄罗斯,便积极推行了包括这些观点在内的“休克疗法”。当时,他们把“平民眼镜”与视作社会问题的“包袱”都“甩”了个干净,可是,主观热望的“休克”在客观上一天也没有“休克”。物价天天涨,生产持续降,卢布贬值到天文数字,金融混乱则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最后,尽管叶利钦一再要人民“忍耐”,但此一疗法的始作俑者——盖达尔,还是不得不在人民的愤怒中于今年元月滚下台。这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

记得过去时常听到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警惕形‘左’实右!”这主要是指那些专为取悦某些决策者而在马列主义里寻章摘句,食而不化,却要鼓弄唇舌,蒙蔽视听,貌似革命,而把革命拉入歧途的那种人。这种人,现在是不可能再以同一面目出现了,但其手法没变:哗众取宠,耸人听闻,脱离实际,藐视人民!

当然,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舀堯之策,负曝之献,杞人之忧,趋时之言,无一不可各据胸臆,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面对那些用新名词装点起来的祸国殃民之论,则不能不无动于衷。请不要忘记,党中央的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里,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互以为辅而又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任何分割这一整体,任何脱离实际的单一突进,都要在历史上收获与自己主观愿望截然相反的苦果。这是否又要唤作“杞忧”? 望能就教于识者。

1995年2月19日

“3·18”随想

3月18日,这是一个应为人类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

1871年的这一天,巴黎的革命在枪声中开始。革命后的巴黎,奇迹般地改变了原来堕落之都的面貌。后来的《真理报》这样描写到:“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跑到凡尔赛去了。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最偏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它告诉我们:只要社会提供合适的土壤,人的可塑性与人的向善的决心和勇气,难以估量。

然而,胜利是短暂的。两个月后,工人的鲜血就铺满了他们亲手建造的街垒。和以往的革命一样,“公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消失了。

——在这之前的1789年,巴黎人也曾冒着枪林弹雨走上街头,奔走相告:攻陷了巴士底狱。但伟大的革命最后却以拿破仑称帝与波旁王朝复辟而告终。

——在这之后的1968年,巴黎人同样走上大街抗议现

存的秩序和观念,横扫假道学,但叛逆的青年最终也淹没在主流文化的反扑之中。

从1789到2008这210多年里,我发现世界上民主的发展,自由的增多,经济的突飞猛进,社会的进步——这一切,如果深究一步,几乎都是下层阶级流血牺牲的结果,但这也是常常被人遗忘或不愿承认的事实。

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我们往往被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吸引,但是你可知道,那些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有许多人却未竟天年。

蔡和森,曾被湖南第一师范的杨昌济老师认为他与毛泽东二人是“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的“奇才”,但1931年被捕后,竟被狱警将四肢钉在墙上,然后以利刃乱刺其胸致死,年仅36岁。牺牲之惨烈,旷古未闻。

向警予,一位豪爽刚烈的土家族女子,1925年牺牲在武汉,年仅33岁。当时的北京《晨报》以“汉口枪决共产党领袖”为题,报道其“身穿绿色长袍,神色不变,狂呼口号,观者人山人海……”

杨开慧,电视剧里还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但其于1930年便带着8岁的毛岸英入狱,同年11月在长沙被害,时年仅29岁,遗言只一句话:“死不足惜,惟愿革命早日成功”!

有资料显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我们党登记在册的党员共300余万人,但自建党以来至建国前所牺牲的党员,仅有姓名可查者即达370万人!毛泽东同志晚年曾无限感慨地对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直至最近还有人问我,几百年经久不息的社会主义运动意义何在?我没有正面作答,而是劝他们去读史,特别要读资本主义发展史。因为只有把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成就不在于有多少个奉它之名的政权,也不在于它有多少个信徒。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带来了多少社会文明与进步。要知道,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召唤,如果没有底层阶级的不断奋起,而且,如果任由那个时代的那些残酷野蛮的压迫、剥削、掠夺与利益集团间的血腥斗争自我发展,那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何为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解释,它与历史上已经有的社会形态的本质不同便是没有剥削、压迫,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与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又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经过扬弃(即在吸纳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种种成果的基础上)的否定。马克思预言这种否定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说:“资本主义胚胎将孕育出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这种因素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某些发达国家看到。

如今尚还健在的一些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概还记得上一世纪30年代那场横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在一片绝望的惊恐中,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凯恩斯“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学说。但在罗斯福总统一系列“干预”中,真正起了作用,而且也是真正可操作的法律程序的“干预”,却是马克思早已提出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与“社会失业保障制”。以致,连罗斯福总统也被称作“赤色总

统”、“共产主义代理人”。时至今日,靠马克思三大良方治疗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个致命的矛盾——资本的不断私人垄断化与生产不断社会化的矛盾大大缓和,摆脱了垂死迹象,发展了生产,并使生产社会化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这些究竟是社会主义因素起了作用还是资本主义因素起了作用?却再也无人提及。

历史的发展,往往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它告诉我们:一切革命的政治效应都是滞后的。法国大革命失败于1795年,但它提出的目标却于100年后实现;巴黎公社失败了,却催生了“十月革命”与“罗斯福新政”;1968年的“五月风暴”当时即已失败,但它的观念却已为现在世界的大多数人接受。因此,我说原来的那些失败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是他们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并再也不能退回到原地了。

这就是“3·18”的伟大意义。

2008年5月28日急就

“从干部看党”

孔繁森的事迹激动人心,但我却为其两件小事沉思不已。一是1981年孔繁森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一是1988年最后离开桑达乡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两次送行,两次“依依不舍”,说明了什么?请先不要断言什么“清官效应”吧!人民群众的这种巨大的感情流露中,其实还有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多年来的物化生活,曾使我怀疑世间还有真情在,曾使我怀疑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已使某些领导干部的个人品德面目不清,也曾使我怀疑党在革命战争中凝聚起来的那种巨大的人民力量是否依然存在。然而,孔繁森却明白地向我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新时期应有的光辉品德。“从干部看党”,也让我从他的事迹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所投入的巨大信任与热情。

“真抓实干”!这是我们喊了多年的口号。但怎样才是

“真抓”与“实干”？是对别人的做法生搬硬套，别人咋干我咋干？还是首先走一条艰苦的调查研究之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坐在上面发号施令，我说咋干就咋干？还是把“我”沉下去，听民之呼声，干民之所想、所急和所盼？是“穿新鞋走老路”，大轰大嗡搞形式主义，哗众取宠？还是脚踏实地地摸清当地的客观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地干？这些看似行为的问题，实际是个态度问题，是对历史和人民的负责与不负责。而人民也正是从干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上来看我们的党的。

在孔繁森事迹的报道中，有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字：“跑”。在岗巴，他“三年跑遍全县的乡村与牧区”；在拉萨，他“跑遍了全市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办、村办小学”；在相当于两个山东省大的阿里，他“跑了全区 108 个乡的 98 个”。要知道，这可不是那种柏油路上“随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的“跑”！而是在“海拔平均 4500 米、空气含氧平均不足海平面一半”的崇山峻岭中去“跑”，且在许多地方要弃车换马，或用自己的“11 号”去“跑”！而也正是这种“跑”，使他找到了适合当地发展的项目与优势，使这个只有 6 万人口的偏僻地区生产总值一年增长了 37.5%；国民收入超过 1.6 亿元，并使广大藏族同胞在他这种艰苦、忘我的“跑”中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与希望，也看到了我们党的精神和力量，唤起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干部的爱！以致，在他离开时，人们对他“依依不舍”；在他受伤昏迷时，“抬他走了 30 多里山路”送到医院抢救；而他殉职以后，会有老百姓匍匐在他的灵前，发出“孔书记您不该去呀……”的哭声！

“从干部看党”这是人民群众的朴素视角。在一个地方

或单位,领导干部形象之所以重要,就是基于“从干部看党”这一朴素的视角。人们从每一个腐化堕落、弄虚作假、盲动浮夸的干部身上都产生一分对党的隐忧,也对每一个鞠躬尽粹、严于律己的干部都投入一分对党的爱!要看到:当孔繁森的高大身躯融入西藏那片壮丽神奇的土地时,在无数的西藏人民心中,矗立起来的将是一座无形的——不朽的——党的丰碑!

1995年5月14日

也说落不实

近两年在人们的闲话中似又多了一句闲话：“落不实”！有时还要加重一下语气：“啥都落不实”！当然，并非事事如此。但也不是全无来由。比如像那一打再打仍需再打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查再查仍需再查的非法出版物；一清再清仍需再清的“三角债”；一撤再撤仍需再撤的公路关卡路障；一扫再扫仍需再扫的“黄”；一缉再缉仍需再缉的“毒”；一纠再纠仍需再纠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以及那一抓再抓仍在不同地方时有反弹的农民负担等，莫不令人感慨！而要说起这“落不实”中的最最“落不实”的事，恐怕还要数那一刹再刹却愈刹愈烈的公款吃喝玩乐风。据说，有的地方已发了几十个文件“严禁”，但依然是“良夜春宵等闲度，一年欢乐复一年”！

为什么“落不实”？原因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工作不认真。若将这“不认真”逐一排列，则不下七八种。如：

老喊“狼来了”！“干打雷不下雨”。尤其当那“雷”声过

后究竟是暴雨如注，顿生清爽？还是雨过地皮湿，徒增暑气？或者是空雷无雨，满天扬尘？则无人过问，此其一。

“月亮走，我也走”。会议层层开，传达层层有；班子层层建，但是无“抓手”；文件层层转，汇报夸海口；成绩一二三，做法甲乙丙；经验 ABC，数字唯我用；“一看二慢三通过”，上级不催我不动，此其二。

宝玉打黛玉——轻打轻落。安排大而化之，只有概括性而无具体性；“通知”温和笼统，只有原则性而无针对性；“号召”空洞抽象，只有善良愿望而无击中肯綮的措施。有的，“厚爱吴姬”，期以“自查自纠，自行改正”！这就使那些敢吃“禁果”者有恃无恐，有机可乘。此其三。

摆“花架子”打“太极拳”。什么“头头抓、抓头头、层层带头”啦，什么“反复抓、抓反复，一役达标”啦，反复“吊嗓子”，把“惊堂木”拍得山响，可就是“只打开场不开戏”，能拖就拖，一直拖到群众没了信心，上级没了决心，拖得政策没了威信，也拖得上头松了劲。此其四。

只打“撞到枪口的”，“民不举、官不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其五；睁只眼，闭只眼，多“栽花”，少“栽刺”，此其六；通权达变，对下不对上，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此其七；“人情大于王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上好的“宝刀”当成摆设，得过且过，此其八。有此种种不认真，故曰：“啥也落不实”矣！

记得毛主席生前有句名言：“天下事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实际上，老百姓也盼的就是这个“认真”。“认真”，“认真”！系之于党心，也系之于民心，法纪之“剑”，当一拭于今！这尤其是在当前认真传达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的时候,就更需要我们那些不“认真”的领导干部拿出勇气,猛治沉疴,一新风气,兑现“认真”!果如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1995 年 5 月 14 日

非信无以立人

思想政治工作被重新提起,让人高兴。可耳边传来的却是“思想政治还灵吗?”“啥是真的?除了钱,老爸都是假的”。又让人高兴不起来!

我们的思想政治为什么不灵了?说法很多,但忘了一句俗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个“信”,可理解为传统文化的信义,也可理解为《商法》、《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但在更大的意义上则指的是信仰、信念。一个人若没有任何信仰作为精神支柱,轻则萌生惰性,重则被某些非正常的东西激活,“不知其可也”!一个社会,也是如此,若没有一个为多数成员崇敬、尊奉的信仰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那就会造成一盘散沙,离心离德,“不知其可也”!而我们的问题恐怕也正好出在这个地方。试问:当货币职能被歪曲、放大为“万能胶”、“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便做推磨鬼”的时候,特别是当某些领导干部把权力抛向市场,使权力、荣誉、地位、政治原则、组织纪律成为商品的时候,又有谁还能相

信我们讲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呢？

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事例为年轻人的思想滑坡而嗟叹，也能为世风日下而发出卫道士般的呼吁。但是，当我们无法为干部中那些屡禁不止的腐化风气自圆其说时，我们恐怕也就丢掉了对年轻人拒绝崇高的批评资格。

有人说：“思想政治已失去了它内在的存在价值。”这不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如果说“失”，那也不是它的“内在价值”，而是其“载体”——人，是那些对社会控制与协调起关键作用的人。要知道，信仰的树立，绝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语言工程，它既有赖于理论的逻辑力量，更有赖于对社会起控制、协调作用的那些人的全方位示范和熏陶，并取决于“吏治清明”作为其规范的“硬件”来保证。否则，思想政治便是空洞的说教。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困难。特别是当面对建国后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误解、滥用所产生的那些后遗症的时候，要打“翻身仗”，确实不容易。但这个“翻身仗”必须“打”，也一定要“打”好。不要忘记，中国革命就是从一次次失误或挫折中翻过身来，才走向胜利的。过去如此，现在、将来亦如此。这也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难以摆脱的一条唯物辩证法则，所不同的只是形式，而不是质。过去，我们在枪林弹雨中打“翻身仗”，生死存亡；现在则面对的是列国纷争、文化对抗，是在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争夺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激荡中打“翻身仗”，性质也是“生死存亡”，尽管它不表现在肉体上。

鲁迅在 27 岁时写过一篇题为《破恶声论》的文章说：“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人。”循此思路，也可以说，失

“信”，则失“心”、失“人”，乃至“误国”，重提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恐怕也正在这里。

2000 年 11 月 19 日

宁无愧乎?

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广东增城一私营皮具厂大火,烧死工人20人,距10月6日广东太和镇一私营工厂的16名女工被活活烧焦只有20天!

在我的记忆里,类似这种本不该致无辜葬身火海的事,已不止一二次。如去年福建晋江某私企大火、浙江温州某私企大火,都是以数十工人的丧命而震惊全国。其原因,也如出一辙,同样的“三合一”厂房,同样的上班锁门、下班搜身的“全封闭管理”与同样的不具备消防设施、麻痹大意,致使一群群年轻生命在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情况下,梦断他乡!

“死者已矣,生者夫复何言哉”!我不想说这是为了追求高回报率而置工人生命安危于不顾,也不想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的论述去“上纲上线”,但我奇怪,相当的此类消息为什么总是对财产损失报道不厌其详,而对人员的伤亡却只在最后寥寥数语便一笔带过呢?可是,两千多年前,

当孔子得知皇家的马厩失火时,却只问人,不问马!

高唱今胜昔的人早把先人留下的价值判断准则置于脑后,而诚实本分的劳动者却在大声呼唤道德与良心,我耳边似又响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但这对于那些连末梢神经也已被钱所麻痹的人来说,不啻为对牛弹琴。生正逢时,谁叫我们赶上这唯“财”是举的年代呢!加之,“转制”不可能一步到位,法制建设又不可能一下子便跟上来,而社会也不可能是一潭清水,“水至清则无鱼”嘛!所以,呼唤归呼唤,我们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人:他们既不像张牙舞爪的狼,与人不共戴天,也不像离了腐败便不能生存的蛆,让人深恶痛绝,从某种角度讲,他们倒有点像那些忙忙碌碌的蚂蚁,勤勤恳恳地向道德挖掘财富,兢兢业业地损人利己,尽管有着常人不及的苦干精神,但在法律的空档里却也游刃有余!良心被花言巧语取代,人格让位于脸厚心黑,追问理想,则只有一个字:钱。于是,当此种行为方式被社会接受,变成社会共识与社会的行为主体的时候,一向诚实本分的劳动者便有了生存的危机!

诗人北岛有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尼采也说:“上帝死了!”信不诬矣。然而,我们终究是要面对历史的,而历史却只能由一个大大的“人”字写成。想想吧!当我们的子孙去写今天的历史也不得不用马克思 100 多年前描写工人生存状况的那种语言时,我们宁无愧乎?

2002 年 2 月 20 日

傲骨与傲心

“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这话有人说是徐悲鸿讲的，有人说是鲁迅说的，近读清人张潮之《幽梦影》，方知是他讲的。他还说：“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则不得为君子。”读后，真叫人有如饮甘泉之感，神清气爽。

何为傲骨？即孟子所说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骨气、正气！这种“气”，我们在孔子的身上看到，他在那个春秋乱世，“知其道不行”，却依然不避艰险地游说列国，以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生理想；我们在司马迁的身上看到，他把满腹郁结化为发愤著书，当一部 52 万余字的“无韵之《离骚》”终成“千古绝唱”的时候，谁能不由衷地敬佩这位血性男儿的骨气呢？实际上，这种“气”，代代都有。如“耻为五斗米折腰”之陶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李白，“仰天长啸”之岳飞，“时穷节乃见”之文天祥……。在近代，我们则从闻一多那“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壮烈中，从朱自清那“宁可饿死也不领

美国‘救济粮’”的寒士身影中,从鲁迅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清啸中,从叶挺、恽代英那“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悲壮中,不都也看到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之气么?

所谓傲心,即那种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盲目自负的浅薄浮躁之心。这种心态,往往把拉长的影子当做自己的身子,妄自尊大,蔑视一切。在历史上,如霸王之孤高自傲,如杨广之骄奢淫逸,如慈禧之飞扬跋扈,如蒋介石之专横霸道,均属此类。在我们的同志中,则主要是那些源于哲学贫困症的一意孤行者。这种人,满脑子形而上学,不辨“黑格尔”与“黑木耳”有什么不同,但却敢向一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挑战。每当这种同志聚而成阵的时候,那便在他们所领导的地方不是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雄心壮志”,便会出现什么“强行起飞,超常规发展”的“活跃局面”;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便要跑步“转入市场经济”。流弊所至,于是便有了见木不见林的“一刀切”、“一哄起”、“一窝蜂”地上;便有了这个“热”过那个“热”,动辄全民皆“×”的形式主义;便有了不顾子孙后代的环境污染与掠夺性的资源破坏;便有了以“搞活”为名的“闯红灯”、“打擦边球”、“走政策边缘”的胡闯蛮干;便有了不问青红皂白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便有了不容分说的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与此同时,便也有了廉价的吹牛夸大;有了以“公关”为名的贿赂公行;有了对种种腐败现象的睁一眼、闭一眼;有了以“发展”为名的公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犯禁……总之,一句话,当主观唯志论所衍生出来的那个傲心横行于世的时候,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便要退避三舍!

傲骨与傲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天壤之别。傲骨为民如“幽兰”,为官如“青松”,不为流俗所羁,不为名利所陷,不为困厄所屈,不望风顺旨,更不会屈道以媚时。如梅尧臣诗:“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傲心则恰恰相反,为民如“浮萍”,随波逐流,玩世不恭;为官则如天之骄子下凡,唯我独尊,专横拔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当然也只能为那些有骨气的刚正不阿之士所不齿!

1997年5月11日

警惕霸气

一则“灰色新闻”让人沉思不已！

《羊城晚报》报道：锦州市纠风办于去年 10 月检查公车迎亲时，工作人员把该市国际俱乐部大酒店门前 6 辆迎亲车中的一辆奥迪拦住，要司机出示证照，司机不睬，车上坐的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刘信久气势汹汹地走下车来说：“把苗和顺（市监察局长）叫来，我跟他说！”交警刘志成插话：“如不出示证照，就按规定取下车牌。”与刘副部长一起的市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刘玉和当下就给了交警两拳，司机也从背后同时踹了交警两脚。监察员刘克军在奥迪发动时继续上前去拦，竟被车顶出 3 米多远。更令人不解的是，此事发生在锦州，数月后却在广州《羊城晚报》上曝光，随后又被上海的《报刊文摘》摘转，《中国青年报》也于最近发表了署名“金陵客”的短评。可是，却始终未见报道其查处情况。

一个清晰的事实呈现出来：刑上“大夫”难；一个清晰的现象折射了出来：民心不可违。你看，那威武不屈的交通

警,那临危不惧的监察员,那些站在他们后面的编辑、记者,还有那位“金陵客”,不都反映了民心所向吗?

我总想,当官的作威作福,下面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这种事,自古以来,在所多有。像欺凌孤寡的张驴儿,横行霸道的卢世宽,纵奴行凶的衙内,炙手可热的贪官,攀龙附凤的无耻政客,欺上瞒下的“假大空”等,大概不到共产主义不会绝迹。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丧失警惕。古往今来,政权腐败乃至政息人亡,莫不先从干部的变质开始,如果听任某些人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无动于衷,那便是“自毁长城”!

刑上“大夫”难,不在法制健全不健全。就拿刘信久这一伙来说吧,一纸“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便可先将他们拘留起来。可为什么就是没人敢管呢?

“刑不上大夫”,也不完全是权大于法。倒退 40 年,毛泽东同志杀了张子善、刘青山两个高干,便使一切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基本上保证 30 年没有贪污盗窃方面的大要案,难道那时就法大于权?

三百多年前,毕生关心人类思想困惑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及权力问题时,便忠告掌权者“不应当滥用这种特权干预法律”。说“尤其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怎样蜕化的”。写了一系列反腐小说的作家周梅森则讲得更深刻,他说他在挂职担任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会儿,有次开车出行于无意间冲出了红灯禁行的底线,当即被警察拦下,但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是,那警察伸出阻拦的胳膊忽地于瞬间又变成了敬礼放行,原因是那警察又从车牌的数字上发现他所驾的车是市政府的车。他一下感到震

惊,但随即又感到难过。他说:“什么叫特权?这就是不受公共规划制约的特权,这样的特权让人舒服,也让人害怕。”因为“一个人的堕落,首先是灵魂的堕落,然后才表现为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堕落。而且,很可能就是从闯了一次红灯开始”。

不过,要我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要看权在什么人的手里。近几年,我们一些地方有个耐人寻味的提法:“启用能人。”但何谓“能”?并无明确的定义。而所谓的“启”,则无非是“围绕票子配班子,配了班子搞票子,搞不来票子换班子”,致使一些政治素质不好,甚至是劣迹斑斑的人钻进了领导层。有的地方,则要的是那些所谓“顺手的能人”,既会拉关系,会跑路子,且在领导不好说也不能说的那些事情上心领神会,能够“打开局面”的人。所以,当这种人当道之后,一个地方或单位的权便与上上下下的“关系网”结合到一起了,盘根错节,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可在那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关系网”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使某些人养成了凭借自己的权力与“关系”敢于横行无忌的霸气。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对照某些地方的现实,我想,重温一下伟人的教导,也许会大有裨益!

1997年8月10日

苏哈托与梁武帝

苏哈托与梁武帝,相距 1450 年,风马牛不相及,但两人的兴衰乃至垮台却有着惊人的类似。

梁武帝萧衍,公元 520—549 年在位,原为齐之雍州刺史,乘齐内乱夺取帝位后,以权力家族化巩固其统治,把自己的兄弟、子侄派往各重要地区掌权,并以纵容腐败来换取统治的稳定。结果,他建立的梁朝却在他的手中夭亡了!史载:此公“长于文,通乐律”,且“自奉甚俭”,“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从不饮酒,只食豆类蔬菜”。然而,他对下面的腐败却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以为如此便可换来对自己统治的效忠。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有库百间,以 30 间存钱,每间一千万,但他不问钱的来源,却说他六弟会过日子。有个叫鱼弘的郡太守贪婪成性,人称其属地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黎庶尽。”他听了却一笑置之。公元 549 年侯景军乱起,将梁武帝困于台城,他的兄弟子侄带来数倍于敌的兵力却不与敌战,整日在城外饮酒作乐,静

待其死后取而代之。

苏哈托,原为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1965年乘当时的经济危机推翻总统苏加诺,登上权力顶峰。32年来,他以裙带关系巩固其统治,以腐败为代价换取经济繁荣,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72美元增长到940美元,但官场上的腐败也早已使国民怨声载道。苏的长女,在内阁占据重要职位,大半内阁成员都与其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苏氏家族,普遍享有特许经营垄断行业与优惠税收的特权,聚敛了高达400多亿美元的财富。去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印尼的泡沫经济不堪一击,货币一下子贬值了80%,一个工人的月薪只够买20公斤大米,失业人口骤然增至1350万,外债高达1400亿美元。而此时苏的女婿的军队又在特里萨克蒂大学打死了6名学生,遂引发了波及全国的骚乱,从而也使这位曾被世界银行称为“好学生”的“印尼建设之父”,遭到了包括其一手提拔起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兰维托等一伙亲信的“逼宫”,他也只好“辞职”。

权力家族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内在的必然要求。发展到近现代,其变种便是以“任人唯亲”为主要特征的权力结构“关系化”,以门第、帮派、地方宗亲等关系的亲疏远近论取舍。历史上一些短命的封建王朝大半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被赶下历史舞台的,而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变频仍,今天你上去,明天我下来,也大半是这种恶性循环所致。

1998年10月11日

闲话女性美

近几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美,已经是一种时尚。特别是女青年,敢穿敢戴敢化妆,花枝招展,五色缤纷,这与过去那种毫无女性特色的社会景象比较起来,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社会进步。

但是,由于盲目从众,只求自我感觉好,有的也把自己搞得反而不美了。走在大街上,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便可发现:千篇一律的大白脸,白得凄惨;不顾自身条件的人造双眼皮,瞠目凸珠,让人生畏。有的盲目模仿影视模特,奢金靡玉,珠光宝气,结果,“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何为美?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者美;杜甫说:“非由述作,发其自然。”可见,美在朴素,美在自然。这种美,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美容师无法用人工矫揉造作做得出来的!

我国是个十分注重审美的国度。早在二千多年前成书

的《诗经》便有“窈窕淑女，静女其姝”的诗句，着力推崇那种淡雅贞静的女性美。稍后的《楚辞》，屈原仅一句“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便将那红妆素裹、顾盼流媚的《山鬼》推到了你的眼前，让你在审美的愉悦中回味无穷。可以说，《诗经》、《楚辞》所体现的这种重朴素、重淡雅、重神韵、重自然的审美观，实际早已融入我国人民的生活情趣之中，成为传统的审美标准。

因此，真正的美，还是内在的气质美。写过《三都赋》的左思说：“美物者，贵依其本。”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也正如当代某诗人说：“美是发自内部生命的光。”即使长得不大好看，只要内部生命之光强大，同样会美得深刻、高雅，风韵袭人。战国时期的著名丑女无盐，“四十悬嫁不售”，因国事见齐宣王，竟以自己的知识和口才令宣王倾倒，被立为后。后人说她虽然长得丑，但“流盼发神韵，言谈吐芬芳”。可见，真正的美是知识、智慧与德操的修养，及从这种修养中所升发出来的气质。是一种“心灵美”。

当然，我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外美浓艳而芳名远播的女性。但她们也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而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昭君、西施、杨玉环等，却成为历代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讴歌不断的艺术形象。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她们的外美也充分蕴含着内在的气质美。要不，“多才艺、善史书”的汉元帝，“性英武，通音乐”的吴王夫差与“邃晓音律”的唐玄宗怎么会把她们视若知音呢？

美，是一种境界，有丰富的内涵。

美，是一种力量，但美得不当就破坏了这种力量。

美,能唤起爱,但外美的浓艳却只能唤起凡夫俗子的低级趣味。

所以,古人说:“妇人之所以事失者,色也!”

追求美,是人之常情,是对自己的尊重与对别人的尊重。但要首先注重自己的德操与知识的修养;注重理想和智慧的追求;注重精神上的独立人格,珍惜自己的尊严,也许,这才是女性美的真谛与本源。

1995年4月16日

“文明之战”与战争的“文明”

伊拉克战争拉上帷幕。布什笑了,布莱尔也笑了。但那个头扎绷带、声嘶力竭哭喊着的小男孩,那直冲霄汉的硝烟,那些该死的、有如死神一般黑压压俯冲下来的 B-52,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世界真的是进入 21 世纪了。战火原来可以如此这般地轻易点燃,又如此这般地匆匆离去,如同看戏,又不像是戏,电视把残酷展现得真真切切,那些从未让人感受过的沉重、压抑,一起袭来。

《圣经》上说:“由于自大,人类失去上帝安排的乐园。”而这次战争却连一个令人信服的借口也没有。说是打击恐怖主义,但伊拉克却并非恐怖主义策源地;说是为了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至今也未找到伊拉克拥有这种武器的证据。当然,也有不同认识,今年 4 月 24 日的《南方周末》便有篇文章说美国这次在伊拉克的战争是“真正的文明之战”,而“文明的含义则在于赢得战争的不仅是飞机导弹,还

有美国认为应该向全球输出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精神’”。比不应事，文不称实，这就让人难以认同了。

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在我的记忆里，这战争似乎只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还未听说过什么“文明之战”，更何况是一场以强凌弱的征服。看看伊拉克这场“文明之战”吧！“文明”的导弹钻地 18 米，“文明”的 B-52 一个架次投弹 30 吨，“文明”的贫铀弹不要说其杀伤力，即使对土壤的污染也要长达几十年，这便是“文明之战”的“文明”！

萨达姆的伊拉克，无疑是与现代社会文明背道而驰的一个怪胎，萨达姆其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杀共产党人，杀库尔德人，杀什叶派穆斯林，杀一切不同政见者，直杀得伊拉克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谈不上有什么民主与自由。但伊拉克人的“解放”却只能由伊拉克人自己解决，而不能由他人越俎代庖。否则，包括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在内的一切新老殖民者的战争历史都应当重新改写，因为那时的强者也是打着种种维护与传播“文明”的旗号闯入那些专制、独裁、封建、落后的国家的，有何罪焉？

“民主”，正因为是民主才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做主；“自由”，也正因为是自由，才只有人民的自由而没有战争的自由。看伊拉克战争，我们决不能跟上那些有如解说一场股票交易或球赛似的分析走，因为伊拉克战争的实质，是美国为打造其不受约束的超级强权所进行的实战演习，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早已被颠倒，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强者手上的一块遮羞布！

我们知道，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文明的主题。但在美国看来，“北约东扩”是“文明”，用两个标准打压中东

的巴以冲突是“文明”，拿上“人权大棒”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是“文明”，以反恐名义动辄便把一些国家列入“黑名单”也是“文明”。这一期间，什么“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邪恶轴心论”、“无赖国家论”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及至去年9月五角大楼“先发制人”的战略出炉，布什“失言”反恐为“新十字军东征”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美国所要的“文明”便是曾使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陷入二百年战乱的那种野蛮的征服！一语道破了天机，但也为伊拉克战争所证明。

其实，要说是总统“失言”也未必，翻翻历史就知道，美国这种“杀鸡骇猴”、独步全球的蓄谋非自今日始，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1950年的朝鲜战争，细菌弹曾使朝鲜这个国家几乎人人面临死亡的威胁；1961年的越南，成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填补政治真空”理论的实验场，化学武器竟令树叶枯落，庄稼不长，得了怪病的人成批死亡。此外，在刚果、乌干达、阿富汗、安哥拉、索马里、巴拿马、南斯拉夫、危地马拉……有学者统计20世纪迄今的大小73场战争，几乎都或明或暗地与五角大楼有关，但炸弹却总在别人的国土上开花！

文明——一根脆弱的风中游丝，它总在强者的威胁与挑战之中；

文明——一个令人向往的美丽憧憬，但它却总是由强者的嘴里说出来才算！

伊拉克战争说明什么？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史虽然已走过了2000多年，但“强权即公理”的政治游戏规则没变，而战争出乎意料地得心应手，也必将进一步强化美国打

造其不受约束的超级强权的心理优势,为构建其治下的“文明”,会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进其“单边主义”,“胡萝卜加大棒”,动辄便“先发制人”,这恐怕才是我们这个世界将要面对的最大危险。

2003 年 10 月 28 日

讽喻诗录粹

30年代鲁迅先生的《补天》、《出关》等故事新编寓古讽今，今人也以古诗新编的手法针砭时弊，令人怵惕。现恭录其佳作数首，以飨读者。

《七律·诵文化骗子》：“行骗江湖只为钱，花言巧语售其奸。‘征文’拟印《千家选》，要稿需邮四五篇。付梓贻君书一册，通函汇我款三元。孰知入海泥牛去，屈指经年讯杳然。”（见《同心》杂志 1995 年第三期）

令人叫绝的是诗人易和元戏仿唐人刘禹锡《陋室铭》写的《陋官铭》：“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这个衙门，唯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谈笑有心腹，往来无小兵。可以搞特权、结帮亲，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青云能直上，随意显精神。群众曰：‘臭哉！此人。’”（见 1992 年 8 月 1 日《甘肃日报》）

不过，大量的精彩之作还是那些讽喻公费吃喝的作品。等而上之的，如王尧戏改李清照之《如梦令》：“昨夜笑声依

旧,满案剩肴残酒。试问宴中人,却道:‘报销依旧’。知否?知否?莫令吏肥民瘦。”(见1995年8月5日《中国青年报》)。等而下之的,如李松奎写的一首类似古乐府的五言,虽稍逊风雅,但寓贬于褒,也堪称力作:“狼煞吃喝风,关键是治馋。治馋得治嘴,管嘴得管严。河北临漳县,真抓又实管。瞄准盘中餐,专治‘吃公款’。干部要吃‘请’,当场就立案。立案就曝光,曝光就丢脸。年终算总账,还要评‘馊饭’。够上‘大王’衔,就砸铁饭碗。官官相‘喂’者,个个叫他惨。若要想偷吃,发现连窝端。县设举报箱,满城都是眼。要说谁倒霉,高档餐饮馆。有的关了门,有的转了产。但愿在全国,多设‘整嘴办’。嘴巴管不住,哪有清正廉。”(见1997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类似的佳作,还有《诗刊》1994年第三期针对成都杜甫豪华大酒家写的一首七绝:“茅屋秋风万古传,楼堂新起草堂边。遥看酒绿灯红处,广厦千间不庇寒。”另外,《经济日报》1994年11月30日发表的陈四益先生写的五言绝句:“醉舞楼心月,欢歌扇底风。千金凭一掷。‘大款’本姓‘公’!”亦为佳作。特别是“‘大款’本姓‘公’”一语,让人拍案。

讽喻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不失风雅,而又夹有幽默,如仙人掌,有刺无花,亦如路灯,照亮黑暗,让人迷途知返。“摇木铎,采风于道”,以检查为政得失,“诗三百”莫不成就于此。现在是否有这样的专职人员?不知道。但我觉得从政者起码应有阅读的兴趣,以反思施政行为,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行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说:“有的放矢才是马列主义。”无的放矢呢?不知道是什么主义,反正不是马列主义!

1998年2月15日

“假”的沉思……

“打假打假，越打越假”；“上面打假不息，下面造假不止”；“上面质量万里行，下面假冒伪劣到处行”。面对“假”的猖獗和关于“假”的种种说法，我不时有着一些想法，但我不知如何表述这些想法，因为它有点像“谬论”。

假能根除吗？我持否定态度。因为人类至今还未找到能够约束住每一社会成员的那种制度，而人类又总是不乏一些秉赋特殊的人，当多数人靠辛勤努力获取果实时，这种人却总能窥到制度的疏漏，径直摘取果实。所以，这场魔道之争就不得不比人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

假的“因子”，源远流长。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假的勾当，商品中的假，只不过是其最现代的一种。从战国“鸡鸣狗盗”的小人弄假，到秦末“指鹿为马”的强权造假；从东吴误施“美人计”的弄假成真，到北宋“狸猫换太子”的弄真成假；从慈禧太后卖官鬻爵造假官，到北洋军阀贿选总统造假选票；从英帝国主义把倾销中国的鸦片诡称“福寿膏”，

到日本军国主义把侵略中国叫作“中日亲善”的弥天大谎……一个假字，贯穿古今。看来，只要人类不毁灭，这场魔道之争就还要继续下去，永无止息！

如今的假冒伪劣只限于商品吗？非也！比如像知识领域的“职称”泛滥，文化艺术作品中的粗制滥造，某些地方工作的虚报浮夸，乃至插足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网”等所产生的假冒伪劣，其实并不比商品上少，危害也不比商品的轻。有时我想，这人类社会的演进如果没有了假的勾当，是否也要变得呆板、苍白？不过，话说回来，当假的“因子”堂而皇之地行进在各个领域时，损失的绝不仅仅是物质，而是科学、技能、艺术、道德等整个人类文明的堕落！

制止“假”的蔓延靠什么？有说靠“法制健全”；有说靠“体制完善”；有说靠“转变观念”。对这些，我都持否定态度。这倒不是有意唱反调。因为观念是由存在决定的，风气是由人发生的，而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行体制又不能说就与各种“假”有什么母子亲缘关系，以致划不清政策界线，而误入歧途！至于说到“法”，恕我直言，我们现在不是没“咒”念，而是没认真念，如“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公款吃喝，“三令五申管不住两条腿”的公费旅游，屡禁不止的公款高消费，有禁无止的公车换代升级，以及《出版法》公布后的非法出版物依旧充斥于市，《教育法》颁布后在某些地方依然拖欠教师工资……如果说“打假”还不完全如此的话，那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实际都差“认真”二字，所以才有了商品上假的泛滥和“假”在其它领域的侵蚀、蔓延。这也许正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这是王安石的一句

名言。所谓“必行”，也就是那句官话：“认真贯彻执行。”因为王丞相在这上面吃了亏，所以他才有了如此沉重的感叹。可是，我们会不会在这上面也吃他那样的亏呢？值得深思啊！

1994 年 12 月 11 日

再说“真抓实干”

“真抓实干”这个提法，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口头、文件上不离它，盖因我们过去吃“假抓虚干”的苦头太多、太深之故。拨乱反正，痛定思痛，人们才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这金石之言：“真抓实干！”

“真抓实干”的“真”与“实”是态度，“抓”与“干”是行为，态度端正不端正，则直接影响着“抓”与“干”。比如焦裕禄，当年如果不是根据兰考地处黄泛区抓了大种泡桐这个“实”，而是追随当时到处都搞什么几大建筑的风，恐怕解决兰考那种历史性的贫困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再比如像孔繁森，如果不是根据阿里的独特资源抓了地热发电、硼矿脱水、羊毛梳绒、鱼骨粉加工等这些切合当地实际的发展项目，而是追随沿海，“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恐怕在那人称“世界屋脊之屋脊”的阿里，“凤”不会去，“商”也要望而却步。类似的事例，还有最近报道的豫东淮滨县，本是“洪水走廊”，直到1991年，人均收入也只有299块钱。可他们针

对水患种“冲不走的”(红麻、荻苇、湖桑、白拉条);养“淹不死的”(牛蛙、谷鸭、中华鳖);造“水上漂的”(钢驳船)发展水运,三年便使工农业产值与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增长3倍多。他们说:“这是把实事求是放到了首位,念活了地理经济学!”

可见,“真抓实干”还在“实”——“实事求是”。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抓的干的是符合当地客观经济规律的实、讲求效益的实、顺应民心的实,自然是抓得越真、干得越实越好。否则,抓得越真、干得越实也越可怕。

同样是搞改革,有的地方在转换机制、转变职能、调整结构、扭亏增盈上真抓实干,效益显著。但有的明明亏损单位一大堆,效益不佳,财政拮据,却乱铺摊子穷折腾,表面上干劲十足,实际上后患无穷。

同样是抓机遇,有的抓“开发区”,开而且发;抓“筑巢引凤”,“有凤来仪”。可有的圈地不少,却开而不发;“巢”也筑得很像个样子,却徒唤:“凤兮,归来!”

同样是抓“利用外资”,有的一项外资的引入便搞活了当地经济的全盘,可有的却把国外站不住脚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型产业当宝贝,引来了环境污染与精神污染的难题一大堆,反受其害!

故曰:“真抓实干”既要有革命的热情,还要有正确的出发点;要对党与人民的事业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不错,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其着重点是“一些”,前提是“看准了的”。这与那些脱离实际的一哄而起,形式主义的盲目从众,“一窝蜂”地跟着感觉走,乃至为了树“政绩”,

脑门一热就拍板的胡闯蛮干，根本不是一码事！

“思路决定出路”，这话无疑是对的。改革开放，不突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就一事无成。但这个“突破”既不是把别人的口号接过来，改头换面，也不是办公室里的奇思妙想，更不是某些人一时的灵感所至，出语惊人！而是来源于像焦裕禄、孔繁森那种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及从这种调查研究之中所升发出来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此，才能真正有“思路”上的“突破”与“出路”上的“创新”。

记得在那个“假大空”呵气成云的年代，毛主席曾有过“越是热情高涨的时候越要头脑冷静”的告诫。这个告诫如今是否过时？值得思考。“冷静”，不是不动，也不是失去思想的沉迷，“当天和尚撞天钟”。真正的“冷静”是清醒，是冷而且醒，是风口浪尖上的深谋远虑，是历史转折点上的缜密思考，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胆识，更是敢于实是求是、敢于对历史与人民负责的党性。当然，也只有建立在这种“负责”态度上的“干”，才是真正的“真抓实干”。

1995年10月8日

正气与勇气

正气——中华民族的元典精神,包含着我国文化传统中的许多美德。如以身许国的志气,嫉恶如仇的侠气,“穷且宜坚”的骨气,“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侠义之气,“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之气,“不屈道以媚时”的阳刚之气,“不为流俗所羁”的刚介之气,以及一诺千金的忠信之气,肝胆照人的坦荡之气,恶名远利、无私无畏的大丈夫气……,均属正气。但这些都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作为基础,否则便都是冲动一时的“闲气”。

正气——正直坦荡、公正无私、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勇气,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党的光荣传统。这一点,我们从屡遭排挤、临危受命的毛泽东身上,从忧国忧民不忧个人的周恩来身上,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身上,从敢上万言书、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及其他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党之所以在旧中国那漫漫长夜

终于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靠的就是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勇气;在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之所以能从失误或失败中端正航向,走向胜利,也靠的是这种精神和勇气。但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庸俗“关系学”的泛滥,“好人主义”盛行,坚持真理的正气在某些地方正让位于“讲面子不讲真理,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的歪风邪气。据说,“上级对下级哄着,下级对上级捧着,同级之间包着,班子里的问题捂着、盖着”、佯装糊涂,如今已被某些人当作“最高明”的处世哲学与领导艺术。在一些单位,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演化成“附议制”,“跟风扬场”,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反正是一把手说了算,自有一把手负责;而起着互相监督、自我修正作用的政治生活制度,则早已走向形式化、庸俗化:“自我批评谈工作,互相批评谈希望”,有的,“自我批评自我标榜,互相批评互相吹捧”,既无坦诚的思想交流,又无积极健康的思想交锋,一团和气,一潭死水,一旦爆发,便闹得乌烟瘴气,这就很难再讲什么正气了。

从思想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当前干部队伍中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克服,与其说是反腐败的力度不够,还不如说是党在思想战线的战斗力涣散,党的光荣传统——坚持真理的精神被严重削弱的结果,“讲正气”,恐怕也要从这上面去抓。特别是要看我们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一把手)敢不敢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传家宝”,重振党的光荣传统:讲真理、讲原则、讲党性。苏洵在其《用间》一文里说:“正,至公大意为之正。用心于正,则一振而群纲举。”这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领导同志把“心”用在“至公大义”——党性、原则、

真理上面,严格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才能“一振而群纲举”,整个班子与全体党员才会把心里话讲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扶正祛邪,并进而使全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1999年8月13日

“数字打假”该动真的了

“上面要,下面报,准不准,天知道”;“统计跟着任务转,数字跟着需要变,一级一级往上编,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反映了人们对虚报浮夸的忧虑,也道出了对“数字打假”的呼唤!

安徽省去年发现 960 多个单位虚报收入。淮北市的乡镇企业局,为争“全省二十强”,虚报产值 2 个亿;宿迁市的一个南关办事处虚报收入一个亿。(见 2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与 5 月 31 日《法制日报》)

湖南省去年查出虚报 6 万件,其中仅小岗粮库等 3 个单位便虚报亏损近 1 亿。该省统计局法制处长宋今来说:“保守估计,全省虚报也有三分之一。”(见 6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许多人以为产值、利润、亏损可能虚报,那么已经入了库的国税该是实打实吧?但有的地方税收竟已收到了 2000 年!”(见 1998 年 6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官出数字”。8月上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的陕西榆林地区子洲县裴湾乡万余农民状告乡政府,便是因为乡长与县农调队长把该乡300来元的人均收入报成600多元,使农民负担也“水涨船高”,增加一倍,而闹得沸沸扬扬。

“数字出官”。湖南省对衡山县东湖镇两个企业抽查,产值虚增1000万元,虚报40%,要县上查处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负责人,但这个“有关负责人”竟于工作组走后升了官(见6月17日《中国青年报》)。群众说:“用活统计数,为吹服好务。只要能升官,敢报神仙数。发展赶××,增长高速度。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害了老百姓,又把国家误。”

正因为是“官出数字”,在当前的种种打假活动中“数字打假”成了最难打的假;正因为是“数字出官”,在虚报泛滥的同时也刮起了自吹自擂的浮夸风。其典型人物便是那位闻名全国的大贪污犯、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他敢向上面吹他“一年干出来一个莱芜”,向下提出“统计要为政治服务,不换数字就换人”。结果,造就了一批惯于见风使舵、精于溜须拍马、敢于吹牛撒谎的干部,也使跑官要官、花钱买官、造假骗官、吹牛升官的腐败风气盛行,几乎使泰安市的班子“全军覆没”。

“虚报浮夸”,不会给社会增加一分物质财富,也不会给国库增加一分收入,更不会给下岗职工送去一分温暖。当然不是什么事都要和下岗职工联系,但因为客观毕竟有着那么一个让人牵挂的事实,便不能不构成我们想问题与看问题的情感背景。也许,任何一级领导干部都无法解决下

岗职工的问题,而路也毕竟要自己走,但任何一级干部都不能无视他们的情感反映。要知道,那些异彩纷呈的“肥皂泡”对于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来说,绝不仅仅是秋风过耳,而是要引起鄙夷,嗤之以鼻的!

现在也许还不到谈论什么“共渡难关”的时候,但现在需要实话实说,而也只有实话实说才能取得人民的共识。

“数字打假”该动真的了!

1998年11月1日

小议认钱与认权

闲翻报纸,忽然一语醒目:“认权不如认钱”,不禁为之一震!客观地讲,此一说法久矣!但令人奇怪的是现在有些人竟说什么“认钱”可使“后门”、“特权”、“关系网”自然消失,进而便推理出“认钱”可敌“认权”的结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异议了!

我们知道,“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现象是伴随经济体制转换中的“暂时无序”所发生的。在这个“暂时无序”期,一方面是利益原则必然要使企业本能地去寻找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尚未掌握资源配置的全部大权,又使企业不得不去找那些尚未脱离资源配置职能的政府主管部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便使这些单位、部门的某些意志薄弱的掌权者有可能把权力“商品化”,滋生腐败。“权钱交易”这类腐败现象还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体制改革的深度、速度与反腐败的力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以为“认钱”便可“抑制

腐败”,便可使腐败这个社会痼疾不治而愈,则无疑于是心造的“太虚幻境”!

封建社会可以说是发明“认钱”的老祖宗,但那个社会也把钱与权编织得天衣无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你能说清这是“认钱”还是“认权”?

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把“认钱”发挥到了极致,但它也“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647页)在这片土壤上,人们确有平等的梦可寻,但平等的梦也总在钱的面前迅速破灭。“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就做推磨鬼”!至于他们鼓吹的“平等”、“自由”乃至所谓的“人权”、“法治”则都被钱搞得支离破碎!

诚然,严格地讲,“权”与“钱”都“不是好东西”。如果哪个社会还存在着“有仨钱就看不起俩钱的”与“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潜意识,乃至一个人的尊严、体面、社会地位都要靠金钱与权势来提升,来维系,那这个社会就少不了为金钱、为权势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的齷齪事。特别是在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转制与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某些人的利令智昏,“一朝权在手,便把钱来捞”,加剧了体制转换的难度,也造成了人民的愤懑,因而使人对“权”与“钱”的认识发生混乱。但如果幻想以“认钱”来抑制腐败,则无异于火上浇油,其结果也必将使“认钱”的更加“认钱”而“认权”的则更加“认钱”,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的权钱观,实际反映着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承认,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客观与环境必然要求人们要有新的观念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需要。但什么

是“新观念”，也要有个科学的界定。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而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找“家伙”，非此即彼，那恐怕就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了。要知道，我们社会中的“权”是无产阶级用几代人的鲜血换来的。它既非封建社会无限制、非约束的“皇权”、“王权”，亦非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平等掩盖下的那种事实上并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为了“钱”便不加分析地否定“权”，抹杀“权”的性质区别，那就十分有害了！

1996年2月11日

等价交换的异化

“等价交换”是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所进行的商品交换。由于商品价值不取决于个别劳动时间,所以,马克思说:“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1 页)可是,我们现在似乎什么场合都有“交换”。报载:上海一外地人向本地人问路,本地人说:“拿钱来,给你说!”北京一大款酒足饭饱之后在饭店大厅里手举 50 元大钞喊道:“听着,谁从我裤裆底下爬过去,这钱就归他了!”还有,某地一幼童落水,母亲急呼救人,围观者众,一人高声回应:“先说出多少钱?”读罢报道,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这些虽然都是“等价交换”的滥用,但若与拿权力交换造成的贪官、情感交换造成的孽缘、心灵交换造成的堕落、色相交换造成的失足、良心交换造成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侥幸于一逞的投机、冒险等欲望与金钱交换造成的走私犯禁来比较,不过是“小菜一碟”!

“等价交换”本来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都必不可少的一个经济原则。它所反映的价值规律,推动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资本主义社会也把“等价交换”投入到资本的“炼金炉”,造成“金钱拜物教”,结果,“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我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形成我们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对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第191页)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等价交换”亦如此。它有其“善”根,亦有其“恶”根。但社会的责任则必须是在充分有效地利用与发挥其“善”的同时遏制其“恶”。如果对其“恶”的发展无动于衷,那恐怕连强盗的杀人越货也要自认为是“交换”——用胆子交换财富。

我总想,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也许莫过于对“等价交换”的无知与滥用,而世界上最具欺骗性的伪善之举,也许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把“等价交换”美化得十全十美,并以种种美丽动听的言辞打动那些无知的人,用自己的灵与肉去搞“等价交换”!

1998年9月20日

又到九月九

又到九月九——毛泽东同志逝世纪念日。在缅怀伟人的同时,不知为什么竟又想起他的那个“六亲不认”的故事。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毛泽东家乡的亲友纷纷写信向他祝贺,有些人并同时向他提出了参加工作的要求。按理说,当时大片新区建政在即,各地政府又在招收人,他说句话,不成问题。可是,毛泽东同志却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了四个“不”: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有些老同志为毛泽东的亲友抱不平,觉得不要说他们在革命中的贡献,就是那些并不与毛泽东沾亲带故的老乡,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毛泽东头颅的恐怖时期,又有谁不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呢?但毛泽东同志却不这样想。他认为:“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说:“共产党人切不可拿感情来论事。如果和蒋介石一样搞‘裙带关系’,就会脱离群众,早晚要垮台。”

毛泽东同志的话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大胸

怀。当然,时代不同了,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要随着时代变。但千变万变,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党的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变,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没变。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更应该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那个“不拿感情论事”的原则立场,如果丢掉了这个基本原则,凭关系办事,凭感情办事,就等于丢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命根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单位,却什么都得一把手说了算。架空了集体领导,也架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民主监督机制,悄然消失。在某些地方、单位,不仅没有健全的民主监督,党内也没有党员群众的畅所欲言;班子里面小事不通气,大事不讨论、不表决,没有真正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没有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失去了党内民主,自然也就使某些领导者的个人权力无限膨胀,想咋办就咋办。“拿感情论事”,习以为常;以感情代替政策,有恃无恐;至于以个人的亲疏好恶来代替党的用人原则,更成了家常便饭。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毛泽东同志一进城便树立廉政典范的深意,大概也正在于“帅以正”天下吧!不过,光有领袖人物率先垂范看来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严刑峻法。尤其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使那些私欲熏心的“公仆”不敢胡作非为。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重温一下伟人的事迹,也许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1997年9月7日

难找“儒商”

也许是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常常听到人们关于“儒商”的呼唤。但是,何谓“儒商”?

“儒”,古代本是从“巫、史、祝、卜”分化出来专为贵族相礼的知识分子,后将孔子创立的学派称“儒家”,对崇信儒家学说的人称“儒生”,儒生而行医道者叫“儒医”,有知识、有理论的军事将领称“儒将”。但却没有“儒商”一词。

不过,古代虽然没有“儒商”这个词,却不能说没有“儒商”。如孔子有名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就是一位大“儒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即子贡不接受任命当官而去经商,每次都能猜中市场行情,所以发了大财。

在《史记·货殖列传》上与子贡并列的陶朱公也是一位大“儒商”。他原名叫范蠡,本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功臣,因勾践生性多疑,他便退出政治舞台去经商,提出“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无敢居贵。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

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等观点以指导实践,也发了大财。

还有一位辅佐齐桓公的大政治家管仲,在其未做官时也是一位大“儒商”。如其在《管子》一书中说:“无市则民乏”,“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他的这些观点,至今仍被商人奉为圭臬。

如此看来,“儒商”者,即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商人也!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看。因为有文化并不等于“儒”。作为“儒商”,起码不能吹牛皮,误导消费,要“信而有征”;起码不能搞欺骗经营,要“言必信,行必果”;起码不能搞恶性竞争,要“让以得之”。如果说有了这些德行才算“儒商”,那我们现在的“儒商”就很少了。

当然,“儒商”的稀缺也不能完全都怪商人。在一个市场秩序呈良性发展的社会里,讲商德、遵商道、守商法的商人是受到保护与鼓励的,而这种保护与鼓励的根本体现便是谁当奸商谁倒霉。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的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谁如果老老实实按照商德、商道经营,谁便处于劣势。除了税、费负担的额定要挨“偏刃斧头”外,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摊派、乱罚款,乃至某些执法人员的吃、拿、卡、要便不期而至。而一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骗了就跑的那些千夫指、万人骂的行径,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实际上也与当地腐败官员的保护、鼓励有关。“苛求君子,放纵小人”这就从根本上毁坏了公平、公正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让奸商频频得势。而奸商的得势和兴时,自然便也会成为一种导向,使愿做“儒商”的人越来越少。

1998年10月29日

“负性情绪”辨

某杂志有篇讲心理学的文章,说人的心理活动中有种“负性情绪”,危害很大,而最易产生“负性情绪”的人却是腐败分子。说巴西有个叫马延思的医生,曾对 580 名腐败官员跟踪调查 10 年,竟发现有 60% 的腐败官员死于种种不治之症,原因便是这些人违反了正常的伦理道德,经常处于恐惧、压抑的心理状态,刺激了自体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大量分泌,使白细胞的杀菌能力大大减弱,于是便要患病、死亡,云云。

我没有学过心理学,本不应对此置喙,但总觉这种“科学发现”经不起琢磨。至少,也与我们的国情相悖。比如慈禧太后,甲午海战一败涂地,竟还敢用保江山的银子——海军经费去修建供自己享乐的颐和园,可谓腐败极矣!但她却一直活了 73 岁,清史并未说她有什么心理上的毛病;明代的张居正,“每餐水陆珍馐百品仍嫌无下箸处”,自己坐的那顶 32 人抬的大轿,“内设厅堂、走廊、寝室,周围童子焚香

侍奉”，可谓腐化极矣！可此公也活了 67 岁，明史并未说他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健康；还有那个清代的大贪官和珅，抄家时家产估计白银 8 亿两，单红兰宝石就有 5 230 块，金珠宝首饰 28 000 件，他虽只活了 49 岁，但如果不是仁宗将他赐死，恐怕他比谁都活得滋润！

是不是我们的古人不懂心理学，史书上缺乏这方面的记载？非也。因为凡是腐败者，大都有其与正常伦理道德相反的一套价值观，自然便不会有什么伦理道德上的自咎，产生“负性情绪”。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吧，一些人不是一直在讲什么“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不拿白不拿，不捞白不捞”吗？有了“不白”这个“境界”，那一切公款支付的吃喝玩乐，一切的以权谋私，一切的贪赃枉法和一切鼠盗狗窃的勾当，岂不都会理直气壮，哪能再有什么“负性情绪”！至于腐败会诱发疾病一说，那恐怕也是书生之见。你看那些卷入腐败的干部，哪个不是大腹便便、营养过剩？中午半斤酒一下肚，什么细菌都杀死了！下午过罢了牌瘾，往舞池里一泡，黑头发飘起来，花裙子荡起来，什么“惆怅”都没有了，哪会生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本是佛家的因果论，想不到如今又有人把这一佛家思想打上“科学”的印记，行销于世了。这究竟是科学的“误会”，还是科学的“不幸”呢？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腐败分子绝不会自生自灭。如果我们眼见国家财富、人民血汗被那些腐败者侵吞下肚，却寄望于什么“负性情绪”导致其自行灭亡，那可就真应了那句流行的俏皮话：“骗你没商量”了！

1999 年 7 月 14 日

呼唤杂文

吴晓同志近以《时代需要杂文》为题,在《平凉日报》上对杂文的现状作了如虹之概括,指出了杂文的时代意义,振聋发聩,发人深思。所以,也使我想起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兹述于后,以附骥尾。

杂文的时代意义,大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才被鲁迅先生提了出来。他在“九·一八”后写的那篇《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即使是晚唐陆龟蒙、皮日休的《笠泽丛书》、《皮子文薮》中的小品文,也“并没有忘记天下”!他说:“生存的小品是‘匕首’,是‘投枪’”“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从此,杂文与时代——“天下”同步的意义便被确定了下来,而“匕首”与“投枪”便也成为杂文的活的灵魂,直到今天。

随着历史的推进与党在新时期的政策的确立,杂文的发展,波澜壮阔。但在繁荣的同时,恕我直言,有的也离开了时代,给人的感觉是“黄昏雨,袭来淡淡哀愁”!有的,则

是远离尘世的清高,孤芳自赏,一尘不染,杂文的时代意义被贬低了,这也许正是吴晓同志要大声疾呼“时代需要杂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杂文也需要时代。50年代的老报人徐懋庸,曾是杂文的一面旗帜,但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诚却被看作“向党进攻”,被打入了“右”册;60年代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也是杂文的旗帜,却被打成“三家村”黑帮。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同志讲:“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陈云同志说:“要有多种声音。”他们不是针对杂文讲的,但却带来了杂文的春天。如今的杂文,再也不会受时代的束缚了,可是,却面对了各种价值观念。当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念粉墨登场、大肆招摇之时,我敢说,杂文作者体内流的都是堂·吉诃德的血,但在下笔时却不得不颇费斟酌。独守寒夜,独对孤灯,他们以自己的心灵震撼拿起那枝沉重的笔,但同时也是在确信社会无意高估思想价值的情况下去投入那种“不识时务”的“文字游戏”的。“举世趋利,文人向隅”!这种情况下的杂文,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冲上去”,便是走进文人的“象牙塔”,为文而文,清高自诩,或发些小情趣上的牢骚,聊以自慰。不过,我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杂文也正是在那“一塌糊涂的泥塘里”产生的,它不会消亡。

杂文怎么写?我是门外汉,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我总觉得杂文之所以是杂文,就必须有其深刻的见解,新鲜的哲理,真诚的灵魂拷问,乃至能够直达读者内心的语言魅力。所以,苏格拉底对希庇阿斯说他“更清楚地了解了一句谚语:‘美是难的’”。

其次,说真话是杂文的生命。罗丹说:“在艺术中所谓丑的就是那些虚假的、做作的东西,不重表现,但求浮华、纤柔的矫饰,无故的笑脸,傲慢自负——一切没有灵魂,没有道理,只是为了炫耀的说谎的东西。”而鲁迅先生则说得更明白:“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当然,杂文也要讲美学意境,但杂文的美学意境却是杂文作者激扬的心灵与精神的诉求,而不是傍市场,跟潮头,目迷五色,面面俱到,把自己变成附属于新闻报道的传声筒,“一地鸡毛”!

杂文,是文学家族中具有特定性的一员。它的“特”就特在与时代同步,有时代的气息,反映时代的正气,是时代“感应的神经”,在时代激流的漩涡中为民呐喊,为时代的正义鼓与呼。所以,时代离不了它,它也需要时代的容纳与呵护。正如吴晓同志所言:“时代需要杂文,不仅表现在时代还有时弊,更深一步讲,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1996年12月15日

商品市场“疲软”析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商品市场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疲软”现象。至1996年,乡级以上工业企业积压的商品库存加上商业库存,已逾3万亿元。“北京120余家大中型商场销售量下降60%,利润下降70%,去年头5个月,一半以上的大中型商场销售出现负增长”(见8月12日《中国经营报》)。“湖南某市17万户个体户中停业、歇业7万户”(见7月22日《中国青年报》)。率先进入中国流通业的日本八佰伴集团社长和田正光惊呼:“在中国的事业面临严峻考验”。(见9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商品市场“疲软”的原因,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流通环节不畅,高档商场与用于招商的出租商场发展过热,消费走向多元化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尚需假以时日等,这些业已形成共识。但是,不知是有意无意,反映在这上面的消费心理因素,却往往被人忽略了。如今的消费者,之所以面对撩人心欲的商品不愿轻易掏腰包,盖因这些年存在于商界的欺

骗性经营已经把人们搞得不敢轻信了！狐疑满腹，犹豫寡决，货比多家，惟恐上当的思想，几乎是消费者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什么假烟、假酒、假食品，冒牌服装假饮料，涉及生产的假汽油、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关系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假药、假营养保健品等，无不到处有售，稍有不慎便使自己辛苦积攒的几个钱被人轻掠而去。试问：长此下去，能不使消费者疏远商家吗？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商业行为的混乱已经由于商业活动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而造成某些相关领域的理想丧失，行为失范，只重眼前实惠，弱化精神追求，直至灵魂被彻底物化。可以肯定地说，近几年暴露出的诸如印制假钞、假发票，造假学历、记假账，虚报产值与人均收入搞假政绩，施工承揽搞假招标，质量验收搞假鉴定，某些执法人员庇护造假嫌疑人搞假调查、取假证、假结案，某些行政监管与经济管理人员“雁过拔毛”、“不给好处不办事”，以及什么假评比、假金奖、假集资、假办学、假招工……等，莫不与商界的消极影响有关。

一个社会，生出这样那样的丑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丑行蔓延与不能有效遏制。那种认为商品市场便是物与物的联系、交换和自由发展，无须道德与法的规范、约束，显然是误解。这不仅要造成流通领域的混乱，同时也要导致恶性竞争，并由这种恶性竞争生出许多污秽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讲，激活商品市场也有赖于反腐败。要知道，没有一个闪射人文精神的清正廉明的经济环境，便不可能有商品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转，并进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建成。

1998年4月19日

腐败分子的特征

闲翻旧报,忽从近年披露的贪污分子的劣迹中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东西,无以名之,姑曰特征。兹录于后,以飨读者。

一曰贪官大多不忘以清官自许,高喊反贪。如首钢原北钢党委书记管志诚,捕前还在做反腐败的动员报告,大讲“十不准”;大贪污犯、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反腐败的动员会上竟能讲出“钱,是两个执戈的卫士守卫的金,伸手必被捉”!

二曰贪官大多不忘以清官“包装”自己,神气活现。如山西汾西县的孟永明,曾因贪污被以不追究刑事处分作过有罪判决,但随后便以重金贿赂原县委书记郑泽生,当了反贪局长;众所周知的王宝森,曾经是北京市反腐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还是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的副主席。

三曰贪官大多手长八丈,坐纳四方贡品,广收八方贿赂。其典型人物便是福建闽侯教育局的那位林局长,在收

受的众多礼品中竟有上好的柏木棺材一具。据送礼人交代,之所以“出此下策”,是“人家什么都有,但又不能不送”。

四曰定调子、捂盖子,“此地无银三百两”。“泰安市委是廉洁的,泰安市政府是廉洁的,泰安市的局以上干部是廉洁的,泰安各县市委常委是廉洁的……”这是胡建学在传达中纪委精神的全市干部大会上讲的,斩钉截铁。可这个“无鼠市”竟被中纪委挖出包括胡在内的5名地级10多名县级贪官,30余人被捕,轰动全国。

五曰“色迷心窍”。贪官多为好色之徒,广为人知者如陈希同、王宝森建豪华别墅“金屋藏娇”;鲜为人知者如江苏邳州岱山乡的乡长聂树祥,竟也修了一座岱山宾馆养姘头。

六曰“横眉冷对千夫骂”,笑骂由汝,“俯首甘为‘大款’牛”。其实,何只为“牛”!四川简阳市的“大款”张某酒后与人打赌,说:“简阳最大的官不是王善武吗?可他在我跟前不过是条狗,我叫他啥子时候来他就得啥子时候来!”说完便拨了电话,结果这位王大市长还真果真按时来了。你看,这不比“牛”要“可爱”得多吗?

七曰“败家子踢家”——大甩卖、大批发。《经济日报》5月6日报道某地一采金大户以1200万元便购得国家一储量6至9吨、价值6亿元的金矿开采权;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与外商勾结,竟将1.2亿元的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工人日报》2月10日报道,山西寿阳县木器厂职代会四次讨论实行股份合作制,但县上却以80万元低价将该厂卖给了原厂长弓凤华等等。此外,如以“开发”为名贱卖国土,以“引进”为名高价收购境外淘汰的生产设备,借“改制”之机对资产评估人为地压一块、让一块,再以种种借

口让法人吃一块的行径,实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贪官,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之一种。但也是种种丑恶的总靠山。世上的丑恶尽管源流不一,形态各异,但一有了贪官肆虐其间,那便万恶归宗,无复言治矣!

1998 年 12 月 13 日

经济管理有无道德率?

去年,我国经济界倒了两位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是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另一个是宁波引发集团董事长陈银儿。前者贪污受贿数额巨大,后者将一家乡镇企业变成自己的私有企业。记者在报道中不无感慨地问:“我们的经济管理还有没有道德率?”

经济管理有无道德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工作毕竟是由人来管理的,而人的道德素质(或曰思想觉悟)则绝对制约着人的行为方式。近些年,我们片面呼唤“能人”,使一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混进了经济管理的领导层。后来,又强调给企业“放权”,让企业成为有充分自主权的独立法人。这当然反映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也卓有成效。但由于权力监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与解决,就使得一些人把“企业自主”等同为“厂长经理自主”,一切都是个人说了算,党的领导形同虚设,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名存实亡,这怎么能不出问题!

制度是重要的,但道德是永恒的,由人设计出来的制度,难免存在薄弱环节与漏洞。当一个企业被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所掌握,而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一切制度便都成了一张废纸。尤其在现实中国,要真正当好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容易。既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又要有组织生产、策划营销、开拓市场的工作能力,还要有协调各方、攻破各种关口的办法。干砸了,没人理你;干好了,便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不论是哪方“神圣”,都得小心伺候,否则,不是“东山上卧云”,便在“西山上下雨”,让你哭笑不得。此种苦楚,对于道德素质高的人来说,是“打碎牙往肚里咽”,负重前行。但对那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来说,却有了可乘之机。因为只要疏通了各方面的路子,钻进各种“关系网”,那他自己便也有了胡作非为的胆子与本钱。

一方面是无监督的利益诱惑,一方面是带有很大风险与个人投入的负重前行,何去何从?全靠厂长、经理的个人选择。这就很难使经济管理中的道德率得到保证了。列宁曾说:“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实际亦如此,靠个人的操守、品质对抗腐败,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看,如果不给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这匹“野马”拴上“笼头”,那我们的反腐败也可能就反不胜反了!

1998年3月10日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坚持“两手”都要硬

“两手抓”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 1986 年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当时他讲的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989 年 6 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讲:“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1992 年经过南巡,他才把“两手抓”定位到“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精神层面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生价值观的截然对立,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曾经由于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那“一手”软,致使一些丑恶的东西在思想混乱的同时迅速膨胀,也使社会道德的堕落与社会公共权力的腐败发展、蔓延,影响到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成为人所共愤的社会问题。

那“一手”为什么硬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认

识上陷入几种误区,则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一是“自然论”。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精神文明“自然会上去”。其理由便是亚当·斯密说的“当经济发展了,人就会实现由‘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过渡”。但他们忘了亚当·斯密的另一句话:“追求金钱名利若超过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的堕落便不可避免。”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有一套完整的为其服务的价值观念的,这套观念的总名词即“功利主义”,在社会学上叫“工具理性”或“工作伦理”。所以,对于企业与个人,我们提倡追求合理的利益与效益。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或“工作伦理”的天然属性,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加任何引导与限制,任令这种“属性”体现到整个社会生活,导入上层建筑领域,变成无所不在的行为方式,那便对社会的伦理、秩序乃至上层建筑的法制与政治生活中的原则、政策、法令、法规等都要形成一种可怕的威胁与冲击,使“社会的堕落不可避免”。而我们现在已经或正在“自然上去”的,也正是这种可怕的“威胁”与“冲击”。这恐怕连“自然论”者自己也始料未及!

二是“先后论”。认为两个文明虽然要“两手抓”,但“发展是硬道理”,自然要“先抓”。这种说法显然是既不理解“发展”,也不理解那个“硬”。其中道理,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1月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上便已讲清。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这说明,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同步“发展”,所言之“硬”,则是包括“有可能变质”在内的那种“硬”。这不是“上纲”。因为“两手抓”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方

法问题,其本质,也是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双向运动”。这里,“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虽然“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但若没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没有来自“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建设,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制约,经济的发展也要偏离方向,乃至“变质”。严格地讲,物质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精神文明的长期积淀,任何偏顾一头的做法都会给改革与发展带来危害。

三是“代价论”。认为要追求效率与效益,就不能不牺牲公正与平等。有人甚至引经据典,主张走西欧早期工业化的道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完成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实现“现代化”。

什么叫“原始积累”? 概略地讲,它是指“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剥削阶级通过对农民、小生产者和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而进行的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为无限度地追求财富的增长而造成多数人的贫困、愚昧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这种代价背后也积累着人类本身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然而,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代价不仅是暂时的,也是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所特定的。代价的选择,要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上,要有其历史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的合理性。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推翻“三座大山”这一历史进步的基础上来搞现代化的。而这个历史进步的标志便是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才争取来的那种对社会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关注。如果以舍弃这种“关注”为代价,走回头路,那不仅不现实,恐怕也早已为屈

辱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所证明：“此路不通！”

四是“对立论”。认为抓精神文明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得要精神文明“让路。”这种把两个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体其实是人。我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但正确的思路却只能来源于人的文化素养、理论修养与实践经验的积累,没有这些东西打底子,便不会形成个好思路,也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为什么我们工作上脱离实际的盲目决策总是屡见不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人文素质与政治素质不足,价值取向走偏。

毛泽东同志曾对物质与精神的作用与反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可惜!这一思想在空话大行其道的“文革”期间,竟被畸形发展为“制造精神原子弹”,停产停课去搞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把经济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也给机会主义者的政治投机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动辄便以革命的名义整人,使不少人至今视精神为“空虚”,只有物质利益为“真”为“实”,这就给我们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历史的阴影与艰难。但是,若由此便知难而退,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只抓物质,不抓精神,那恐怕就使我们刚从“唯意志论”里挣扎出来,又要陷入“机械唯物论”而不能自拔了!

1999年3月6日

“权”与“罪”

最近,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决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非法集资诈骗案,公司经理沈太福伏法,原科委主任李效时被判刑,人心大快,但也发人深思。1987—1993年,七年七名省部级干部被处理,犯罪无不有如李效时,权钱交易,贪而无厌,一齐倒在金钱脚下。如原海南省省长梁湘、原湖南省副省长杨汇泉、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尔提·沙比尔、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张辛泰等,莫不如此,有道是:“杀人何必定锱铢,钱以刀名即巧屠。”不知这些贪官如今可有如此顿悟?!

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讲过:“从类人猿到人要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却往往像蝉蜕壳一样容易。”“权”与“罪”也是这样,只在一念之间。权力的背面其实就连着风险,连着罪,权力有时也可把人送上断头台!

不过,细一思量,“权”与“罪”似又没啥因果关系。权力

对人的影响,从来都是因人而异,与人的道德水准、政治修养、文化素质、自身抱负等诸多因素有关。翻开历史看,上下五千年,有为权而弑父杀兄的,也有功成身退,拱手让权的;有为权而认贼作父的,也有忠贞不二,以身殉国的;有要权不要廉耻者,卖身投靠,奴颜婢膝,以图幸进,但也有洁身自好者,誓不“低眉折腰事权贵”;有人掌权,贿赂公行,诛求无已,怨声载道,但也有高标独举者,两袖清风,世代传诵;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指鹿为马,欺上压下,但也有人甘冒鼎镬之灾,坚持真理,至死不悔;有以弄权为能的政客,翻手云、覆手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打击忠良,但也有不怕掉乌纱的铮铮铁骨,为民请命,视死如归。可见,权之正邪全在人心,心正则权正,心邪则权邪。子曰:“政者,正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权”,是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任何力量都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我们社会中的权,是人民给的,当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安危、人民富强和民族振兴服务的时候,它是庄严而神圣的。但当其沦为个人或某些小集团谋私的手段的时候,它便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妓,一文不值的垃圾,一切祸患的源泉。不过,一旦如此,那弄权者的自身毁灭也就近在咫尺,指日可待了!不知今之贪官以为然否?

1994年6月5日

钱与人

钱与人,是个谜。有了它,精神倍增;没了它,英雄气短,即使是铁骨铮铮的鲁迅,也不免要“破帽遮颜过闹市”!

有人说,钱不在于有,而在于用。但钱之为人用,却有高下之分。

自恃有钱的人讲阔、讲派、讲牛、讲帅,把钱贴在脑门上,唯恐别人看不见,他要的是让人羡慕,把他看成“神”。但会用钱的人则把钱放在账上、拿在手上,让它运转,变成事业,变成对己对人的贡献。所以,前者是钱的奴卑,被钱支配着,而后者才是钱的主人,他支配着钱。

街上做小买卖的人锱铢必较,要的是公鸡下蛋,钱生钱。但真正的企业家则先考虑人之所需,怎样投资,什么是投资之极限。尽管他也要钱生钱,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却不忘“双赢”,使买卖成为绵绵不断的生财之源。

钱这东西,人人需要,但穷人是因为需要才想钱,而富人却未必因为需要才想钱。所以,穷人只是因为缺钱而穷,

而富人却往往为钱所困。

钱,你可以拥有它,但不可能占有它,这便是金钱给予人的朴素道理。花会谢,叶会落,烟会消,云会散,钱亦如此。世上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大都和钱有关。聚散之间,便有了起伏跌宕的人生。

生活中透过钱去看人往往看得最清,因为谁也不能在钱的面前隐身。至于那些满嘴跑火车,说大话,使小钱的伪君子,只要他一开口,便让人知道他是什么货色!而那些表面不爱钱,乃至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人,则不用他开口,便知他挥霍的钱十有八九不是他自己的钱。

听出租车司机说钱:“一句话,该你挣的钱跑不了,不该你挣的钱就是拼上命也挣不来!”所以,开出租的人不抢活、不强载。

听一位老工人说钱,也是一句话:“只有沾着自己血汗的钱,用起来才舒坦。”这说明,自食其力的人,在钱的面前,自有其茹苦如饴的坦荡,乐在其中。而那些吃着大款,花着公款,“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吃喝穿戴基本都有人送”的人,却没这个福气!他总觉着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狐疑满腹,连睡觉都尽做噩梦。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说:“黄金这个颠倒众生的东西,在那个理想的自由社会到来以后,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建筑材料,人们将拿它来装饰马桶!”读之令人惊诧。然而,在理想的大同社会到来之前,芸芸众生,依然不免要为钱而“鞠躬尽瘁”。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夫妻反目,手足相残,追根问底,最终都跳不出一个“钱”字。这倒不是钱有什么魅力,而是钱之为人用,与人的生存繁殖、休养生息,乃至人的

社会身份、名誉、地位等实在是联系得太紧密了，息息相关，于是这钱的获取与积累，便也变成了一种痛苦甚至是血腥的过程。

钱不会改变一切，但一切会在钱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就像从窗缝吹进来的风，表面看没什么，时间一久，便见灰蒙蒙的尘土已将一切家具物什无孔不入地污染了。这就是钱的作用：“无处不在无时在。”它既是柔软的，又是坚硬的；既是细弱的，又是冷酷的。对于人，它既可以拯救你，也可以摧毁你；既可以使你的感觉如入九天，也可以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欧·亨利的名篇《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写了一个经纪人从证券交易所中暂时脱身小作休息时，向身边坐的一位女速记员求婚，女速记员先是一愣，接着泪水夺眶而出，继而她又笑了，说：“亲爱的，难道你忘了？哈维，昨晚8点钟我们已在街角小教堂举行了婚礼呀！”

你看，钱竟把人整成这个样子，它叫人忘记了一切，甚至包括自己是“无毛两足的动物”——自然人。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一篇文章里叙述一个资本家亲口对他说：“赚钱的诀窍是‘三缺’——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一句话，缺德。这便是资本主义迭进期的人性。

忽然想起一句话：“钱是万恶之源。”

有句阿拉伯谚语也说：“爱财是万恶之源。”

两句话如出一辙，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让人惊讶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钱的“万恶”之说，不过，仔细推敲，两句话又不是一回事。一个说的是“钱”，一个说的是“财”，而“钱”则只是客观附着物，“财”却是主观的，“钱”的

后面是人,如果人“万恶”了,那“钱”也就“万恶”了。正所谓:“无情最是黄金物,变尽天下儿女心。”人为了钱,是什么手段都敢用的。

所以,我说“万恶之源”是人,不是钱。

2003 年 10 月 21 日

老 友

腊月 29 的晚上,我的那位最富争议的老友终于没有熬过年,去世了!

说起来,让人悲哀……

老友是生在根据地,长在红旗下的老革命。小城解放,他与我同在刚组建的公安处工作,我负责人事,他管治安,但那时的社会秩序却令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散兵游勇,明偷暗抢;潜伏特务,昼伏夜出;武装土匪,打家劫舍;封建帮会、地痞流氓动不动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老友的工作,如同救火,经常都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报警声中度过,“食不甘味,寐不暇寝”,而在两次波及五县一市的叛乱与平息那次震惊全省的监狱暴动中,他这个治安科长更是摸爬滚打在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使我们这些共同战斗过的同志至今提起仍会情不自禁地生出许多敬意。但令人遗憾的也正是他的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在后来的工作中随着职务的变化,却成了他的“包袱”,使他犯了不少错

误。1958年,作为一个县级市的第一书记的他,在全省带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接着,“公社化”,“食堂化”,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三收款”这些波及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在他那个市雷厉风行。1959年的反右倾,错批了一大批干部,个别还有被错捕而押死在监狱的。但最令我吃惊的还是在无任何资金、技术的情况下开工修筑直达百里以外的矿区铁路,并为迎接十年大庆加宽十里长街,结果,街道拆成了百孔千疮,火车路也以毁坏许多粮田而告终。在一次地委召开的粮食征购电话会上,他与董志塬上的一个产粮大县较上了劲,自报完成一亿斤。天哪!谁都知道,他那个市的年产量当时也不过一亿二三千万斤。这就造成了一部分社队的十室九空,不要说口粮,有的连籽种都交了征购粮。

我无意揭死人的疮疤,也不想咀嚼历史的苦涩。因为历史账不好算,也算不清。但历史上那些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干部作风问题是否已被认识改正了?却发人深思。比如虚报浮夸,不顾实际与可能的跟风和逞能;比如报喜不报忧,一级一级地往上哄;比如无视群众负担能力的滥摊与乱罚;再比如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搞成“附议制”的那些脑袋一热就拍板的胡闯蛮干等,尽管老友那个时代的问题与现在的不可同日而语,但却如出一辙。一些干部的“豪情”甚至比那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动不动便打造什么“东方斯坦福”,“中国曼哈顿”,目标几天一修订,提法一天一翻新;你修我拆他又建,一任领导一道令。所以,曾为大贪官王怀忠攒足了面子的形象工程——阜阳飞机场,如今却成了安徽财政填不满的黑洞,而耗资3.2亿元,被媒体称为“豪华衙

门”的呼和浩特市政府大楼,竣工二年却还拖欠着民工的血汗工钱三千万元。我至今奇怪,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好大喜功,盲目攀比这种曾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的风气为什么却至今还未退出政治舞台!

我们当然需要那些有胆识有魄力,敢于拿大措施、大动作的改革家,但请记住:衡量改革的成果是生产力,而不是几座标志性的建筑与形象工程。

我们也确实需要那些有头脑、有见地、才思敏捷、作风过硬的政治家,对“看准了的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这里首先是“看准了的”,不是只给上级看的;是“造福”,而不是拿人民血汗打水漂的“造孽”。

忽然想起晏殊的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吗?你看,老友与他的那个时代均已无可奈何地离我们而去,但那似曾相识的工作作风,在某些地方却有如“归来燕”,又回来了。从流风遗韵后继有人来讲,这倒可向老友致以心祭,告慰亡灵了!正是:潮起潮落潮不停,潮潮都有弄潮人,年年岁岁潮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安息吧,老友!

2004 年元宵

且说“我看……”

今年3月,大贪污犯、原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在回答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提问时说:“我看社会就这么回事!帮人办点事,人家感谢一下,算不得贪污。”

我不想和贪污犯争论,感兴趣的倒是那个“我看……”。因为如何看我们的社会不是小事,何况是“领导干部”怎么看。

社会当然不是朱胜文说的“就这么回事”。因为如今的社会虽然不乏朱胜文这种变了质的“领导干部”,但像孔繁森、李安国那样的公仆却是社会普遍尊重的对象。这才是主流。而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全面认识我们的社会。

不过,恕我直言,应该怎么看是一回事,实际怎么看又另是一回事。手头有个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关于“城市青年评价社会”的问卷调查,其中对“如果行贿能解决您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行贿”的提问,竟有53.61%的人回答“肯定会”!与此同时,由华中师范学院心理研究中心在武汉进行

的“武汉市民对腐败问题的社会评价千人调查”，竟然也有53.71%的人对“为了办成一件对单位极为重要的事需向领导部门进贡您持什么态度”的提问回答：“要进贡！”

实事求是地说，这也反映了一种“看”，且正是这种“看”，才导致相当一些人放弃了以前那种理性的、道德的行为选择。

如今可怕的也许还不是“权钱交易”。真正可怕、乃至彻底可怕的是对“权钱交易”的无奈与默认。你听吧，人人都咒骂腐败，但一事当前，却又无可奈何地去求助于腐败。批个项目给多少钱，承包个工程给多少回扣，得到一笔贷款、批得一片土地给多少好处，等等，在某些地方实际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例行公事”了。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该办不办、该快办的拖着缓办，使许多正经事不得不附加上许多费用与感情去办，才是最大的腐败。明礼暗贿，似礼实贿，以赠代贿，等等，实际都是“该办不办”把人逼出来的，这是现实中量最大、最伤群众心的腐败，也是最难反的腐败。因为这种腐败就像那目所不及而又无所不在的白蚁，如不清除，大厦终将被其蛀空，而扑灭清除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反腐败的根本是深化改革”，但在改革的同时若不同步建立起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的防腐机制，改革也很难顺利进行。

“保卫廉洁的根本措施是转变政府职能”。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也要培养廉洁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干部的政治素质。尤其在大变革、大发展的今天，世界观是个总开关，只有使干部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树立起正确的

权力观、群众观,才不至于财迷心窍、色迷心窍、官迷心窍、鬼迷心窍!

“机制”与“土壤”的关系,互为因果。其效应有三:即有效监督使腐败“无法为”,严刑重典使腐败“不敢为”,而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则使干部认识到腐败“不能为”也“不屑为”。但遗憾的是,如今的监督,除了领导监督以外,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形同虚设;法制监督还停留在“民不举,官不纠”的状态;而重提改造世界观也似乎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老生常谈”。所以,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而腐败分子也就如同“过江之鲫”,反不胜反了!

1999年12月5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总想,毛泽东同志讲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许并不只是讲给孩子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道出一个普遍真理,即:只有学习,而且要“好好学习”,才能积立身之本,获进步之梯,得创造之法,感知大千世界之变,推动我们的事业“天天向上”。

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一步步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与新的矛盾碰撞、摩擦,层出不穷,每一步都在探索中行进。学习,应当说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恕我直言,这些年,对于学习,特别是对学习与实践的关系,在某些人中是早已被大大地淡化了!有些人,工作舍得下苦力、用笨力,唯独不重视学习,心力耗尽,心劳日拙;有些人,整日忙于上“文山”、下“会海”,但对该下细工夫的思想实际、理论实际,却安不下心来,结果越忙越乱;有的人,跑项目、跑资金、行色匆匆,不遗余力,但却懒得去务“虚”,

岂知,有“米”要“炊”好,还需正确的方法去指导;有的人,对市场经济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仅仅简化为一个“干”字,却不知缺乏正确理论导向的行动就是盲动;还有一种人,对一切学习都不以正眼看,凭主观臆断工作,跟着感觉跑,即使干“瞎”了,也要硬着头皮干到底,盲目自负,令人担忧。

应当承认,学习毕竟是“务虚”,好像与近年提倡的“务实”有矛盾。殊不知,“虚”与“实”都是客观存在,且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不“务虚”,“务实”的底气也就不会足。严格地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文化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虚”,其实就是一种高层次的“实”。比如:协调、平衡与发展速度的矛盾;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与宏观调整的矛盾;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存的矛盾;开放劳动力市场,把市场机制引入就业制度与职工主人翁地位的矛盾;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与现行工资政策、消费政策的矛盾;农业市场化与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矛盾;人际关系商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这些,既是市场经济的“虚”,也是市场经济的“实”。解决问题,既要靠具体实践者的“干”,更要靠实践者从实践到认识和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顺利建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个永恒的劝诫。对此我们应该不分时代,不分年龄,当然也不应以工作忙为借口,而有所忽视。尤其在目前,作为改革实践者的公务员,更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以推进改革,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发展与进行!

1994年7月24日

说义利

义耶？利耶？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几千年。争者固争，鸣者固鸣，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何必曰利”，耻于谈钱，被认为是“高雅”；见了“孔方兄”便羞羞答答地称其为“阿堵物”，则是“君子”之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今“谋道不谋富”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此种心态则不能说已完全消失。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不是仍有人在揣度姓“社”姓“资”的问题吗？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发表快一年了，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面前，不是仍有人在左顾右盼，心神不定吗？而耐人寻味的还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忽如日升中天，忽如晨星落地，有的厂长、经理完成任务后，在承包兑现奖面前也总显得不那么自在。如此扭扭捏捏者何耶？说到底，还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在人们心理上散发着连自己也觉察不出来的那种作用。

当然，见利忘义，甚至陷入极端利己主义也是危险的。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

关。”但这个“利益”不言而喻,也包含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内。如果一个人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兴亡和人民的富强,只知追求个人利益,甚至巧取豪夺,损害国家利益,并认为它合乎情理,天经地义,那我们这个社会岂不陷入人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局面?那还有什么安定团结可言?

“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社会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它以正义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信和虚假等行为与观念来评价人们的品格,并通过舆论使人们潜移默化地养成“义”的信念和习惯,“心所同然”,“闻义能徙”,“见义勇为”,甚至,“舍身取义”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安定。所以,我们不应否定“义”,或不加选择地以封建社会之“义”来取代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之“义”,更不能以“哥儿们”的“义气”把“义”的概念庸俗化。

“义”与“利”,又是一对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做为道德观念之一的“义”,是存在于“利”这个事物之中的,因此,我们既不能“是义非利”,连起码的“物质利益”也不要;更不能“是利非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至于那些公事私办,吃拿卡要的“见利忘义”之徒,更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义焉?利焉?望君切勿糊涂。

1993年2月6日

学孔繁森当学其真情

读孔繁森的事迹,我总觉得有种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东西在心头涌动,这就是孔繁森的情。

生在山东,干在“屋脊”,离亲弃家,无怨无悔,是赤诚的报国情;

跋山涉雪,在高寒缺氧中查资源、找优势、访群众,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是求真务实的工作热情;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却还要在自己那不高的收入中为收养孤儿支付费用,为孤寡老人慷慨解囊,为贫病交加的老百姓送医送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铁骨侠情;

急民之急、想民之想、干民之所盼,且不惜为此献出鲜血、献出健康、献出生命的这种情,则是一个人民公仆与人民一脉相连的赤子之情。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不仅像动物那样有“欲”,而且还有能为他人——群体献出爱心的“情”。此种“情”,

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表现在一个人民公仆身上，便是爱国、爱民，且不惜为其赴汤蹈火的献身之情。用范仲淹的话说，这种“情”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则称其为“圣”，曰“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诸葛亮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则说是“伏首甘为孺子牛”；用孔繁森的话说，那就是“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爱，与憎、恨、哀、喜、怒一样，同是“情”的一种表现形态。就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情”，则主要是表现在自己对于群众的那种自发的感情。可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只要大小戴上一顶“乌纱帽”，便与群众拉开了距离，见人程式化，待人组织化，举止架子化，言语文件化，处处露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那副捉摸不定的脸谱，见了上司是一种模样，见了群众又是另一副尊容，这又怎能再去奢谈什么“群众感情”？

当然，如果说这种人完全没有什么情，也不符合实际。比如：周旋于达官显贵的送往迎来，忙碌于工商大贾的礼仪致意，只知“商场”、“官场”的“行情”，不知群众的苦情，是“情”；疏贫趋富，贫困地方绕道走，富裕地方常行走，有意无意地充当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是“情”；戚戚于名、汲汲于利，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是“情”；终日为位子、房子、车子、票子绞尽脑汁，孜孜以求，还是“情”；陶醉于“文山会海”里的文字搬家，把关心群众变成纸上谈兵，是官僚主义之“情”；不调查、不研究，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脑门一热就“拍板”，是孤家寡人之“情”；虚功实做，只要热闹气派，不讲实际效果，是形式主义的糊弄群众之“情”；“长袖善舞”，问

题面前打“太极拳”，“笑骂由你笑骂，好官吾自为之”，则是老于世故的政客之“情”；以检查验收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挥霍人民血汗不心疼，是败家子的性“情”；好吹不好批，弄虚作假，哗众取宠，则表露了邀功佞进者的心“情”；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是心系“赵公元帅”之情；通权达变，自立名堂，扰民害民，则是对“孔方兄”的独钟之“情”；对腐败分子下不了手，当断不断，是对党的事业的无情；不惜以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为代价，脱离实际地营造“表面政绩”、“贴金政绩”，劳民伤财，则是其自己不好说、别人也不便说的那种“情”的驱动。

学习孔繁森，不在喊口号，不在唱高调，对号入座要看情，实际行动也看情，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要达到孔繁森说的那种“最高境界”，不可能！

1995年8月17日

读出幽默

幽默——美学名词，语意双关的修辞法，让人觉得有趣、可笑，意味深长。生活中的幽默“无处不在无时在”，所以，有时读报也会读出幽默。

一、“学而优则‘囚’”

广东佛山原县长廖添才在中学开学典礼上讲：“你们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当官嘛！‘学而优则仕’，要当大官、发大财……”可这“高论”在他自己身上的验证却并不美妙。任职2年，受贿30万元，并把两位副县长、一名政法委书记与下属几个局长一起带进图圉。有人改鲁迅诗曰：“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捞多少已碰头；镣铐银铛过闹市，暗自思量泪暗流；千年只道学‘则仕’，不道也可变‘则囚’；今与铁窗成一统，无论冬夏与春秋！”

二、一元钱的买卖

原广东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的大公子陈励生，年仅28岁，却是东南商海有名的“弄潮儿”。1993年他以一元港币

在香港汇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入股,不几年便使该公司大发特发,其中仅汽车走私湛江入关一项,便使国家损失税收1.65亿元。有人改辛弃疾《南乡子》词曰:“何处望神州?满目风尘入眼愁!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湛江滚滚流;年少‘弄潮儿’,坐断东南祸不休,天下贪官谁‘高手’?陈陈,父子皆为阶下囚!”

三、呜呼,“优秀”!

“优秀检察官与情妇伏尸别墅,家有财产百万来路不明”这消息来自沈阳。(见9月4日《广州日报》)检察官杜某从业13年,便与情妇宋某好了十多年,且拥有家财百万与豪华别墅,岂可掩人耳目?但居然竟是“优秀”!有人问道:“缠绵悱恻十年多,溘然一逝起风波;‘优秀’且敛钱百万,不‘优秀’者又如何?”

四、哀哉,“党性”!

还是《广州日报》的报道;重庆一建筑公司为讨回湖北巴东县饮食公司拖欠的工程款,向该公司3名领导送“辛苦费”7万元,称“以党性担保,绝不出卖”,后来案发,有人叹道:“如今皆曰商品贱,谁知‘党性’倒值钱;不过说贵也不贵,一掷只值7万元!”又云:“‘党性’原来是崇高,如今作为贿之桥;马列地下如有知,也骂子孙是不肖!”

五、“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是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的一句话。故事发生在其担任原海南副省长时,某私企为得到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开发权,遣风华正茂的女秘书单独去找孟,孟一见果然按捺不住,说:“你真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便将那女秘书抱在办公桌上奸污了!此事后因其在湖北又与一香港小姐的

一番风骚,使国家引进的两条生产线蒙受重大损失而被揭露,才使其海南名言不脛而走。有道是:“色不迷人自迷,却道人不可抗拒;石榴裙下交易起,反腐又添新课题!”

腐败,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但若与幽默结合,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可笑却又笑不出,可叹而又无由叹!那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兆,至少也反映了腐败的泛化。所以,只有此类幽默日渐减少或没有,才是国家之幸! 不知识者以为然否?

1999 年 12 月 5 日

从艾科卡降薪说开去

美国企业界的奇才李·艾科卡,放弃福特公司每年百万养老金的诱惑,甘心到“大厦将倾”的克莱斯勒公司掌舵,仅仅五六年,便使这个公司还清数十亿美元的负债,且一跃而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排行第五的事迹,一个时期以来,一直被媒体传为美谈。但从报道看,艾科卡到克莱斯勒公司后却没有什麼惊人举,只宣布了一件事:自己的月薪只拿一美元,誓与公司共存亡。就这一句话,便赢得了职工的信任,大家感到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心里踏实,有奔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从而使艾科卡的扭亏措施件件落到了实处,让公司很快走出了困境。

艾科卡的事例说明: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想干点事,也还是要讲点精神的。但令人困惑的是,在我们的某些亏损企业里,却“宁亏企业,不亏领导”,哪怕给工人发不出工资,领导的高级轿车照样坐,打着“公关”旗号的吃喝玩乐照样干,乌七八糟的这奖那奖一个也不少拿!结果,人

心散了,单位倒了,形成“破庙、穷僧、富方丈”的怪现象。我在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能做到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现在都说国企亏损是个“老大难”,却难见领导下去抓个点,打开局面给人看;都说“领导班子是关键”,可难见有人不吃行政饭,敢到亏损企业挑重担!“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毛病算什么精神?说不清。反正它不是共产党人的精神。

记得不久前读过一篇题为《企业即人》的文章。讲的是七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史上最让人震惊的事件——日本经济的崛起。这个经过二战惨败,曾被认为一个世纪也翻不了身的岛国,为什么会在二三十年便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了呢?经过西方学者的苦苦反思,发现其成功的本质所在是不仅注重规章制度等“理性管理”,而且加倍重视人的价值观念的构建与培育,强调人格感召,要求领导必须拿出与职工“同甘苦、共命运”的形象来带动职工致力创造企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使企业有了向心力,从而也使企业有了旺盛的技术消化力与强劲的产品开发力。这种作法,日本学者叫“组织风土”,西方学者称:“企业即人”。作为注脚,IBM公司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说:“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是远远超过其技术、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所能起的作用的。”

尽管立场、观点不同;尽管社会制度不一样,但资本主义企业除了重视管理、重视技术外,更重视价值观念的培育这一点却值得我们学习。可我们现在有些人一提政治思想,一提精神,便认为是空的、过时的,这实际上是从一个极

端跑到了另一极端。殊不知,精神和物质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无论任何一方陷入盲目,都有可能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结局,而且,它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996 年 2 月 8 日

反腐无需唯心论

一家颇具影响的刊物有篇说腐败的文章叫人看了不是滋味。文章言道：“唐代高僧慧能云游至广东法性寺，逢住持讲经，听者众，忽一阵清风吹来，经幡摆动，众僧说风动，有说幡动，争论不已。慧能曰：‘非风动，非幡动，乃汝心动！’众皆释然。”于是便得出结论：“腐败亦心动也！”“就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而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

不用说，作者是好心。但这却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心动”也者，对那些终日无所事事而又不愁没饭吃的人来说，不啻为“醒世”之言。但若有个下岗工人给那和尚一巴掌，说“你胡编！”他还能说那是“非人打、非手打，乃汝心打”么？

主观唯心主义总爱把人的心灵绝对化，但同样是从“我”的意识去认识，也不一定就有相同的认识。禅宗把世间的一切都看作“苦谛”，“人无我、法无我”，“自性本空”。可腐败者却把这世界看作原本就一个自私自利的“我”，“人

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他却认为“苦海”临照了夕阳便是一片“金海”,“谁不捞要后悔一辈子”!所以,“前车不远,后车又覆”的现象并不少见。原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被处决,他的继任人向明序又身陷囹圄;首钢的原党委书记管志诚枪毙不到两年,两个继任者杨立宇、赵东洋又先后复蹈其辙;时间再往前推,则还有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的“翻车”于前,而另一副部长张辛泰的“翻车”于后。这些,难道一个“心动”便能说清?

“意识决定存在”还是“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争论已久。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任何事物都不是脱离客观条件而孤立地存在和运动。这些年,说实在话,我们一方面为改革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欢呼,一方面又不能不对一些地方“转制”过程所暴露的问题而惊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权达变,只顾眼前,使和平时期的“冒险家”如鱼得水,也使贪得无厌的奸商如沐春风。既然“阿Q”都随便拿走了“供桌”上本不属于自己的“宣德炉”,那又怎能防止我们队伍里的“假洋鬼子”混水摸鱼,乃至“趁火打劫”呢?

诚然,“转制”这一过程的本身便是一种突破——突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与“禁区”。所以,某些“失范”现象的出现甚至有其“必然性”。但大面积的“失范”则必然要影响稳定,失去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增加“转制”的难度。在这上面,一切唯心主义的空洞说教或其他什么主义的坐堂论道都无济于事,根本的一条,是让“阿Q”与“假洋鬼子”们付出成本与代价,至少也要让他们知道,即使

是“红尘滚滚”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否则,一旦使那些诚实本分的劳动者产生了“相对被剥夺”的感受,总是“老实人吃亏”,那便要引发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前景堪虑!

1999 年 11 月 28 日

庄子、孔子与开发

因为近几年有关生态破坏的报道多了起来,也使我想起了庄子、孔子的某些话。

谁都知道,庄子是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但他讲的“天地有大美(本原)”、“四时有明法(规律)”、“万物有成理(法则)。”(《知北游》),并告诫人们“勿与朴素(大美)争美!”却很有见地。他讲过这样一个寓言,大意是:远古的时候,世界由“倏”、“忽”、“浑沌”三个王来主宰,而“浑沌面无七窍,”“倏”、“忽”嫌他不好看,便为其在脸上凿出了七窍,结果,“七窍备而混沌无!”

这里,“浑沌”即“天地之大美”的形象化,象征着自然界的原生态。而所谓的“凿”,即人类那些不计后果的开发与建设。如今,耕地锐减,淡水叫缺,大海赤潮,城市陆沉,沙漠在世界上正以每年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面积向前推进,森林草原急剧衰退,在我们的头顶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臭氧层“黑洞”,不断扩大,而地球上每天灭绝的物种有报道说

达 170 余种之多,我们基此而获得的“有”,不也在同时印证着庄子所说的那个“无”吗?

不错,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是人的本性。这包括宽大舒服的居住空间,丰富的食物营养,方便快捷的信息、交通等等,甚至还要为子子孙孙攒足了财富。然而,人类的不当攫取也会使你不想要的东西随之而来。近几年有个名词频繁出现:“安全”。——生态安全、物种安全、资源安全、基因安全……但真正威胁了人类安全的却是人类自己,是人类有了更多的贪欲与自私,不把环境与自然生态当回事,拼命攫取,享乐无度,加上人类本身的尔虞我诈,就必然要生出许多不安全因素。

当然“安之若命”(庄子《齐物论》)——对一切原始的东西都不要去改造,也是错误的。因为随着人口增长与人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增加,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过头了,而是还很不足;人类的科学技术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面不是超前了,而是还很滞后,需要反对的,是以牺牲别国、别省或别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把祸水、灾难转嫁于人的那种“殖民地”式的掠“凿”;是只顾眼前,只顾自己,甚至连子孙后代死活也不顾的那种胡“凿”、滥“凿”、狂“凿”与盲“凿”,而不是“凿”。换句话说,生态与环境上的问题,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人与人(包括人与自己后代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是人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走偏与迷乱!

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其实,开发建设也是如此。至少要有“他人”意识,才能唤醒人的

“生态意识”、“环保意识”,使开发建设真正成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文明行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是否又要回到孔子?不好说。因为孔子自己也力主“和而不同”。不过,这个古老价值观的意义却是现实的。从某种角度讲,也许只有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高扬生态意识,超越工具理性,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断裂连接起来,成就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理性思维达到一个新高度,生态破坏才能彻底解决。请记住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2000 年 12 月 24 日

闻瑞丽市提高教师工资有感

报载,中共云南瑞丽市委、市政府近日宣布:不鼓励中小学教师停薪留职从事第二职业,从1993年起,采取政府出一点、社会出一点、学校筹一点的办法,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并解决教师住房问题,使其专心育人。读来令人振奋,也令人感慨!

教育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由于国家的财力不足,百业待兴,教师的工资待遇,住房安排,虽经努力,却仍难尽如人意。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辛勤的“园丁”,有如30年代的鲁迅、王国维,安贫乐道,不以物惑。但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海”,的确也有不少人放下师道尊严,跳了下去,一显身手了。知名学者办公司,当经理,教授“练摊”,讲师卖煎饼、炸油条,以至小学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向学生兜售烤红薯……,成了一时风尚。投笔从商,儒生上“战场”,对此,有人惊呼:“不正常”,有人指责:“不务正业”,有人哀叹:“斯文扫地矣”!尤其,敢于

“下海”者除少数郁郁不得志者外,多为教学、教研上的骨干,这就使社会面临一种艰难的抉择:堵耶?疏耶?任其自流耶?代价多少?利弊几何?瑞丽的做法是:一不提倡,二不鼓励,三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谓明智之举。须知:市场经济自发地向效益倾斜,却不自发地向社会公平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给予适当调节,这就叫政府功能。

改革现已逐步步入深层次,由此触发的社会问题,亦将接踵而至,因此,只有把改革的热情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打好这场攻坚战。尤其,越是群众热情高涨的时候,越要注意政策,注意引导,注意保护,切忌因袭旧体制下的老套路,“一卡、二压、三吓唬”,那恐怕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93年1月7日

关于“海”的思考

去年以来,最大的社会冲击莫过于“海”了。“海”也滔滔,“浪”也滔滔。它荡涤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唤醒人们潜藏心底的那个追求创造的欲望,也使每个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确定的人生目标。“惊涛拍岸”,浪卷起心态万千。这说明党的十四大关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兴奋之余,我总觉得有些问题也值得思考。比如:“海”的寓意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市场经济的“海”,有人说是商品经济的“海”,而所谓的“下海”,也大多指的是参与商业买卖或商业服务而言。这样讲,作为形象化了的语言,无可无不可。但回归到理论,则值得商榷。因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商品经济是相对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而言,讲的是独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和等价交换关系;而市场经济则相对计划经济而言,讲的是

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高度社会化、市场化了的商品经济。具体地讲,是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不要求产品通过市场为社会所用,且作为生产要素的活要素——劳动,与物质要素——资产,也要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动态地流向有生命力的产业和部门,为社会所用,才可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成。

诚然,商品与市场,是两个相依并存的范畴。有商品就有市场。但简单商品生产所伴生的只能是进行简单商品交换的、无序的、不稳定的、地区分割的地方市场,发达商品生产所要求的则是一种稳定的、规范的、基本统一的全国市场,而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则在统一的全国市场上,还要有基本统一的、无关税壁垒的国际市场与之相适应,否则,便无法推进商品生产的现代化。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同样道理,“商品交换”亦不等于“商品经济”。因为“经济”活动的组成除了分配、交换、消费等外,当然包括商品生产。“生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如果把商品经济仅仅理解为商品交换,人人都挤到流通领域去倒卖,却不注重提高生产,追求生产的商品质量、花色品种、适销对路,从而使商品生产得到发展,那我们的“商品经济”也就无所谓其“发展”了!

由此可见,无论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都是有着完整的概念,丰富的内涵和时代内容的,是有条件的。因此,以“海”的高度发达状态比喻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场经济”,或尚处于发展状态的“商品经济”,都不十分确切。如果一定要做“海”的比喻,那么,充其量,这个“海”也只是流通的“海”、商品的“海”,本质上,则是正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海”。而也正因其还在“转”和“变”的过程中,独立自主的市场活动主体尚未形成,门类齐全的市场体系尚未健全,法律、规则、制度等相关的制约、规范措施没跟上,不能保证平等竞争,所以,这个“海”的机遇多、风险多,空隙也多,遂令某些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有机可乘,以权经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收礼受贿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当然,在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中,无序和混乱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能任其自流,相沿成风,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上,经过“必要的补充”、“为辅为主”、“两个结合”、“内在统一”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的确立,认识逐步深化。已经走过的历程,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海”,那我们都在走向这个“海”,而“下海”的主体,则是经济体制的整体。因此,“下海”的着眼点,我们始终都应放在这个“主体”的“整体”上,并从这个方面做工作,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日建成。

1993年4月15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化”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是人对合理社会的一种理想的选择。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会自发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也只有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

然而,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却并非一次完成。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由指令性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我国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这一根本、全面性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渐进过程。

最好的说明,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演进。几十年来,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把市场作为“必要的补充”,前进了

一步;从“必要补充”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从“为主”“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又前进了一大步;而从“两个结合”到最近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可以说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在这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的改革性,高度统一。

在这里,改革的基础——市场经济与改革的目标(或目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度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以产品生产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以商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列宁在半个世纪前就明确指出:“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这一光辉思想,现在终于由我们党作了精确的表述和发展。

但是,理论的突破并不能代替实际工作。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便是经过四十多年的辛勤努力,虽已积累了二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建成 3900 多个大中型企业,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生产”过程,却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这正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点。

何谓社会化,从较高的层次讲,即不只是产品通过市场为社会所消费的那种产品“社会化”,而是作为生产要素的活要素——劳动和物质要素——资产,也要通过市场,为社会所用——即产权和劳动的“社会化”。

产品社会化、劳动社会化、产权社会化三者构成生产或经济社会化的完整概念。而也只有这三者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生产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大生产”过程。

马克思有句名言：“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曾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演变的自然产物，它只能建立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而这里所说的三个“社会化”，也可以说，就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在这个基础(或条件)之上的一种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走向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走向生产(或经济)“社会化”。要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还是要学好十四大文件，转变观念，首先打好思想工作的基础，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条件，加快改革与开放的步伐。

1992年12月8日

欣闻沪上“卡拉”不“OK”

今年元月9日的《市场报》报道：“目前上海冠以‘夜总会’、‘沙龙’、‘娱乐城’之类的高档娱乐场所，亏损的竟达70%。”

近两年，我特别爱看某地精品屋倒闭、极品烟酒卖不出去、高档商场不景气、豪华别墅没人要、高级宾馆门可罗雀之类的新闻。读到沪上高档娱乐场所亏损，当然更高兴。这倒不是有意和谁过不去。因为这些专为高消费服务的经营虽然也是为了适应不同层次的需要，但骨子里却都在打公款高消费的鬼主意。它们兴旺了，企业的一部分利税上缴便神鬼不知地消失了，财政收入的某一部分也随之而“泡汤”！君若不信，请看一例：“锦州市纪委去年通过市公安、工商、税务等局对该市的15家较大歌舞厅联合抽查，1~6月底，仅一次消费在500元以上的营业收入中，便有80%是公款消费，有的高达90%。”有个舞厅老板说：“我们挣的就是公家钱！”（见1994年10月12日《辽宁晚报》）

“我们挣的就是公家钱!”这看似蛮横的回答并不奇怪,因为人家老板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奇怪的倒是那些“鱼”,为什么竟会自动游了去上“钩”?

有一种说法很值得研究,“人嘛,总要接受现代文明”。可我觉得不管什么“文明”,都不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现在不是到处都喊效益不佳吗?可同时却有人拿上公款“舞低杨柳,歌尽桃花”,做千金一掷之“潇洒”,请问:这究竟是“文明”还是“文明”的欺诈?

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讨论。曰:“改革嘛!就要付点成本和代价。”可我总觉得这“成本”、“代价”的付出始终都应建立在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上,要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如果把错误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损失作为“成本”、“代价”推给历史的必然性,那就会成为某些对历史和人民不负责任的人的“挡箭牌”。比如,贪污受贿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形式主义形成的浪费,追求享受导致的公款挥霍,一次次把洋人的破铜烂铁当“先进设备”引进的败家子行为……,如把这些都说成是改革的“成本”和“代价”,那岂不是给改革抹黑?

上海高档歌舞行业不景气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也像锦州那样抓了一下?未见报道,不敢妄加评论。但它却反映了一种趋势,表明那些错把算盘打在国家身上的高消费经营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我高兴。

1995年4月16日

回扣的负效应

回扣,是商品购销或工程劳务承揽交易中由一方从所得款提出一定比例的现金,作为促成交易而支付给对方的酬金(包括实物)。其名目有“劳务费”、“好处费”、“介绍费”等,但大都是非公开情况下的约定,因此,其实质是商业贿赂,属收买行为。

但是,过去由于认识不清,法律也无明确界定,它有如一个“幽灵”,在经济领域里到处游荡,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首先,回扣这种贿赂形式极大地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平等竞争。如一些颇具实力的大中型企业产品为什么竞争不过集体、私营企业产品?某些名优产品为什么竞争不过伪劣产品?假冒商品为什么屡禁不绝?这些,确有许多原因,但回扣这个“幽灵”的从中作祟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就谈不到公平竞争了。

其次,回扣的泛滥,必然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曲解,把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当作市场经济的真谛。比如,为推销

非适销对路商品向买方有采购权的人支付回扣;为获取贷款向握有放贷权的人支付回扣;为承揽工程劳务向招标负责人支付回扣等,使贪污受贿有了适应生长的土地。

第三,回扣使假冒伪劣商品的流通有了如虎添翼的活力。报载:“全国每年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千亿元,相当于全国居民100余天的消费总额。”这不仅坑害了消费者,而且也使一些正常的生产者利益受损。

第四,回扣的最大受害者还是国家和集体。据来自权威媒介的调查:“1992年国家财政因回扣流失约为30亿元。”其中,“全国药品行业测算每年约有7.72亿元被回扣吞噬,约占国家医药行业全年利税收入的16%”,如把每年流失的这些钱用到基础建设上,我们要办多少事!

回扣,是市场无序向有序转轨期间的产物。因此,总的解决办法也要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去年1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这是解决回扣问题的关键性一步。看来,坚持依法办事,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回扣行为。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许还要假以时日。

1994年4月7日

令人担忧的换车风

近两年,换车之风日盛。一些领导人为了讲排场,摆阔气,吉普换上海,上海换桑塔纳,桑塔纳换进口轿车,互相攀比,形成了不该换而换,还能用也换的怪现象,带动了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剧了公款高消费。

诚然,“民不可皆圣贤”。平心而论,一个单位添一两部新车,这在如今也算不上是惊人浪费。君不见,我们有些单位接待上司,应付检查,打通关节,送往迎来,一桌饭菜动辄数百元!公款吃喝伴以公费消遣;公费跳舞,通宵达旦;公费游览,涉水登山;公费点歌,余音绕梁;公费送礼,心照不宣。据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就有一千亿元之多,如拿这个数字与我们公仆坐的几部高级轿车比较,不也是“小巫见大巫”吗?

当然,如把这个“小巫”与我们的国情、民情联系起来看,似乎便不那么轻松了。因为我国毕竟还有 8500 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城市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亏损,有的连工

人的工资也发不出去；在教育上，虽经国家多方努力，年均仍有失学儿童 400 万，其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年均 100 万。据说贫困地区一个失学儿童一年所需的书本学杂费也才只有 60 元，不知我们的公仆是否想过：足下一部车，该是多少娃娃的学杂费？可救助多少上不起学的孩子啊！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生在世，受一定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可能不受某些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是，“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78 页）这也就是说，人不仅受环境的制约，同时也有能力去建设和改造自己所处的环境。湘潭市长卖掉高级轿车为教师发工资，就是最好的说明。作为人民公仆，我想至少也应像他那样，保留一点不为世俗所羁的阳刚之气，不在种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中迷失自我，像马克思所说：“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和“自然主宰的人”！

最近，中央领导强调指出：在那些发不出老师工资的地方，不准买高级轿车，不准建高级宾馆，违者要追究责任。我想，这对于那些一味追求享受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人来说，恐怕也到了应该清醒清醒的时候了。

1994 年 3 月 24 日

“合理的利己主义”合理吗？

近从某一颇具影响的报纸上读到一则新说：“合理的利己主义”！

其实，此说也并不新，法国的爱尔维修早在 18 世纪就讲过。后来，德国的费尔巴哈、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都坚持了这一思想，我国的近代思想家严复还把它中国化为“开明自营”，他们都想通过对利己主义作出一些限制，使其“利己而不害人”。但 200 多年了，合理利己主义和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一样，都是一种不现实的社会思潮。

何谓“合理”？如今已很难说清。比如前一时期正当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甚至有人戏言：“如今只有骗子是真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出现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王海，他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搞得那些损人利己的商家狼狈不堪，群众拍手称快，可同时也有不少文章责难，有的甚至称其为“刁民”！你说，谁有理？而也正因为说不清，于是，行贿受贿，回扣诱购，美女攻关等等，也就有了“合理”的理

由而大行其道了。当然,“利己”是客观的存在。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市场的职能规定了必须赋予“经济人”以经济行为的功利与目的,若没有了这一目的性,那“经济人”在产生的同时也就消失了,而市场经济的基础亦将随之而崩溃、消亡。但是,必须明确,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的内涵也同时要求“经济人”的“利己”行为必须是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与不损害消费者利益(利他)的前提下,讲求效益(利己)。“利己”是以“利他”为基础的。至少,也不能“损人利己”,或“害人利己”。如果不讲这些,光讲一个“合理”,那便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

“合理的利己主义”之所以是谬误的,还在于它把“合理”与“合法”混为一谈。“合理”与否,根据是道德的标准,而“合法与否,则根据的是法律的标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见死不救,或先交钱再救人,可能“合法”,但不“合理”;千金买得美女笑,万金去吃“黄金宴”,住豪华别墅,坐高级轿车,只要钱的来路正当,也许是“合法”的,谁也管不着,但也决非“合理”。这就叫作“法”与“理”的古老颉颃,几千年了,难道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就能解决问题?

其次,从另一方面讲,“合理”的行为也不可能是利己的。我们知道,利己主义是人们在面对自我与他人、集体、社会的矛盾时,只考虑一己之利,而不管他人、集体、社会有利还是有害的一种行为上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只有在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能凸显出来,要么,有利于他人、集体、社会——走向“合理”;要么,以个人利益为取舍的标准——走向“利己”,水火不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硬

要在这种冲突当中找出一种既“合理”又“利己”的选择,我看不是“子虚乌有”,也是“天方夜谭”!

2000 年 1 月 21 日

“劳动”与“劳动价值论”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劳动”与“劳动价值”的议论屡见报端。比如“劳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的第一章里便讲:“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指出“复杂劳动”——科学技术等脑力劳动的创造是“物化的知识的力量”。可有人却说“知识是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声言“信息社会的现实便已说明价值的创造是知识,不是劳动”。这就让人难以认同了。

应当承认,我们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理解,从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认识价值;从“活劳动”——抽象劳动——人类无差别劳动上理解劳动,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直接劳动创造价值”,进而引申为“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的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物质领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并因此而建立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

——剩余价值论。但剩余价值论并不等于劳动价值论,同时,马克思也从来不认为“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只要翻翻《资本论》便知道,还在体力劳动占主要形式的19世纪,他便预见科学技术成为主要劳动形态时“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资本家则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说“这种与剥削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值的劳动”。

你看!即使在工业化初期,马克思也未舍弃知识的价值,而且连资本家管理、指挥知识的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若因此而否定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那就不对了。因为人的正确思想认识如果经过人的实践——认识与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积累,便不可能知而能识,识而能思,思而能进。而这一识、思、进的过程,也正是马克思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能创造的价值比社会平均劳动要多的”“起了自乘的劳动作用”的那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过程。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的也正是这种“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创造。

美国有个未来学家奈比斯特在一本书里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为知识价值论所代替。”很武断。但他忘了,知识作为“存在物”,不经过人的劳动实践,它的价值只能转移,不能增加。同时,知识本身也不等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因为离开了劳动实践,知识就创造不出来,就转化不成力量(生产力),形不成价值。

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毕竟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不同了。面对信息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如果不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会犯错误。如纯粹的流通,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创造价值的,但如今包括流通渠道在内的第三产业,已占发达国家 GDP 的 70%,在我国也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另如价值分配,如今若不考虑参与生产的其他要素的贡献与回报,发展经济便是一句空话。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发展变化说到底,也只是劳动领域与分配内容、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是价值创造源泉的变化,也不足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此外,还有一种“背离”说,认为“多元所有制允许了剩余价值的剥削,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误解。因为恩格斯早在 19 世纪的后期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和德国社会党《青年派》的信中便讲过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公式来运用”的思想“对在每个特定时刻起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会把自己“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

我无意进行批评。之所以想到恩格斯的这些话,大概也与教条主义对于我们党曾经有过的“祸害”有关。不过,我想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马克思说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我国还只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初始阶段”;既然经过 20 年的实践便已看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与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实,那我们也就找到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根据。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百多年来,争议时起,至今未已。这是好事。因为有人争论总比被人忘了好。同时,真理也总是越辩越明的,只是这“原理”上的争论,则无论否定

与认定,还应本着理从事出的路子,争其所由,论其所以,有根有据,如果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抓住某些表象便下结论,那就有失公允了。

2002 年 10 月 28 日

聆听弱小者的声音

我喜欢上《平凉日报》是十年前的事。那时,离休以后订报成自费,大报订不起,便只订《平凉日报》。十年来,每每于茶余饭后,信手翻来,便不忍释手,时时有引人共鸣的快感,填充了我的许多寂寞。

有人说,《平凉日报》是“三分种的报”——经不住看。这当然是因为过去它小。但我也认为它小而精、小而活。特别是它的“社会版”、“泾水”与后来开辟的“民生热线”、“特别报道”等栏目,世情时政,时事风云,文艺体育,道德经济,正言谏论,大道小法,焦点热点,缘情而发,豆芥巨观,小中见大,一纸在手,便知天南地北,宏观微观,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动态,与时代同步,所以,在我们这个家属院,每天的《平凉日报》一进门房便被候在那里的同志们争相传阅,几经辗转,便不知其去向也!

53年过去,《平凉日报》终于走完了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小报历程。如今,扩版增容,版面全面刷新,内容更精、更

活,处处追求的是一种大家风度,的确让人高兴。但我也希望它一如既往地关注弱小声音。我总觉得,在泡沫文化泛滥的今天,思想上的“拓荒者”也往往正是那些时代的弱者。尽管他们的声音不顺耳、不合群,甚至被误解为“聒人听闻”。

我没有研究过声音的起源和历史。但从文字的角度入手,这个问题也许不难解决。因为词汇的出现只表明人类进入了自觉认知的视野,并不表明声音的开始,而声音的力量则穿透时间,跨越时代,传至未来。往远了说,这种声音的代表如屈原,如司马迁;往近了说,如鲁迅,如马寅初,如彭德怀,如顾准,等等,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声音。

诚如某公所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今已较改革前有了发展”,“民生、民权的保障机制相应改善”。但是,耳闻目睹,往往也使人不无遗憾地感到打“死老虎”不遗余力,捉“西门庆”之流难试牛刀;管小商小贩绰绰有余,摆弄“和珅”一类就显得力不从心。弱者的声音,隐在局促的生存里,曲里拐弯地表达,或幽默,或调侃,或感叹,或呼唤,但值得思考的却是其背后的原因。

记得《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有个这样的细节:店小二端上来两盘菜,对纪晓岚说:一盘叫“吃着明白”,一盘叫“看着糊涂”。其实,用这两句话来概括我们现在的某些事,也并无不妥。

读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堂·吉珂德斗风车,总想他就是疯了,也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但与现实一对照,才知他“疯”得明白,糊涂得“可爱”。

然而,历史的经验也已反复证明:“糊涂与清醒是互相

转化的,人不言比人言更可畏。”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就怕鸦雀无声!”

当然,就声音的生存与自身把握的底线来讲,也应当是理性的,直抒胸臆不忘审美,呐喊也不乏理性的判断,只是这理性必须真正发自“道”与“知”,如果凌空蹈虚,以致连声音的楞角也打磨掉了,成为理性的玻璃球,那这种声音不要也罢!

2003年1月11日

我的学习总结

党员先进性教育已进入整改阶段。就个人而言,总结一下,十分必要。

先说学习,收获不小,但也有曲折。起初,我总以为“先进”也者,概括起来无非三句话,即平素工作要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要能站出来,危难之中要能豁出来,用不着长篇大论,同时就这三个“来”来检查,也很自负,觉得无论是在党的战争时期与建国时期,还是在建国后的“文革”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后,五十六年,自己虽非出类拔萃的一员,但亦问心无愧。后来,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特别是经过同志们互相讨论的帮助,才使自己认识到:先进性首先是识见于先的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上不去,不要说“站出来”,就是跟上走、随大流、不掉队,也难。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速转型的时代。城乡矛盾,贫富矛盾,资源环境同发展的矛盾,腐败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分配与再分配不公的矛盾,传统

文化与现代普世价值观的矛盾,历史陈疴同改革开放实践的矛盾……,纵横交错,而由这些矛盾所生发出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也纷乱庞杂。如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再认识;执政党的生命力究竟是什么?党的干部应该对谁负责?等等,如果弄不清,跟上世俗偏见走,那就有可能于无形中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有三。首先,它对这一社会形态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它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同这一矛盾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消亡。其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消亡又持一种现实而非急于求成的态度,并提醒人们防止“左派幼稚病”。第三,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发展动力,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肯定的。赞扬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承认它在人类历史中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但我们过去却认为其一无是处。这是非常有害的。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论述各种“反动社会主义”时,便对这种片面的虚无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因此,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它的根本性质,基本走向,如今便不能不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许多旧模式的超越。一方面,经过扬弃,它吸纳了,或正在吸纳着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创造与其一切可利用的东西,以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在自己的实践中

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研究与实践。效率与公平兼顾,正义与竞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其实践的快速发展,如今甚至已超过了我们思想认识的速度和想象力,为世界所瞩目,成为世界社会学科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

近一二十年,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给我们很大震动。过去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主要因为它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但苏共算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呢?实事求是地说,它在理论上要比我们挖得深,但它的执政失败了!而也正由于它的失败,也才使我们有了一系列的新认识,这包括“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等等,总算看清不是政党性质便决定了一切。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进一步说,是不是经济一上去就把问题解决了,也不一定。印度人民党这些年,曾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达到6%~8%,去年还达到10%,但今年它却下台了,原因就是它执政这些年只重效率不重公平,阶级分化严重,使整个中下层的日子难过,所以老百姓就把选票投给了国大党,因为国大党提出关注穷人啊!你看:“泥巴打败鼠标!”(《参考消息》语)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它说明对公平与效率这对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的矛盾,马虎不得,稍有不慎便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执政党的地位。

几十年来,我们天天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却始终没有解决。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成了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不过,多年的经验教

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尤其不能把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个别原理(如阶级斗争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具体体制以及革命形式等许多论述都是“历史的论述”(恩格斯语),必须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且,都属于途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即根本)。坚持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是遵循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则主要应看是否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是前提,是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与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目的,因此,这也应是检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不是马克思的个别语录或其它。

共产党的干部对谁负责?不用说,人民的长远利益至上,要对人民负责。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正确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上级负责,对下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

应该承认,上级领导的决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的,服从上级决定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乃至对下级负责是一致的。但由于人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党性强弱等这些综合素质不一,致使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难以避免;因急躁冒进、盲目蛮干而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有时也难以完全杜绝。历史上,我们党是依靠党内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来使问题的发生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但这个优良传统自被“文革”破坏以来,至今也在一些地方、单位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

名存实亡,徒具形式,致使“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造就了一批只唯上不唯实的势利小人。居庙堂之高不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不忧其党,把党的工作当成谋私的“本钱”和盗名窃誉向上爬的“阶梯”,不体现人民利益,甚至伤害人民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党员都能有一种自觉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觉悟,洞幽烛微,敢言人之不敢言,与假丑恶作不疲倦的斗争;开风气之先,敢当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先行官”。如果说“先进”的话,我看这才是党的干部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先进性”。

并不是说党的干部就应该是超人、完人。但就一个党员的党性来说,他就应该有这样的先进性。这是党性的要求,也是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我们说,在这新旧交替、鱼龙混杂、充满矛盾的时代,又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长于质问的党性更让人期待呢?

这就是我的总结。

2005年5月28日

也谈生意难做了

近来每遇“海”中人，均呼：“生意难做！”于是我也想说说这生意的难做。

人为什么要做生意？无非为赚钱。但钱为何物？“生意人”又未必明白。

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钱，其本身是凝结了人的一般劳动的。钱，是劳动的尺度，所以，劳动付出与自己所赚的钱应成正比。

但是，一个时期的商海里，却随处可见“不等式”。投机钻营，炙手可热；坑蒙拐骗，立地暴发；买空卖空，空中取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假冒伪劣，充斥于市；走私犯禁，目无法纪。有的只要和某些权力粘上，转眼便成富翁，要不怎么能舍得花几十万元买条狗，把人民币卷成鞭炮放呢！如今，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法制建设这只“强硬的手”，均已悄悄进入了市场，尽管这几只“手”现在还不太理想，但再像过去那样赚钱也不大容易了。

于是,当某些人也想步此后尘时,“生意”就“难做”了!

盲目“下海”,屡遭败绩者喊难,难在自己不谙此道;

守法经营者喊难,难在竞争对手如林,货比三家,买卖难成,但却难的正常;

投机钻营,坑蒙拐骗者喊难,是难在市场机制渐入正轨,价值规律的作用明显增加,加上消费者的抵制监督,自然要使那些奸狡诡谲之徒处境不好;

钻政策空隙,梦想以钱换权,再依靠权而暴发的人喊难,是难在宏观调控的举措增强,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再若胆大妄为,便不能不有所顾忌;

走私犯禁者喊难,则正好说明法制的严肃性、权威性及其对市场的监督制约正在起作用。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生意不难做。比如:专为公费吃喝而花样百出的高档宴席;专为公费娱乐而到处建起的豪华舞厅、夜总会;专为公费送礼、打通关节而生产的极品烟酒、精品服饰、高级营养品等等,这些生意尽管不难做,但也见不得人,只要体制改革与反腐败继续深入下去,他们也总有一天要喊“难”!

由此可见,生意难做者,难的正常也! 不难做者,不正常也! 所谓正常,是那个难字说明市场的运行机制正在完善,表明诚实劳动、本分经营才有真正的价值。所谓不正常者,则表明那些不难做的生意其实都是在打公款高消费的鬼主意,所以,我愿那些发国家财的生意能够很快难起来,并让其难度大些、再大些!

1995年4月2日

官格与人格

读过安文忠、张凤霞同志的文章《做官与做人》后，很受启发，它使我想起了官格与人格问题。

格即框，一定的标准或式样，将其具体到做官与做人，就是做官与做人的标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官格与人格。这个“格”，主要看行。

官格与人格，自古以来便有其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评价标准与内涵。但强调做人要正直、正派，为官要清正廉洁，正大光明，则是各个阶级、各个时代始终不变的主题。如今的时代，我们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综合素质来衡量人，为官则讲的是德才兼备，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正”字。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有些人似乎早已无视这个“正”了！为官也好，为民也罢，总以为开放搞活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会弄事、玩得转，便是好样的，致使一些原本就品格不正的人“得势便猖狂”，什么坏事都敢干。为文不以炮制黄色图书、音像为耻，为商不以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为缺德,丧尽天良的毒品贩子以害人为发财之捷径,杀人越货的强盗还自称“好汉”!人贩子如倒贩牲口一样倒卖妇女儿童,横行一方的地痞流氓则以恃强凌弱为能,坑蒙拐骗的勾当随时可见,种种被人唾骂的黄色服务有恃无恐,至于那些本是十分庄严的执法领域,若一旦在其某个环节上被这种品格不正的人掌握了,那就更可怕了。公事或公开的场合,这种人把大道理讲得滴水不漏,可私下场合也把丑事办得让人怵目惊心。有的,被有钱人拨弄得颠三倒四,把权力当商品,官格人格扫地以尽;有的,花天酒地,什么都搞,丢尽了官格,也丧尽了人格;有的,营私结网,今天跑这个请那个,明天又赠这个送那个,花公家钱,结自己的关系网,败坏了官格,也辱没了自己的人格。

官格与人格哪个重要?我看是个统一体。端正的官格可锻炼升华人格,严肃的人格又可使官格得到自觉的规范与发挥。固然,人不做官还要做人,要守住自己心灵上的最后一方净土,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来说,官格人格应当配套。否则,若一旦在群众眼里留下品格不足而神气十足的印象,那就很难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了。

1996年6月23日

实绩与不实之绩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干部使用上有个通俗的提法:“凭党性干工作,看实绩用干部。”这使德才标准有了新的载体,受到干部的欢迎。但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不知为什么往往被人忽略,不看党性,而只看实绩,于是便使实绩走形变样,脱离了实际,成了不实之绩。

不实之绩有多种,择其大端约 6 桩:一曰“数字论英雄”。特别是在那些事关个人荣辱进退的经济指标上玩“数字游戏”,互相攀比,致使一种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虚报浮夸风重新抬头。一方面是形势大好,数字喜人;一方面是效益滑坡,财政拮据,有的连给自己按时发工资都成了问题。二曰“避难就易”。比如:精神文明难出政绩不抓,反腐败的难度大不抓,党的思想建设难以量化不抓。相反,却热衷于那些“盆景工程”、“贴金工程”与“形象工程”,把“政绩”树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讨了上级的喜欢,却留下群众的怨言。三曰追求表面“繁荣”。宾馆、饭店、卡拉 OK 舞厅、高档商

场,蜂拥而上,超越了购买力,也脱离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与市场容量,致使那些富丽堂皇的楼、厅、馆、厦少了公款消费便难以为继。四曰“短平快”。拼设备、拼投入、拼消耗,只说眼下的“绩”能“看得见,摸得着”,却丧失了发展后劲,留下个烂摊子,谁去都无法“收拾旧山河”。五曰“赶时髦”。别人干啥我干啥,全然不顾实际与可能,结果,合资只见意向,不见外商;上项目只见报道,不见工厂;开发土地,圈了一片又一片,只见草长;抓扭亏则硬把亏损单位与盈利企业捆到一起,一夜便摘了亏损帽子,自己糊弄自己。六曰追求“轰动效应”。只顾一头子,搞“大手笔”、“大制作”,一鸣惊了人,却造成当地经济的整体失衡,寅吃卯粮,捉襟见肘。有的,财力不足便打群众的主意,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成了家常便饭,加大了干群矛盾。

实绩不实,实际上是“凭实绩用干部”的不实。恕我直言,如今的“凭实绩用干部”,在某些地方早已简化成“凭数字用干部”,切断了与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的必然联系,也切断了与那些直观看不出来、数字量化不出来的许多潜在的抽象工作的联系,于无形中助长了短期行为,助长了形式主义。在某些用人风气不正的地方,则由于严重存在着凭关系用干部的腐败现象,使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精于溜须拍马,敢于吹牛撒谎的人,成了气候,于无形中使历史上的“假大空”借尸还魂,所以,这种地方的“实绩”便也有如虚光耀眼的肥皂泡,除了嘴上功夫,很难再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实绩”了!

实绩,是实践的结晶,也是实践反馈于认识的实证。实绩的实与不实,都要在历史上回到认识,进行再认识,接受

历史的检验。同时,也要回到邓小平同志说的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上来,接受人民的判定。如果只讲个人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的作用,那是迟早要“翻车”的!

1997年7月2日

《蓝光闪过之后》

这是一部电影纪录片的片名，于唐山大地震三年后的1979年摄制完成，并在全国放映。由于当时正处于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它虽然使我目睹了败壁残垣的恐怖，瓦砾成堆的空旷、萧条乃至奔走于死亡线上，斗志昂扬，不畏艰险的解放军，却未得到灾难的有力认知。但5月12日四川汶川的这场《蓝光闪过之后》，却使我在那条冰冷的幽明异路的阴阳界上，全方位地看到了我们人类超越极限的伟大。

地声隆隆，尘土蔽日，天旋地转，房倒楼塌，就在逃命成了人的唯一意志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高喊“快跑”的同时，却用自己的身体护卫了老弱妇孺，而许多人刚刚逃出死地，惊魂未定，却又冒着余震的危险返回抢救那些压在废墟下的人，有的甚至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一个个感人的镜头，一个个动人的场面，纷至沓来。从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生死营救，到浸透温情的举国援助，从抢救、医治、防疫

到伤员转移等一系列复杂工作的安排调遣,到后援物资与人力资源的源源不断开进,每一时、每一处都无不涌动着 13 亿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浓烈的手足之情。

我的双眼模糊,心房里的血不断往外涌动。我奇怪,这个曾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为什么如今却使我感到陌生,甚至有点不认识了昵?

.....

一个老乞丐悉悉碎碎地抖动着他那双肮脏的手,搜遍全身,将其所有的 105 元钱悉数投进了捐款箱。

两个女学生在学校大楼废墟前长跪不起。原来,她们俩是她们的老师吴忠红最后推出来的两位同学,而此时的吴老师则已长眠地下了。

5 月 27 日刚刚抵达青川的四川省军区少将司令夏国富迎着向他一路小跑而来的青川县武装部上校部长袁仕聪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在军队中很难想像。原来,这主要是因为这位上校在执行抢救命令的过程中,曾三次路过埋有其母亲与侄女的废墟也未停下来的感人事迹,早已在老百姓中到处传说。

谭千秋,一个应该永远载入史册的老师,他竟用自己的脊梁顶住了塌下来的屋宇,而在其身下却护卫了四位小学生的生还。也许是其名讳中的“千秋”二字,使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龚天秀,一个不敢独自睡觉的弱女子,地震中,丈夫为救她而负了重伤,走前只留下一句话:“如能得救,照顾好孩子。”可她自己的一条腿死死地压在水泥板下抽不出来。最

后,还是她向营救者要来锯子,自己生生锯掉了自己的那条被压的腿,才被人营救出去。其决绝与坚韧简直令现在的人无法置信。

此外,如从废墟中艰难爬出后又两次爬回废墟背出两名同学的“班长”林浩、在废墟下用身体护住同学的“篮球男孩”甯加驰、为救同学而失去右臂的小女孩王彬……,这些在灾难中释放了最美好、最光明的人性光辉的孩子们,对于我的内心深处的那种触动,几乎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谁曾想,一个无街不成市的社会,能有如此朴素的热忱,会有如此真诚的关注,会有如此无私的热情,会有如此痛我所痛的悲痛。

谁曾想,一个商业气息这么浓的社会,拜权拜物的游戏规则曾令我们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时候,诚信、守诺、热血衷肠、济困扶危等这些人间正道,却在“呼隆”一声的震荡中作了全新的填补。善良被唤醒,同情被感化,良知迅速回归到人之本性。我总觉得,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复活”,是人性的“复活”,更是一种社会“良知”的复活。它正磨砺着我们的仁心、爱心、情感、道义与一个人应有的社会责任。

是的,没有什么比大悲大喜更能历练人的神经与人的情怀了,也没有什么比大爱、大志的崛起更让人欣慰与自省了。不必期待。我相信,经过这次灾难的洗礼,我们已经又一次地爬上了一个制高点。这里面有你、有我、有我们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但他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国人!

2008年6月25日

附一 诗十四首

述怀(八首)

一

宦海沉浮四十三,好书好字不好官。
世事粗谙身已老,切身经济是加餐。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逝者如斯长已矣!回首天涯一片丹。

二

两袖清风一书屋,一身傲气半屋书。
心同野鹤与尘远,却道天凉好个秋。
老来不知愁滋味,夜对孤灯只读书。
从此此身为己有,不是浮云亦自由。

三

谁在人间得久留,年逾七旬复何求。
闲倚南窗且寄傲,一任夕阳伴书读。

傍晚郊塬独散步，枝头落日黯然收。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留？

四

政声应视人去后，功过毁誉看公论。
话到功名心本淡，自甘云水著浮身。
曾经九死不怕鬼，革命一生何俱贫。
长啸一声归去矣！不求依附只求真。

五

一生坎坷已成翁，独立寒秋向晚风；
此身虽已闲如羽，回视“千钟”一发轻。
天道渐远人道途，力微当自慎前程。
岁老无须称上驷，只把衰朽度黄昏。

六

仰以察古俯观今，天意从来高难问。
老去休作天涯想，且抱诗书对花吟。
病起翻书如访旧，闲梳白发乘余阴。
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七

（18年之后的1972年5月终于接到我的
政治结论通知有感）

功名傀儡场中物，只见蚊逐与蝇争。
人间何处是穷通？是非名利有无中。
劫后书来感不尽，着着错尽气自雄。
老来报国成何计？难忘屈原李杜魂！

八

披发长歌览大荒，凡人也有一时狂。

每于几微看世界，信有人间雾茫茫。
世人逐势争奔走，逸乐安知与祸双。
眼前道路无经纬，一天明月半天霜。

读史

九

沉浮不在奸与忠，英雄遗恨古今同。
丹心一点如亮晶，难求朝野立论公。
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中。

十

不是无端情绪生，直将过去写成吟。
但写真情并实景，不以祸福乱己心。
鬓华虽改心无改，文似冰壶见底清。
只是老来心偏苦，吟向秋风白发生。

十一

虽居世网常清静，终年无送亦无迎。
有时直上楼之顶，披云望月笑一声。

十二

退后方知一身轻，但忧不见改革成。
我党改革成功日，欢庆无忘告闲翁。

（1992年8月借陆游《示儿》诗韵赋于粮食处为我离休而召开的送别会上）

打油诗·谢客（1982年题于自家门首）

十三

春节锁门谢客，并非不近人情。

只因浮情旧礼，日渐虚繁低庸。
 令人啼笑皆非，让人受宠若惊。
 有的超越友谊，其中奥妙难云。
 吾本一介布衣，“慎其独也”平生。
 几经升沉苦乐，侥幸未坠红尘。
 今与老妻远去，跳出情网樊笼。
 此举曲劣和寡，必将贻笑四邻。
 但为节操自守，宁肯一意孤行。
 切望诸亲好友，勿以碰锁为愆。
 君子之交若水，不在礼还往送。
 假期若有急务，请找朱、李、长胜。

（注：“朱、李、长胜”为地区粮食处当时的三位副处长）

养生吟

十四

静以养心动养身，用以养脑俭养魂；
 惜气存精养精神，清心寡欲不劳心。
 食唯半饱无兼味，茶只两吨不多饮；
 世态炎凉不生嗔，毁誉由人不争论。
 正谊不登傀儡场，亦不追欢悦世人；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理经纶。

附二 我的回忆录(之一)

两个母亲

—

一辆东洋车在广安门大街上艰难地挪动。车上坐着母亲、妹妹和弟弟,脚下还塞了一只藤篮、一个手提箱,箱子上面还塞了一个包袱。小弟虽然被母亲搂着,但实际却在那只包袱上坐着,这怎能不使车一走一晃,且不断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呢?

1941年的北京城,除了长安街、东西交民巷有点柏油路外,其他街道还都是些石子路,东一个坑、西一个洼,无风三尺浪,有雨一街泥。那辆车,看起来也是一辆临近报废的“老爷”车了,车轱辘不圆,车把被人手磨得起了弯。拉车的看起来岁数不大,但被鸦片抽得形如枯槁,骨瘦如柴,走不上两三步便咳嗽一声,没进宣武门,他便歇了两次,干咽了一个烟泡,嘴里时不时地唠叨着一句话:“这年头……唉!”

街灯隔着三五个电杆才有一盏是亮的,照在马路上,把人影拉得老长老长,我们一群人就像晃动在午夜大街上的幽灵,毫无声气,除了车夫那一声声的干咳:“咔、咔……”,空气里,留下来的便只有车轮的咯吱咯吱声响了。

我们赶的是午夜3点去张家口的火车,但从“甘肃会馆”出来,就1点多了。磨磨蹭蹭,我估摸此时至少也已两点,心里不时起急,又不敢说,可走在前面的我们那位领路人马凤山老汉却沉不住气了,一拐过菜市口他就催车夫快点,一次两次,那车夫还不说什么,次数一多,那车夫就不耐烦了:“您来试试,省钱就别想快!”两人一顶嘴,母亲坐不住了:“让我下来走吧。”我们都知道,她肺上有病,不能累,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的病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得的。父亲领着看了好几个中医,都说是风寒,不碍事,可就是不见好。最后去看施今墨,怀疑是“癆”,但也未定。有一次母亲咳了一夜未能入睡,父亲急了,便找来两个烟泡(鸦片)去试,谁知那像黄豆大的一点点,竟有神奇般的效应,不咳了,可从此也害了母亲一生。先是喝,后是抽,到父亲去世那一年,她老人家已因病而成瘾,不吸一口,那咳嗽就没完,脸憋得铁青,让人看着害怕。

母亲的病是怎么得的?小时候我没想过,也不会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那是心理上的长期忧郁所致。她与父亲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牺牲,为了自己的母亲,也为了她那不争气的弟弟。

母亲的老家在右安门外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村庄里,是汉民。听姥姥说,祖上几代都在翰林院当差,家里还挂过

“千顷牌”，但到她公公那一代便垮了下来。我的姥爷很早便死了，姥姥领着我母亲和我舅舅苦撑苦熬，在那个大家族的分崩离析中备尝了手足反目、弱肉强食的苦痛，所以，她在女儿婚事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她这一家三口带出那占地百亩，有着虎皮石墙包围着的大院子，把她养老送终，给儿子成家立业，结果便造成了一个 18 岁的闺秀与一个 40 岁的异乡男子的结合，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说句心里话，我父亲也是个老实人。他本是当时被称作甘肃化平县，如今已划归宁夏改称泾源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有一妻四子二女，但只有祖上留下来的百十亩薄田，所以，早在上个世纪初他便把农活交给了孩子们，自己出来给人拉骆驼，补贴家用。那时的骆驼队，是商品流通中的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寸步难行，商人们便利用骆驼沿着毛乌苏沙漠边缘的古长城一线把青海的盐、宁夏河套地区的粮、甘肃的烟叶、食油等运至包头、张家口乃至北京、天津等地，然后再把那里的布疋、绸缎以及煤油、火柴等“洋货”运回来，以获取微薄的利润。但这微薄之利也只能产生在驼工的脚下，产生在驼工的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劳动付出中。他们每人要负责一“联”（8～12 只）骆驼的喂养，日夜兼程。骆驼是三五天才喂一次，把料口袋掺上盐挂在它们的脖子上，边走边吃；人则在饥饿时把自己背的炒面嚼上几口，边吃边行。饮水是东家用羊皮制作的一种“囊”装着，但也只有在押运的掌柜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互相传递着喝上一二口。有时三五天，有时七八天，才能走到一处有人家的地方，歇歇脚，但这也只能是掌柜与骆驼的休息，驼工们要互相帮助着把驼背上那二三百

斤的货物一个个抬下来，走的时候再一个个抬上去。那可真是一场“死打硬拼”的战斗啊！不论冬夏，每到此时，驼工们便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把两肩伸进驼架，只一声“起——”那脊梁上的汗便随着升起的货架而渗了出来。据说，有的驼工因这种爆发性的用力而吐血，有的便倒在路上与沙漠长眠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驼队行至北京的昌平一带碰上了曹锟的败兵，货被抢劫一空，人也差点丧命，掌柜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把骆驼悉数卖给了汤锅，钱也悉数分给了大家，然后干干净净地洗了个“乌苏”，便在昌平的一个清真寺里上吊自尽了。流落在北京的父亲先是在甘肃同乡会的帮助下，为一家车马店“挡槽”（即店小二一类的雇工）。后来，有了些积蓄便出来自己做起了小买卖。也是天不绝人，不几年的功夫，竟也有了自己的店面，于是便也有了异乡安家的打算。不过，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与母亲结合这个问题上，唯一的一个要求便是要母亲进教，与那个大院里的亲戚断绝来往。这对于姥姥来说，可说得上是正中下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姥姥对那个虎皮石墙围起来的大院为什么那么地决绝。记得母亲还领着我回去了一次，姥姥在我的记忆里，则从未登过那个大院的门。

父亲与母亲的婚礼在大栅栏有名的饭庄“同和轩”举行。听姥姥说，婚礼很隆重，八抬大轿从右安门外一直抬进前门，并请了当时著名的天桥清真寺冶亮普阿訇主持婚礼，念了“依扎布”（证词）但参加婚礼的除了陕甘同乡以外，双方都没有一个亲戚到场。他们婚后的第二年（1931年）有了我，两年后又有了妹妹，随后又有了弟弟。按常理说，这应

该是个欢乐的家,但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就感到除了我们几个孩子以外,他们都活得很沉重。父亲只是每天回来吃两顿饭,吃了就走,母亲则整日抱着一本书不抬头,一切家务都是姥姥操持,连我们晚上睡觉都是跟姥姥一起睡,而我们也只有跟姥姥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了无拘无束,有了无法无天。

我总感到我父亲是个冷漠得出了奇的人。除了店里的事情,他的最大的快乐便是每个“主麻日”到天桥清真寺礼拜时,随自己坐的车再拉上一洋车面,站在寺门口,看着寺师傅一碗一碗地把面舀给穷人,而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的笑脸。在家里,他除了偶尔抱抱妹妹以外,对我和弟弟连正眼瞧一下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对我只笑过一次,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为他写家信,而且第一次就能把他想说的话写得清清楚楚,于是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脑袋说:“行!比我强,将来就是摆个代写书信的摊子也饿不死了。”不过,母亲却不是这种要求。我五岁多一点便被送进南横街一家私塾去读“人之初”,后来虽又转进羊肉胡同文化小学去上洋学堂,但每晚的一篇“大仿”和一首千家诗的抄写是要交卷的。每个礼拜日,她还要为我追补原在私塾没有读完的“四书五经”,先领读,后开讲,每章都要重复三四遍,然后便要我按她讲的复述,复述不完整时,便要我跪在地上去想,如能想出,还则罢了,否则便是一顿掸把子,辟头盖脸,不容分说,可打完了她又抱着我哭。我那时的脑子里经常有两样东西在晃动,一是爸爸嘴唇上那两撇并不怎么浓密的胡子,总透露出一种威严,让人害怕;另一就是妈妈的鸡毛掸把子,似乎是活的,总在

我的眼前跳跃,有时半夜里便被这两样东西惊醒,大喊大叫。现在想来,我至今仍有的半夜惊醒甚至睡不着觉的毛病,是不是也跟母亲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有关?说不清。

父亲的死,很蹊跷。那年他虽已 53 岁,但身体硬朗,也从未听说得过什么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从不在外吃饭的他,那天下午却告诉母亲店里和他约好了,在柜上吃,晚上不回来了,走时还把妹妹抱起来亲了亲,可也就在那天晚上出了事。大约是午夜 1 点多钟,柜上的两个伙计风风火火地来把我跟母亲叫了去,只见店里灯火通明,爸爸住的那间上房里里外外都是人,一位戴眼镜的医生正分开众人往外走,好几个伙计阻挡着他,哀求着他:“您再给看看吧!行行好,救救我们的掌柜,他可是个好人啊。”但不管怎么说,那医生只是往出走,既不开方,也不给药。待到我跟母亲奔进那臭气熏天,床上地下全是呕吐与排泄物的房间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最后,他只挣扎着拉住母亲的手,说了一句:“你可要‘护食奴’着啊!我对不住你……”便闭上了眼睛。

“护食奴”,是阿语,也是我们化平县的乡土话,意即“原谅”、“谅解”与“宽容”。但此时的意谓则只有他们老两口自己心里清楚。母亲会意地点了点头,泪在不言中滚滚落下,然后便一仰脖子,昏了过去。

据伙计们讲,父亲从发病到咽气也不过两三个小时。而令人奇怪的是账房先生——一个前清时代的老童生,民国以来曾为多家商号料理过账务,且向以账算一丝不苟而享誉商界的人,却不知去向了,而所有的账簿也被二掌柜马耀南查封了。尽管那晚他并不在柜上。母亲苏醒过来的第

一件事便直奔账房去找账,但面对那些盖有马耀南私章的封条,只得作罢!

父亲死后的清产、分账、财产分割、丧事处理乃至我们家的内部分家,都由马耀南一手包办了,也办得“漂亮”。他请来了当时汉奸政府的商会副会长、也是我们甘肃人的张秀石坐镇,开了一个有甘肃同乡会正副会长与米市胡同清真寺众位社首参加的一种说会又不像会的那种莫明其妙的会。对于占有60%的资本,有着主管经营权的我们家,只一句话,还有你们多少钱。至于这账是怎么算的,开业以来的盈亏情况,竟连一个交待亦无。尤其,对于分账后有资格参与我们家内部分配的也只有我们弟兄六人,作为寡妇的母亲与妹妹却无缘参加分配,他说:“她们迟早是人家的人。”所以就“免了”!至于老家四个哥哥急切不能来取的那份分家的钱,也暂由他来保管。语气坚决,斩钉截铁,与会者也是个个噤若寒蝉,一语不发。最后,还是一位姓于的同乡会长说了句公道话:“把寡妇算进去吧!你总不能叫她明天就嫁人啊!?”说完了便拿起拐棍往外走,谁也留不住,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扬长而去!

父亲的丧事办得既热闹又尴尬。送葬的那天大雨滂沱,但陕甘同乡的乡亲们几乎都来了,一些要“乜贴”的也闻讯而至,整个送葬的队伍在雨中竟迤迤迤迤地绵延了有一华里。北京人都知道,从宣武门外的米市胡同到西便门外的三里河回民公墓,小说也有三四十里,但当我到达坟地回头一看,大雨中的白帽子竟白茫茫的一片,站满了整个的墓园。可是,在给父亲“过七”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按照我们回族人的风俗习惯,送葬以后的第七天,要请

阿訇开经,追悼亡灵,同时也是丧主对丧事帮了忙的亲友进行答谢的日子。届时,亲友们也要给丧主送挽幛,表示哀悼。但就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事,也被马耀南抢了去,提前通知在他的家里办,理由是我父亲与他是最好的“多斯提”(兄弟、朋友),而我母亲则是进了教的汉民,即使办也不会使亡人满意。这简直是对母亲的莫大污辱。但她也有她的主意,几乎是在同时,她也以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孝子”名义散发了请帖,并亲自到寺里向阿訇与社头们打了招呼,这便使阿訇陷入了两难的处境。作为宗教职业者,他们是没有权力拒绝的,最后,几经磋商,还是马家做了点让步,把开经时间挪到了下午,这当然使母亲占了上风,但来我家接“都哇”的同乡也寥寥无几。记得好像除了那位倔老头于会长以外,就再没什么人了。不过,马家的事也过得不顺心。不知是谁,也不知是有意无意,竟在众多的客人面前喊了一句:“这满院的挽幛都是给蓝子玉(我父亲)挂的,可为啥不见蓝家的人?!”他这才请了两位威望比较高的社头来接母亲。本来,母亲是不打算去的。但有两位社头来请,又不能不去。所以,母亲只等阿訇念完经,接了“都哇”,便在客人们的喧嚣中拉着我悄悄离开了马家。

二

丧事后的母亲,脾气好了许多。她好像“豁”出去了,竟破天荒地给妹妹买了一件狸子皮的翻毛皮大衣,给我跟弟弟也做了新衣裳,把我们一个个打扮得跟洋娃娃似的,每日晚饭后还要领上我们到骡马市大街、菜市口去“溜弯”。有时还要站在“泰和”、“西鹤年堂”这些大商号门前听听“戏匣子”(商号收音机的扬声器)里面播放的白云鹏的大鼓,或王

杰奎说的评书《包公案》。她似乎在炫耀,又好像在寻求解脱,她再也没有在每晚逼我去读“四书”,也不让妹妹到清真寺里去读经了,并开始帮姥姥做饭、洗衣、理家,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可是,她的咳嗽却越来越严重了。我们都知道,她在悄悄地横下心来戒烟……

1939年的冬天,我四哥突然从老家来了,一身褴褛,备述老家兵连祸结之苦。说他本是个“哈里发”(即有一定阿文基础的经生)只是未“穿衣”(毕业、成为阿訇)如果母亲能帮一把,让他在北京的哪个清真寺去“住学”(作为当地的阿訇的学生,继续深造,并参预当地的宗教活动),有了社会影响,他便有了“穿衣”的可能,并进而在宗教界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显耀门庭。母亲被感动了。我知道,她是出于一种“打翻身仗”的心理而被感动的。她给他从头换到脚,缝了新被褥,请了“嘎随”、“古兰经”等必备的经书,然后便置办了一套套当时北京最好的“四色礼”,领着他一家家拜访当地的宗教名流、社首,几经游说,最后我四哥终于进了本坊——米市胡同清真寺。后来也听说他在寺里的影响不错,都说他“念”得好,有出息,母亲也高兴,说我们蓝家终于出了个人物。可是,没几个月,我这位四哥就变卦了,每次回来都向母亲讲一些生意场上的事,谁跑“单帮”挣了多少钱,谁做买卖发了家。有一次他终于吐露心扉,说只要妈妈给他本钱,不出一二年,他便把父亲的“兴盛昌”这块金字牌匾重新在骡马市大街挂起来,让陕甘同乡刮目相看。这的确抓住了母亲那要打“翻身仗”的心理。但她当时并未表态。姥姥说:“君子不跟命争啊!你们家可再也经不起事了。”母亲也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嘛!”可后来又听他嘀咕

什么：“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这些话我当时一点都不懂，直至多少年后偶翻旧书才找到出处。前一句的意思是要人懂得命运之不可变，安时处顺，出自《庄子》，后一句如译成白话便是“井泉的干涸难道不是从井泉中开始的吗？”出自《诗经》。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老人家的思想何以转得那么快。一天晚上，她把一家人叫到一起，从箱底翻出一只北京人送礼用的那种可装四五斤糕点的木匣子，哗啦一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对四哥说：“这可是我们母子的命，你拿去当本钱吧！”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事便陪着母亲到大栅栏的廊房头条一些金店去打首饰，有时买，有时换，有时刚戴几天便又拿去另做了。可我不知她竟攒了这么多。有打着“足赤”标记的手镯、戒指、项链、手链，有镶着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祖母绿的头花、胸花、耳坠、簪子以及大小不等的金条、金砖，花花绿绿，金光闪闪，摆满了一床，把我们一下惊呆了。可四哥却一脸的庄重，对母亲说：“妈！我们将来都要见主的，也要见爸，您放心，我绝不会干那些有失‘依玛尼’（信仰）的事！”第二天，母亲便与四哥一起到廊房头条的“老凤翔”金店把那些东西全换了现。看来，母亲很兴奋，可也很不安，有时“妈——”的一声把姥姥叫到跟前，却又反问自己：“我想说什么来着？”

破釜沉舟，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可又有谁能理解母亲当时的那种心情呢？

果然不出姥姥所料，四哥一去如“黄鹤”，翩翩飞出不再来。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姥姥也整日里唉声叹气。转眼之间，冬去春来，而我家又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

事,雪上加霜。

一天晚上,忽有两个“高丽”(今朝鲜、南韩)人押着遍体鳞伤的舅舅闯进门来,只问母亲一句话:“这人你们还要不要?”谁都知道,那时这些被北京人称作“高丽棒子”的人是谁也惹不起的。他们的祖国虽已早在19世纪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能随日军到中国来的却大半都是些不安分的地痞无赖。这些人,有的凭着自己会说日语,熟知日人的风俗习惯,一般都与某些日本人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公开在市面上开设“烟馆”、“白面房子”、(吸食鸦片、海洛因的店铺);有的开赌场、妓院、放高利贷、包揽诉讼,手眼通天,简直就是“二皇军”!母亲一见这些人便吓掉了魂,瘫在椅子上,好半天才镇定下来,把人家递到眼前的一堆借据翻看了一遍,然后便不假思索地把手上的一对镯子、一枚戒指取下来,说:“我们孤儿寡母就剩这点东西了,您高抬贵手吧!”这时,姥姥也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死说活说,才把两个凶神恶煞打发出去。

说起来,我这个舅舅虽然没出息,倒也并不是不要强。父亲按照与姥姥的约定,大概在与母亲婚后的不久便给舅舅成了家,而舅舅也凭着从小对古玩收藏的特长,做起了“打鼓”的生意(北京一种沿街串户收购古玩、玉器、旧家具的行业。“打鼓”的,系对这一行业的俗称)。买卖倒还可以,他那个小家也过得去,只是我那个舅妈不是东西,生活享受的要求无止境,总嫌舅舅没本事,不是吵便是闹,后来竟席卷了家中可以拿走的物品跟人跑了!舅舅怕舅妈的娘家跟他要人,东躲西藏,不知怎么一下便染上了“白面”(海洛因)这要命的嗜好。起先,母亲不知道,见他那无精打采

的样子,还以为他因舅母的事打不起精神,不时地塞给他一些钱,让他重操旧业,把生意恢复起来。后来知道了,也就改变了态度。有一次竟连哭带骂的把舅舅赶出了门,可舅舅也从此有一年多没来我们家。这一年多,母亲、姥姥都为父亲的丧事、四哥的突然来京与后来的突然失踪,搞得筋疲力尽,没有去管他,也没有想到他竟敢借了“高丽棒子”的高利贷!这便使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彻底的、也是无可挽回的走向了深渊。

舅舅于那一晚便带着满身的伤走了。舅舅走后,姥姥哭着也要走,说她再也没脸在这个家待下去了!母亲当然不会让姥姥走。但家境日艰,每况愈下,为了节省用度,母亲不得不求助于同乡会,搬到不要租金的“甘肃会馆”去住。可是,没几天,馆长杨田甫便又把我们从前面的大院逼到最后一间堆放垃圾、杂物的小院柴房里去住,连门窗也没有。每晚,母亲总是不断地在地上来回走动,咳嗽不断,姥姥则望着星空,唉声叹气!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听母亲跟姥姥说:“您还是回到您那大院去吧,那儿有您的房您的地,总比跟着我强啊!”可每每也只听到姥姥长叹一声,便没了回音。但姥姥也终于没有把女儿守到底。1941年的开春,甘肃同乡会通知我们说我四哥在张家口外张北县的一个叫“东号”的清真寺里“住学”,在当地的宗教界还颇具影响,他们打算派人把我们母子送去,同时并已在同乡中募捐了200多元做路费,要我们即刻动身。母亲一听,喜出望外,可姥姥却像霜打了,一脸的愁云。记得出发那晚,当我们一家跨出“甘肃会馆”的大门时,姥姥突然拉住母亲说:“妈今生只能把你陪到这儿了,你去吧,好好把孩子们拉扯大,那是你的

指望,你就别管妈了!”母亲怎么也不答应,哭着、嚷着、撕扯着,最后甚至跪到地上求她,但她老人家还是走了!向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教子胡同南口,一颠一跛地走了!什么也没拿,路灯下,只有她一生不离的长管旱烟袋上拴的那个烟荷包,在她肩膀上的空间里晃动。几年后,当我再次到北京打问她的下落时,都说她要了“乜贴”(要饭者)也再未回到有着她的一份房子跟地的虎皮石大院。我至今也不明白,那个虎皮石大院究竟埋藏了她老人家的多少仇恨!

三

火车上的拥挤杂乱,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张家口距北京的路程,只有两个多小时,但却是两个傀儡政府管辖,一个叫“蒙疆自治政府”,一个是“华北自治政府”管辖下的“北平(即今北京)市政府”,货币也是两种,一种叫“蒙疆票”;一种叫“准备票”。(即伪政府的准备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互不流通,但张家口临近农牧区,粮油肉蛋都便宜,而北京人那时连“配给面”也有时买不到。所谓的“配给面”,即伪政府按户、按人每月定量卖给老百姓的一种面粉,还不如现在的饲料,其中大部分是橡子与豆粕混合加工而成,尘土砂子什么都有,有时吃着吃着便吃出一团头发、线头与铁钉什么的,让人恶心半天,牙碜得合不拢嘴,但就这种面也要你拿户口本去排队,有时排了一天,说没有就没有了,谁也不负责任,于是这便造成了北京人一窝蜂似的到张家口去买粮,有些人因没办法在黑市搞到“蒙疆票”便带上北京特产的大白菜去换。张家口那地方气候冷,缺菜,什么菜到那儿都值钱,可这也就造成了火车上的秩序混乱。车厢的走道、厕所乃至座椅的上下,所有的空间,全被装大白菜的

包袱、筐子占领,人就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在大白菜上。母亲把大爷、大妈挂在嘴上,好容易求人把弟弟跟妹妹塞到行礼架上让出的一个空间,佝偻着腰,窝在上面,而我与母亲、马凤山老头,便有如打进那些大白菜中间的楔子,连挪动一下都很困难!

天亮的时候到了张家口,马凤山领着我们从桥东到桥西,一路询问,竟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接待我们这一帮形容憔悴的老弱,都当我们是“逃难”的。好容易挨到园台子找到一家车马店住下,日头也已偏西,母亲买了些煎饼馃子让大家充饥后,便都胡乱瘫在了坑上。可是一到晚上,车马进店,这问题就来了。过去张家口的那种车马店,现在可能没有了。这种店,一进门便是一个大院子,两厢都是一溜顺墙而建的马厩,马槽朝外,车马一进店便把车上或骡马身上驮的货物卸到当院,然后把骡马往马厩里一拴,倒上草料,这些车户、脚户便把自己带的莜麦面粉拿出来去做饭。做饭的地方其实也是人住的地方,一间大房里,锅头连着一个通间大炕,人就蹲在那大炕上做,也蹲在那大炕上吃,吃完了便横七竖八地顺势一躺,光着膀子亮着腿,咬牙放屁叭叭嘴,鼾声如雷。母亲一生哪见过这种阵势!早在这些人一进店,她便领着妹妹站到屋门外去了。这时候,虽然开了春,但乍暖还寒,晚风中只听她咳嗽连声,妹妹也好像在隐隐约约地哭泣,后来,还是好心的掌柜的娘子硬逼着掌柜与那些车户、脚户一起睡到前面的大炕上,把我们母子领到她的小屋睡下,母亲的咳嗽似乎才好些。可母亲这一夜也未能很好地入睡,她只把被头的一角盖在腿上,身子靠在墙上,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天,马凤山一早便出去找搭“黄鱼”去张北县的汽车了。所谓“黄鱼”,即为那些跑长途的汽车司机临时捎带的旅客。那时不像现在,大小城镇都有车站,有人卖票,有人招呼你上车,扶老携幼,车上有座,到站了还要喊一声“车到××,请准备下车”!哪有这么舒服的事。旅客就是河边那些不值钱也不屑为人一顾的黄花鱼,人家司机想“捞”了“捞”两条,不想“捞”就不“捞”。而做为“黄鱼”的旅客即使被司机“捞”上了,那车上也没座位,把人不是放在如小山似的货物堆上,便是把货物挪一挪,掏出个坑来把你塞进去,让你不见天日,提心吊胆,总怕来个急刹车,那些装货的箱笼包裹随着惯性向你袭来!

马凤山出去以后,母亲也许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忽然要带我们去黄土厂的姑父家。姑父叫马天凤,也是早年流落到张家口的“骆驼客”,现在的姑姑虽然不亲,但两家的来往也从未断过,每逢大小“开斋”节,父亲母亲要拿上礼来张家口给他们开斋,姑父姑母也要回访,有时还要在我家住上几天,在北平游一游。可是,曾几何时,姑姑那张连眉毛都会说话的脸,竟变成了铁板一块,一开门便把一只手撑在门框上,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地横站在那里问:“你们来干甚?”“甚”是张家口的乡土话,类似陇东的“啥”,询问词,也多用于语助,但姑姑此时的“甚”则带有明显的冷漠与轻蔑,一下子把母亲“甚”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放眼望去,透过小院那扇已经打开的屋门,上房里,姑父正端着一把小茶壶,歪在椅子上品茶,悠然自得,好像这门槛里外的咫尺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母亲终于明白了,也终于恢复了她那大家闺秀与生俱来的高傲,挺起胸,不屑地把门里屋里扫了

一眼,说:“对不起,我走错门了!”然后便把头发一甩,拉着我们走了。临到胡同口的时候,她把我们几个孩子叫住说:“记住,你们今后就是沿街要饭,也不许再登姑父家的门!”

四

张北,地处古长城以北的“坝”上。张家口人所谓的“坝”,并非堤坝或如拦河坝的那种山梁,而是高地,有如陇东的“原”,但要比“原”大得多。一出张家口你便看见它远远地横亘于天际,几与天接,但当你爬上去的时候,又是沃野千里,碧空如洗,草长莺飞,一望无际,好像那天比坝下面的天也高了好多。远远望着那一丛丛滚动着的羊群,你还会真以为那是天边的白云。不过,这地方也怪,有草无树,“老死不见桃杏花”加以无霜期短,农作物主要是莜麦、胡麻、土豆、糜、谷、黍和少量的春麦,与四季瓜果不断,一年到头都吃白面的陇东比,那可就差多了。

日头偏西的时候我们到了张北县。历史上这张北叫“兴和路”。因地处往来于元上都(正蓝旗)与元大都(北平)之间的交通枢纽,故曾与作为元中都的兴庆府齐名为“中都”,并建有行宫,可见其胜。元之后,尽管因政治中心东移,日渐衰落,但它仍是这个千里坝上的一个主要的农牧产品集散地。可是,自打其沦陷之后,由于其南领京津,北拒满蒙而俯视张家口的战略地位,这里又几乎变成了日本兵的兵营,街道上的日本人倒比中国人多,店铺关门歇业的十之八九,我们不敢久留,下了汽车便雇了一辆驴拉车赶到离张北县大约四五十里的公会镇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便朝大乌登进发了。

大乌登本是蒙语。但这里却住着十几个村子的回族农

民。有人说他们是明洪武三年跟大将常遇春、李文忠平北至此,有人说他们是历年“走口外”流下来的中原人,也有人说他们是清同治年间陕甘起义失败后沿古长城一线溃逃至此的关中回民。但我更相信第一种说法。因为这些村庄的名称都很怪,“东号”、“西号”、“五号”、“七号”,似与古代军队的编制番号有关。四哥所在的“东号”是这十几个村庄最东面的一个,离公会镇不远,约在中午时分便到了。四哥很惊讶,没想到我们会找到这种地方来,但旋即镇定,马上安顿我们在这里“开学”(即主持当地宗教事务)的佟阿訇家里吃了饭,又忙不迭地说要出去找房子,佟阿訇一听便热情地说:“找甚房哩!就在我这前院住,我不在的时候也给我老伴做个伴、听个门嘛!”四哥一听,喜不自禁,拿起扫帚就要去打扫,可马凤山却急着要走,我们知道,这老头家里只靠一个小杂货铺维持生活,孩子又多,日子过得很紧,是耽误不起的,如今为了同乡的事,拼着一大把年纪,千里迢迢,把我们送到口外,且分文报酬未取,也着实让人感动。这一路上,如果不是他的情况熟,地理通,有意识地躲过那些寻衅滋事的日伪汉奸盘踞之处,我们真不知会落到何种地步。所以,突然分手,倒让人依依不舍,母亲找出一条她最喜爱也平时很少戴的丝围巾递给马凤山说:“我也再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你别嫌弃,把它给老嫂子捎回去,权当留个纪念。”这老汉也未推辞,拿起围巾便急匆匆地上路了。

我们的安家几乎把佟阿訇家的家俱分了一半,锅碗瓢盆,桌椅板凳,柴米油盐,吃的用的,一应俱全。有时,师娘(佟阿訇的老伴)还要拐动她那两只缠得很小的小脚把她自己做的莜面窝窝之类的吃食送过来,让母亲尝,但母亲只是

礼貌地说声谢便完了，很少说话。没事的时候她不是坐在那里发愣，便是把我们几个孩子的棉衣找出来，拆了洗，洗了缝，缝了再拆再洗，没完没了，尽管是咳嗽连声、气喘嘘嘘，但谁也和她搭不上话。

四哥的吃住都在清真寺里，有时回来一次也好像是忙里抽闲，可说走又不马上走，站在那里，搭讪着，欲言又止，像有许多话要说，又像要等母亲问他，给他提个话头，连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我一见他那窘样就想笑，但一看母亲那冷冷的样子，便只好装正经，不敢多嘴。有一次，他终于开口了，说：“妈，我一直没敢跟您说，我……我……把那些钱丢了……”，可母亲还是不说话。好半天，他又说：“您相信我吧！这也是‘呼达’（真主）的定然……”。母亲依旧不语。最后，他嗫嗫嘘嘘的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母亲的意见，说：“妈，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凭我在寺里的收入，也能养活咱一家老小，您就不回北平了吧？”也许是这一句“不回北平”的震动，母亲终于从她忙着活计的手上把脸扬起，哽咽着说：“你先忙你的去，以后再说吧！”说完，便又忙她手上的活计去了。

母亲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但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四哥又失踪了。他在清真寺里的同学发现他的被褥与日常用具一件未少，但就是好几天不见人影，佟阿訇急得团团转，几乎把全村的男人都动员起来分头去找，足足折腾了七八天，但母亲却出奇的平静。她开始悄悄地收拾东西，该拿的，该带的，该给佟家归还的，都分别整理到一起，当村里人渐渐平静的时候，她试探着问佟阿訇：“您老人家能不能再帮我一把，把我们母子送到张北！”

佟阿訇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我知道你是我们这地方留不住的人,但你到了张北又咋办呢?”母亲也沉默了。我知道,她身上只剩下15块蒙疆票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母子四人到张家口的一张汽车票钱。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简直让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母亲此时却反问佟阿訇:“您不是常说甚事都听(主)口唤认定然吗?”这一问可真灵,佟阿訇连忙称是,第二天便叫坊上派了一辆车,并嘱咐赶车的到张北后一定要看着我们上了汽车再回来。可是,我们终于没能走出张北县,又回来了!

记得我们那天到了张北刚进店,便有一老一少骑着两匹快马赶来,那年轻人我不认识,老者便是东号这一坊十几个村中最受尊重的一位社头,名叫霍伍元。这两人一来便叫店家腾出一间小房让我们母子住下,接着又买来好些烧饼馕子之类的东西让我们几个孩子吃,然后便把母亲叫到掌柜的柜房里,不知说什么去了。不一会,母亲回来了,不吃也不喝,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炕沿上,我问什么都不回答。后来,她竟不声不响地往下揪自己的头发,揪了一绺又一绺,一绺一绺地抛在地上,不哭也不笑,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妹妹与弟弟扑在她怀里哭着求她,我便拼命抓住她那两只手,可她也像拼命似的把头往墙上撞,折腾了好一阵才平静了下来。傍晚,她又被霍伍元老汉叫去了。我心里一阵恐惧,可又不敢问,几经犹豫,还是大着胆,蹑手蹑脚地跟了出去,爬在柜房的门缝往里望,只见母亲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霍伍元老汉正细声细气地给母亲说着些什么,忽高忽低,说马木萨如何如何,却总也听不出个头绪来。不过,这马木萨我倒认识。尤其他那长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

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脊背不驼老弯着,走路不瘸老踮着,他那左眼,不知何故,下眼皮里的红肉一直翻在外面搭拉着,让人害怕。听说他的家道本来不错,只是有一年的一月之间抬出去了四个亲人,父、母、妻、子都死了,他也灰了心,便把十几顷地交给了佃户,自己却跑到清真寺里当了“木丈吾”(即专门给来寺礼拜者烧洗“阿不代司”水的勤杂工)。用我们回族人的话说,这叫赎自己的“骨那哈”(原罪)。那时,他每天忙完了寺里的活,还要给佟阿訇家里送水,可不知是佟阿訇给他说的,还是他自己的意思,每每给佟家把水送完,便也悄不言声地给我家倒上一担。但把水一倒就走,从未与我们这一家人说过话,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与这人有什么瓜葛。这时,只见那年轻人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往桌上啪地一拍,说:“都一天了,你倒是给人个声气呀!”这一下使霍伍元老汉也有了气,但不是对母亲,而是对那年轻人,说:“你这叫干甚?!这么大的事,你不叫他娘想好了能行吗?”

午夜时分,母亲回来了。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妹妹和弟弟,突然把我搂住,哇地一声哭了,说:“妈要领着你们跳火坑了……”。

五

路在我们的脚下重新展开,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但它已不是我们来时的那条路了,而是朝着“安固里淖”那个方向走,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不时有一群群的野鸭惊起,点缀在蓝天白云之间,倒也让人心旷神怡。

这“安固里淖”,史载其名为“鸳鸯泺”,是辽金两代帝王的春猎之处。但老百姓却称其为“苦海”,传说东海龙王的

三女儿爱上这草原上的一位年轻的骑手,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打入这淖下受罪,结果这夫妻二人日夜哭泣的泪水便把这淖水染成了苦水。我们现在就是绕着这片“苦海”走。岸边上,衰草枯苇铺了厚厚一层,骡车碾压过去,那枯草下面的泥浆便乘势掀起,溅人一身,从早上太阳冒花到日头偏西,我们才从这“苦海”的东岸走到西岸的山坡下,好在这山并不高,实际只是个梁,不到掌灯时分,便翻过梁去,到了“西号”。

马木萨家位于这山梁的半坡处,孤零零地一座房,一明两暗只三间,院墙塌成一圈拱起的泥土,杂草丛生,瓦砾遍地,就连那马厩、磨房也只剩下陡立的四壁。看得出,这是个荒废已久的家,只是我们到的这一晚还算热闹,院里院外,足有七八十个男女老少,引颈而望。先头赶回来的那个年轻人,这时正候在院外,态度也好多了,忙不迭地把我们领进屋,便招呼早已在堂屋围座一圈的阿訇“开经”,念“依布扎”——一段经文,也可以说是结婚证词,每每于诵读之中都要郑重地问一下女方的父亲:“你给了”?再问男方“你要了”?待他们都有了回答,阿訇们才一气把经念完,遂告礼成。可是此时的母亲却两眼发直,望着屋顶,好像对阿訇的提问没听见,再问一声,依然如此。而此时跪在地上等待接“依布扎”的马木萨,也是这样,把头垂到了前胸,对阿訇的提问一声不吭。这时,满屋子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霍伍元,可他也好像没了主意,良久,才站起身来,对阿訇说:“这都是说好了的,字据都写了,手印也压了,你老就念吧!”这才使这场尴尬的礼仪草草收场。

阿訇走后,一些参加婚礼的女眷们简直是不容分说,七

手八脚地便把母亲拥到里屋的炕上,说她中了邪,一位老婆婆竟从怀里摸出一苗针,扎进母亲的“人中”,只听母亲“啊”了一声,生气地把那苗针拔出,说:“你们饶了我行不行?”并摆了摆手,示意要她们出去,她需要安静。可这些妇女们谁也没走,黑压压地挤了一屋子。那一晚,霍伍元老汉也未走,坐在堂屋椅子上,不时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前额说:“真主阿!我这是干了个甚事……”。

三天后,母亲终于能吃点东西了,也开始挣扎着整理这个破家,不停地洗洗涮涮,擦擦扫扫,尽管是那样的力不从心。可谁知我在这个时候却出了个大问题。也许是因为母亲的病情好转,一高兴,便偷偷跑到山坡上跟放马的孩子们学骑马。起先,他们还只是让我骑那些经常使唤的老马,后来便把他们自己经常骑上用来在马群中追马、套马的那种“头马”叫我骑,可这马一见不是它主人,便尥起了蹶子,一下子把我撂在地上,人事不知。此后的十多天,我基本上是不给不吃,不给不喝,不叫不醒,只是糊里糊涂地睡。这坝上不要说医生、医院,就连点中草药也难找到。母亲只是守着我哭,毫无办法。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马木萨好像比母亲还要着急。他先是跑到张北买了二两红糖回来,拿到寺里请阿訇用诵念的经文吹成“都哇”糖,给我灌上,随后又几次上山挖来连本地人也叫不出名的一种草根,熬成汤,让我喝。当这些都不见效时,他几乎跑遍“大乌登”的十几个村去问偏方。后来也不知听谁说我这病是“汗病”,要长年在外的老脚户终年不洗的脚丫缝里的泥与小米一起炒黄,熬成粥,喝了才行。于是他又二次去了张北,在一家车马店等了三天,才从一年过半百的老脚户脚下找到这种“仙

丹”，回来如法炮制，果然使我服后出了一身大汗，好了！

我的病愈，也使母亲改变了对马木萨的态度，说：“真没想到他还是个好人。”但马木萨却仍是那种萎萎缩缩的样子，好像心里窝着什么事，母亲有时跟他说话，他却总是低着头，到该他说话时，又不知道他嗫嗫嘘嘘地说些啥，有时人还没听清，他又扭头要走，母亲气恨地说：“你一个山野汉子怎么就没个痛快劲呢？”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嗯啊一声，不置可否。此后，大概我们来都快一个月了，一天晚上他忽从他那小屋过来对母亲说，他已给几个社头说好了，仍然回到东号清真寺去当“木丈吾”，家里的生活，他也给佃户们做了安置，按时把粮油柴菜送来，不会有甚问题。说完，便从怀里把那张按有双方指印的婚前“约定”掏出来，递给母亲，说：“我原本只想要个孩儿，把马家的根续上，没想到他们把事弄成这个样子，委屈了你，我现在把它还给你……”他说得很平静，也很快，一反平日畏首畏尾的常态。可母亲却并未去接那张纸，叹了口气，说：“你就别走了吧！这也是主的口唤定然，我们就都认命吧……”说这话时，我发现母亲好像又哭了，眼角上明显地含着泪花。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还是走了。但不是去了清真寺，而是去给日本人做苦工。那也是一天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说马木萨这些年在清真寺里当“木丈吾”，躲过了好多“公差”未去，这次就不能不去了，说完，便绳捆索绑地把他拉了去。

“公差”、“公差”！不知有多少人去了便也回不来，母亲几乎天天去打听消息，可人们连那些出“公差”的人去了哪儿都不知道。从夏到冬，也不见个人影。还是一天晚上，我

们忽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大雪地里抬进一个人，母亲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骨瘦如柴的马木萨，爬在门板上，奄奄一息。细问来人，方知他在工地挨了打，伤未愈却又在肩膀上长了个“搭背”（一种恶性痈疽），整日流血流脓，还不敢叫日本人看见，否则便不管你是什么病，一律当作传染病拉出去活埋。后来一个当工头的中国人动了恻隐之心，偷偷把他放了，他勉强走到张北便病倒在一家车马店里，高烧不退，不吃不喝，幸亏这家店掌柜早先也是大乌登人，才打发两个伙计把他连夜抬来。母亲知道这种垂危的病人是经不起折腾的，便给他灌了些盐开水，随后又赶快熬了些小米粥一点一点地给他喂下，这才把他抬到炕上，而他也这才微微地睁开了眼，好像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奇怪的是，天快亮时，他忽然有了精神，把母亲叫到跟前，用手指指屋顶靠山墙的那根椽缝，示意叫母亲去掏。母亲踩了一个凳子上去，摸了好半天才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全是地契，她把它递给他，可他又把她的手推了回来，说：“我……我……”他“我”了半天也没“我”出个下文，却用手指指弟弟，眼中露出一种恳求的神色，母亲一下明白了，说：“你怎么还没死了这条心呢！”原来，当初他并无续弦之意，只想要个孩子续根，说让他出多少钱都行。只是这霍伍元老汉觉得他一个老光棍，终年在外，有了孩子也没办法带，于是便死说活说地促成了这场悲剧。但母亲虽然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答应了改嫁，却始终也未答应给他孩子，说：“我不能对不起孩子他爸。”如今，看来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改变初衷了。只见母亲一把拉过弟弟，让弟弟跪下，说：“你就叫他一声‘大’吧！”可此时的马木萨却脖子一软，把头一下

滑到了枕头底下,任凭母亲怎样呼唤也没有回音了。

马木萨死后,丧事草草而过。但一些让人恐怖的议论也随之而至,都说马家这地方太“硬”,谁住谁倒霉。一些老年人甚至劝母亲搬家,还说他们在晚间看到过什么,弄得母亲六神无主,每天不到掌灯的时候便关门。可虽知这冥间的鬼未至,阳间的鬼却先来了,腊月的一天,家里忽然来了几个汉子,一进门便对母亲说:“你哥叫你搬到他那里去住,那边安全,也好照顾你们。”说完,便将一应家俱搬上两辆大车,连同我们母子,一起拉去了“七号”。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母亲如今却有了天上掉下来的“哥哥”。当然,完全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准确,他不仅与马木萨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同宗不同房,同时也是大乌登这十几个村庄的首富,他叫马彦,因其为人阴险,尽给宗室弟兄们的产业打主意,向为亲房各家所不齿,当初木萨他父亲之所以要离开七号,举家搬到西号来住,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些,母亲也早有耳闻,但如今也只能任人摆布,一个身处异乡的寡妇,拉家带口,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六

七号村位于大乌登的北部边缘,孤零零的一座大堡,从这里再往北、往西,便都是汉民村了。早先这堡里住的全是马家的族人,如今则只剩下马彦一家,其余便是历年逃难而来的佃户,有回有汉,凭着两膀子的力气租种马彦的土地为生。与通常的富户比,马彦的家也并不算有多气派,但清一色的大瓦房,三进三出的院落,两厢还有数不清的厢房跨院,独踞一隅,这就使堡内那些佃户们住的土坯房黯然失色

了。我们去后,名义上是被安排在掌柜的院里,实则乃掌柜院中一个早已荒废的跨院,只一间屋,除了随身的衣服被褥以外,西号拉来的家俱一件未给,实际给了也没处放,家徒四壁,进门就是炕,每日的饭食有人送,但送来的也只是长工们吃剩的一小盆“苦累”(一种用土豆与莜麦面和在一起蒸熟的面圪塔),有时多,有时少,好在这个院堆着不少柴禾,饿了便把炕烧热,蒙头一睡,倒也自在。不过,好梦不长,没几天这马彦便发下话来,叫我每天去搂柴,搂多少,烧多少,小院的柴禾不许动。这可就把我害苦了。口外这地方,每年一场“坐冬雪”,至少也有四五寸厚,搂柴的人要先拿一大笤帚把雪扫过再用耙子去搂,风雪晦明,俯仰百变,有时忙活一天也搂不了多少,这便使我们那小炕时热时凉,而每当炕凉的时候我便被母亲嘶哑的咳嗽声惊醒,一种无以言状的歉疚与自责的心情油然而至。有时,就干脆起来,爬到窗台上,望着天边的月色,听着远远传来的汉民村那有如闷雷滚动的腊鼓声,直到天明。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打出了正月,给我们送来的饭食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差,“苦累”中的土豆多是一些冻坏了的,味同嚼腊。母亲找了一回马彦,要求与我们自己的佃户取得联系,把粮食送来,我们自己做饭,可这马彦却嘿嘿一笑,说:“租子我都代你们收过了,还找人家干甚!一个家里过日子,饭不够就叫上锅的多做些送去,何必自找麻烦?”母亲只得做罢。可是,肚子不饶人,弟弟整日爬在母亲的腿上哭,妹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也越陷越深。“荒岁儿女瘦,穷途涕泪零”。但我们的处境实际要比杜甫说的境况糟得多。杜甫说这话时,他还能领上妻儿老小上山采橡子充饥,可我

们在这千里冰封的坝上却连一点聊以果腹的野菜也很难找到。

也许是饥饿的驱使吧,那时候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理冲动,每每见到佃户们吃饭,便下意识地趴到人家门框上去看,他们有时也硬塞给我一点吃的,但也总要叮嘱我:“少掌柜,你可千万别让老掌柜的知道。”这其中道理,他们不说我也清楚。但面对着啼饥号寒的弟弟妹妹,我又毫无办法。为了不连累这些佃户,也为了不使母亲在马家失去尊严,我狠了狠心,便借出去搂柴的时候跑到那些汉民村去要,心想,那些汉民不认识我,自然不会把风吹到大堡里去,至于民族上的生活界限,觉得只要生米生面,料也无妨。可是这口外人的“生”与“剩”是一个音,每当我喊一声:“大爷、大娘有生吃的吗?”人家端出来的不是剩饭便是剩菜,我一看,扭头便走,把人家也搞得莫明其妙,甚至招来一声谩骂:“叫化子不吃剩饭,惯出来的毛病!”冷嘲热讽,再加上狗的无情追咬,有时奔波一天也所得无几,而最难过的还是母亲这一关。初起,我骗她说那些米面是我帮堡里佃户们推碾掀磨人家主动给的,她也信以为真,并用那个每天去伙房端“苦累”的小盆胡乱打些糊汤给弟妹充饥。今天编个李大妈给的,明天编个刘二婶送的,没多久,我就编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总觉得母亲在怀疑我,有时连看她一眼都胆怯。有一天,我在汉民村讨要碰上一位赶着马群路过那里的蒙族老大爷,见我可怜,便从马背的皮囊里掏出块干奶皮子扔给了我,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悄悄把弟弟叫出来给了他,可一转身却发现母亲就在身后,她一把把我拉进屋,叫我跪下,脸上那好久未见的威严一下从眼睛里逼射出来,问我是从

哪儿偷的！我委屈地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连自己也未听清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见母亲听着听着那无声的泪便落了下来，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她终于把我扶起来说：“孩子，记住，‘不食嗟来之食’，你是个男人，要有骨气！”并明确宣布：“再不准你出去！”哪怕睡凉炕。

可是，母亲第二天便改变了主意，天刚亮便叫醒了我，让我以搂柴的名义出去打问一下去东二台伪区政府的路怎么走，有多远，并叮嘱我只问生人，千万不能叫大堡里的人知道，一脸的严肃。我也感到事不一般，很快打问清楚便回来告诉了母亲，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色尚早，便抱起了弟弟对我跟妹妹说：“走，我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

七

我们又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是那么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只是又多了一层漫过脚面的泥泞。

按理说，这阳春三月，早就应该是桃花细逐杨花落，百紫千红斗芳菲的时候了，可这千里坝上却依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听人说，坝上独行，最让人害怕的是狼群，尤其是这冬去春来之际，它们三五成群，专袭那些远离村庄的羊群与行人。可我们走了一天也未碰到这些恶煞，唯一的威胁倒在脚下，“残雪暗随冰笋滴，连片泥泞恼人来”。从早到晚，一直走到月明星稀，几乎是一步一个趑趄地挨进了东二台，而此时的沿街店铺也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只好互相依偎着在一家店铺的廊檐下过夜，但一俟这一路行来的虚汗落定，那身体便不由自主地发起了抖，上牙打得下牙响，母亲赶快解开衣襟把弟弟裹住，可这又引发了她那无休止的咳嗽，几至不能自制。

不知是妹妹的嘤嘤哭泣,还是母亲的咳嗽把主人惊醒,我身后的店门“呀”地一声打开了,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走了出来,用手上的马灯把我们母子一一照了一遍之后,便把我们领进了屋,给老伴说:“快给孩子们烧口汤,看把这一家人冻成个甚了!”接着又把炕的一头腾开,让我们上炕。母亲俯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泥泞,刚要推辞,那老奶奶却一把将弟弟拽了上去,说:“甚个脏净,谁到这个地步都一样。”

一碗热汤落肚,母亲才逐一回答了老者的提问。这老人家一面听着,一面啧啧连声,忽地把大腿一拍,说:“对,告他个灰鬼没头鬼,他早就恶名在外了!”说:“这也是真主的安排,叫你碰上了我,天一亮我就领你们去。”原来,这老者的儿子在区政府当炊事员,他也常在那里行走,有不少熟人。可是,说到这,他又挠开了头皮,好像有什么难处,经母亲细问,他才告诉母亲这区政府新换的一位区长,本是一位念过洋书的人,早年还在北洋军阀曹锟的政府里干过事,自打曹锟倒台,他便归隐桑梓,谢绝了仕途,去年不知从张家口来了一个什么大人物,带着日本兵到他家去了一趟,他就出来当了区长。可这老头一上任便立了一条规矩,打官司要先递状纸,没状纸的一律不管。这就苦了这里的老百姓。这坝上不要说找个写状纸的,就是找个能写平安家信的人也要提上鸡蛋跑几十里。这东二台虽是这周围四里八乡的一个政治中心,但能写状纸的也不过一二人。要有四色礼,还要托人情,有时花上钱还要看人家高兴不高兴。所以,老百姓都说写状纸还比打官司难。这老人一路说来简直像诉苦,越说情绪越低,母亲等他说完才淡淡地问了一句:“大爷,您这里有笔墨纸砚吗?”老人不懈地问:“干甚?”母亲说:

“这个状纸我自己写。”老人一下睁大了眼睛,几乎是从头到脚地把母亲审视了一遍,又摇了摇头,母亲一下急了,说:“大爷,您若不信,我写了念给您听,您如果听着不行,咱们再找人写行不?”老人答应了,但也将信将疑。当他把他日常划“水牌”记“流水”的那套笔墨纸砚拿出交给母亲后,便爬在炕桌的这一头,一眼不眨地看着母亲把那一张大麻纸写完,压上指印,给他念了一遍之后,他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不过,让我说,他也许只是被母亲那抑扬顿挫的念状声调所感动,因为母亲写的有些话,不要说他,连我在当时也未听懂。

我们无疑是遇见了“宋士杰”。这老者天一亮便跑到区上给区长说他店里来了个女“秀才”要告马彦,连状纸都是自己写的,区长也感到有点稀奇,叫马上带告状人。当我与母亲进去时,只见这位区长一手拿着状纸,一只手用两个指头轻轻击打着桌子,一吟三叹地念道:“……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然,孤孀弱子,弥天之冤,复何以堪?天苍苍,野茫茫,‘何泛滥之浮云兮,飙雍蔽此明月’,草离离,露稀稀,‘梧桐半死清霜后,旧垒新坟两依依’……”念到这里,他忽然自言自语地“嗯?”了一声,说:“这句好像出自《九辩》,但这后一句……”母亲接过来说:“贺铸的《半死桐》。”这老头连连点头:“对、对。”接着,他把手往下一按,头不抬眼不睁地侃侃而谈:“不过,你可知道这《半死桐》的典故却出自《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他边说边把状纸放下,摇头晃脑的正欲把他的见解继续发挥下去时,眼一睁,见他面前站的竟是个一身褴褛的村妇,不禁一怔,马上改口问道:“这状纸是你写的?”母亲说:“是。”又问:“你都

上过甚学堂?”母亲说:“我没上过学”。“甚?”他好像没听清,眼睛里的疑惑也从他那老花镜片的上方直射过来,母亲赶紧补充道:“我是家教”。可这老头还要刨根问底:“你娘家是干甚的?”这可把母亲难住了。我知道,母亲向来不愿说她那个娘家,何况此时也不宜扯得太远,但此时她又不能不说话,几经犹豫,她以试探的口气说:“区长,您看是不是让我先说说冤情?”不卑不亢,好像也使这老头儿感到了什么,若有所悟地:“唔”了一声,又点了点头,但旋即又很快把手一摆,说:“算了,你回去吧,明天过堂。”

真没想到,一堂官司不到一小时便打完了。马彦这个“土皇帝”,原来只是“窝里横”,一见官便连个囫圇话也没有,只会“是、是、是”,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不仅答应退出全部霸占的房产、土地及粮食、家具等一应什物,还当着区长的面掏钱雇车把我们母子送回西号。路上,他的那些道歉的话,简直让我们受宠若惊。不过,也万万没有让人想到,就在我们回到西号的第三天,乡上来了两个人,把我拉走了,说是到野孤岭去修公路。尽管一起拉走的还有同村一个叫“盖底儿”的小伙子,但我那时才只有13岁,无论是按常理还是按当时的规定,这都说不通。可那两个穿制服的人给母亲说:“你不是会告状吗?那就告乡长去吧!”母亲欲哭无泪,呆呆地靠在门框上,举首望天,直到我要走出村了,回头望去,她还是那个样子。她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已经晚了。

八

野孤岭,与其说是岭,还不如说是梁。它既无我们甘肃乌鞘岭的苍莽雄浑,亦无陇南摩天岭那“四面白云生,中峰

倚红日”的奇崛伟岸,看不出它与坝上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但却得到了历代兵家的偏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挥师东下时,在这里创下了中外战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野狐岭之战。凭着这一战他才入长城,跨黄河,势如破竹,问鼎中原。但有趣的是,明洪武三年,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常遇春与李文忠也是在这里的最后一战,才扫清了大元帝国的残余势力,为大明 200 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日军的长期驻屯之地,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也在离此不远的狼窝沟打响,战斗之惨烈,旷古未闻,不知有多少苏联红军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去的这个时候,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正一路顺风地抢占东南亚各国与太平洋各岛屿,后防空虚,这里只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兵营,我们这些民工劳累一天之后,便睡在这些兵营的地面上,连一把干草的铺垫全无。所幸的是在我被抓的那天,村里阎大爷见我衣衫单薄,便把他身上披的棉袄给了我,每晚我就把它铺在身下,倒也不觉怎么冷。只是这棉袄是通常被人称作“卧龙带”的那一种,袖子出奇的长,而身长却只到人的小腹,铺在身下也只要一尺多一点的宽度,一翻身便滚落到地面上,而只要被那冰冷的地面冻醒,我便再也无法入睡,眼前不是母亲那憔悴的身影,便是妹妹那两只深陷的大眼睛。有时,脑海里便频频出现我背着弟弟,搀扶着妈妈,行进在七号至东二台的那条泥路上。我心里暗暗地叫着:“真主啊!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些泥泞呢?”

乡关何处,只有梦如故!一转眼便到了溽暑蒸人的夏天,可人的心里却依然很冷,民工中不时有人被日本人挑出来,成批地装上汽车拉走了,有说到抚顺挖煤,有说是到南

洋修工事,但谁都知道,只要一走,就回不来了。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对病号与捉回来的逃亡者的处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活活烧死或活埋,叫日本人说,逃亡者都是“良心大大地坏了的”。而中国人的病则都是“瘟疫”,不烧不埋便不能遏制流行,只要你三两天不吃饭,便厄运难逃。那拼死的挣扎,那绝望的呼叫,那声嘶力竭的求饶与那无济于事的哀告,无不让你心惊肉跳。我们无时不在恐怖的包围之中,也无时不在恐怖的驱使之下,如同牲畜,白天被赶出去,晚上又被赶了回来,唯一与牲畜不同的是吃饭而不是吃草,只要那开饭的哨声一响,我们便自动地排起队来,把自己头上那顶破毡帽取下,翻转过来,托在手上,等待伙夫舀给自己的那一勺小米饭,而每当此时,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哀油然而起,想哭,又不敢哭,也哭不出来,而且,自己还要提醒自己:“吃吧!不吃可就让人当你是生了病啊!”于是,狠狠心,便把那混有毡帽的汗腥与毡毛的小米饭囫囵吞下。

两餐小米夹生饭,一枕黑甜梦饿乡;此境人生不易致,生于忧患尔休忘!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一天晚上与我一起被抓的“盖底儿”把我唤醒,揪住我的耳朵只说了一个字:“走——”,我一下紧张了起来,也兴奋不已。啊!为了这个“走”,我俩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又忍受了多少次心理上的冲动与不安哪,现在终于让我们等到了。于是,说走就走,尽管它是九死一生。

说来话长,那大概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盖底儿”突然被工头调去给伙房担了一天水,无意中他发现伙房后面堆柴禾的那个小院墙上的电网,好像与大院的电网不一样。

再一细看,这小院的电网与大院的电网本应连接的那个拐角处,却各自独立,留有缝隙,尽管那个缝隙不大,但它却说明这小院电网是不通电的。为了证实这一发现,他还捉了一只麻雀投上去,试验了一下,果然未出所料。那晚,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我,可我却为如何进入那个小院而发愁,那不仅要经过伙房的内外两道门,同时在伙房那大屋里还整整住了伪军的一个炊事班。但“盖底儿”却蛮有信心,说:“猴都有打盹的时候。”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每晚都要溜出去,察看动静,寻找机会,但每次回来都对我摇摇头,毫无结果。这一晚,几个伙夫不知怎么一高兴,打起了“牙祭”,呼五喝六,一直闹到后半夜,人睡了,门却虚掩着,“盖底儿”这才领着我穿堂过户,爬上小院那个柴禾垛,把禾草先顺势往院外抛了一些,然后钻过那道虚设的电网,纵身一跳,便轻轻落到了那些抛出去的禾草上,逃出了魔窟。

那一晚,我俩几乎是脚不沾地地整整跑了一夜,不敢进村,也不敢上大路,怕引起犬吠,又怕遇上伪军巡逻队,一直跑到天快亮时才糊里糊涂地钻进一片庄稼地,倒头便睡,待到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睡到一片花的海洋里,有红、有紫、有黄、有白,放眼望去,真可谓是“山花照坞复烧溪,树树枝枝尽可迷”。可惜的是,它并非唐人钱起说的山花,而是罂粟花,这种植物,原产欧洲,二年生,草本、夏季开花,单生枝顶,蒴果皮层含有一种如同乳汁的液体,只要用小刀轻轻一划便流了出来,晒干浓缩成膏体便是鸦片的生货,经过煎熬、过淋、去渣,再予浓缩成膏体,则是鸦片之熟货。它既有镇痛、止咳之奇效,亦给人以麻醉,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快感,有些人便是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而久吸成瘾,只要一离开

它,便眼泪鼻涕一大把,什么劳动能力也没有了。这种害人的东西在“七·七”事变前,日本还仅是以其在中国的日租界为基地,向中国走私,“七·七”事变后,便将其在中国的种植与制售作为其侵华的一种战略,把占领区划分为“满州”、“蒙疆”、“华北”、“中支”四部分,由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海相、陆相为副总裁的“兴亚院”全权负责,在中国大量推广种植,廉价倾销,引得一些无知农民趋之若鹜!据日本著名学者伊原泽周于战后写的调查报告揭露:“……宏济堂(秉承兴亚院之命全权管理在华占领区毒化业务的机构)开馆五年即在华盈利 10 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的翔鹤级或瑞鹤级航空母舰,即可建造两艘……”他说:“……1936 年北平(今北京)市的人口是 1 546 389 人,但鸦片的消费量即达 4 731 313 两,人均消费 3 两有余”,而“这些鸦片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蒙疆(亦即坝上)”。它是“日军侵华期间推行‘鸦片战略’”的结果,“绝不次于‘三光政策’和七三一部队为细菌战所做的人体试验”。日本军方曾兴高采烈地断言:“只要中国有 40% 的吸鸦片者,那它便永远是大日本的附属国。”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逃亡的路上倒多亏了它,每每于饥肠辘辘时,便走进罌粟地,捡那已经割过烟并已经黄熟了的蒴果,破其壳,食其籽,聊以充饥,尽管其味道如同嚼蜡,但为了活命,也就“不知腐鼠何滋味”了!

从野孤岭到大乌登,本来只有三五天的行程,我俩却走了半个多月。往往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溜到村边井沿喝口水,或叫开马厩、羊圈边看牲畜人住的那些窝铺的门,要口吃的,问问路,有时就只能按北斗星的位置去找方向了,几经辗转,好不容易到了家,家里却早已在恐怖中度日

如年了。母亲告诉我,乡上那两个“黑狗”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对“盖底儿”家好像还追问的不太紧,但却声言必须把我找到送回工地。大概是我回来的第三天吧,愁眉不展的母亲终于下了决心,把我们兄妹几个锁在家里,一个人去了东号,晚上回来,她把我叫到跟前说:“不是妈心狠,孩子,逃命要紧,今晚你就跟你四哥走吧!”原来,我的那位四哥早就回到东号清真寺了。我至今对他那时的“失踪”有怀疑,总以为是他与社头霍伍元商量好的逼母改嫁之计,但又苦无证据。不过,这次总算他还有良心,母亲给他一说,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是提出要逃回老家去,母亲当时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可不这么办又的确很难使我脱离虎口。那一晚,母亲先叫我干干净净地洗了个“乌苏”(冲洗全身,如同淋浴,但有一定的操作程序),随后便找来几件随身换洗的衣裳打成一个小包袱,给我背上。这时候,四哥也来了,可我却不想走了,与弟弟妹妹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但母亲脸上却出奇的平静,一滴眼泪亦无。她无声地看着,无声地听着,一直等我们哭够了,才把我叫到跟前问:“你还记得妈教你念的那首李贺的《野歌》吗?”她叫我背给她听。可当我背到“男儿屈穷志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时,她就不叫我往下背了,说:“行了。记住这句话。一个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知道吗……”她也有点哽咽了。此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那个家的。但却至今也没有忘记母亲脸上那既哀伤又平静的神色。哀伤是和一般的母亲一样的那种。是凡人的。但面对命运又有着一般母亲所没有的平静,而哀伤则因了这平静,这坦然,才有了更感人的力量。她甚至没有起身送我,只是平静地望着,望着我走出家门,走上门前那

面小山坡,走进黑暗……

“孤身一行千里外,不知归日是何年”?妈妈呀,你可知道,儿子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九

我又回到了北平,住在大栅栏的三元店里。听老辈子人说,这大栅栏本是明永乐皇帝迁都北平后,为了招商而在前门外建起四条胡同之一,即廊房四条,到了康熙朝,因这条胡同集中了许多大商家,为了加强治安,胡同口设栅栏,昼启夜闭,故又俗称其为大栅栏。不要看名字不雅,有清一代,它却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曾有过 800 多家钱庄、20 多家银号与 40 多家金店的鼎盛。最早由中国人办的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也诞生在这里,同时,它又是古都文化名流的荟萃之处。据说,编纂《四库全书》的三百多名学者大都住在这一带,还有纪晓岚、王仕桢、李渔等名人的故居。不过,这里也是声色犬马无奇不有的地方,除了“八大胡同”那些数不清的青楼妓院以外,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都能在这里找到。著名的“同光伶十三绝”、“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大都住在这里,京剧的“七大名班”、“三大科班”与“七大戏楼”也大都在这附近。当然,占主要地位的还是那一家挨一家,鳞次栉比,灿若晨星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张一元”、“瑞蚨祥”、“六必居”、“谦祥益”、“老凤翔”、“月盛斋”、“同和轩”、“亨得利”、“厚德福”、“大观楼”……这些名字一听就让人感到不同凡响,老北京们侃起大山来有所谓:“头顶马聚源(帽店),脚踩内联升(鞋店),身穿八大祥(八大绸缎店),腰缠四大恒(四大钱庄)”的形象比喻,似乎把这些老字号往身上一裹,自己便也

俨然成了上流社会的显贵而不与人同了。沦陷后的大栅栏,自然是“沧桑易代繁华远”,当年的绝代风华无存,流光溢彩不在。可遗址余韵,市井风俗,乃至它的醉生梦死,似均不减当年。“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让人心痛。可我们又一时走不了。战争时期,不要说火车汽车,即使是找一条可以通过两军对峙的乡间小道也难。四哥每天出去找同乡,打问路径,我没事便跑到离大栅栏不远的琉璃厂去看书。那时的琉璃厂,基本为两种行业所占据,一是古玩,一是书。其实,古玩也以历代传世的珍品书画与当代的名人字画为主,书则多为一般书市不多见的经典著作与古籍。这些书店的老板与店员大都有着很深的专业知识与学识,一些善本、孤本只要经他们翻看上几页便知真假,道其来历如数家珍。而光顾这里的人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的人站在书架前,拿上书一看就多半天,老板也不讨厌,有时还会凑过来各抒己见地和你切磋一番。我对这里的兴趣,缘于母亲。父亲在世时,母亲是这里的常客,也买也卖。父亲去世后,她便只卖不买了,卖的最多的一次是我们往甘肃会馆搬家时,她竟把她从娘家带来的一箱视若生命的线装书一次卖掉,说:“现在才知道,百无一用者书也!”可我却从此反而对书有了感情,特别是那些古旧的线装书,碰到手便想翻一翻。有一次我被一本残缺不全的《大宋宣和遗事》迷住,感到它比《水浒》讲的实在,也使我对宋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结果,一直到书店打烊了,还站在那里傻看,老板过来问我:“小兄弟,你能看懂?”我尴尬地笑了笑,赶快把书合上,归进了书架。可那老板又把书抽了出来,放到我的手上,说:“拿回去看吧,算我送的。”我一下子不好意思

思起来。心想,母亲教我“不食嗟来之食”,难道就应要“嗟”来之书?但那老板却一本正经地说:“这年月像这种书不要说卖,送也没人要,咱俩就交个朋友,好不?”还说“只要你爱看书,以后尽管来,甭不好意思。”可是,自那以后我便踏上了回老家的那条险象环生之路,再也没有去过那家书店。

我们大体上是1943年秋天离开北京的。本来,我们是打算从张家口西走大同出偏关,沿毛乌苏沙漠南缘一线的所谓“北路”进入宁夏,再取道同心、固原回老家的。但当时的晋北已被日军的残酷扫荡弄得哀鸿遍野,十室九空,行旅望而却步,这才不得不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沿陇海路西进,走所谓“东路”。可是,谁知我们一到郑州便碰上了一场刚刚经过的大轰炸,整个一个繁华的郑州东关几乎被老百姓称作“黑寡妇”的那种美国飞机夷为平地。到处是败壁残垣,到处是瓦砾,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也到处是呼天唤地的哀号与哭泣!

铁路不通了,步行也危险。据说早先从洛阳到潼关这段封锁区出两个买路钱还可通过。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屯兵于潼关的国军似乎亦有反攻的迹象,西去的人动辄便被日军当作奸细抓去,生死不卜,这就不得不打消西进的念头,转而南下许昌、叶县、西峡、翻过老君山,进入陕南,再取道龙驹寨(今丹凤)、黑龙口、蓝田到西安,也就离家不远了。但一到叶县便遇上了麻烦。四哥随身带的几本经,引起了查店警察的怀疑,竟说那是密电码,糊里糊涂地把他抓走了。

叶县这地方,虽然只是一个县,但因其地处黄淮平原的边缘,南接南阳平地,北控郑州、许昌、平顶山,向为兵家必

争之地。四哥也许正是有闻于此，才领着我专捡那些偏僻的乡间小路走。可谁知你越怕鬼这鬼越多。我真不明白，这些警察怎么就连世界三大文字之一的阿文都不知道，又怎么会与什么密电码能联系得上！

我一个人被撂在个荒村野店里，一住便是半个多月，丝毫不闻四哥的消息，好在这店掌柜也是落难之人，供我三餐还不时安慰我耐心等待。我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帮他干些劈柴担水的零活，如此一来二去，我才知道他的一家妻儿老小俱已殁于战火。他一个人之所以苦熬至今，就是想“等到小鬼子跑也跑不出中国的那一天，看他咋完蛋”！每到夜深人静，你听吧，一曲音韵凄绝的《苏武牧羊》二胡曲，便从他那小屋传出，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有时他也随着他自己拉出的旋律有一句没一句的唱：“……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望儿同入梦，两地谁梦谁……”而每当唱到这个地方，他那声音便压得低了又低，有点嘶哑，也有点哽咽，让人至今难忘。

四哥终于回来了。他还未及备述狱中情况，那店掌柜又被绳捆索绑地拉走了，我们弟兄二人只好连夜上路，直奔西峡，谁知尚未进入伏牛山区便远远传来炮声隆隆，日伪已开始了在那里的残酷扫荡，我们只好绕道湖北的襄阳、老河口，穿过老君峡，再入陕南。这条路至少也使我们多走了五六百里。但也正如一句俗话：“歪打正着。”无意中我们竟走上了一条敌我双方均未来得及封锁的通道。一到老河口，便见一群群难民，一夥夥败兵、学生摩肩擦踵，抢渡汉水。老君峡里，人声鼎沸，车马声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的儿子，扛着大包袱与推着独轮车的庄稼汉，一脸的疲惫，

也一脸的愁云。而与此相反的倒是那些学生,一进老君峡便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欢蹦乱跳,眉飞色舞,而那些败兵似乎也没有我后来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种凶巴巴的样子,个个精神沮丧,无精打采,似有许多的怨怼与无奈。特别是来往于前线与后方的军车司机,每每遇到一些走不动的老弱妇孺,便停下来,拉她们一程。有一次,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位好心的司机,叫我上车,可一见随后赶来的四哥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人家“哼”了一声,便把车门关上走了。四哥感到尴尬,我也觉得无趣,但对一个司机的原则态度与认真,也不能不予谅解与同情。

行行复行行,我们终于走出了老君峡,在大巴山那奇峰峻岭中往复盘桓了数日之后,到达了龙驹寨,并侥幸地搭上了一辆去西安的汽车,只是车到蓝田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又遇上了一位讲原则的检查员,认为超载太多,把四哥等十多个人赶下了车,我与留下的一些妇孺老幼到了西安,两眼一抹黑,只好在车站上死等。幸亏这个车站的职工个个都是热心肠,每到他们开饭的时候也不忘我们,馍馍稀饭管饱,每晚还拿来许多大碳把候车室的炉火烧得通红,所以,直到三天后四哥他们随后赶来,我们这些婆娘娃娃也未受冻馁之苦。流亡三千里,处处遇好人。这也是如今那些力主“利己主义”的人难以想像得到的。但它却是事实。否则,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早已不知葬身何处了。

十

西安古城,早已失去它那“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

满秦川”的风貌。到处是临战前的荒乱,也到处是难民与士兵,所幸西至宝鸡的火车还通,这就加快了行程。四哥说:“再有一‘主麻’(七天)就到家了!”可这家是啥样子?我一无所知。

从宝鸡往老家走,基本上是沿着秦岭的西部边缘迤逦向北,越走越高。但是,当你爬上西去的大门——千山之后,一道苍茫雄浑的天障便矗立在你的眼前,远远望去宛如游龙,从南向北,连峰不断,这就是有名的关山,也叫陇山,它有大小之别,大关山从南到北,横亘 300 余公里,其最高峰便是海拔 2928 米的六盘山;小关山与其平行,但却偏东而又向北延伸至我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崆峒山。老家化平(今泾源),便在这大小关山的怀抱之中。

好多年来,我总觉得历史老人对我们老家这个山区小县好像有偏见,翻遍二十四史也难见有关它的详细记载,但它却是一处较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地方。《禹贡》言其商周两代为“雍州卢国属”。因发源此地笄头山(鸡头山)的泾河源头的有泉百余,趵突喷涌,又名“百泉”。《诗·周颂》:“视被百泉”,即指此地。所以,周穆王于公元前 976 年西击犬戎时即西巡至此,秦始皇于公元前 220 年西巡陇西、北地两郡东归时,便于此地建“回中宫”(后毁于公元前 166 年的汉与匈奴之战),开辟了起自千阳河谷北上经此地而出萧关(今固原)的“回中道”与“鸡头道”,沟通了秦凤与陇西、陇北的交通。此后,“汉初置朝那城”,后又“改卢国故城置安化城”。北魏先置“百泉城”后“移并县东二百里之朝那城”,唐置“大震关”,宋置“制胜关”,金筑“化平城”,直至清设省直属的“直隶化平厅”,历朝历代,人文建置绵延不绝。而值得一提

的还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与元世祖忽必烈这两代君主,甚至以此地作为西击西夏南伐西蜀的战略基地,屯重兵、储军械,并建行宫以避暑。可惜此宫毁于1260年阿兰台儿与浑海都的叛乱,如今除瓦砾础石等遗迹外,其余建筑荡然无存。

从农耕文明的角度审视,老家这个地方无疑是块宝地。尽管其可耕地不足总面积的一半,但天然植被好,雨量充沛,到处有林有草,也到处有溪流泉涌,且日照不短(年约51%),属于中温气候区。不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两千多年来,先秦与戎狄之战,汉与匈奴之战,唐与吐蕃之战,宋与西夏之战,金与蒙古之战,义军与元之战,直至清末陕甘回民抗清大起义,无不与这大小关山有联系。如今有关这些战争的记载,史料无存,只有到古诗词里去找了。如《古乐府》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陇头吟》中的“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绝断”;乃至唐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十五州”;杜甫《洗兵马》中的“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高适的“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卢思道的“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有关这大小关山的战争描绘不知有多少。也许,正是历朝历代的兵连祸结,我们这个关山中的小县人口,从有记载的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的1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的长达940多年中,不增反减,成为16591人。如果除去同治10年(公元1871年)强行安置的9400口陕甘起义回族中流散下来的老弱妇孺,人口几近无存。

十一

劫后余生的老家人,一代代地在这大小关山里披荆斩

棘,也一代代地在这里繁衍生息。作为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我无法知道他们有过的灾难与痛苦,也无法知道他们在这大小关山里洒下了多少血和汗。老人那多皱的前额,年轻人手上那重重擦擦的老茧,光着屁股的孩子与妇女们身上的破衣烂衫,都告诉我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多么不容易。我家尽管有着4个哥哥做为劳力,但在农事之外,倒有一半的时间要靠进山烧木炭、挖药材,或把本地的药材、山货担到宝鸡卖掉,再把那里的布匹、煤油、火柴担回来,挣几个钱贴补家用。实际上,这也是山里人那时唯一能够取得货币收入的一种办法。每到冬闲季节,你看吧!三五一伙,十个八个一帮的“扁担客”们,便艰难地盘桓在那崎岖而又铺满积雪的山道上,犹如一群群负重的蚂蚁,佝偻着身躯,与其说是担,还不如说是驮,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是爬。待到下山,人的腰虽然挺直了,但又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被脚下的蹉脚石滑下山去。所以,他们手上都有一根一头装有一个小铁叉的木棍拄着,上山用它借力,下山用它探路,走累了就拿它把担子一支,歇一会再走。而每当此时,他们也会吼一嗓子我们西北回族特有的“花儿”：“站在这高山望平川哪!平川里一对儿牡丹,看起来容易摘到手难哪!摘不到手也枉然……”还有：“翻过这一山望一山哪,山顶上一片片云翻;看起来近哪实是个远哪,爬上这山顶也摸不着天……”那有如土地般质朴粗砺却又浓郁苍凉、汁浓味醇的气韵呀,真让人像喝了酒似的神迷而魂飞魄散。那高昂而又悠长的后拖音,则有如穿云裂石、直泻千里的飞瀑,穿过峡谷,直斥人的心源,透着无奈,也伴着悲怆。但它不是抒情,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排排闷气而矣。

“苍头”——我家所在地的村名,(现在叫蓝大庄)听起来古怪也别扭。老人们说,沿用此名,主要是为了怀念。类似的,如离我们村不远的“九舍”、“大秦”、“王阁村”等村名,据说即使如今亦能在陕西的渭南找到。但何谓“苍头”?这个谜,直至我后来读《史记》方知是用青巾裹头的军队,始自春秋,最有名的“苍头军”是陈胜起义军中由吕臣率领的一支,“与项羽同屯兵于彭城,数破秦军”。可是,《汉书》上又说:“苍头庐儿,皆用致富”。按颜师古援引孟康对此句的解释:“汉名奴为苍头”,是奴隶,这就又让人悲哀了!不过,我总想,这“苍头”二字到底还是说明了“苍头”人的来历。至于我们究竟是军人还是奴隶的后裔,倒也无关紧要。

我很幸运,老家同样有着我的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与我的生母不同,一顶雪白的“盖头”几乎连眉毛都“盖”了进去,两只小脚虽不止三寸,但也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小的脚了。一字不识,却治家很严,兄嫂们见了她都有点怕,好像不管什么事若离开了母亲,他与她们便没了主意,可母亲又从不多说,她只是专心致志地坚持她的“乃玛子”(礼拜),一日五番(五次),一番也不能少。她礼拜的老屋是任何人都不许进去的。她在那里沐浴,在那里礼拜,也在那里休息。我回来后她便叫我与她住在一起,睡在她的脚下,每晚总要叫我把内衣脱下来,替我捉虱子。那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会长那东西。自从到家,她老人家便把我的内衣连烫带洗地清理了两遍,可当她每晚检查时,却仍要活捉好几个。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神又不好,每当我看她在昏暗的麻油灯下,屈着腰,甚至连鼻尖都快碰到手上的那些衣物时,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酸溜溜的,油然而至。有时我就要赖

皮不给她脱,说自己白天捉过了,她老人家便把脸一沉,抄起扫炕笤帚做出要打的样子,可那扬起的笤帚停在空中又不往下落。这正和我的生母相反。一个是爱极生恨,从不迁就,哪怕打完了再一个人去暗自落泪;一个却时时有节制,总不伤感情,同样是爱,究竟哪个母亲的爱深?我也说不清。

家住山脚下。一进两院。前院是磨房、碾房与过去雇工住的厢房,多已倒塌;后院内宅本是个四合院,但一溜东房也已倒塌得只剩下了山墙,其余便由弟兄四家分住了。我与母亲住的那间老屋,虽无花木盈窗,但出得门来便有树萌绿荳供你直通溪边,而一到溪边之后便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舒畅起来。你看,山在俯瞰着你,遥遥耸翠;水则环绕在你的脚下,悠悠泄银,漫山的梯田碧绿连天,一到收获季节便又如黄金匝地。特别是四五月里,油菜花开,清香四溢,一阵风过,便浥透这山村四野,试想这身在其中的人能不心旷神怡乎?

家是温馨的,也是贫穷的。自抗战以来,家里几乎每两年就要雇一个壮丁去打仗,而农民又没什么货币收入,只能卖地,到我回来时,包括我在内的弟兄五人,只剩有祖传的8亩山田度日,加以我的二哥、三哥都身有宿疾,一个幼时一场大病后失聪,一个是打柴时摔断了左臂,始终没有长好,这就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很难维持了。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与我同宗,论起来还和我是一辈的一位叫蓝鸿恩的本家哥哥在白面河开了一个饭馆,想叫我去给他记账,“身价”每月一块大洋,已来问过两次,可她老人家感到我刚回来不久,一些老亲戚家的门还没去认,怎么能打发孩子去挣

钱呢？我一听，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央她第二天便领我去，但她老人家还是心事重重地磨蹭了好些天才领我去了，并千叮咛万嘱咐地唠叨了许多在外生活的规矩，才眼泪汪汪地离开了那里。

白面河，距我家 8 华里，坐落在泾河南岸，是泾水出山后流经的第一座集镇。不过，历史上流经这里的泾河却叫“白岩河”，镇也叫“白岩镇”或“白岩川”。《金史·地理志》载：“白岩河，化平四镇之一”，成书于康熙年的《古今图书集成》说“白岩川在大会坡西北十里”即指此处。而《周礼》与《水经注》上讲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弦蒲藪”，则在此镇之西的不足 10 公里处，今名“老龙潭”，又名“泾河脑”。在一道宛若天门中开的石峡里竟自平地涌出三座大潭，依次排开，各自相距不到半华里，各个都是碧波翻滚，飞沫喷珠，湍湍四溢，而当这三潭之水汇到一处的时候，它便以雷霆万钧之势，从那峭壁绝立的石峡中夺路而出，奔腾咆哮，一泻千里，这便是泾河。传说中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即指此处。清人胡记谟于乾隆 55 年（公元 1790 年）奉命勘察泾河源后，有诗赞曰：“无数泉飞大小珠，老龙潭底贮冰壶，汪洋千里无尘滓，不至高陵不受污！”

无论是从历史的悠久，还是从山水之奇、之秀，都应当说这白面河是一处堪令世人瞩目之处。可惜，环境封闭，交通阻塞，鲜为人知。那时候的白面河，说是镇，其实也就三五家店铺，十几家饭馆，三日一集，日中交易，一到背集，便连跑过去个狼也没人知道了。不过，每到逢集，倒也能使我们这种名为饭馆实为茶馆的生意红火一阵。无论是跟集的老农，还是赶集的客商，或是跑江湖卖艺、变戏法卖药的，拉

“公子”配种的，合绳的，钉掌的……各色人等，最后都要到我们这些小饭馆来“刮”上一碗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老家人喝茶，千篇一律的都是“紫阳”。这是唯一产在我们西北的一种茶叶，有陕南“紫阳”与陇南“紫阳”之别。这种茶叶，又名“陕青”，对比茶中的贡芽，称它粗鲁都是夸耀；对比茶中的龙井，称它老迈都没有资格；对比茶中的白毫，看上去它比那离离荒原还要沧桑；对比茶中的明前、雨前，则分明就是那岁岁枯荣的残雪泥泞。但所有这一切，种种宛如真理的大错铸成，原因都是没有经过那悠然自得的一“刮”。你瞧！那些来我们饭馆喝茶的茶客，只要是真正的饮者，进得门来，一不大呼小叫的喧哗，二不搭讪着与人讲话，先找一处僻静的干净座头坐下，把你送到他面前的茶具与等级不同的“紫阳”审视一遍之后，却只要你用少许落开的水把茶叶泡上，等那茶叶的腰腿一一展开了，他才让你再把沸腾的开水冲进去。而所谓的“刮”，也就从此开始了。那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表面看，只是用盖碗的碗盖边缘一遍又一遍地去“刮”那茶汤上面漂浮的茶叶，实际上则在那不厌其烦的“刮”中已把你这茶的等级、品质、成色乃至水的好坏，是不是刚出山的泾水等等，都在心里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待到茶汤变成橙绿色，那一碗紫阳茶也就在那不紧不慢的“刮”中泡好了。端起来，呷上一口，从唇与舌间一流而过的那股清香与苦涩，真如惊艳，瑞气在胸中涌动，也自心头蒸腾起来。这感觉，让人在思前想后之中便有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想法，认定这紫阳茶也就有如成就了它的老家人，是沉香，是悲壮，是苦吟，亦是苍凉。

“刮”，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讲究。不过，话说回来，它

也不是有钱人玩的那种“茶道”，更不是文人雅士的“品”。说白了，它只不过是那些忙碌一天的人最后寻求的一种短暂的休憩方式，养养神。而每当此时，也就连我这专管记账收钱的人也闲不住了。要帮伙计们端茶送水，涮洗碗筷，有时还要拉动那硕大的风箱，忙不迭地把水烧开。好在这山里人一般都好伺候，只要那茶叶地道，水是开的，送的及时，便不会再有什么挑剔。当然，也有难伺候的。就像《儒林外史》第22回说那“卜家兄弟与牛浦吵架被郭铁嘴一把拉进茶馆劝开这场闹……”一样，我们这小馆子也常有这种事。只要这些人一进来，那桌椅板凳摆得正不正，盖碗擦得净不净，茶叶的多少乃至水的温度高低，便都成了问题。但一俟当代的那些“郭铁嘴”说得一天乌云散，他们也会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这些端茶送水的“小人”说些道歉的话。老家人都这样，一是一，二是二，不曲不阿，也不矜不夸，肝胆照人，朴实无华，就和那大小关山一样，坦坦荡荡，你说不清它的底蕴有多深，也说不清它的胸怀有多大。

十二

初涉世事，我便踏入茶馆这五方杂处之地，实属意外。但我却至今无悔，甚至对那段生活还有所怀念。我总觉得茶馆这种供人消遣余暇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场所，它使人不期而遇，不约而聚，闲侃闲聊，却交流了感情，化解了郁闷，消解了人间的隔膜、冷淡，也于无形中排解了人与人的许多矛盾、摩擦和误会，其核心是个“和”字，尽管它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格格不入，但与酒楼、饭店如今那种铺排、浪费掩盖下的曲意逢迎，虚伪应敷，言不由衷，恰成鲜明对照。“半壁山房待茶客，一盏清茗悟人生。”这也许正是茶馆

的可爱之处。如果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让我离开了那里,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愿在那有着特殊文化氛围的茶馆里了此一生。

我大概是 1944 年的春天来到这白面河“恩记饭馆”的。逢集虽然很忙,但一到背集也闲得无聊,不仅没客,连那些伙计们也都回了家,这就使我这有家而不想归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了。也是没事找事,每到背集日我便拉上恩哥的那头老黄牛到河对岸去放牧。那里有一大片修直挺拔的杨树林,树林里还有一座小学校,书声朗朗,流水哗哗,老牛吃草,我便躺在草地上把心灵放牧出去,“翳然林水”作“濠濮间想也”!有时,也被那稚嫩的读书声吸引,情不自禁地溜了进去看,但也有好几次都被那位操着外地口音长着一对三角眼的老师轰了出来,讨了无趣,这才明白,自己早已不是此道中人矣!便不再去了。可是,谁知这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却又把我赶进了那个令人生畏的学校大门洞,又谁知我的那头老黄牛,大概是被冰雹打急了,也跟着我的屁股跑进了学校大门洞,而且还很不客气地在那门洞里大大地拉了一泡,这可就把那个三角眼气坏了,一掌扇来,把我打翻在地,接着一脚,我便滚出了校门,脑袋也不知碰在什么地方,只听“嗡”的一声响,便人事不知了。此后,听说如果不是“疯子”赶来,把那凶神挡住,并冒着雹雨把我背了回来,我这条小命也许就真要送在那个地方了。

提起这“疯子”,还得细说一下。他本不疯,只是他那形象不雅,却又不能不让人视其若疯。且不说他那蓬头垢面,就说他那身装束吧,一件脏兮兮的光板皮袄终年不脱,一双麻鞋无论冬夏都是光着脚板穿,也叫人疑惑他疯了。听说

他三年前才来到这个小镇,是个套麝(香獐)的能手,但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谁也不知,听口音倒有点像现在电影里的那个蒋介石,整天把个“娘希皮、娘希皮……”挂在嘴上,嘟嘟哝哝的也不知他在骂谁。那时候,一个麝香包(香獐的脐腺)要卖到两三块银元,但他每月只上两次山,初一下套,十五去取,每月一个,从不多套。没钱花了便到我们这个小饭馆来赊账,这使得恩哥见到他就没个好脸色,也少不了几句揶揄的话。可我却依然照旧。我总想,人家又从不赖账,只不过耽几天时间,何必那么势利?结果,如此一来,他便有钱没钱来了都找我,也使我俩混熟了,知道他当过兵,打过仗,死里逃生,流落下来,辗转至此。但给谁当兵,给谁打仗,打谁?他却不肯细说。有一天背集,我正准备去放牛,他忽然来找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很精致的茶叶罐,打开盖,送到我鼻子底下说:“你闻”,接着便让我去拿开水,说要好好和我“品”一下。我一看那罐里的茶叶,真叫人吃惊,竟像一个个小弹簧似的,一圈连一圈地盘成一个个小圈,通体墨绿,顶端好像还有点白色的茸毛,待到把水冲了进去,那些小弹簧便一个个站立了起来,而那绕梁三日依然薰透满室的香气,便也一丝不漏地散发了出来,尽入心脾。我不好意思地呷了一口,顿感神清气爽。从舌尖开始进而弥漫全身的快意,竟在我的记忆里维持了好多年。我问他这是什么茶,他说叫“碧螺春”。我说我在北京见过,也喝过“碧螺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也没有这一股奇香。他这才告诉我“碧螺春”原来还有家种与野生之别。野生的大多长在云雾缭绕的深山,且采摘期短,可遇而不可求,多为进山采药的人在其采摘期碰到手上,采回加工供自己饮用,市面上很

少见到。这是他昨天集上从一个收药材的南方客商手里花了一块大洋,还说了不少求情话才“让”了过来。说“如果不是看在都是南方人的情面上,人家还不‘让’呢”!这可真叫人大开眼界,可我总觉得太贵了。就那么一小罐,不过二三两,却要一块大洋,等于我在这里干一个月的工钱,值吗?他摇摇头说:“小兄弟,你可知道,我喝一口这个茶就等于回了一趟家呀……”声调里带着悲怆,脸上刚才那股眉飞色舞的兴奋也一扫而光。我不忍心再问,默默地看着他自斟自饮,直到太阳西斜,那茶汤没了绿色,他这才像个醉翁似的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往出走,嘴里咕咕哝哝地吟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经他那么一字一板、一句一顿的吟诵出来,那后拖音到有点像哭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个谜。因为他曾救我一命,解放后我专门去了趟白面河找他,还动用了镇政府的人去调查,可老乡们却说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我被打的消息不脛而走,可也没料到会那么快,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颤颤巍巍地走进门来。我的“乎达(真主)”呀!8华里,头天还下了大雨,这一路的崎岖,一路的泥泞,她老人家是怎么走来的?如果万一……我一下扑到她怀里,只想哭,可她老人家却铁着脸,先叫我在地上走动一番,见还灵便,未伤筋骨,便叫我把恩哥找来,说要带我回去。这一天,正逢集,早上大家都忙着做准备,谁也没发现老太太进来。此时一见,恩哥便赶忙打躬作揖地赔不是,说这事全怪他没把我照看好,但无论如何不能让我走。其实,我也不想走。那每月一块大洋的收入,在我们那连洋油灯也点

不起的家来说,可不是小数,咋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但母亲那态度则连个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只见她两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打开拿出三块银元放到桌上对恩哥说:“这是你原给娃的半年‘身价’,如今娃已干了三个月,给你退回三元,咱娘俩就两清了,你也‘护食奴’(原谅)着!”说完,便催我赶快把账簿拿来办移交。此时,早已惊动了店里的大伙,也惊动了后院居住的恩哥一家,都跑来相劝。可她老人家不管别人怎么说,一俟我的移交账款两清,便拉起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连恩哥虔诚敬意地给她泡的茶也未喝一口。一路上,我从我挽着她的那只手上感到,老人家好像有点身不由己似的,一脚高,一脚低,也没有一句话,一直到走进家门,她这才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说:“我咋办了这么个糊涂事啊!若把娃‘背毁’(死)到那儿,我可咋见他‘大’(爸)呀!”捶胸顿足,弄得我也难过了起来。不过,我不明白她老人家何以如此地动感情。一个山里娃,嗑嗑碰碰寻常事,再说,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可她老人家却不这样看,说这事全怪她当初动了钱的念头。如果不是为了钱,你能遭那么大的“祸”吗?最后,她甚至带着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娃呀,钱这东西是活‘依不里斯’(魔鬼),只要人的‘乜贴’(主意、念头)不端正,‘乎达’(真主)就给你把‘摆俩’(灾难)降下了……”

把钱与魔鬼联系到一起,这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有关钱的一种阐释。同时,有了问题首先“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这种态度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而所有这些,却都出自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之口,体现在一辈子也未走出这大小关山半步的老婆婆身上,能不发人深思吗?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每当我回想起母亲，便也想起了陶渊明这两句话。实际上，真、善、美的东西往往就在那些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身上，不在读书多少。

十三

母亲终于下定决心送我去读经。这个想法，她本来在我从北京回来时就有了，她说她这一生只有一件心事，那就是在我的几位哥哥里边能培育出个有“尔林”（学问）的阿訇。但令她失望的是，即使是苦读如老四，20多年了，也至今未“穿衣”（毕业成为阿訇）。按她老人家的说法是：“‘尔隔里’（天资、智商）不够，‘口唤’（真主的安排）不到”，无法勉强。我回来后，她看我小小年纪竟念了那么多年的书，读经也一定会有出息，便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恩哥的擢辍又使她改变了初衷。结果，险些让我送了命，她也追悔莫及。现在我回来了，她说“这也是口唤、定然”！再不能犹豫，大概是我从白面河回来的第三天吧，便谨遵母命，走进了清真寺。

“阿訇”——波斯文的音译，意为教师。但要真正成为一个阿訇也并非易事。阿拉伯文化中的经典亦如中国古文化中的经典著作一样，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个念经人从五六岁开始，大体要经过五六年的启蒙，再经过七八年的基础教育而成为“哈里发”（阿文意为继承者、代理者，在中国则为清真寺里进行经堂教育的经生，学员）但从“哈里发”再到“穿衣”（毕业成为阿訇）则无任何时限。特别是老家的“格底目”（尊古）教派，无统一的教权组织，阿訇的产生，往往只能在现任阿訇被另一仰慕他的教坊群众搬（请）走，或在无人搬（请）的情况下任期届满，不得不被迫辞学（辞职），

出了空缺,才有可能为本坊那些出类拔萃的“哈里发”“穿衣”。他要有宗教界资深人士的推荐,要有本坊宗族大户的首肯,要有社头们的反复协商,还要有乡佬(教坊群众)的多数认可,民主性很强,不确定因素也多,但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尔林”(学问)、道行与品行。否则,即使是皓首穷经,耗尽毕生精力,也不一定会成为令人仰慕的阿訇。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200年前韩愈对国子监那些莘莘学子们的描绘,也可看作我们回族那些“哈里发”们一生苦读的写照。不过,也与国子监中那些躺在富贵乡里读书的公子哥们不同,“哈里发”们只能在一边读经,一边为教坊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服务时,依靠教坊群众随意施舍的“海提叶”(货币)来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标准。有的即使是忍饥挨饿也要“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确乎不拔,浩然自守”。至于名害利钝的世俗之争,则早已被他们视做身外之物了!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人是环境的产物。”也许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经堂生活所致,老家这地方的念经人,特别是那些有了一定造诣的阿訇,大都有着一副特立独行的风骨,超然于物外,不与人同。其中如我们村的清真寺阿訇“云南李”,便是这样的一位。传说中他每年“斋月”(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都是整整一月不出礼拜殿,不吃不喝也不睡,待到“尔代·非吐尔”(“尔代”即节日,非吐尔即“开斋”、合译为“开斋节”)那天走出,却依然是精神矍铄,气色不减。还有一说,大旱之年的祈雨,尽管他有不同看法,谓非正道,但在众命难违的情况下只要他承头,十回倒有九回灵。不过,传说归传说,真正让

人感到古怪的还是他那性格，生无媚骨，冷若冰霜，即使是县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访，也不应酬，可是他一旦讲起了“吾儿孜”（讲经布道），却又成了另一个人，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总有新意。有次我听他给“哈里发”们讲《古兰经》第25章第63节：“真主的仆人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按色俩目尔来一昆！’”其中“按色俩目尔来一昆”这句话，本是伊斯兰教的习惯用语，意即“你好”，是问候语。但他却认为在这个地方——“蒙昧的人呼喊他们”的情况下，这句话应是“和平”、“和善”、“和解”之意——“和为贵”。而不是“你好”。他说：“伊斯兰”的原意即“和平”，“伊斯兰教”即“和平的宗教”。至于有人说穆圣一手执“古兰经”，一手执剑，以武力征服了异教徒，则是对伊斯兰教历史的无知。所以，当“小心翼翼在路上走着”的“真主的仆人”听到那些轻薄骄矜的“蒙昧人”呼喊时，他们只能以一种不卑不亢的语气警劝他们：“和为贵啊！”否则，若译成“你好”？则不伦不类，也与当时的情境、气氛不符。

一个经常挂在伊斯兰教徒嘴上的问候语竟有如此许多深意，这对于当时的我不能不有着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知为什么，这阿訇却好像对我一直有偏见。记得母亲领我去入学（读经）的那一天，他一见我便说：“这娃不是念经的料。”后在母亲的一再央求下，才勉强答应。但却又把我交给主管小学的“二阿訇”，整日与那些连鼻涕也收不住的孩子们为伍，“羊群里跑骆驼”，成了孩子们的笑料，动不动就拿我开涮。你听：“大炮大炮咚咚，一炮打到北京；北京敲锣，一炮打到白面河；白面河敲梆梆，一炮

打到蓝大庄;蓝大庄有个蓝鸿勋,不打柴、不拾粪,老大的个子来念经,‘别’、‘且’、‘之母’认不清,阿訇说他‘狐成精’……”

讽刺与幽默,是老家人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特别是相知较深的挚友,见面一个不把一个挖苦几句好像就不够交情。他们好话歪说,正话反说,有的故意颠倒,故意夸大,甚至把一些互不关联、矛盾的事物揉合到一起,编成民谣,到处传唱,博人一笑。其中如有名的《人咬狗》:“东西街,南北走,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推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骑了轿子抬了马,吹了锣鼓打喇叭!”再如《说白话》:“说白话,道白话,红萝卜长了个丈七八,白菜长的磨盘大,三岁的娃娃种庄稼。取我婆时我记得,场上割谷碾大麦,回家生下我大伯,我大满月我陪客。”此外,如:“高高山上一堆灰,姊妹三人坐一堆,大姐放了个屁,给二姐溅了一脸灰,幸亏三姐跑得快,不然还吃屁的亏”;“旦娃的媳妇真能干,脚拉风匣手擀面,奶头尖尖擦洋火,屁股蛋上烙馍馍。”还有什么“这灯那灯,猫儿点灯,老鼠吹灭,蝇子告状,告出皇上,皇上推磨,推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锄地,锄出他姨,他姨没处藏来没处去,门背后挖了个窝窝存了个屁。”……,这些土得掉渣的民谣,尽管不伦不类,不着边际,却也唱出了老家的风土人情,唱出了无奈。不过,就我的那些小哥们给我编的那首童谣来说,倒没有任何夸大。那时候,我对阿文的学习确实发愁,甚至望而生畏。特别是“别”、“且”、“之母”几个阿文字母,粗一看,都像中文的心,只是那心里心外多了几个圈圈点点,一不小心便张冠李戴,没办法,我便在那些阿文下面一一用与中文的同音字

注上,不仅很快就把那 28 个阿文字母学会了,而且不到一个月,又把那本作为启蒙的经——“孩提”(阿文音译为“封印”)也念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赢得了小伙伴们另眼相看,也让村里人啧啧称奇,说:“到底是大地方长大的娃,不一样!”可我们那位什么事都较真的“云南李”阿訇却不这么看,竟在许多人都在场的众目睽睽之下,把我那本注了音的“孩提”收去,让我念他的那本,一下子就把我的那点小聪明戳破了,于是便也有了骂我的那句名言:“狐成精!”

我的出丑,成了小伙伴们取笑我的笑料,也加深了我与阿訇的隔阂,总是躲着他,有时就是走碰头也不愿按习俗给他说个“色俩目”。说实话,我心里真有点恨他。可是,有一天他竟差人把我叫了去,说:“娃呀,你再不要受那个罪了!你不是念经的料,还是去念书吧。”说着,便从炕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我,说那信是他写给现任平凉陇东师范阿文教员萨里哈儿的。萨是他的老同学,叫我四哥领我去准没问题。这的确太突然了。我心里像闯进个小鹿,突突地跳个不停,心想:离开学校快三年了,而以前在沦陷区所受的那点可怜的基础教育又与大后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考上,又能跟得上吗……这都让人不得不担心。

十四

平凉的陇东师范,是抗战以后自上海迁来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原名“国立上海伊斯兰师范”,校长是回族的著名学者达浦生。民国 30 年,国民政府派马汝麟接任校长后改为“国立陇东师范”,专以培养陕、甘、宁、青四省的回族教师为己任。设速成班、后期班、附属小学与阿文专修班各一,包括学生的食宿在内,全部公费,向为贫困的回族青年所向

往。但遗憾的是,我们来晚了一步,只差一天,报名截止,萨里哈儿也束手无策。不过,也不是毫无办法。据他说,那时的陇师,因为回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上一片空白,每年招生回族学生根本招不够,以致后来不得不招收一些有志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汉族学生勉强开课,所以只要能请当地回族中的社会名流、耆宿向学校推荐一下,网开一面,也有可能。实际上,这也是陇师每年都有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这对于从大关山走出的我们兄弟俩,却比登天还难。后来,还是萨里哈儿的提醒,使四哥想起了父亲早年在平凉的一位姓×的故交。此人虽是个土财主,但因其与平凉回族中的首富×××是儿女亲家,珠联璧合,因而也就有了呵气成云的本事。过去父亲每年捎回老家的财物大半均由其属下的皮行转交,同时对他在北京的生意也有不少的帮助,只是父亲去世后再无来往。萨里哈儿说:“像这种事,对这些人来说,不过是一张名片的事,举手之劳,何况又是为了我们回族教育呢!不防一试”。于是,我们便直奔了×家。

×家住的地方,在当时的平凉属城乡结合部,门外不远便是一道人工渠,小桥流水,水磨声隆,一派田园景色,但进得大门却是一座大院里面套着小院,小院门楼里的咫尺之内又嵌着精致的屏风,全是城市民居的建筑风格。我们叫了好半天才把那小院的门叫开,可出来的人把我们兄弟俩上下打量了一下,便返回身去,又要关门,四哥赶忙上去揪住那两扇要关的门板,“哀哀上告”,只求通禀一声,见老掌柜一面。也许是他那一声高一声低的诉说惊动了内宅,还没等他啰嗦完,就听那屏风后面一声痰嗽,接着便是一声断

喝：“去——粘(方言音然)啥呢！也不看自己是个啥，还要上学……”后面的话可能更难听，但门关了，没听见。这种接待方式常见于吝啬鬼之对待叫花子，它叫“隔门打发”！但这又能怪谁呢？！

世上怜才休恨少，平生失学本来多；天公有意君知否？成才还需自琢磨！大概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哪怕饿死，这辈子再也不求人。

从平凉到家，不足百里，我们兄弟俩却走了整整一天又一个大半夜。这除了从平凉起身较迟以外，扫兴而归，打不起精神，也是原因。回去咋办？经是读不成了，可家里的农活母亲又不让我插手，说我不是吆牛后半截的人！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也不知其所以然。至于四哥，他好像比我的心情还坏，走着走着便蹲在地上要休息，说他心口疼。我心里明白，那不是病，作为一个有着20年学龄的“哈里发”，何曾受过如此的屈辱？同时，这趟无果的平凉之行，无论对于四哥还是母亲，都是违心之举。我们家自同治年后便有一条不成文的祖训：“不粘(然)官家，不干公事。”而读书的目的则无非要吃官家那碗饭，这在那些祖祖辈辈受尽官家欺侮的老家人眼里，无疑会被视为不屑。所以，一直到我参加革命以后，母亲仍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你咋能钻到那‘合头’(里面)去嘛！”我至今不解，那位对阿文经典哲学参悟很深的“云南李”，当时为什么竟会出了那么一个点子，让我去上学？！

鸡叫头遍的时候我们到了家。但一进家门便把我愣住了。深更半夜的，一家老小却几乎都在院里，哥嫂们正忙着把大哥屋里的一些什物拿出来往驴身上驮，母亲嚤嚤啜泣，

几个侄男侄女像受了惊吓的小鸟,躲在大人身后,怅然若失。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待细问,只听四哥嚷道:“我找这‘瞎子’去,问他讲不讲理!”这可把母亲吓坏了,一把位住他,不但不要他去,还要他也连夜逃走。否则,老大走了,倒霉的就是他。

“瞎子”,是我们这一保的保长,只是眼珠子有点斜,并不瞎。因为其办事不公,乡亲便抓住他那点生理缺陷,叫他“瞎子”。“瞎”,在老家音为“哈”,与“坏”同意,如庄稼受灾称“瞎了”,把品质不好的人称“瞎怙”、“瞎拐”等,并不单指五官上的缺陷,而是一语双关。不过,让我说,乡亲们还是客气了,他岂只“瞎”,简直就是一霸。听母亲说,有一年父亲回来,带回一架大座钟。那时候,这东西在山里便成了洋玩艺儿,惹得全村人都来看,“瞎子”说:“给我吧,免你一年的田赋(公粮)。”父亲说他买的时候就把“乜贴”(意念)举下了,是送给清真寺的,并答应回到北京再买一个托人给他带回来。可谁知父亲回京不久这抗战就开始了,音讯全无,哪还谈得上给他带钟!结果,他三年之内就叫我家出了两个兵。除老二、老三身有残疾,是免役,老四正读经,母亲不忍其半途而废,而大哥又是家里唯一的精壮劳力,不能去,便只好由保里雇人去。但雇一个兵是多少钱,却只能由保里说了算。先先后后,一共整的我家卖掉了80多亩好川地,还把楼上的所有木料折价拆了去。听大嫂说,拆楼的那天,来了好些人,就跟抢一样,临走时还把她屋里的一个工艺精细的刻花铜鞋拔子拿走了。说“你们这种人家还能用上这东西”!如今又说我家“中签”了,要再出一个男丁去当兵,岂不是明摆着的讹诈与欺人!母亲说:“这哪是要兵,分明

是要命,你们能走的就都走吧,看他‘瞎子’能把我咋!”

大哥走了。他把他的一家全带走了。大嫂抱着孩子骑着驴,一把鼻涕一把泪;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跟在驴后面,一步一回头;大哥担着锅碗瓢勺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一声不响,我的脑海里不知怎么一下便闪现出一幅流亡图,像我归来的路上那些逃难的人群,也像我在沦陷区常见的那些为躲避日军蹂躏而东躲西藏的老百姓。“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为什么不管走到哪儿,吃亏受罪的总是那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呢!

十五

大哥走后,四哥也走了。他是在一个夜晚被村中一阵剧烈的犬吠惊醒,慌慌张张拿了他的几本经,越墙而去。可是,那一夜抓兵的人却未到我家来,真不知这“瞎子”捣的什么鬼,以致连一向沉着冷静的母亲也有些不安了。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娘俩也出去躲躲吧!”于是便领着我去了大姐家,但没住几天,她又领着我去了二姐家,就这么来回转,反正不回家。可这对我来说却是最开心的日子。我的两个姐姐,一个住在西沟,一个住在王阁村,都在关山脚下。大姐夫是个猎户,二姐夫则是个家道殷实的农家,有良田百余亩,还开着一座油房,身不动,膀不摇,连一摊子家务都交给我姐姐主持,我姐一见我们去了便做许多好吃的东西款待我们,可我却从心眼里喜欢大姐家。大姐与大姐夫是二婚,但俩人的感情好,亲密无间,整天乐呵呵的,只要你一踏进她家的门,便让你情不自禁地融入他们那和睦的家庭气氛里,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特别是大姐夫,我一去便领着我上山,教我怎样使唤猎枪,怎样在那一望无际的松林竹海

里辨认各种野兽的不同踪迹。有时,走远了,回不来,便到烧木炭的那些人的窝棚里借宿,和那些山里汉子一起点燃篝火,把打来的野物剥去皮毛,掏掉五脏,悬在火上,然后再煨上一罐茶,一边喝,一边聊,待到那些野物被烤得嘶嘶作响、滋滋冒油的时候,便把它们取下来,一一撕开,沾上盐,大口大口地嚼下去。那滋味如今想来,仍让人馋涎欲滴。

山,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仁,胸怀宽广,博大憨厚;水,则代表着智,聪灵秀逸,柔可克刚。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也!但我却更爱山。我总觉得山的丰富内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不仅是雄伟,不仅是深邃,也不仅是它那一望无际的苍莽耸逸,而是当你走进它那绿浪翻滚的海洋时,它所赋予你的那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是心中的那片寂静,那片晶莹。风吹竹林,有沙沙声响;瀑布挂石,直落深潭。很多时候,山都是无声的,惟溪水之潺潺,惟草叶自顾自地摇摆时,乘风弄翅,所发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声音。每每于此,我便想到:我是否应当小心翼翼地轻扣山门,问一声:“大山,我可以进来吗?”

山,是说不尽的。不过,真正使我刻骨铭心地震憾过的还是老家这大关山。那还是一次未得赶回的山中留宿,在烧炭人的窝棚里吃饱了,喝足了,姐夫忽然一时兴起,要带我去看日落,我们一起跑上峰之绝顶,在一处“一览众山小”的地方坐下来,往西望去,那血红的太阳啊,正点燃了半天的流霞,也正点燃了大关山那特有的苍茫。云,披上夕阳,在你脚下缭绕;山,便有如海市蜃楼那样,不时变换它那红绿相间的颜色,也不时变换它的姿态,风情万种,气象万千。有时,一阵风来,那被染红的山系便犹如一片赭红的海,汪

洋恣肆，直泻苍茫；有时，它又像我在张北草原看到的那些气势磅礴的马群，漫过云海，奔腾而来。莽莽之中，那种落日余辉中的紫烟袅袅，那种夕阳徐徐落进山谷的空旷寂寞与凄凉，让人至今难忘……突然，一声凄厉，几只归巢的鹰，就像这苍山云海中的一个精灵，自天边，自云底，或自林海的深处，忽地蹿出，如游龙，亦如闪电，掠过群峰，掠过急流高挂的峡谷，直上蓝天；接着，几转盘旋，又直下云海，只要是它所到的地方，那山也动，云也动，人，仿佛就在那山与云的动荡中颠簸，摇啊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你脑子却是一片空白，忘记了世间的喧嚣，也忘记了人间的恩怨、痛苦与烦恼。山啊山！老家的大关山，正以它那特有的姿态抒发着它的胸怀、力量，展示着它的奇妙，也展示着它那无与伦比的气宇与精神。

“乐不思蜀”，也乐而忘返，一晃就是几个月过去了。忽一日，三哥跑来对母亲说，平凉“师管区”派来接兵的那些人已经走了，“瞎子”也始终未到我家来，所谓“中签”一事，大概是“瞎子”吓唬我们，他要母亲回去。母亲只是“唔”了一声，全无任何回去的表示。后来，眼看快过年了，她才对我说：“也许真的没事了，要不我们回去看看？”我正玩得高兴，但也只好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跟着她老人家往回走。可是，谁知我们前脚走进大门，还未及进屋，那“瞎子”便大摇大摆地走来了。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个久候于鼠洞前而终于得逞的猫，洋洋自得，也不慌不忙，良久，才笑咪咪地对母亲说：“嬷嬷，（方言音‘麻麻’，既伯母。），两条道你挑，要么，雇；要么，把老四或老大叫回来当兵。但不管咋办，你都得先把小五（我的乳名）交给我，让他们来换，这也是县上兵

役科的主意,我没办法。”他这一招,母亲可能早就料到了,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下傻了眼,把“瞎子”看了好半天也没回上个话来,只是一把抓着我,把“瞎子”看着,看着……忽地身子一软便坐在了那冰冷的台阶上,无声的泪,簌簌而下,脸白得像张纸,一丝血色全无。至此,我也才终于明白,这几个月,她老人家为什么撂下家里的一大堆事情不顾,却领上我去东躲西藏。

大概在我们回家的第三天,母亲终于不得不让“瞎子”把我带走了。这不能怪母亲。因为家里除了仅有的8亩山地与现住的房子外,“山穷水尽”,不可能,也没有那个力量再雇一个人去当兵了。我走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娃呀,你可要‘护食奴’(原谅·谅解)着,妈可的确再也想不出个办法了!”和我与生母别离时的情景一样,她老人家也没有哭,没有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走出屋子,又走出院门,一脸的沮丧,也一脸的愁云。

人生自古伤心事,莫过生别与死离。但正是需要母亲呵护与教育的少年时代的我,却生生地离开了两个母亲,这究竟是生不逢时,还是命该如此呢?说不清。不过,现在想来,倒觉得命运之神的这种安排,也没什么不好,它毕竟使我走上了另一种人生之路。尽管这条路要比我以往走过的路更艰难也更曲折,甚至是布满荆棘,险象环生……

2006年5月22日脱稿